

文史资料选辑

——港澳台及海外来稿专辑

第十四辑

(总第114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编辑说明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同属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我国近现代史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难以在内地或国内征集到的。向港澳台及海外征集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领域，我们应努力开拓。近年来，随着文史资料工作的蓬勃发展，这项工作已取得了相当进展。现特选录本会和部分地方政协的有关稿件，汇成专辑。衷心希望各界读者对开展此项工作提供意见，鼎力支持，尤盼港澳台及海外同胞惠赐宏文，丰富本刊的资料内容，为我国近现代史料库藏增添瑰宝。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目 录

· 两 航 起 义 ·

- 两航起义的前前后后..... 张胜航 (1)
- 斗法纪实——两航财产争夺案始末..... 刘敬宜 (25)
- 引子
- 起因
- 双包案的产权问题
- 假买卖，真介入
- 双方战略
- 陈、魏输了
- 刘敬宜传奇..... 华莱士·布朗 (39)

· 耆 年 自 述 ·

- 我是沙场过客——北伐战争回忆之二..... 李汉魂 (46)
- 武昌围城与奉命援赣之际的小闹剧
- 吴佩孚的“秋波”，孙传芳的“梦幻”
- 偏师偏许下浔阳
- 南浔线上铁戈横，驼峰孤山血凝碧
- 马回岭强敌就歼，“联军”“空城计”幻灭
- 赣战中一笔陈帐
- 四军回师武汉，人民锡予荣宠

投考军校的回忆..... 谢冰莹 (73)

一个惊人的招生广告

报名

一点感想

六十年前的往事——当兵的回忆

· 人物述林 ·

我的父亲徐谦..... 徐 英 (80)

怀念竺可桢校长..... 马国均 (90)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 李侠文 (104)

我记忆中的父亲 韩素音 (120)

· 洋行史话 ·

英商太古洋行在华南的业务活动与

莫氏家族..... 莫应焘 (127)

太古洋行的组织轮廓

创立时期 (1867年——1900年)

发展和全盛时期 (1901年——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 (1941年以后)

莫氏家族的变化

· 侨居琐记 ·

旅美杂忆..... 谢英明 (176)

早年的旅美华侨

三藩市唐人街

芝加哥唐人街

关于华侨社团

留美学生种种

· 艺坛谈往 ·

我随尚和玉先生学戏·····郑星垣(201)

拜师

尚先生谈戏

尚先生的几出戏

荷里活寻梦录·····关文清(215)

往荷里活去

“到纽约去找经理吧！”

选角办事处

早期的美国电影事业

寄食“唐人街”

在大酒店切马铃薯

结识一个画家

迁入了艺术之家

“将进酒，杯莫停”

初做“临记”

碰上了施素德美

电影学院的生活

“助导、演员和厨子！”

《蠢侦探》下落不明

不当演员，聊当作家

用平常的文字，写平常的事情

大导演葛莱夫的作风

黄柳霜与黄宗霭

“声声归去莫多留！”

重游荷里活

千面人主演《吴先生》

与美国移民局斗法

两航起义的前前后后

张 胜 航



原中国航空公司
总经理刘敬宜



原中央航空公司
总经理陈卓林

两航起义是建国之初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至今已近38年。本文作者张胜航是原中央航空公司高级职员，曾亲自参与其事。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定居香港后作者与他们多有往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里忆述的是当年起义的经过以及其后错综复杂的护产斗争。

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属国民党交通部的两大航

航空公司。1949年11月9日在刘敬宜、陈卓林两总经理的率领下驾机北飞，成为国民党驻港机构起义的先声。“两航”起义切断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空中补给线，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两航”起义后在香港还留下了大批的飞机与器材、房产、资金等，这些财产引起了国与国之间的诉讼，最后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英国政府用武力抢走了飞机与器材等。当年，我参加了起义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两位老总北飞后，我又留在香港作为中央航空公司临时机构“非常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亲身经历了这场错综复杂的法律斗争。现根据我掌握的材料回忆如下。

1949年5月1日，刘敬宜一大早就来到上海天津路二号中国航空公司总部（自抗战胜利后，中国航空公司从重庆迁回了上海）。

8点多，忽然闯入一位全副戎装的军人，自称是汤恩伯的副官，奉命来见刘敬宜，有要事相商。

刘敬宜处理了手中文件，来到会客厅。

“为什么你们出售飞机票不收金圆券？”来人一见到刘敬宜就大声嚷道。

刘敬宜说：“我们收到通知，说目前市面上金圆券流通不够，可以并行收银圆。”当然，这是理由之一，但主要是因为金圆券贬值，上海市面上人们见到金圆券如遇瘟疫，故民航出售机票亦不收金圆券而收银圆。

来人气势汹汹拍着桌子。

刘敬宜知道他们来此是为了敲竹杠。上海已被解放军包围，朝不保夕，上海的许多富翁都给汤恩伯的军队捐了一大笔“草鞋费”。

等来人怏怏去后，刘敬宜返回写字间对秘书说：“我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请帮我收拾一下。”

中午1点，刘敬宜给“中航”驻沪负责人留下一张纸条，请他们务必保存好飞机器材等，将来移交给新政权。随后，刘敬宜悄悄地携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飞往香港。

刘敬宜到了香港没几天，上海方面来信说：5月1日下午，汤恩伯的部队派人抓了中国航空公司营运部副主任吴志洪、中央航空公司营运部副主任邓士章。

我当时也在上海，是“中航”的职员，与胡志鸿、邓士章都很熟悉。因为“中航”与“央航”为了统一机票价格，常每星期碰头一次，而邓士章、胡志鸿也经常来参加协商票价。他们两人都有背景，邓士章是邓演达的本家，又与汤恩伯本人熟悉，他的材料三天后送到汤恩伯手中，汤立即下手令将他释放了，胡志鸿则与美国人关系密切，经人说情，关了几天后也保释了。

邓士章出狱后见到我说：“简直是一群土匪。我们一进监狱，一股臭气熏得几乎窒息。接着上来几位，二话不说就动手解去领带、鞋带、裤带，根本不把你当人看待……”

刘敬宜知道这些情况后，悻悻地对朋友说：“如果我迟走一步，可能也得被关进监狱，况且我没有邓士章那么多关系来担保。”

二

“中航”与“央航”从1948年12月开始分别陆续迁离上海。

“中航”总公司迁往台南，机航基地迁往香港，“央航”迁往广州。大批的“中航”员工随着公司的搬迁，来到香港。飞机停在启德机场，大批的器材搁在露天，仅用雨布罩着。

1949年6月，香港总督葛量洪发通知给“中航”总经理刘敬宜，香港政府决定征用“中航”厂房。香港民航处也发通知，要求“中航”在一个月将所属机厂迁出启德机场。

当时，英国在香港有三家航空公司，其中最大的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其次是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三位英国飞行员集资购买了两架飞机在港创办的。另外，还有一香港航空公司，其规模更小，仅有一条香港至上海的航线。

“中航”与“央航”的规模，在当时亚洲地区是屈指可数的。“中航”拥有客货飞机75架，其中四引擎“空中霸王”巨型客机5架，每架价值均在50万美金以上，“中航”机航维修保养器材（不包括在美订购的补充器材）约值6000万美金。“央航”总公司8月份从广州迁往香港九龙运动场道，约有40架飞机，其中有6架“空中行宫”客机是刚向美国订购的，已交货2架。

英国人对启德机场停放这么多“两航”飞机自然不放心。据说有一位英国的航空大臣来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停放着这么多中国飞机，就对前来迎接的人大发脾气，说：“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中航”接到这份通知后，致函香港民航处申诉搬迁困难。刘敬宜急忙找国民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郭德华，郭亦束手无策。刘只好找律师向法院上诉，找了一位叫希尔顿（SHELCON）的律师作代理，控告香港政府的不合理征用。

1949年8月13日，经审理后，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认为法律上没有这种征用的条文，香港政府的征用令应暂缓执行。

谁也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香港总督葛量洪召集立法局议员，在会上通过了“紧急法令”。声称根据“紧急法令”重新颁发新的征用令。

第二天，民航处派人封闭了跑道以北的“中航”所有房屋。

刘敬宜得知机场的情况后，召集“中航”机航、营运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刘敬宜说：“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了。为此，我决定所有‘中航’飞机停航。同时，我准备告到ICAO。”

国际民航组织机构分为二种，一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

TA—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另一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后者是代表官方,前者是由各航空公司组成,总部设在加拿大。

刘敬宜给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拍去电报。港英当局慑于刘敬宜在航空界的声望以及“中航”停航的影响,不得不暂时发还“中航”的发动机修理厂,并准“中航”延期三星期作搬迁准备。

危机似乎暂时过去了,但港英当局欲夺取“中航”飞机、厂房的威胁仍象阴云一样笼罩着刘敬宜。

三

1949年10月20日,刘敬宜在香港接到一份蒋介石从大陈岛上空发来的急电。要刘敬宜在26日前速到台北。“中航”的几位负责人得悉,力劝刘敬宜不应在这时去台北。刘敬宜权衡左右,最后,还是决定去。“央航”陈卓林亦接到了电报,称病未去。

10月25日,刘敬宜乘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见到前来迎接的魏景蒙。刘与魏景蒙私交不恶,就悄悄地问魏:“老蒋急急找我来有何要事?”魏景蒙将刘拉到边上劈头问道:“你有没有把‘中航’飞机器材私自运到广西去?如有此事,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回香港去。如果没有这事,那么我就带你去见蒋介石。”

刘敬宜松了一口气,坦然地回答:“没有此事。”果然,第二天,蒋介石一见面就询问这件事。

刘敬宜从台北回香港没几天,又收到蒋介石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即赶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刘敬宜大惑不解,重庆现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中,国民党的军队虽然仍在抵抗,但已朝不保夕,白市驿机场是国民党军用机场,重庆只有沙坪坝机场是民航机场,而且这二机场都不属“中航”管辖。

刘敬宜拿不定主意。他给陈卓林挂电话。刘敬宜与陈卓林关

系一向不错，陈卓林在国民党空军中算是老资格，对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性格非常了解。当他听说刘要去重庆，连连劝阻说：“去不得！去不得！万万去不得！”

由于陈卓林的劝阻，刘敬宜决定不去重庆。

四

我是1949年5月随“中航”迁往香港的。在上海时，查镇湖找我谈话。他暗示说上海即将解放，他不准备离开上海。还说形势已是如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查镇湖当时是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他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航政司科员、军政部航空署航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43年，中德断交，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濒于倒闭，交通部接管后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委任查镇湖为副总经理，陈卓林为总经理。

我到香港后，除了担负“中航”部分营运工作，还协助陈卓林做些草拟材料的秘书工作。1949年9月间，在陈卓林处，我忽然又见到查镇湖，他带着一位年轻人来见陈卓林。那年轻人个子很高，北方口音。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吕明，是周恩来同志派来策动“两航”起义的。

当时“中航”内部，人心浮动。

“中航”从上海迁广州，又从广州迁到香港，职工、技师、飞行员等绝大多数人的家属都在内地，许多人是勉强随公司迁到香港。上海解放后，“中航”不少职员收到上海亲属的来信，言及上海市面安定、生活已有保障，劝亲人回归。这样，大部分人都有回归之意。

1949年后，“中航”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却没有航线可飞。公司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入不敷出。陈卓林每天都是愁眉不展。因为1000多人的工资、飞机的维修都需要钱。当时“中航”

的营运，主要是靠国民党联勤总部包飞机给盘踞在云南、贵州等地国民党残余部队空运银圆、弹药、药品。以支持他们抵抗，作垂死挣扎。云贵多山，气候变化无常，加上没有地面导航，飞行安全无保障，飞行员多不愿飞。记得有一次，接到贵州方面报告，有一架“中航”飞机在贵州触山爆炸。我们赶到现场，飞机已烧得仅存钢架。驾驶员与机上人员无一幸存，皆烧得无法辨认，运载的银圆如雪片一样散落四处。

“中航”的部分高级职员也开始悄悄地准备另谋出路。有些人想乘机捞些钱逃往外国，有些人则表示不愿回内地，也不愿到台湾去……陈卓林也十分清楚自己到台湾去肯定毫无前途可言。

陈卓林，1892年出生于旅美华侨家庭，原籍广东台山县人，青年时代受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思想影响，考入美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陈卓林与林伟成、聂开一等人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返回祖国，建立革命政府的空军，陈卓林被任命为航空局飞机师。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陈卓林担任该校飞行教官，培养了一大批飞行人员。北伐战争中，陈卓林率学员组成直属北伐军总司令部的飞机队，参加北伐作战。后因飞机损伤殆尽，陈转回广东空军工作。

1928年陈济棠割据广东，大力培植空军，陈卓林任空军参谋长。这期间广东建立了飞机制造厂，还生产了一些轻型轰炸机。蒋介石自然对此不能容忍，尤其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与蒋对抗。

陈卓林对陈济棠的割据以及联合广西军阀准备内战的做法，甚为不满。蒋介石暗下派人到广东、香港活动。经陈卓林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的配合行动，1936年7月18日，广东空军6个中队70余架飞机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北上投蒋。

陈卓林对蒋介石是有功的，然蒋却从未信任过他。陈卓林到了中央空军工作后，处处受到歧视、排挤。当年陈卓林一手放飞的毛邦初、王叔铭等人早已升居高职，而陈卓林却始终是一蹶无

名的空军上校。

1943年，陈卓林任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有一次，陈从昆明返渝，随身携带几条外国香烟，准备送给旧同事。飞机抵达重庆后，来了几位航检所的人，在机上发现了一箱奢侈品，硬说是陈卓林的，不仅扣了香烟，不容陈分辩便解往军法处，关了6个月。事后才知是被人诬陷。

陈卓林对蒋介石是又怕又恨。

“中航”在抗战胜利后，经过陈卓林的一番努力，实力渐增，渐与老牌的中国航空公司并驾齐驱。1947年以后，“中航”投入“戡乱”业务和输送“美援”运输，夜以继日地飞行，公司业务畸形发展。1948年11月，蒋介石授予陈卓林以宝鼎勋章。

然而蒋介石对陈卓林并不放心，早有特务密报，说“中航”内部有共产党活动，陈卓林有“通共”嫌疑。“中航”自迁到香港后，接连发生飞机北飞行动。蒋介石几次电召陈卓林到台湾述职，陈皆以身体欠佳而回避。

当陈卓林在徘徊、权衡之时，他的老朋友查镇潮登门拜访。查与陈是多年同事，了解陈卓林对蒋政权的不满，鼓励他投向人民，向他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争取两航全体起义。”

陈卓林表示同意，并要求起义时间愈早愈好。

起义时间为何定在11月9日呢？当时有一说法：英国政府要在11月11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认为，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必然要动手抢这批飞机。因此必须赶在11月11日之前起义。

我参加“中航”的起义准备工作。“中航”方面，陈卓林直接抓营运部，营运部主任是邓士章。邓是1946年进入中央航空公司的。他与共产党早有联系，1949年4月他曾利用“中航”的飞机将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将军家属由上海秘密运至北平，为此被上海警察局拘留。邓是起义的参加者与组织者之一。

机航方面负责人是陈文宽。陈原在中国航空公司任机航组副主任，并担任过蒋介石座机的驾驶员。陈文宽飞行技术优良，富有组织能力与事业心。他因不满“中航”华裔飞行人员与外籍飞行人员待遇不平等，而接受陈卓林的邀请参加“央航”。陈卓林曾单独找陈文宽，劝他一同回去。陈文宽回答说：“我不赞成，但我也反对。请准我三个月的假期。”

当时，我的工作是为安排部分员工回国，并把一些打算运回去的器材准备好。我们都认为起义后，“中航”的飞机将投入国内航线。陈卓林让我安排一些在业务上能独挡一面的人先回去，管财务的是林正卿（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毕业）、徐冯嘉（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毕业），负责营运的是张振、郁曾楠（上海商学院会计系毕业），他们大都担任过站主任。我要求他们多带一些客票、货运单以及进帐的报表等，机航方面则将飞机的备用器材包装好。

为了协调，我与邓士章等人商量让“央航”的机航、营运人员互相见见面。因为营运与机航人员在业务上素无来往，我们将大家召集在香港何文田约道三号开会。见面时，虽没有深谈具体问题，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五

“中航”方面的情况，大都是后来刘敬宜告诉我的。

上海解放后，陈毅派了二人到香港。

他们到香港后，见到了刘敬宜，说他们是陈毅派来的，并分析了国内的形势，劝说刘敬宜起义。这二人，刘敬宜都认识：一位是原中国航空公司法律顾问杨六凤，一位是曾在国民党航委会任过职的，叫张志航。

刘敬宜心里有些怀疑，因为1949年香港市面上形形色色的骗子很多。刘敬宜听了他们的介绍后，半信半疑说：“我不能凭你

们几句话就相信你们是上海陈毅派来的代表。”刘敬宜采取了不拒绝也不同意态度，虚以委蛇。

随后，便是查镇湖与吕明前来拜访。

吕明早年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考入国民党空军。国民党航委会以美国租借法案的名义派了一批人员去美国学习驾驶B—29型轰炸机，吕明经挑选，亦被派往美国。1946年回国后，调杭州笕桥航校任飞行教官。

吕明做学员时在美国认识了刘敬宜。当时，刘敬宜曾数次到学员驻地视察，与学员一起合影。

吕明一见到刘敬宜便称之“刘老师”。

“我不认识你呀。”刘敬宜摇摇头说。

“刘老师，在美国，有一次我们所有学员在营地门前列队接受您的检阅……”吕明谈起在美的情景……

“哦——”刘敬宜关切地询问旧日在美培训的学员情况，师生之情使彼此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刘敬宜对这批学生是有感情的，回国担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后，他还把许多学员拉入“中航”工作。

“国内的情况怎样？”刘敬宜自从仓促离开上海后，每天仅从报纸上了解国内的形势。

吕明是一位口才极好的人，他谈起解放战争的形势，谈到上海解放后两航员工的情况，谈到旧中国民航事业的坎坷，谈到新中国民航事业之前景……

吕明来此之前，曾通过中国航空公司的地下党了解了刘敬宜的情况。刘敬宜一辈子搞技术，学有专长，同一般的国民党政客、官僚不一样。吕明还听说刘敬宜接手“中航”时，曾不顾外籍驾驶员的反对，拉平了中外员工的待遇、开除了一些不守纪律、玩忽职守的外籍职员。刘敬宜事业心很强，他不满意目前的现状，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又害怕“中航”偌大的资产落入他人手中……

“刘老师，我是周恩来副主席派来的。”

刘敬宜大吃一惊。当时吕明才27岁，英气勃勃。刘敬宜不敢相信如此重任会由一位年青人来挑。吕明思路敏捷，针对刘的处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航”留在香港毫无出路，目前由于国内航线中断，“中航”已无法维持正常开支，只有回到国内，才有发展前途。吕明谈起共产党决心大办民航，可又缺乏人材、飞行器材，恳切希望刘敬宜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民航建设。

刘敬宜被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打动了。他提起上海陈毅曾派人来过。

吕明说：“杨六风那边，已不再来，今后由我与你联系。周恩来让我转告您，希望刘敬宜先生能以大局为重，他在北京等候您的消息。”

为了摆脱“中航”内外交困的处境，刘敬宜曾闭门苦思冥想，寻找出路。他十分感激共产党在这关键时刻为他指出一条通向光明摆脱困境的道路。刘敬宜是一位在旧社会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他非常讲究忠孝，讲究民族气节，所以当吕明晓之以国家、民族大义时，刘敬宜一语未发，陷入了深思。

刘敬宜与吕明仅见面几次，后来他曾多次提起吕明。吕明的坦率、干练、机智使刘敬宜从年轻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新中国的未来。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因为这关系到1000多职员……”

“陈卓林总经理已经表示同意，现在就看刘老的态度……”

11月7日晚，吕明与何凤元等人再次拜访刘敬宜，彻夜长谈。刘敬宜终于打消了顾虑，同意参加起义。

六

吕明与查镇湖于11月8日搬入九龙半岛酒店。“中航”、“中航”都召集过部分上层骨干会，讨论起义行动计划以及起义后的

善后工作。

北飞的飞机中，最大的是“中航”新购的“空中行宫”号，这种飞机是当时最好的飞机，时速240英里。“两航”北飞人员将乘这架飞机，由潘国定担任正驾驶员。

11月8日，“中航”的营运业务照常。

国民党联勤总部一早就派人来订飞机，准备往云南空运药品等。我当时经手签订这最后一批合同。我对来说：“明天有飞机。”11月9日，当我们的飞机北飞，所有航班取消的消息传开，联勤总部的人急急忙忙来质询，说：“你们怎么拿合同开玩笑！”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事先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飞机要北飞，自然不会订合同。”

起义前，机航飞机航班照排，标上正副机师的名字。当时“中航”的正驾驶员大部分是外籍的，每次飞行前都住在半岛酒店。深夜一点，逐个叩门通知，“因气候不好，明天航班临时取消”。这样，他们蒙头睡觉，我们另外安排一批机师。

11月9日凌晨，我很早就起床，匆忙漱洗后，从香港佐敦道出发，开着汽车去接徐冯嘉、林正卿到机场。在机场等了一会儿，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镇湖等人也都到了。

我陪陈卓林、邓士章上飞机。过海关时，陈老总急急忙忙，忘了拿一瓶果子盐，海关人员叫回陈卓林问：“这是什么东西？”陈卓林说：“这是用来清洗胃肠的。”司机从汽车的后车厢中搬下一筐水果，水果筐上的片子写着：“台北——端木杰部长笑纳。”

过了海关，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陆续登上飞机。清点人数时，发现“中航”的张振（营运组专员）未到，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焦急，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他来，正准备关上机舱大门时，我突然看见张振拖着行李急冲冲跑来。

飞机发动机轰鸣声震耳欲聋。

我急忙做手势通知机上人员打开舱门，一边对张振高声喊道：

“你快爬上飞机，不要管行李了，行李由我处理！”

张振点点头，手忙脚乱地爬上飞机。飞机关上舱门，缓缓前行，驶向起飞线。

“中航”的飞机也隆隆发动，我招呼地勤人员将张振的行李搁在后面的飞机上。地勤人员自然不知道我们的飞机是同一目标，飞向北京。他们对我说：“不行！前面的飞机是去台北，后边的飞机是飞贵阳的！”

我扯足嗓音说：“不要紧，你们帮助装上。我们可以通知贵阳方面转。”

机场上空云雾低沉，能见度差，飞机沿着跑道一架接一架起飞。我朦朦胧胧地看到机场外铁丝网处，有一年青人拿着望远镜在窥视飞机起飞……目送飞机全部起飞，我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刘敬宜告诉我说：飞机刚起飞，陈卓林就从口袋掏出水果刀，到厕所及后舱仔细查看了一遍，他担心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机上。

当天中午，飞机在北京西苑机场降落，李克农代表周恩来前来迎接。起义人员下榻于北京饭店。聂荣臻、刘亚楼等人前来祝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周恩来副主席紧紧地握着刘敬宜、陈卓林的手，激动地说：这一正义的行動的重大意义与影响是十分强大的，抵得上200万大军，大大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毛主席给陈、刘二人写了贺信。

香港方面，我们组织了几个小组分头慰问北飞人员的家属，给陈卓林、刘敬宜、潘国定、路家玖等人家属送慰问信和水果等。“中航”为了处理日常事务，安定职工情绪，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我是“非常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航”则成立了“顾问委员会”。

随后，我们迎来了一场错综复杂而又冗长的法律诉讼。

七

“两航”起义的消息刚见报，蒋介石电令在重庆的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赴港处理。空运大队陈纳德与副总经理魏劳尔飞赴台北与蒋介石商议，国民党外交特派员郭德华急急求见港督葛量洪……

11月13日，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交通部部长端木杰从台北到香港，任命沈德燮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戴安国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并在报上发表通告，要求“两航”员工前往代办处重新登记，并以发薪水为诱饵。

“中航”、“央航”自两位总经理率机北飞后，全体员工通电起义。刘敬宜、陈卓林到了北京后立刻拍来电报，勉励“两航”留港员工加强团结，虚心学习，以便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为中国民航事业努力。11月12日，周总理宣布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同时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为了保护“两航”留港飞机与资产，“两航”成立了纠察队。

“两航”在香港及美国均有一笔资产。据刘敬宜的记录，香港启德机场，尚有“中航”31架飞机（DC—4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7架、PBY客机1架），仓库里有备用发动机100多台以及各种飞机零件。另有“中航”购置的产业：庇利船厂在机场附近新建的仓库、发动机厂，在美国尚存有汽油现款。“央航”在港有39架飞机，值数百万美金的飞机零件，还有二架已付款却尚未交货的“空中行宫”号飞机。

国民党方面不甘心让这么一笔巨大的财产落入共产党手中。沈、戴二人几次企图强行接收“两航”香港办事处，都被起义人员拒绝。11月24日，沈、戴二人委托高露云律师向香港高等法院投

诉，控告“中航”何守荣等20人，“中航”王新章等16人“霸产”，“劫持”“两航”在港飞机及器材所属资产，并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中航”、“中航”员工靠近这批飞机，扣押“两航”在港一切财产与飞机器材。

我们接到法院的“禁制令”后，召开了“非常委员会”会议，决定委托刘瑞骥、梁锦涛律师向法院申请“反禁制令”，禁止原告（沈、戴）进入“两航”公司。

八

12月12日，香港《中国邮报》、《星岛日报》刊登消息，曰：“中航”的“空中行宫”飞机失事，刘敬宜、陈卓林等人丧生。

此时，刘敬宜、陈卓林已来到广州，并电召香港“两航”部分中层干部去广州商讨有关工作安排。这时期，“两航”由于财产、资金冻结，职工薪水发不出。刘敬宜将情况报告周总理，北京即电汇600万港元。刘敬宜特意电告，要求大家“撙节使用，千万不可以浪费”。

12月19日，原美国空运大队的陈纳德、魏劳尔突然在香港宣称：国民党驻英使馆已通知英国政府，关于“出卖”“两航”资产给陈纳德。以350万美元的代价“购得”该项资产。当天下午，陈纳德拜见香港总督，要求加入国民党控告案的原告一方。

香港高等法院批驳了陈纳德的请求。

与此同时，陈纳德执4张期票以390万美元将“两航”资产转手给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简称CATI）。该公司据查是1949年11月30日在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注册，经理白乃伦，原系陈纳德空运大队董事之一。白乃伦在办完所谓手续之后，声称：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已重新在美国登记，要求香港法院予以保护。并聘请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顾问杜洛云抵港充当该公司法律顾

问。

这一步棋完全是国民党当局一手导演的。这是他们害怕“两航”资产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采取的步骤，他们的用意是希望美国政府出面干涉。

九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沈德燮、戴安国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原告已不复存在，沈、戴二人聘请的高露云律师也因当事人离去匆匆，撤销了此案。

此案撤销后，我们要求解除“禁制令”，并要求台湾方面赔偿扣押期间所造成的损失。

1月5日，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又向香港高等法院投诉。这次他们变了手法，先控告陈纳德、魏劳尔不把“两航”财产交出来，并请求法庭批准接管“两航”资产。

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演了一出“苦肉计”，将“两航”36人作为第二被告又拖入另一案子（陈纳德告“两航”霸产一案）。这样，变为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告陈纳德，陈纳德告“两航”员工。

1月9日，法庭宣判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败诉。理由是：在没有当事人（即“两航”方面）出庭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受理。

1月22日，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重新上诉，并在被告方面再加上中央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

2月1日，法庭开审。这一天香港所有出名的大小律师都云集法庭，香港报纸称之为“司法界一大盛事”。

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请了高露云、大律师廖亚利孖打、麦尼尔、胡礼；陈纳德、魏劳尔请布律端大律师；我方请了梁敬陶、陈丕士、贝纳祺、波打大律师。

双方在法院上各不相让，唇枪舌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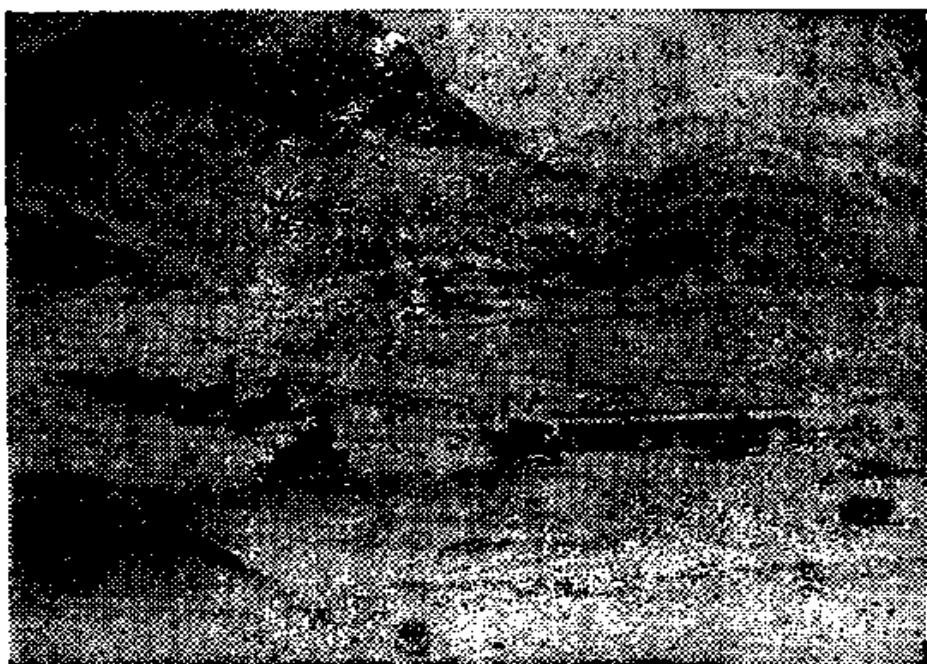
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在判词中指出：由于有关方



中国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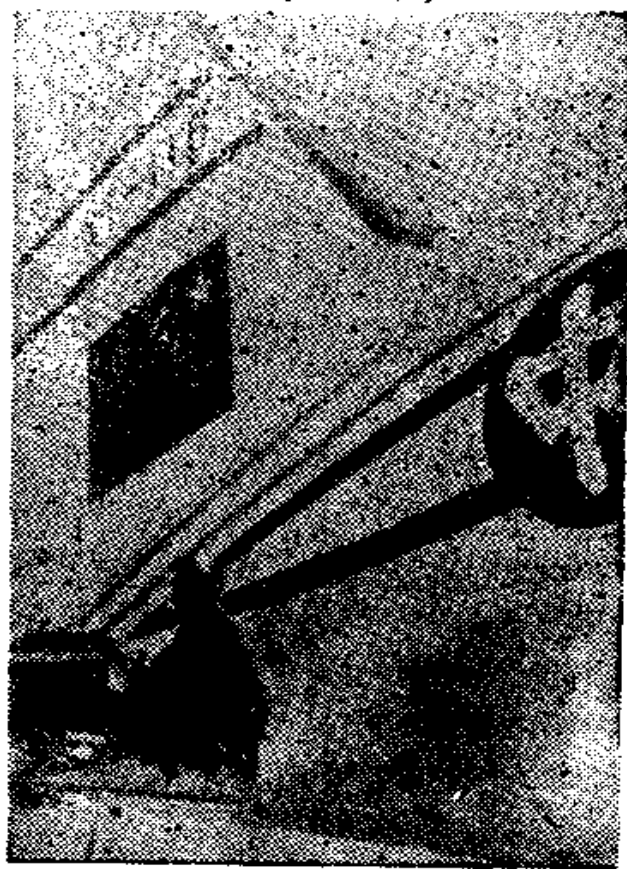


中央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



香港启德机场南区（1949年）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日，国民党特务炸毁飞机七架。图为飞机被炸后的情形。



面并未全部出席，且原告所提出的证据不够充分。中国航空公司不属于国民党政府，“中航”是私人性质与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故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权售卖“中航”产业。中央航空公司原属国民党政府，作为一主权政府，有“豁免权”，政府是不能作为被告上法庭受审的。在判词中还指出，台湾方面召开“两航”董事会将财产卖给陈纳德、魏劳尔，这么重要的会，应由全体董事参加决定（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董事在香港、内地）。

法庭批驳了美方的上诉，并宣布解除1949年11月23日的“临时禁制令”。

十

2月23日，我在“央航”办事处听到“临时禁制令”取消的消息，不禁松了一口气。“临时禁制令”的取消表明我们的官司赢了，“两航”的财产可以转移了。

启德机场上的飞机，由于停搁时间久了，有些机件已生锈了，我们马上通知机械员加紧维修，给发动机试车，随时准备飞回去。

3月上旬，中央军委民航局特从京、津两地抽调原“两航”飞行人员约30余人来港准备将留港飞机分批飞回内地。

一切都准备就绪，在办理“适航证”时，香港民航处却不予办理。他们借口：飞机尚属两国家之争议，（即中国登记注册，另一说在美国注册）在这种情况下，飞机是双重国籍，不予办理，飞机要起飞不行，但如果用船运走，他们不管。

这很明显是刁难，拖延时间。当时我们国家没有大轮船可供运载飞机。我们只能将一部分未动用的飞机器材装船内运。

美国民航空运公司见“两航”备用器材被运走，急忙又上诉，并要求港府再下达“禁制令”。

台湾方面也不甘失败。4月2日，凌晨约4点，我听到机

场方向传来爆炸声。急忙赶到机场，看到停放在机场边上的七架飞机遭人破坏，有人安放炸弹……

事后，我翻阅了香港德臣西报(英文版)，上面有一则消息谈到此次爆炸的原因，据国民党驻港特务言，破坏飞机是为了阻止飞机落入中共手中的计划中一部分。另有消息说，为了对付解冻时期中共搬运“两航”财产，台湾的特务头子已下令驻港特务“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

原来机场的警卫是依靠港英警察，飞机被炸后，我们立即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纠察队约200人进驻机场。

周总理就飞机被炸事件发表声明：我国民航飞机7架，在由英警负责警卫的香港军事禁区内被炸毁事件，香港政府应负完全直接的责任……

1950年5月10日，在美国民航空运公司的所有起诉皆失败后，英国枢密院插手其中。枢密院向香港最高法院发出“枢密院令”再次冻结“两航”的飞机与资产。

5月17日，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英驻京代办提出严重抗议。

十一

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介入，使“两航”的财产争夺案更加错综复杂。

美国民航空运公司不服，1950年5月19日，又寻找不同理由控告“中航”。

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言不必再参加法律诉讼。因为从前几回的诉讼中，每次都是我们赢了，“临时禁制令”也取消了，可最后又来一道“扣押令”。显而易见，这样的诉讼毫无用处，白费精力。

1950年9月12日，高露云律师楼派人送传票到香港皇后大道

中“央航”办事处，我们拒收。香港高等法院遂询问港府，港府辅政司回复，只要将传票搁在“央航”办事处门口，收不收都一样。

我到办事处见到这张传票，就拟了一封回信给辅政司，大意是：在中央航空公司门处地面上拾到一张传票，收件人为中央人民政府。我办事处并无责任传递此项文件。盖是项传票，系英国政府行政命令签发，基此，理合连同该文件备函退回，请查收。

过了几天，辅政司回了一封信，言“这份东西是法院给你们的，我们作为行政机构不干预法院的事。”我们拒收传票，不出席法庭审理，法院发来通知，言如果没有人参加，高等法院可以在缺席的情况下照样进行审理。

台湾方面得悉我们不出席，对此很高兴。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外交部部长叶公超、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交通部副部长刘绍鼎、交通部航政司司长黄浣以及陈纳德、戴安国等人都书写了“誓章”（即宣誓不得改动的证词）。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的总经理还特意去伦敦聘请英女王的御前大律师蒙克顿爵士，在开庭前经过一番精心准备。

1951年3月27日，法庭在我方缺席的情况下开庭，英女王御前大律师在法庭上宣读辩词洋洋洒洒长达57页。大谈买卖“两航”财产权的合法性。

然而这次他们仍旧输了，法庭以(1)财产交易在进行时，即把“央航”转手倒卖时，“央航”事实上已由人民政府控制；(2)整个买卖是对人民政府存有敌意的；(3)经手买卖的官员如阎锡山等人已被新政府撤销，根本无权参与买卖。据这三点判决此项买卖不合法。

这样，沈德燮、戴安国、陈纳德、魏劳尔以及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上诉的所有诉讼案全部以败诉告终。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

十二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美国将干涉朝鲜内战。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两航”财产更成为一极敏感的焦点。美国政府从后台跳入前台，直接干涉“两航”财产归还。

6月1日香港《文汇报》刊美联社29日电，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讲，对于停放在机场的40架飞机（指央航）所进行诉讼案子，预料所进行的法律手续，可以使香港方面至少在一年之内不能将飞机移交中共。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凯斯写信给国务卿艾奇逊，要求国务院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阻止这批飞机移交到中共手中，尤其在韩战时期……

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秘书宣称，陈纳德将军可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如果失败，还可以向英国伦敦枢密院上诉。在飞机的所有权最后决定之前，英国政府应该命令香港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批飞机离开香港。即使法律步骤完全失败了，也不能让飞机落入中共手中。

美国民航空运公司在香港的所有诉讼都失败后，遂准备上诉伦敦枢密院。

在这期间，美国法院将“中航”及“央航”在美国的资产判归陈纳德。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

香港政府增派警察封锁“两航”留港飞机及机场的房屋及仓库，严禁人员出入，并欲强行清点“两航”新亚、庶利仓库财产。

1952年1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同意美国民航空运公司上诉，5月3日经合议庭批准。7月23日，英国枢密院开庭，听取美国民航空运公司的陈诉。

在开审前，香港报纸一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这次审判结

果将有利于陈纳德方面，香港政府已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来完成飞机的移交。

果然，7月28日，英枢密院宣判，推翻香港各级法院的判决，将“央航”40架飞机及零件判归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当时仅以口头判决，说因为“韩战”爆发，停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的40架飞机，其本身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正式判决书是至10月13日才补交我方。

7月29日凌晨1点，香港包括新界的水陆军警全部出动，包围了启德机场以及“两航”存放器材的仓库。警察手执棍棒，将我方纠察队员从睡梦中打醒，连推带打押往警察局。

“两航”自起义后，留港员工已分三批复员回到国内，剩下的人员留守保护资产，遂成立了“两航联合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听说纠察人员被带走，急忙赶到警察局，被阻于门外。尽管事先已有风声，仍有措手不及之感。

直到天亮，香港警察全部接管后，才宣布开始释放我方纠察人员。其中有一位伤势很重，被送入医院。通过他，我们了解了前前后后的情况。

我们一方面电告广州，请示领导，并与被拘禁的纠察队员联系，送食品、水果。我方纠察抗议香港当局的暴行，拒绝出狱以示威。这批由香港当地工人组成的护产纠察队在保护国家财产不受外人侵夺破坏的斗争中表现得机智勇敢，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时，我方纠察向警方表示：“对这种无理扣押，我们决定不出去。”

直到下午4点，接到广州方面的指示，我方纠察才走出警署大门。

这场财产争夺案，由英美帝国主义插手，最后导演了一场武力抢夺。抢走了原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全部留港资产，包括11架飞机在内。被当地报纸称为“七·二九事件”。

过了一个月，美国方面安排了一艘来自菲律宾的航空母舰，准备将飞机逐一吊装上船。在吊运期间，机场附近全被封锁了。为了留下证据，我们派人在远离机场的高楼上拍了许多照片，“中航”的邵致和还携一摄影机躲在高楼里拍下美军吊运飞机的情形。这些胶片冲洗后，我都看过，拍得很清楚，后来托人送回广州。

“两航”起义是国民党在港企业公司最早起义的，由此带来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步其后尘的有香港中国银行及10余家银行，资源委员会驻港机构以及招商局。毛主席、周总理都充分肯定了“两航”起义在中国民航史的历史地位，肯定了“两航”员工在新中国民航事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绝大多数员工至今仍在民航战线上默默地工作……正如刘敬宜曾经说过的：“两航起义不是我一人的功劳，而是全体‘两航’员工的功劳。”

（陈海滨 整理）

斗法纪实

—— 两航财产争夺案始末

刘敬宜

作者系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1949年11月9日与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在香港率部驾机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统治。本文是刘敬宜先生于1959年以“说梦客”笔名撰写的，记叙了“两航”起义后，国民党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结盗卖人民财产以及我人民政府与其进行斗争的详细经过。

引 子

1949年11月9日香港发生了空前的事件，“中国”与“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归服人民政府。由此引起了资源委员会、招商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福建省银行等十几家银行的起义，给人民政府带进了绝大的资产与大量的外汇，使国际为之注目，世界为之震动，更促进了英国在外交上对人民政府的承认。

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流氓的野心，先以假买卖式参加双包案在香港诉讼，继则利用国际之法律隙缝，终以政治手腕赢得官司。此事于今十年矣，爰记之以证昨日之黄花。

起 因

1949年10月1日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政治虽有奠定而军事仍在节节进行，国人正以改朝换代视之，而国际间亦以革命政府代替执政政府，此亦国际间之惯例，不足以引世人注目，而促成其提早承认也。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有鉴及此，于是乃派吕明^①南下至两航基地之香港，说服两航人员定期起义。

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于11月8日与机航组主任陈文宽^②商定翌日共飞北京，惟以机航组副主任戴安国^③与蒋之关系，不敢贸然从事。先是戴安国在民航局长任内，极不得意，于是乃辞去局长职而就中央（航空公司）之机航组副主任。其用心所在，多知其意在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也。陈卓林与陈文宽商至中夜不决，于是陈卓林乃携邓士章、陈文惠于9日晨乘 CONVAIR（空中行宫）机去。

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以被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所嫉，横遭港府征用之余，又为蒋之小报告所害，几乎在台被捕。展望前途黑暗，遂为美方同事之言“去台不如留港，留港不如另谋出路”所动，于是乃定与陈卓林同乘飞京，一场轩然大波就因此而生了。

周恩来总理于11月12日首先欢迎二公司归服人民政府并宣布二公司为政府资产，同时任命陈、刘继续任二公司总经理职务。

① 吕明：周总理派来香港指导策划起义的代表，起义当天陪同两位总经理同机飞回，未几病故。

② 陈文宽：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员，时为中航副总经理。

③ 戴安国：戴季陶之养子，时为中航机航副经理。

双包案的产权问题

“两航”起义后，所留在港之资产计：中央航空公司飞机39架，飞机零件、公司产业值港币数百万元，尚有在台湾之无线电台与留在大陆之财产，另在美国还存有现款，留美未交之“CONVAIR”2架，其共值约美金数千万元。“中航”计飞机32架，中有4架“霸王号”，备用100台飞机发动机，零件无数。“中航”产业“BAILEY”（即庇利）船厂（及至1952年判给陈纳德）在启德机场新建之大仓库、修理厂、翻修发动机厂已于1949年夏先后为香港政府征用。其在美存有汽油及现款，另有“中航”在旧金山华员住宅一所。现停放在启德机场的飞机：中航（CNA-C）飞机有DC-4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7架，PB11 1架，共31架。央航（CATC）飞机有CONVAIRS-240型5架，C-46型18架，DC-3型运输机17架，两公司共71架。

此庞大资产引起中外之野心家注意。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陈文宽不为蒋所信任，总经理一职竟为戴安国所得。“中航”方面秘书主任王助亦具野心，然以为刘氏所信，总经理一职归刘氏之前任沈德燮氏。于是戴、沈二氏携资在港即竖起旗杆，大招两航之人马“来归”。

“两航”人员于二总经理飞京后，即自组委员会代行总经理职权，并通电附和起义、效忠人民政府。“央航”组有“非常委员会”，“中航”组有“执行委员会”。此二委员会拒绝与戴、沈联系，且占据二公司办公地点，不纳戴、沈二人派员进入公司内，正式变为夺产问题。于是沈、戴乃控于（香港）法院，并提名两公司人员霸产。两公司人员以先入为主的姿势颇占上风。

是时，有传英国将最先承认人民政府之说，如果实现，则双包案之夺产官司可立即解决，把野心家之心火扑灭，乃不料英国

延至1950年1月6日始宣布承认，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带给野心者绝大的机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假买卖，真介入

话说戴安国、沈德燮二人到港以后，花了许多不明不白的钱，想把这份大产业夺到手，可是连公司的大门都进不去。于是乎从保护这份产业的心理变成了破坏这份产业的心理。一方面指使人用炸药来破坏飞机（这是1950年4月2日发生的事情），一方面要国民党民航局代理局长左纪彰通知香港民航局把所有留在启德机场之“两航”71架飞机之登记证与适航证取消。如此则香港政府可以有权扣留飞机不放。同时香港法院因戴、沈之控诉二公司人员，也发表了法院的扣押令（即禁制令），也就冻结一切现状，不准移动，听候法院的判决。这都是1949年11月间陆续发生的事。

在这种鹬蚌之争中，渔人也作了另外的打算。大家都知道民航大队是陈纳德办的，大战之后陈纳德已卸任美第十四航空大队，国民党政府颁给高级勋章多枚以酬其功。陈则进一步要求组织民航大队。是时中国已有“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以之应付国内外航空运输尚有余力，因无必要再组织第三航空运输机构也。此种建议为当时之交通部及“两航”公司之反对，以其有碍PAA（泛美航空公司）利害所关之中国航空公司之发展也。

蒋氏不顾一切反对，仍然一意孤行，准许民航大队成立，有效期间为二年，划定民航大队之业务专运当时战后美援物资，由中国海岸运至内地。成立不及一个月，陈纳德借口以飞机由内地空飞回至海岸不经济，请准由内地搭货飞回海岸各地。此为第二步之扩充计划。不几日，陈又与山西省政府订约（因阎锡山原为民航大队之股东），可代山西省政府航运物资由海岸至山西，并可由山西土产由山西运至海岸。此为民航大队第三步计划，虽有

二航空公司反对亦无效。第四步计划为邮政局订立合同，代运各地之邮件、兼运小件包裹。于是商货兼收，无地不可以去，无货不可以收。其业务与二航空公司无异，且民航大队之业务蒸蒸日上，有夺两航空公司之领导权之势。其所以然者，盖另有原因在也。

(1) 以当时外汇缺乏，而飞机零件与汽油之消耗全仗外汇。“两航”公司所分得外汇既有限制，则飞行钟点自然也有限制。民航大队航运美援物资，则有美金进帐，更有美金补贴，在经济上已操胜券。(2) “两航”公司所有飞机零件与汽油之进口，均照一般进口货缴付关税，而民航大队则享有豁免之权，且无迟延提取放行之误。(3) “两航”公司对政府有纳营业税与所得税之义务，而民航大队则又不与焉。(4) “两航”公司对政府所颁政令，必须奉行，稍有不合，枪毙有份；而民航大队公然走私黄金、钞票，以邮政局邮袋为掩护（向例邮袋必须在邮局封拆，而民航大队则以民航大队所在地为邮袋封拆），在上海以虹桥机场，在广州以天河机场为基地，场内不准海关人员进入检查。更使“两航”公司不敢接运之业务，多拥至民航大队之门。

民航大队第一个二年期的合同于1949年满期，民航局与“两航”公司都反对再续，可蒋又答应续2年，改名为民航空运公司。这个时候，华北山西解放了，民航大队的股东们见大势已去，与陈纳德拆了伙。华东、华南解放以后，地小机多，有翅无处飞，陈纳德正在当铜卖马中，见“两航”起义，引起了他的野心。可是双包案中之产权问题与民航空运公司风马牛不相及，如何介入呢？这是陈的伙计魏劳尔的杰作。

魏劳尔在美为一无藉藉名律师，论财则不名一文，论胆则全身都是，论冒险则空前未有，固一流而氓者之流也。陈魏二人商量的结果是：(1) 收买“两航”公司之资产，假设的虚有其事的。(2) 再转卖给一个美国注册的公司，以美国对付英国。(3) 以美注册之新公司控告陈魏二人不能交货。(4) 再转告牵及“两航”公司人员霸产不放。如此这般，民航空运公司就

加入了为“两航”公司的产权争夺战中。沈、戴二人也就销声匿迹了。这场法律战争涉及四个政府，人民政府、“国民政府”、美政府、英政府。各方面延聘的律师不下20人，为香港法院空前大案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双方战略

话说陈纳德与魏劳尔的阴谋决定以后，就向阎锡山“行政院长”提出购买“两航”公司的问题，并且又去暗地里许以个人的好处，很容易就得到了阎的赞助。经蒋考虑一番，认为戴安国与沈德燮二人去接办的成绩不佳，认定“两航”情形已临绝境。陈、魏所提办法也只能看作死马当为好马医。以为暂时的由陈、魏出头在香港打官司。败呢，并无大损；若胜呢，则全盘财产归回，自属幸事。因料不到偌大的财产于英国枢密院判决后，统归陈、魏二人私人所有，此案遂成为近代之国际间一大骗局也。

陈、魏所提出的购买条件：（1）购中央航空公司代价为150万美金，分三期付款，每期50万元，年限每期一年，不计利息。（2）购中国航空公司代价为200万美金，分三期付款，第一期60万元，第二、三期各为70万元，年限每期一年，不计利息。（3）上项期票持有人可于本案清结后，掉换同价值之新公司股票（这点证明陈、魏一个现钱都没拿出来）。

上项条件并无现款交易，陈魏二人完全玩弄手法，空手赤拳作成骗局，一转眼间即把拟购“两航”公司之350万美金代价作成380万美金卖给新近在美国DELAWARE州（特拉华州）注册之美国民用航空公司（CATI——CIVIL AIR TRANSPORT INCORPORATED与原有之CAT民航空运大队仅多一字，此为“中国”注册之有限公司，以淆乱世人之听闻），立即赚了40万美金（见1949年12月19日陈纳德所签卖单）。

阎锡山于1949年12月11日连夜与陈、魏共拟成出卖文件，将

“两航”公司之20年经营，上万人之血汗断送了。译文如下：

中华民国行政院 台北 1949.12.12

陈纳德将军
魏劳尔先生 （美国特拉华省法定合伙人）

启者，阁下出价购买中航公司及央航公司之呈请经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当局已接纳。

中华民国政府兹将中航公司及央航公司全部资产飞机、零件、机器、工具以及一切凡属于该两航空公司范围内之其他财产，包括全部政府所占有之股本或其他业主契据等售给并转让与阁下，阁下现系该项财产之唯一所有人。

此项售卖及转让系经阁下洽约而成者。兹证明上述交易以此为最后及完全。本院经咨会外交部准备全部有关此项转售之必须证件，根据尊意而转移与任何外国政府。

其他任何必需以资证明阁下对该项财产之所有权文件，亦经飭令政府全体官员协助办理。

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 （签字）

十二月十二日

（注：本英文函，系法定正本，任何中文翻译属本出之译本。）

睹上文件，顿觉阎锡山对英文一门并不高明，而遽然以国家行政院院长身份签订英文文件，并叙明以英文为法定正本，实在是颟顸荒唐之极。再看文字之意义，字字都有法律意味，必系出于律师之手，铁钉般以卖方之人而维护买方之权益，尤足以证明本文件完全是陈、魏的意思，搞成文件交由阎锡山签字者，更足以了解当时执政者之手足失措，为政失策，为国失去人心也。

12月12日，交通部奉到命令，时部长端木杰已辞职，由次长

刘绍庭召集中央航空公司董事会议于台北，自任董事长，通过“中航”卖给陈、魏所代表之CAT（民航空运大队）。

“中航”同样由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召集中航董事会议，自任董事长，并通过了出卖家。更荒唐的是自己花了125万美金，将PAA（泛美航空公司）在CNAC（中航）所占20%股份清出去，无代价地送给陈、魏。

早在1949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曾就“两航”留港资产事发表声明如下：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直接管辖。

“两航”公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有权处理，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略、移动、或损坏。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神圣的产权，应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两航”留港资财有被非法侵略、移动或损坏事情，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我民航局局长钟赤兵于1949年12月23日就陈纳德、魏劳尔企图非法侵占我“两航”留港财产事发表声明如下：

据香港消息，国民党残余匪帮，企图将我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产业非法盗卖与美籍人士陈纳德、魏劳尔。陈魏二人已据此向香港政府要求窃取并运走我“两航”公司在香港的资产。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总理早在12月3日即已郑重声明……国民党残余匪帮的这种盗卖企图与陈纳德魏劳尔的胡言乱语，当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中航合同的第九章第二节规定，“中航”股权不得让与私人，足见国民党残余匪帮与陈纳德、魏劳尔的勾结是私相授受，毫无根据。我周总理前已指出：……由于陈纳德、魏劳尔企图非法侵犯与移动我“两航”公司留港资产，我们再一次提请香港政府对于这一声明的

注意。

以香港政府的立场来说，对于这宗大案件是相当的头痛与困难的。（1）对人民政府不可欺，对美亦不敢得罪。（2）人民政府认为“两航”资产为国家资产，在国际法上不受外国之制裁，可是资产是停留香港的。（3）陈、魏认为在购得“两航”资产事时，英国仍在承认台湾之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以故此等交易也是合法的。（4）可是“两航”资产为“两航”公司人员所占有与管制。而人民政府又以国家产业关系不能受外人制裁，以故不派代表出席法庭，仅有二航公司人员以第三者之身份被控而提出自辩书。（5）“国民政府”中官员提出誓言证明陈、魏二人为合法之购得“两航”资产继承者，有外交部长叶公超、交通部长刘绍庭、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民航局局长赖逊岩等等。尚有上述阎锡山出售“两航”资产文件，由台外交部传致伦敦外交部转殖民部作为正式文件，以便利陈、魏在香港法院之法律根据。（6）陈、魏由英伦与华府均聘有国际知名律师出庭代为辩护，并请得中国法律家说明其承购两航资产事亦合乎中国法律。

陈、魏方面最坚持之一点，为在1950年1月6日之前，英国是承认“国民政府”的，而买卖是成立于1949年12月12日，以故此项买卖是合法的。人民政府1950年1月6日在英国承认为合法政府以后，只能承继“国民政府”所有遗留下之遗产，而不能否认或否定“国民政府”已卖出之产业。这个在国际法上是无根据的，而且在1949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民航局已将所有“两航”公司之飞机登记证与适航证予以调销，另在美国民航局登记。振振有辞，煞有介事。然为陈、魏辩护律师所忽略之一点，为远在1949年12月12日买卖成立之前，此项资产已由双包案中之双方当事人，请由香港法院于1949年11月19日命令扣押，不得移动，那么如何能成立买卖？怎样去交货呢？再看看买卖的条件，很明显的不是一种纯粹的生意交易。如此不顾卖方之利益，完全为买方之阴谋的政治动态。

陈、魏已知香港法院洞知其奸，深恐官司打不赢，于是以政治的手段，请由英皇直接下令干涉。1950年5月10日英国政府对香港最高法院发出“枢密院令”，将我“两航”在港资财横加扣押。

5月17日，我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特提出严重抗议。以下是章副部长致英代办抗议的全文：

胡阶森代表先生：

5月11日接先生第28号来函并附来英国政府5月10日发出的1950年枢密院对香港最高法院（司法权限）法令及有关该枢密院法令的官方声明的全文。同日据香港确报，香港最高法院已下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所属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停放在香港启德机场的70架的飞机，予以扣押。

查此项飞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不许任何人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损毁、破坏、转移。前经一再通知英国政府在案。英国政府既然宣称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财产，便应当充分予以尊重。现在英国政府这种扣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财产的行为，不仅表示英国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财产毫不尊重，而且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

为此，我特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先生转达英国政府立即解除对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70架飞机的扣押。

专此布达、并致

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副部长 章汉夫

正在这个时候（1949年11月24日），香港法院合议庭上有一段法官与陈、魏所请的律师^①间有趣味的问答。

法官问：现在本案中的国家，应当采取何种适当步骤以保护其产权？

律师答：当事国家应当出庭。

法官问：对一主权国家控告问题，余深纳闷，但枢密院扣押令是否削减一国家权利？

答：否。虽然有国家豁免权，但您仍有权审理本案。

问：枢密院扣押令中“所有权或是占有权”的要求，其意义如何？

答：其意义为原告尚未得到，而欲索回其产权。

问：合议庭的判决，对我是否有所约束？

答：否。你可以重审此案，使现在的一方得到此项资产。

问：依枢密院扣押令，我不知此案如何能告终结？

答：我希望此案可以终结，盖民航处处长可以下令扣押此项飞机。

问：但是，当时人民政府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

答：否。人民政府在当时未被英国政府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

陈、魏输了

自从11月9日“两航”公司起义以后，这一连串的法律问题年表是如下的：

1949年

11月9日：两航起义的飞机12架飞北京、天津。

^① 陈纳德请的律师有二位，一位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洛云，另一位叫 T. CORCORAN，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顾问。

11月12日：周恩来总理宣布“两航”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并任命陈、刘继续为“两航”公司总经理。

11月24日：“国民政府”所派之戴安国、沈德燮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两航”员工，并取得“临时禁制令”。冻结“两航”资产及飞机。“两航”员工亦向香港高等法院取得“临时禁制令”，即从本日起，在香港高等法院未解除“临时禁制令”前，“两航”留港的资产与飞机，双方都不得移动。

11月30日：陈纳德、魏劳尔新组织之CATI在美请求注册，请求人为E. C. SAIMONS（赛蒙斯）、N. C. DUNNING（邓宁）、R. A. SCHWARTZ（舒瓦茨）三人（CATI中文名为：美国国民航空运公司）。

12月4日：陈纳德、魏劳尔函“交通部”请准以350万元美金的代价分四年以四张期票作为购价。

12月12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用英文函复陈、魏允予售给。

12月19日：陈纳德、魏劳尔正式宣布购得“两航”所有资产。陈、魏将方购得之“两航”资产又转卖与方在美新组织注册之CATI。

12月20日，泛美航空公司驻“中航”之代表人艾礼逊宣布任何不依照合同之股权买卖不予承认。“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端木杰在港宣布对出售“两航”事并未参与。中航“副董事长”沈德燮宣布对于出售“中航”事并未奉到命令。陈纳德、魏劳尔请香港高等法院对“两航”公司诉讼案准该二人为原告人。

1950年

1月6日：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

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辩论“中航”讼案（OJ517案）。

1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辩论“中航”讼案（OJ518案）。

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命令解除1949年11月24日之“临时禁制令”。

3月8日：CAT（即陈纳德民航大队）不服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又向香港法院合议庭提出上诉。

5月10日：英皇突由枢密院颁布扣留“两航”的飞机命令并经由行政手续将“两航”飞机和器材扣押。

5月13日：香港法院合议庭宣告维持原判，驳回CAT提出的3月8日的上诉案。

5月17日：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似此情形，“两航”留港资产既经香港高等法院宣布解除冻结令，就更不受任何法律上的约束。从法律的观点上看，陈纳德、魏劳尔所提出的法律讼案，已经算是失败了。可是英皇枢密院的命令（这是很明显的政治原因，才搅入这道命令）指明“两航”飞机的所有权发生了争执而颁发的，所以又要重新开始在香港法院辩论：（1）“国民政府”与陈纳德、魏劳尔之间的买卖。（2）陈纳德、魏劳尔与CATI之间的买卖。这个又说明了陈、魏的阴谋，如果得不到“两航”的飞机与资产的话，则把这些飞机与资产仍然扣留起来，不使它们起作用，甚至于使它们破烂腐朽而报废，官司虽输，而胜利还是他们的。

香港政府得到英皇令后，即将“两航”留在启德机场的护产人员逐出，而替以香港警方维护，全部“两航”留港资产交由香港民航处清理，听候法院的解决，并着由港督作最后他自己认为满意的决定。

以上所记，完全是双方斗法律，自此以后，则改变成斗政治了，虽然是仍在法律的笼罩下。

兹先将1950年5月13日香港法院合议庭的判决书摘要如下：
（一）英国承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虽在1月5日，但依据英国律例，在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则承认日期追溯到控制之日起，

“两航”总公司都在上海，上海是1949年5月就已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控制。所以对“两航”来说，国民党政权在12月12日已不是合法的了。（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从该日起，国民党政权的各官员都已被免职，中航的前董事亦已解职，因此国民党政权无权核准此项买卖。（三）中央航空公司为政府的一部门，在性质上，根本不可出卖。中国航空公司的出卖，也违背了当初组织公司办理中国境内空运的本意。两公司在性质上都是不可出卖的。

因此，“国民政府”与陈、魏间的买卖，以及陈纳德、魏劳尔与CATI间的买卖不过是企图阻挠“两航”留港的资产归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一种捣乱而已。

（陆元斌 整理）

刘敬宜传奇

华莱士·布朗

刘敬宜的一生，既平凡又充满传奇色彩。澳大利亚记者华莱士采访了刘敬宜夫人刘蔚英女士和他们的儿子霍华德·刘以后，以极其简练的笔触勾勒了刘敬宜先生的一生。

30年前，刘敬宜夫妇将雏悄悄地从香港徙居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他们的邻居决没想到，住在隔壁的这位文质彬彬的男人是中国的一位伟大英雄。华莱士·布朗采访了刘敬宜的妻子和儿子，终于发现了此人的卓越功勋。

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国老太太，安详地坐在儿子的家里。她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沐浴着堪培拉柔和的阳光，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她几乎足不出户，事实上，她的邻居对她也是一无所知。

1949年那个多事之秋，她记忆犹新，当时毛泽东主席接管了中国。

1949年11月9日凌晨，她的丈夫从他们在香港的家中失踪了。他率领着年轻的部下，驾驶着公司12架飞机飞往北京。

或许，这位中国老太太在沉思。生命——确切地说是她已故的丈夫把她和她的家庭，从华北平原带到这里，经历了战争、革

二

在最近，从悉尼直飞北京的中国民航首航班机抵达中国时，机上的两位旅客，他们是堪培拉的年轻律师与他的妻子。他们受到的礼遇超出了与他们同机到达北京的澳大利亚航空部部长金·伯斯利以及几家澳大利亚报纸总编等贵宾。

在北京直飞悉尼的澳大利亚康达斯帝国航空公司的首航班机上，有十几名中国官员，他们是去拜访这位住在堪培拉的中国老太太，向她表示敬意。

她的丈夫是现代中国最卓越人物之一。他曾是蒋介石中国的一位英雄，后来他成为毛泽东中国的人民英雄时，国民党则视之为叛徒。

然而，不管怎样，有关刘家的故事还是首次对外界披露。

这位老太太叫刘伟英，她的丈夫就是刘敬宜，那位堪培拉的见习律师是他们的儿子叫霍华德·刘。

三

刘敬宜1897年12月18日，阴历11月26日诞生在紧靠黄河南岸的古城——开封，他是一家纸作坊老板的儿子。

1917年，在全省的英语考试中，他获得第一名。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之所以夺得第一名，是因为他知道“Crayfish”一单词的含义。

1918年，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又获得了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他专攻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美国底特律大陆动力公司当实习工程师。

他回到了中国。初在沈阳教工程学，并在航空部当工程师。

这时他与第一位妻子结了婚（后来她死于难产）。

刘家持有的文件证明刘敬宜曾当过蒋介石政府的农工部副部长。1930年刘敬宜在满洲里，充任中东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这期间，刘敬宜的生活中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他与刘伟英结婚了。她是天津的一位大学生，正在攻读英语、数学和物理，还差三个月就要毕业了，然而她为了和刘敬宜结婚而放弃了这一切。

第二，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时，他被卷了进去，但他设法逃到北京。

第三，他从雪地里救起了一位流亡中国的白俄妇女，她在刘敬宜以后43年的生涯中，成了他的第二位妻子和总管家，她取名刘Tosifea。

霍德华·刘说到这，回头看了他母亲一眼，接着说：“这对她是一个小小的痛苦，然而这只是一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们是民主的，平等的一家人。”

他的母亲默默无言，只是莞尔一笑。

刘敬宜的两位妻子一共生了五个子女，他们全都在澳大利亚。

大女儿刘玲（刘伟英生），在阿得雷德市当中学教师，嫁给广播电台古典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Rick·weston，大儿子尤金（刘Tosifea生）在悉尼经商；二儿子霍华德·刘（刘伟英生）是澳大利亚大学经济系、法律系毕业生，三儿子亚历山大（刘Tosifea生）是新南威尔士东海岸航空公司的电脑航行飞行员；四儿子威廉（刘伟英生）是悉尼商业学系的学生。

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交战时，刘敬宜成了一位关键人物。

1933年，他被任命为城市航空工厂的厂长，他曾试图在武汉建立自己的飞机工厂，并寻找能避免日本轰炸机轰炸的岩洞。后来他把全家都搬到重庆。1939年，他想依靠苏联的援助在新疆建

立一家飞机工厂。

1941年，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刘敬宜作为中美航空问题的首席联络员，绕道飞往华盛顿，途经印度、卡拉奇、开罗……

他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军衔，在华盛顿中国使馆充任航空事务顾问。他参加了1944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民航会。1945年，他参加了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并作为协议条文的签约者之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刘上校成为中国国际航空事务的首席代表，出席过在都柏林、蒙特利尔、开罗、墨尔本召开的国际会议。

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

四

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军队逐渐压倒了蒋介石的军队时，国民党政府指示刘敬宜把他的飞机转移到香港。另一个规模较小的航空公司，由陈卓林任总经理的中央航空公司，也受命将飞机转移到香港。

这两家航空公司共拥有83架飞机，当刘敬宜、陈卓林北飞后，中国航空公司的DC-4型运输机，与中央航空公司的康威尔士型飞机都被封存在香港的机场上。

谁该拥有这批飞机呢？北京的毛泽东新政权？台北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或是美国的航空公司，如泛美航空公司、飞虎航空队……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战。

霍华德·刘接着讲述他父亲的故事。

“我父亲离家时，我正在香港一家医院里做眼科手术，那时我捆扎足球，不小心眼睛被刀划了一个口子。父亲晚上离家出走，母亲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与陈卓林先生一起集中了12架飞机和足够的飞行员，在未与北京联系妥的情

况下起飞了。”

“我父亲曾对谁该拥有这批民航飞机，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最后他选择了北京，而不是台北。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因为父亲认为北京仍然是中国的首都。”

几个月后，刘伟英也突然失踪了，她越过边界到达中国，和丈夫在一起呆了一段短时期。

五

刘敬宜，这位前国民党政府的航空首脑的生活起了戏剧般的变化。

毛泽东主席对这位带回飞机的英雄表示敬意，蒋总司令的流亡政府却悬赏他的头颅。

北京方面给他安排了一个高位，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返回香港家中，过着安静的流亡生活，除了收下一栋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房子，以供在香港养老外，他没要任何报酬。

国民党编造了刘敬宜在中国北部的兰州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的消息，事实上，刘敬宜已秘密地回到九龙爱德华亲王路的寓所。

关于飞机失事的报道，影响很大，以致刘伟英夫人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唁电。其中有一封罗斯福妻子亲笔写来的慰问信。刘夫人把它当作家珍而保存着。

刘敬宜在流亡生活中，为他的生命担忧。在香港，他有三年没有迈出家门一步。

刘夫人和她的儿子生动地回忆着当时笼罩在家庭中的不安气氛。家中喂养了4只阿尔萨斯警犬，在室内安装了可观察入口处的镜子，为了预防不测，刘敬宜常随身携带左轮手枪……家中所有的邮件，包括美国来的杂志都由一位亲戚收后转来。

就这样，刘敬宜总算幸存活下来。1971年，刘夫人接到了澳大利亚驻香港的移民机构寄来的一封信，正式批准刘敬宜“和

你的两位妻子”移居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刘家仍谨慎地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悉尼罗沙维尔。1973年，刘敬宜因中风死于霍恩斯医院。同年，他的白俄妻子也在悉尼去世。

刘敬宜逝世的消息，是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新华社东京分社公布的，当时，刘敬宜已不为世人所知。从东京发出的消息，没说明刘敬宜死于澳大利亚何地，或为什么他在澳大利亚。

但消息说：中国总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中国民航总局都发了唁电。周恩来总理赞扬刘敬宜“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六

确实，毛泽东的中国并没有忘记刘敬宜。

1974年，霍华德·刘和他的母亲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应邀回国观光，受到贵宾般的礼待，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宴会。

在悉尼一家银行的金库里，保存着刘家最珍贵的传家宝：1949年毛主席、周恩来给刘敬宜的亲笔贺信。

霍华德·刘在堪培拉的住所里，有一玻璃小柜，里面有许多勋章、奖章，这些奖章大都是1949年前蒋介石授予的。

在一本剪贴簿里，有一张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的军团荣誉奖状，表彰中国空军上校刘敬宜在美国执行中国空军代表团的任務时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毛泽东主席得悉刘敬宜逝世，曾准备为他举行国葬，并要将他的骨灰运回北京，安放在专为“人民英雄”准备的地方。

但是，刘敬宜家属婉言谢绝了，他们将刘敬宜安葬在悉尼赖迪公墓。

霍华德·刘说：“我父亲没有叛变。他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其他任何政党，他为中国做了他应做的事。我为

父亲的功绩而骄傲。历史已证明他做得对！”

“我也为母亲感到骄傲。她做出了许多牺牲，当我父亲浪迹天涯时，她照顾了家庭。”

刘夫人慈祥地看着儿子，微笑着说：“我从不问长问短，但我相信我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翻译：毛 文

我是沙场过客

—— 北伐战争回忆之二

李 汉 魂

武昌围城与奉命援赣之际的小闹剧

北伐军攻下武昌城，是战术上的胜利，同时也更属于战略上的胜利。

准确地计算时间，我军是以1926年8月30日攻克贺胜桥，而正式开始向武昌城进军则是8月31日。当10月10日以历史性的偶合，北伐军的雄师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15年之后，再一次使这名城刮垢磨光，重登历史舞台。进军过程一共是40天。

我们最初是采取强攻手段，以不惜牺牲的姿态来抢城的，但当时的战争仍只是一种点、线、面的攻守概念，立体战争（即配合空中的攻击手段）还刚在萌芽，武昌的城坚堑深，正是历史上盛称的所谓金城汤池。徒然以血肉之躯架梯攀缘，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实质上犯不着向敌人居高临下的枪口下押注，所以攻城司令部曾下令改弦易辙，采取全面封锁的战术代替强攻。同时在第八军的呼应配合下，他们已经占领了隔江的汉阳和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整体，两足俱折，武昌城在敌军的战略意义上再也不是中流砥柱，眼见就要宝鼎倾颓。北伐军的封锁，不但切断了敌人的邮电交通，而且切断了敌人的弹械来源，加深了城中军队活动的瘫痪。其中一点为北伐军所最不忍的是封锁措施使整个武昌城的粮源也

不继了。它当然关系到残敌的本身，却也同时陷城内数十万居民于饥馑。因此，攻城司令部曾多次号召残敌投降，庶免祸延百姓。北伐军总部行营白崇禧参谋长也指示航空队派遣飞机飞临武昌上空，散发传单，敦促敌人放下武器，向革命部队输诚，缓解满城人民绝粮的燃眉之急。敌人中的死硬狡狴分子也曾卖弄过玄虚，派使者要价还价地谈判；另一部分较为开明的也有凛于大义，确认前途而主动与我军洽商。我军在不懈的封锁、警戒，积极挖道，耐心接触，最大的希望是让人民群众在这场残酷战争中把受害和损失减至最低限度。

如此的相持，一直延续了40个昼夜。

也就是“鼎折二足”、武昌围城之日，吴佩孚勾结上孙传芳。孙传芳的野心原就不小，早已磨刀霍霍，吴佩孚的秋波一送，他的“五省联军”也就更开始做着“饮马洞庭，击楫扬子”的幻梦。从1926年9月初旬至下旬，孙传芳大军入赣，而且把他的精锐谢鸿勋、卢香亭、杨震东、邓如琢等部部署在江西西境沿湘赣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莲花一带，准备随时向湘东出击，威胁北伐军军运大动脉，甚至袭断北伐军后路。另外，孙传芳还派遣陈调元、马登瀛率部自九江乘军舰挂日本旗溯江西上袭鄂城以解武昌之围，攻大冶逼咸宁以拊北伐军之背。在战略上，这也是孙吴的大联合，一齐在几个省区的军事大运动。北伐军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不容许有少许的失落差池，总司令部既未拿下武昌，又要统筹湘鄂豫进军后新局面的维持与巩固，更必须无懈可击地使孙传芳部队找不到北伐军的弱点和可乘之机。这一个要害的关键，端在战略的远见。兵法上的“有力进攻为最佳防守”是一条黄金规律。因此总部早就利用孙军布置未竣、阵脚未稳，发制机先，把原部署在全军战斗序列右翼的谭延闿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由醴陵基地分头突击赣境萍乡；又把原已集中在湖北咸宁的中央总预备队程潜的第六军调回通城，向赣境修水堵截；而蒋介石总司令亲率第一军的第二师刘峙部，由湖北移师东向，直

指江西，会合有关部队，展开对孙传芳的全面扫荡。

武昌围城之战正酣，江西方面的敌我动态显示出吴佩孚与孙传芳的勾结，时时在形成一股暗流。虽然北伐大军雷霆万钧的威力使湘鄂豫三省残敌望风披靡，可是江西境内孙传芳配合吴佩孚的蠢动，不能不说是给予北伐军以很大的掣肘。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总司令部从全局观点着眼，显然也需要急取武昌，然后把铁拳全力挥向鄂赣、湘赣的东线。

我十二师本来在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任务中是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一带，而且张发奎师长已下达了我三十六团及独立团各自负责一段阵地，三十五团则为军部的总预备队。自攻城司令部因兼司令李宗仁的第七军已为堵截陈调元、马登瀛，悉数急调鄂城、大冶，攻城司令亦改由我四军陈可钰副军长兼充，并且把强攻改为对武昌城的全面封锁，因此9月稍至10月初间，沿线战况一直沉寂。

困守危城的残敌似乎是迫切等候着东线的孙传芳部队给他们解围的，所以每次刘玉春、陈嘉谟派遣的和谈使者总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故弄玄虚。我北伐大军固然已在东线全面有效地堵截了孙传芳部队的西进，但是，我们也根据各方消息，得知江西方面我东线大军对南昌的攻略是得而复失，损兵折将，情况严重。尤其是孙军有一个混成旅沿长江西上，在石灰窑一带乘我江防薄弱环节成功登岸，其企图当然在威胁我后方，达成纾解武昌守敌之困。

武昌的负隅之“虎”，到底是内外消息隔绝的，封锁战略在这方面收到效用。我们围城的部队当然知道鄂赣战事吃紧，南昌方面也出现了城破后再为敌人反噬，我们还深知北伐军处在两个战场，战线距离拉得太阔，军需粮秣的补给困难。但可能在武昌困守和豫南遥远的敌人不能象我们自己这样了如指掌，是以我们起码还处于优势。

征赣之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在10月1日，我三

十六团忽然得到一个单独出发江西的消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一个去为革命事业出力的机会，纵使龙潭虎穴，我们只为一句豪语：“让我们把它夷平！”

我三十六团果于10月2日出发，是循原来进军之路折回纸坊、山坡等小镇，命令是叫我们在金牛集中。我们从来是没有对命令表示过怀疑的，也就是说服从命令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军人的天职，或者说作为一个军事集体的基本信条。本来唐生智的第八军早在北伐军总司令部策划进攻武汉时，是由总部部署为左纵队的主力，唐生智军长被指定为左纵队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第八军除留下一部分作为攻城部队暂归李宗仁军长兼攻城司令节制外，其大部分则分配在名符其实的环绕武汉三镇左翼执行任务，目的是绕出金口强渡长江抢占汉阳。诚然，汉阳的攻略成功是属于第八军的军功，而且促成武昌城的陷于孤立，也与第八军的攻取汉阳有着直接关系。至于武昌围城部队中，因为第八军所留一部分既已拨属攻城司令指挥，李宗仁的第七军复以援贛开拔东线，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递补攻城司令，所有不同番号的围城队伍当然亦只能在统一指挥之下。大敌当前不容有任何龃龉，可是眼看着武昌危城指日可破，有一股小暗浪却轻轻冲击了我们明眼人的纯洁心灵。

第四军所属的各师各团以至最基层，自编组、训练、集结直到分别奉令进入战斗序列，一贯是不辞艰险、舍己奉公，而且遇困难就上，遇光荣就让，彼此团结精诚，指挥遂能如臂使指。最初北伐军总动员令未颁，独立团叶挺部即先期开赴湘东南的安仁、攸县，驰援唐生智部队所受赵恒惕的南下军事压迫。以后十师与十二师在株（洲）、醴（陵）、浏（阳）、平（江）连续胜利，我四军也毫不居功，偶有挫折亦绝不妥协。这种风范，实在无忝于以后受到江汉群众锡以“铁军”嘉名，并且为人民所永恒怀念。偏偏在围城的白热阶段，十二师中的我三十六团忽然奉命离开攻城的战斗岗位，折向金牛集中，第八军已早有二个营在我们的攻城防地接防，及至我团到达金牛，金牛也同样先有第八军

第一师的第一团在等候与我三十六团交接防地，他们是开回武昌镇填补我们攻城位置的空缺。换防后该师即通报说：“一、阳新现有敌军两千余，大冶有敌军千余；二、第七军已由瑞昌向九江挺进，南昌、九江在激战中；三、第八军正由鄂城向石灰窑（即大冶向长江的出口）、黄石港敌军施加压力。”基于没有其他消息可供勘对，我三十六团只好在金牛警戒候命。

及至10月5日，我十二师师部及三十五团亦开抵金牛，这一次的移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至于赣境战报6日才来，南昌方面，北伐军已大获全胜；九江方面，第七军亦所战皆捷。那么，我十二师的任务是什么呢？

直到10月7日，总司令部有电报，指明第四军任何部队非有总司令命令不得离开武昌城前线，故此陈副军长兼攻城司令就有急电给我十二师，飭令凡已由原攻城战斗序列撤出的，应火速赶回原指定攻城任务所担负的防地，这又一次使我师的人增加了困扰。我们怎样去组织交通运输工具？我们怎样向当地群众交代？我们又怎样考虑面对阳新、大冶一带残敌在我们布防和警戒后忽然又出现真空的新问题？但命令既已下达，信赖和服从就是我们的最高选择，急如星火的我们抢分夺秒向武昌城前线奔赴。途中，道路传闻武昌困敌已开城出降，负责接洽而最后逼使敌人达成协议的是第八军。当然，八军军长唐生智是前敌总指挥，从前敌总指挥的涵义说，攻城司令虽在单对围城时有它专门的责任，它仍然该受前敌总指挥的节制，我师是在执行封锁、战况沉寂之际从通湘门撤下来把防务交给八军的两个营，而且，我们明明知道当“封锁战”正在发挥效力，城中困敌也朝不保夕地酝酿着求和谈判，甚至派遣密使接洽多次，俱无成议，偏偏在我十二师离开原防之后，第八军就能具有如此威力解决了30多天未决的问题？驰返原防的急行军路上，一个一个疑团，浮荡在我三十六团、三十五团以及师部成员的胸臆。脚迹已经踏出来就无须回顾，胸臆不解之结使我们对革命的远景蒙上一层淡淡的忧虑。本

来嘛，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因敌投降以至接洽成熟往往系于时势，不受哪一层级、哪一个作战单位，能够促使敌人输诚、或者由谁来负责受降，在整个革命利益衡量，都是一样，何况彼此根株相连。我军我师我团亦绝无争功夺名的意识，不过深入一些去思考。最初攻城部队包括李宗仁的第七军、刘峙的第一军第一师、陈可钰副军长指挥的第四军，第八军除了派去抢攻汉阳剩下较少的一部，及后李宗仁、刘峙等部都以赣境吃紧，由总司令部调赴东线去了，第四军成为了武昌这方面围城主力。敌人不降于我四军而降于第八军，其中使我们最迷惘的是莫非我们见嫉于友军么？我们在许多硬仗中作了一些革命军人应该做的事，莫非就为友军所误解成争功吗？我们在围城的前沿上当战争沉寂之际忽然奉调到一个并不吃重的防地到底是为什么？总司令部严申本军任何队伍非有总司令部命令不许离开又为的是什么？攻城司令对于指挥围城队伍不能以专责成的原因又是为了什么？

陈副军长兼攻城司令饶有大将风度，当我师回驻原防，除获得温慰外，更叮咛对于每一个行动必须树立全局观点，服从战略需要，不能稍存猜付与怀疑。显然，亦只有这样才可以消弭一切不利因素，才可以使我们北伐的兄弟部队之间保持最良好的团结融洽关系。“师克在和”，我们充分了解了主帅的高瞻远瞩。因为当我们重归战斗序列时，我们知道了第八军曾在与城中吴俊卿第三师洽谈后曾试图进城不得要领而复出。对于这一历史秘密，今天由我补叙出来，我并不从任何恩怨的观点出发，到底天下之间是没有什么永远秘密的。我只觉得，设使在一场兄弟阋墙的 가능성이在萌芽，而一个胸襟广阔的主帅能使危机化解于无形，那才是我们在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这应该具有历史上永恒的意义，我为一位大将风度的人物歌颂，也为此而提供世人一面现实的镜子。

然而，毕竟我们围城大军终究由陈副军长兼攻城司令率领进城了，那一个激动的场面已见诸前述。我在这里所以不惮烦地补

充，主要在阐明我第四军的观点和立场，让史家有比较可靠的修史资料。！

吴佩孚的“秋波”，孙传芳的“梦幻”

吴佩孚在武汉一战中是部署了重兵，其希望确保鄂豫地盘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当武昌围城之日，吴佩孚已预感其独霸中原的幻想已濒黄粱梦破，形势逼人，使他不能不考虑到必须找“续命汤”来苟延他的末日，串连军阀、勾结列强的两张王牌他都打出来了。

上面已经提过，北伐军沿粤汉线以四、七、八军为主力的攻打武昌部队，在40天的围城未下时，一直以五省联军总司令自封的“土皇帝”孙传芳，也正虎视眈眈，屡图向湘鄂染指。其实，他也并不是没估计到北伐军的右翼大军的铁拳已经挥向福建和江西，将引致什么后果，但目光如豆的军阀从来是高估自己而低估人民，眼睛是只看见鼻尖的。尤其是吴佩孚那么秋波一送，啖以厚饵，孙传芳野心益炽，他还恃着帝国主义可以为他撑腰，他哪有不磨刀霍霍、凶相毕露地在这关键时刻以逞一试呢？北伐军自进军以来战略上的敏感度很高，部署也很少被动，所以赣境的孙传芳部队一开始集结、移动，北伐军总部原率领的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的第一师等部队，便直接由蒋介石、白崇禧指挥东向。

孙传芳的所谓“五省联军”原在1926年9月间就已经分遣谢鸿勋、杨震东、邓如琢等部分布于赣西修水、铜鼓、萍乡、莲花一带着意向湘赣、鄂赣边境窥伺。这时，更明目张胆动作起来。“解武昌之围”是向吴佩孚卖人情，“抢占湘鄂地盘”是他的“基本大业”。

第七军李宗仁部是在武昌围城之战方酣抽赴鄂城、大冶迎击闯江而上的孙传芳所派遣的西犯部队，其实当武昌城在双十节被

攻下后，第七军已扫荡了黄石港、富池口、石灰窑等处，越过瑞昌进击德安了；至于蒋介石总司令指挥的部队也由醴陵出萍乡，由通城出修水，把赣敌各个击破，直抢南昌城。

我四军在进驻武昌城按照攻城司令部分配，执行维持秩序、巩固治安、协助民众清理危房、整顿残秽、恢复交通、鼓励市廛复业、督饬学校开课、工厂复工，这样的百般丛胜，革命军正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尤其是一牵涉到前线部队的给养、军实支需，我们“仁者之师”的“解民倒悬”的号召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以我当时的观察，由于围城日久，炮火毁伤，民房铺户多成焦土，百姓亡命归来，无所栖止，不少才于街头或借颓垣片瓦以蔽风日，触目凄凉景象，心辄戚然！更看到此次部队入城，因指挥系统稍涉庞杂，间有一些游杂队伍借端骚扰，已据报有不明番号“官兵”做出了不法事件多起。当时上报到攻城司令部、前敌总指挥部，急待处理，后获北伐军总部行营白崇禧参谋长电令，如有再敢破坏军纪、损害民众利益、直接间接影响革命军令誉的，只要查有实据，攻城司令部仍负责全权作出军法审判。因此歪风才得刹住。我十二师各部除执行任务外，并加紧整训，团、营单位的工作几乎都忙碌到排不开来。我当时曾向团长和师长都强调过军事行动必须要配合政治工作。武昌一战虽然我北伐军取得胜利了，但贺胜桥之役以后，我曾目击了革命军所开出的“支票”在民众面前并非百分之百的兑现。武昌城既下，居然还出现了军纪上未尽如人意的事情，姑不论责任究将谁属，其影响自不容忽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此我于出发援赣前曾在军中大声疾呼者。

1926年10月21日，我四军奉命以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三十五团、第三十六团、炮兵营、直属部队及第十师之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第三十团的第二营等队伍，由武昌乘轮船东下。我们的东征援赣开始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以北伐军统帅亲自疾趋江西前线督战，总

司令行营也从湖北移署南昌附近，而且第二次围攻南昌的战役也在10月初旬便展开。第一军的第二师是主攻部队，其余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也分别向萍乡、修水出击。孙传芳的军队并不比吴佩孚的军队出色到哪里（注），北伐军的破竹之势，已使赣敌疲于应付，孙传芳在连续失利中，显然争取不到主动，吴佩孚对他的“香饵”这次成为“毒饵”。领受过北伐军铁拳的孙传芳此时也只好让各路部队龟缩不动，并且死力保住南浔线，沿铁路布防。20年代，铁路的交通运输到底还是比较先进的，不象革命军凭一双脚板走遍天涯，所以当时孙传芳唯一可恃的仍然是南浔铁路。蒋介石总司令大概已估计到武昌的解决已经是指日可待，对唐生智的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擅令八军某部接替我师我团在武昌城下的攻击位置、并将我团及三十五团调赴金牛一带，认为属于指挥不当，因此严令非有总部命令，围城部队不许抽调。这一做法，在战略上是使能集中力量迅速攻拔武昌后，解除了援赣战事的西顾之忧，而北伐军内部必须团结，消弭了一些不必要的摩擦。以我当日作为一个团级佐属来说，我这种体会，大概能代表了广大忠诚的北伐将士的心声的。

拥有交通工具，在行军的速度上当然比靠双脚步行为优越了。自从从军讨贼，由粤入湘，由湘进鄂，我四军虽战绩勉堪告慰国人，斩将搴旗，关山飞渡，但取义成仁的烈士，血洒疆场的已经为数不少，所以培训补充，团一级的责任特别重大，因为“团”往往是被视为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单位。我以团幕僚长的身份，对兵员、对粮糈、对交通运输、对筹划配合地方政情、对争取民众归心，都曾与兄弟部队同僚，花尽心力，此次东征援赣，亦努力为减轻部队移动的疲劳，蓄积新发于硎的锐气，求得有交通工具运转的行军路上，让战斗人员都能节省一点体力。三十五团是此次张发奎师长所指挥部队的先遣队伍，先数日已出发鄂城，我们是属于后续部队，按次序我团须随师部一齐开拔。

开拔之际，连续接获福建方面的战报和浙、皖方面有向革命

军靠拢的消息。大概知道北伐军在闽军事迭获胜利，浙江的督军夏超亦宣布独立。皖军与北伐军有了默契，这对于整个赣局的底定，已不待蓍龟而判明。我军过鄂城，得确讯：大江南岸鄂境已无敌踪，第七军则由箬溪进至鞋山、武穴，现正在交战中，我三十五团亦已向大冶推进。

鄂城地方不大，与黄州隔河相望，宋朝苏轼误以为三国当年赤壁鏖兵即在此，由于军中暇豫，离前线尚远，未有交绥，况此夕月明风静，我也不计较历史上此有数之大战役到底果是就在此一赤壁，既然苏子曾与客泛舟同游，那末我也拉了三两团部中人，且向江边遥望。山川相缪，郁乎苍苍，要是当年曹孟德困于周郎的果是此地，则今日我们挥军北伐，讨军阀而锄列强，凭吊千古战场，似亦剑气冲云、角声吹月。一时兴发，吟了七绝六首。当时剑泉在三十五团已驰赴大冶，种石则调军部留武昌。酬唱无人，颇增寂寥之感。诗忆录于此志念。

(一)

大江东去萃群英，瑜亮同功一炬成。
未殄渠魁空复众，江流有恨带悲声。

(二)

烽火今宵似曩时，月华无恙世情移。
可怜一样无依鹤，难向江南觅旧枝。

(三)

天下英雄漫自夸，棋争一着便全差。
无端昨夜东风急，堪笑狂夫意态奢。

(四)

一夜狂飙卷六军，千年赤焰尚留痕。
汉家火德今犹旺，好向山前认国魂。

(五)

黄花晚节古同钦，身后碑铭未可侵。
魏武岂容称汉将，春秋笔法重诛心！

(六)

赤壁临江自古今，寄身天地任浮沉。
滔滔未了刀兵劫，愁对空山独自吟。

(注)：根据我当年(1926年10月11日)的军中日记，摘录一段如下：

我军攻下武昌，敌守将刘玉春为剑泉所逮获，送攻城司令部，据参与讯问的军法人员纪录：“刘玉春谈此次北军之败，实为吴佩孚始料不及，向来南北打仗，南军绝不能越过汀泗桥，竟料不到广东军如此厉害，贺胜桥一役我三团人死折了两团，连长只剩得四个，那个阵地是参谋长陈冲(也是保定同学，昔共芸窗，今各异调，堪发一叹!)所选。地太荫蔽，我一见便欲退后，但恐失士气，未果；我之部属实很用命，所以虽只剩一个团的人员为基础，尚能死守武昌四十日，不料竟为吴俊卿所卖！至于武昌之不能守到底，我早看到，力主退守汉阳，但吴子玉(吴佩孚别字子玉)不听，我既经受命，只以死殉。今日得此结果，原无话说，但一班部既经输诚缴械，尚望加以保全。……”

刘玉春又评论革命军说：“南军能人自为战，活泼勇敢，实为北军所不及，尤以大包抄及长途追击，更足令人佩服。……张作霖的军队亦不弱，孙传芳的军队日子太老，实不能战。……以南军如此勇锐，倘能认真研究北军的利钝，所到处顺应舆情，不难统一中国……”

刘玉春言谈侃侃，绝无畏怯，且中间颇多中肯之语，亦北方武人之翘楚也。

此处刘玉春所评孙传芳部队作战能力，不失为的论，故引此为注。——作者

偏师许下溧阳

——四军对精战的战略设想

自鄂城出发，过石灰窑。

途次我不但协助团长鼓舞士气，整顿军纪，极力诱导军队与民众建立鱼水情，而且每每一值闲暇即与团部成员及各营长慎研作战计划，尤其注意考察各所过地区的工商业状况及农业生产力及其布局，因为在石灰窑还要候车，所以我有机会理解了大冶铁矿和石灰窑的土敏土厂情况。大冶铁矿借石灰窑作为成品的出口转运站。以战事关系，复因营业不景，铁矿停工已达数月。建厂在前清时代，系借日本款项5000万元始得开办，停工后除留少数工人看厂外，皆已遣散，但仍须每月缴付息金数10万元，支付工资亦须数万元。如何能在没有生产的情况下维持此一大笔开支，真叫人对中国工业前途浩叹！至于土敏土厂每日产量约30万斤，营业状况颇好，工人数百，惟工资极低，厂内设备极坏，卫生措施更谈不上，工作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空气污浊，往往成为工人致病之源，所入仅勉足一饱，几无足供事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难怪在当日工人急需投身革命，而革命的坚决性又以工人为最了。

过大冶，候船渡纬源湖，既济，我张发奎师长所率各部俱抵达黄莲港。这一带尽是长江水系里河汉纵横，湖沼棋布，地形极复杂的地区，攻守都往往是因为一子之差而贻误大局的。张师长诚然是稳重练达而又有胆色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一个“全天候”、“全地形”的战术家。他看中了无论在富池口（鄂境长江边阳新县属）或直至瑞昌（江西省属）敌军如何驻有志在出击的部队，但倘使我部能直插九江或顺横扫瑞昌出九江，局势将对我北伐军绝对有利。张师长的判断是，根据军网的自陷被动、外强中干，尤其是尾穴不掉，显然就已经“骨里生虫”（当日张师长谑

语)，不堪一击了。另外我们从黄莲港经白沙铺到达阳新城，沿线均接获总部和七军的通报，俱反映了一系列关于浙、皖敌军均表厌战，印证了我们在武昌开拔前的情报，大概可信度很高。再就是我们部队在阳新一面小驻整休中，一面也派出队伍向木石港警戒。我们进一步掌握了这鄂赣边境上的城、乡、墟、镇都十分贫瘠，农业连年失收，人口亦较稀少，以如此民穷财尽的环境，频年战乱不停，万恶军阀简直以苍生为豕狗，其本身亦能残喘到何时？我们部队的给养，张师长已严立军令，所过村寨，绝对不许扰民。补给线拉长，对我们当然是有威胁的，不过倘使我军以一日之饥而换取民众的拥护，使老百姓能目击仁义之师，对比横征暴敛、置民水火的反动势力，则我北伐军虽未必略取一城一池，其潜在之影响将不能以斗、秤、尺来计算了！

在富池口，我师部已得到十五军（即鄂军原守备汉阳的刘佐龙师，武昌围城战时在汉阳起义，北伐军总部任命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后再扩编为十五军，仍以刘佐龙为军长）在蕲春失利的消息。我们判断，十五军丢了蕲春，对赣方我北伐军的进军已经影响不大，因为我张师长所率各部已在下勘和马脊坳一带与第七军李宗仁各部靠拢，把整个突入鄂境的孙传芳军后方遮断，蕲春之敌亦势成釜底游鱼，无足为虑了。

木石港警戒是交给我三十六团执行的，当师部所率队伍直向鄂赣边境跨越时，根据探报，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与我军通款，并派参谋樊崧甫来我师驻地，随同我师前进（樊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作了一定贡献，曾任国军军长，我军当时亦对他十分礼遇，并不视同“人质”）。樊曾通报了当时的“最近”敌情：

- 一、陈调元已无斗志，瑞昌之敌亦准备退却；
- 二、德安有两旅一团及一个支队，但马登瀛旅及陈光祖支队已与北伐军有了默契，将准备退却；
- 三、南昌之敌，目前仅能自卫；
- 四、白宝山（当时的江苏督军）10月22日在江苏通电独立，

占领镇江，沪宁铁路交通已中断。

五、周凤岐师长现在九江。

若果按照以上的通报推论，张师长的战略构想在当时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然而军令与军纪我们到底还必须服从，我们仍旧依于原来军部的部署：穿越夏雾岭关、过羊肠山、马迹坳向白水街集中候命。

夏雾岭颇称险峻，岭上叠石为关，是鄂赣交界处，过此即已踏入江西的瑞昌县境。由夏雾岭向东，我师所过沿途均属地瘠人稀的地区。此一带曾在一个短期间内北军经过三次，我北伐军经过四次，给养上的困难又再摆在我们面前，成为政治工作的考验。羊肠山是跨武宁与德安的险要，第七军曾在该地附近与敌激战两次，我师部队通过时，地方民众都能概述战中情景。北军的军纪败坏与我军的不扰民、不滥取相映之下，民众悦服，肯于和我军愉快合作。师长印证了我对政治工作的意见，几度嘉勉，成为师领导单位要调我当师政治部主任的一根伏线，不过此亦后话了。

南浔线上铁戈横，驼峰孤山血凝碧

白水街候命的部队云集。

北伐军统帅部下达了蒋介石总司令准备于11月2日施行总攻击的命令。

统帅部的战略部署是：

（一）以第二军、第三军、第十四军为右翼军，负责向南昌进攻。

（二）以第六军为中央军负责向乐化进攻。

（三）以第四军、第七军及贺耀祖独立第二师为左翼军负责向马回岭、德安、涂家埠方面进攻。

（四）以第一军为总预备队，控置于奉新、安义地区。

以上的部署，是全线出击南浔铁路，夺取南昌、德安，切断

孙传芳倚仗以为运输兵员粮械军实的命脉，使其军队运动陷于瘫痪，而我北伐军则可以反客为主地最后解决九江，控制长江由浔至汉的全段水程，奠定继续北伐的基础，以期电扫皖、直、奉三系军阀，迅速达成统一全国的愿望。此一战役的远大战略设想，诚然是一些短视的人所未能盱瞩的。

我四军和七军及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同属左翼军部队，左翼军的攻击命令由李宗仁军长和陈可钰副军长联合签署，其要旨是：

一、根据总司令部下达通报，敌方卢香亭师及其彭德钰、李俊义两旅，在涂家埠附近，郑俊彦师、邓如琢师在南昌，陈调元部及刘凤图、毕化东等残部在瑞昌、武穴附近，颜景崇、上官云相、马登瀛等三个旅及北军周凤岐部在德安、马回岭、九江口一带。已命令右翼军于11月2日开始向南昌攻击，中央军同日向德安攻击，总预备队随时策应。

二、我左翼军按总部布置之作战目的在于切断南浔路，协同右、中两大兵团之运动，并以一部分监视瑞昌敌军动态。11月2日开始以主力向德安、马回岭进攻。

三、独立第二师先派先遣提前进驻冯家铺，监视瑞昌之敌，掩护我左翼军之左侧，以主力压逼冈家铺，抄捷径佯攻马回岭，视敌方动态，随时变佯攻为主攻。

四、第七军取道谢家铺、抱桐树、郭村正面攻击德安，但进抵郭村时即应占领邻近村镇警戒南昌之敌，俟四军由乌石铺渡河攻击敌军右侧时，即可配合夹击。

五、第四军由白水街东向抵乌石铺时即拊德安敌军之右背，或渡河或不渡河，视战况而定，应各与独二师、七军联系，紧密配合，共奏夹击之功。

六、各部11月1日应到达之位置为：四军在烂泥坡，七军在郭村、独二师在孙村，不得有误。

七、应注意：如德安已取而马回岭未下，四军应即迅速协助

独二师合击马回岭之敌。如德安、马回岭俱下，我左翼兵团应集中向涂家埠或九江方面运动，命令另达。

八、各部逼近铁路线时应全面将铁路及电线破坏。

1926年11月1日，我张师长所率各部依照命令要旨进至烂泥坡、夏家铺一带，各部均就驻地分别对德安、马回岭方向警戒候命。我三十六团由我率领各营长赴前方探察地形，并慎重研究各项侦搜所得的敌情资料。其中一宗是从德安方面获得的确息，说德安敌人甚少，重兵集结于德安以北的孤山、万家垄、马回岭一线，恃有铁路可以利用，策应方便。掌握了这一情况以后，我左翼军各部都在盘弯弓，敌方亦在刀出鞘、箭上弦，战云弥漫在南浔铁路线的上空，两军对峙，形成了一个紧张局面。我们虽然是吊民伐罪，但战火使老百姓同罹苦难，一个革命军人到底也觉得内心惨然！

我张师长考虑到德安敌军力量第七军已足以当之，所以为拊德安右背，确定主力进攻万家垄、骆驼山及孤山。令三十六团黄琪翔团长为指挥官，领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另配一个营及炮兵一个连，于2日清晨，攻击前进，其余各部为总预备队。黄团长兼指挥官复分配本团自晏家桥经老黄涌铺、依坂塘向孤山、骆驼山进击，交给我负责指挥；三十五团则经彭家桥向万家垄进击，另配的那一个营营长姓毛，黄团长命令他留一个连在芦家滩附近监视德安动静，其余沿河向泗溪渡进击，炮兵连随三十六团选择适宜地段部署炮兵阵地，并机动配合各进击部队。

防守孤山、骆驼山之敌为山东军马登瀛旅之一个团及邓如琢残部。两山距离仅三、四百米，互为犄角，形势颇优，然皆非险峻，处处可以攀登。我师皆善于山地战，睹此地形，士气益壮。黄团长是时已赶至依坂塘，阵前勘察，以孤山为附近岗峦起伏之最高处，判断必为敌军主力所在，因传令各部密切注意其动态。我所指挥的三十六团已开始与敌接触于依坂塘及泗溪渡，黄团长旋即调动本团一部分兵力从依坂塘东北抄出孤山北面。我指挥机枪

连从依坂塘东南正面攻击，并令配属我团炮兵连在阵地选择孤山敌主力点列放。至此，我团各营已渐渐逼近骆驼山。三十五团缪培南所部当时在我团左翼，已攻万家堊得手，迫使敌军撤至铁路以东，并据得高地一面监视路东敌人，一面向北对马回岭警戒；缪团长的措施是为严防敌人增援，协助我团抢占孤山，合力对敌夹击。由于黄团长先命我分兵依坂塘东北自背后对孤山包抄，此际孤山东、南、北三面均为我师属各部将其联络线切断，交通给养皆陷绝境，而我军乘势挺进。战况空前酷烈。守敌之顽抗，亦显出其北方军人的特有气质。日正当午，我军在几经攀缘，几经扑倒，天地震怒，战士饮血的悲壮情况下终将孤山、骆驼山相继拿下。我团亦伤亡枕藉，二营营长陈特阵亡。

残敌溃向德安，遗弃尸体满布山头及峪地，铁路车站上不及搬运之粮食及零星物品很多。枪声才歇，附近乡民男女纷纷冒险出来争相拣拾。

军阀苦民，于此可见。

马回岭强敌就歼，“联军”“空城计”幻灭

黄琪翔团长继续下令我团沿铁路向德安追击。我率我团的二、三两营轻装，黄团长则率辎重及其他装备继后，沿路与零散敌人作了多次遭遇战，残敌且战且逃，我则且战且追，直至德安城外铁路桥的北端。这时，第七军已占领城南一带，在夹击残敌一战中我们和第七军会师了。黄团长率领全团向第七军发出信号，表示我团是一面追击残敌，一面奉命联络第七军的，在未再奉到本军命令以前，一切按照第七军军部的意向行事，并接受节制，第七军方面表示了对我团的恳切欢迎，彼此在军事惺惺中，由于互相支援，共同创造了胜利，我们感到欣慰。我团队伍没有进城，只暂住北门外李家铺附近。这个会师的历史时刻是1926年11月2日下午4时5分。

是夜，我团迭接张师长命令，知道马回岭方面的战况还在胶着，飭令我团火速向马回岭一线归队，加入战斗。

事情是这样的，自张师长指挥的各部抢攻孤山、骆驼山得手后，除我团衔尾追击溃向德安之敌外，已即率各部转向马回岭攻击。据报：马回岭守敌为颜景崇、上官云相、马登瀛三个旅。颜景崇部实力较强，马回岭亦天险可恃，所以颜部依险设防，不断构筑工事，为三个旅中的主力。张师长指挥作战以来，惯于急攻，而且我军刚获孤山胜利，士气方锐，衡量事实，敌军防御力量在不断加强中，旷持时日，益增攻击困难。独二师贺部师老无功，使贻局余敌有残喘机会。为迅速扑灭马回岭敌势，张师长已部署三十五团缪部为主力径向马回岭攻坚，以第二十九团协同前进，控制铁路，再命炮兵营选择适宜地段布阵，以炮击遥控前线，掩护步兵；张师长自率第二十八团由卒子岭、五谷庙直逼火线前沿。

三十五团、二十九团在梯次散开的前进过程于11月3日午后，有两个营与敌在横山遭遇，一举将敌击溃，追踪至马回岭之南，敌人在据险而守，我军在择险而攻，战况惨烈。但正因为敌军拚死负隅，张师长判断此即为敌主力所在，下达如下命令：

一、三十五团继续向右翼运动，将攻击位置由正南面延伸至马回岭东南，相机分遣余力进入马回岭背后高地。

二、第二十九团进入车站范围，控制其进出口两端。

三、第二十八团御接二十九团左翼铺开，严防敌人突围或反攻。

四、炮兵营即利用横山布阵候命。

五、各部就原地紧密联系，互相通报情况。

令下，已黄昏时分，寒云迷径，雨雾濛濛，敌竟利用此一天时，向我三十五团阵地反攻。一次不逞，再次亦不逞，俱因我各部联络紧密，处处连锁，反应敏捷，敌每次异动，都经过炽烈的火力接触后，龟缩回去。张师长周旋于各部阵地前沿，考虑到敌

既然敢于出击，可判断为敌方必已有后援驰至，乃一面遍令加强注意，不许疏懈，复部署翌晨施行拂晓攻击。

我三十六团既奉师长令回马回岭参与攻击任务，遂即向第七军军部报告并交回防地，当夜准备。黄团长仍令我先率各营先行，半夜行军，至拂晓即已行至离德安北30里的五谷庙。师长正在终夜调度各部分别进入攻击位置，知我三十六团已赶至，乃飭令前向五里插入三十五团与二十九团之间的空档地段，向左右两翼密取联络，相机配合，黄团长所率队伍亦适时驰抵阵地，师长并于电话上切囑团长必须全力支援三十五团腰部，争取一举奏此肤功。是时三十五团、二十九团皆已各奉师长电话通知严阵以待，且以令十师蒋光鼐副师长亲率二十八团向敌右翼（即我左翼，原属二十八团位置）抄出敌后，以呼应三十五团及二十九团之对敌正面攻势。

三十五团的顽强，在前此已颇使敌方颜景崇部胆慑，此一再一接触，战况惨烈比以前更甚。马回岭守敌虽渐呈不支，但仍多次拚命反扑，甚至突入我三十五团阵地，对我军亦施行包抄，我三十六团奋起还击，配合缪团缩短战线作反包围，终将敌方压倒。颜景崇所部平素颇有训练，除作战能力不弱之外，非至受伤或被俘获终未肯屈服缴械，是以全线溃败之际，死伤狼藉。我们颇为他们替军阀卖命表示惋惜。

解决了马回岭敌人后，敌军卢香亭部由涂家埠开至，意图反攻德安（其实敌之最初放弃德安系“空城计”，其概略见后述）。战地通报，已知敌前锋正与李宗仁第七军激战于九仙岭，而且声势浩大，张师长即奉令率领所部驰援，其中，以第十师（当时第十师陈铭枢师长因事在假，第十师暂归张发奎师长节制）蒋光鼐副师长先率三十六团、二十八团及三十团之一部向德安李宗仁军长通报听候调遣，张师长则自己率领其余队伍直接向九仙岭加入七军作战。

当蒋副师长到达八里铺，敌增援部队正沿铁路反攻，以优势

火力向第七军阵地猛射，第七军的回击似未能压倒敌方的优势攻势；蒋副师长睹状，深为七军忧虑，因此急令我三十六团抢越铁路占领右方高地。我更指挥机枪连以十挺机枪集中掩护我团各营勇猛冲锋，一方面截断卢香亭所部后路，再而支援了第七军的右翼使其有机会摆脱敌军的纠缠；黄团长复乘时挥军从右翼对敌施以包围。卢香亭部虽称善战，到底还是在这一场恶战中处处丧失了制动权，反德安反攻终究成为梦幻。其全线溃败退却时，所遗辎重上发现几处有白粉写下的字：“再遇四军，不可轻敌！”

我四军乘胜一举歼灭卢香亭、颜景崇、上官云相、马登瀛、陈光祖各部，并且配合其他各路大军一鼓作气，最后攻下了九江城。

赣战中一笔陈帐

——历史的小斑点

对于德安、马回岭之役，我四军基于一向有功不居、有过不诿的精神，一直以来，在已有的战史文字资料上，从不曾提过友军的缺点，尤其是属于一些隐私，我们为顾全大局、维护整体革命利益，认为事情既已过去，又且虽然江心补漏，亦已化险为夷，只求革命事业不再重蹈前辙，也就让历史长河的滚滚波涛把它淘洗掉算了。

往事迄今60年，偶触前尘，一个当时曾作沙场过客的老兵，颇有心潮澎湃、不能自己的心绪，故亦姑把远年生封的阵中日记摘出一部分，借作后人参考。我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以最客观的立场反映当年事实。

1926年11月3日（记于万家壘阵前）

此次战斗（作者自注：指马回岭一役），三十五团死伤至三百余人，殊为惨烈，然倘第七军能早些进军德安以北，俾本团得于昨日向马回岭增援，又或独二师能

切实协同我一致动作，则我四军当不致如此费力，即可将敌解决；惜俱取巧规避，使我四军几濒于殆，亦良足扼腕矣！所幸我到底能发挥其最坚韧之战斗力，赢得敌我双方一致倾服。

我团比三十五团所处攻击位置较多荫蔽之地形地物，故伤亡不致如三十五团之甚，敌溃退时所遗军器，我两团均集中力量于小范围内追击，战场清理只留给其余部队担任，所以缴获枪械除就追击途中捡集外，不暇细寻。此次各团共得步枪千余，而贺师（作者自注：即独二师）坐享其成，所得较我全军为多。

敌既狼狈奔窜，当由独二师向九江方向追击。本团回车站集合以稀饭充膳，即开回万家垄。

为本军计，原以直进九江为有利，师长亦向上级有此建议，因按照总部部署，我军完成扫荡马回岭之敌以后，如何继续进军，已由层峰授予权宜取措之权；但李宗仁军长仍要我军同打涂家埠，只得听之。

1926年11月4日（记于南山村阵地）

早6时由万家垄出发，7时半抵德安站，时涂家埠之敌纷纷向德安反攻，……攻势猛烈，第七军之一部有动摇模样，……我军予以支援，机枪连控制高地，从左翼推进，我团更向敌右翼包围，敌开始全线崩溃，纷纷逃向鄱阳湖畔之吴城，我派第二营协击残敌。……

此役我团略有伤亡，亦缴获步枪十余杆，但我团自开始投入协攻以至追击均未亮出自己番号。

敌军之溃退，由第七军主力追击，我军为总预备队，嗣奉命在南村警戒候命。

卢香亭自涂家埠遣来反攻德安的敌军，在溃退时遗下若干机密文件，表明了所谓“五省联军”的全盘作战计划系以鄂赣各地部队进至相当地段时，即准备以十一

月二日向我北伐军作全线攻击，而且故意让出德安，诱我军进城后，乃由马回岭、涂家埠南北两面向我夹攻，此一部署的确极饶战略意义。岂知我四军早已先行抢攻孤山、骆驼山及马回岭，致使敌方“南北夹击”计划的北面一臂先折，我未被“聚歼”而敌反被我肢解而就歼，当我四军既下马回岭后回头一击，第七军遂得解脱纠缠，奏功于千钧一发之际也。

第七军李军长原为赣战我左翼军主帅，其面对南浔线的作战计划原拟四、七两军全力攻德安，而以马回岭完全畀予独二师负责，向兄（作者注：指张发奎，其别字为向华）则认为德安之敌为数不多，毋庸主力对付，故毅然直攻万家壑、孤山，进而支援独二师协攻马回岭，果能破敌而不为敌所制，此一着在于发制机先也。设不然，独二师独当强敌，万一为敌所破，使“五省联军”实现其南北夹击计划，则全盘尽墨矣。

本晚得前方通报，南昌已在我北伐大军右翼军包围，第七军亦直逼南昌，名城将指日可下。

向兄主张本军回师九江协助贺部，未悉可邀准否？

1926年11月5日（记于万家壑驻地）

……

涂家埠（即永修县治）已肃清敌踪。……

南昌城已攻下。……

我四军奉令开赴九江前线，向湖口截击，本团作先锋部队。

师长并已在我团之前出发。

1926年11月6日（记于九江）

拂晓出发抵马回岭车站，得与师长晤面，知道某方愿弄我，欲令我出屋于而由他们进驻九江，因此本军必须遵照原始命令即晚向九江挺进，免堕人彀。部队在赶

程途中见有火车隆隆迎面而来，为争取时效，不得已先将列车截住，下令扣留，列车员工及车站负责人闻知系北伐军第四军部队，莫不肃然起敬，那时南浔线上铁道管理尚未由革命军接收，但员工均表示愿为本军提供方便，行军秩序虽然未恢复正规，站方同意紧急通知前后各站凡有列车运行暂先让路，这种特殊优惠，使我军将士俱极感奋，仁义之师，战无不胜，新克地区，不特残敌肃清，铁路员工之同情与合作，何啻革食壶浆？革命军人将何以慰万民嗷嗷厚望？！

师长令：我四军其余队伍仍步行至沙河候车，行程60余里，2时到达沙河，4时半列车开来，5时15分开出，薄暮遂抵九江。

独立第二师于进入九江时，曾与敌军在铁桥附近作战，双方死数百人。

九江之攻取，基本没有什么恶战，敌人只是溃退。

1926年11月8日（在九江）

鄂赣边境武穴之敌向黄梅退走，我奉令指挥本团协同第十师渡江追击，正准备中，希夷（作者自注：叶挺字希夷）此时自武穴来，言第八军前日已至广济截击矣，我去是空走，不如不去，我据此复命。

接第七军通报，追击吴城残敌已获胜，缴枪六千余杆，敌旅长两人一死一俘，其余官兵六千余人均输诚。至此，卢香亭部属全都消灭。赣局教平。

师长因迭受友军愚弄，愤懑回汉，留言谓“我虽不争功，但不愿阵前闹意气，惟有闭门韬晦，国事烟塘，不知革命成功何日！”语气沉痛，闻者凄然。

我三十六团黄琪翔团长奉命代理师长职务。

九江敌人退走遗下物品甚多，独立第二师殆取不胜取，本团拾其残余，亦得饼干30余大桶、炊具、帐幕、

水壺及卫生器材亦不胜数，“五省联军”之军实如此丰富，乃悉以资敌，信知战贵攻心，物质固未足恃也。

1926年11月9日（记于九江）

.....

闻总司令将于今日到潯，各界纷纷往迎，本团亦派一个营前往，但空等待。

.....

1926年11月10日（于九江）

总司令原定今日下午四点钟到，詎又白候一日。

.....

1926年11月11日（于九江）

总司令今日下午五时抵潯，各界欢迎极其热烈。

.....

1926年11月13日（于九江）

天阴微雨，气候转寒。

闻中央派古应芬为慰劳北伐军专使，将于今午来潯，我曾偕同本团各营长往东洋码头迎候，但天气骤变，船到无定期，故又返回团部。

.....

1926年11月14日（于九江）

古应芬先生以国民政府慰劳专使名义于今日12时在新管房大操场慰劳本军；我团接得通知过晚，集合不及，只我乘马前往，风雨载途，我军各部皆集队候，劳之适以“劳”之也。

.....

以上为当日阵中及战役结束后连日日记的摘录，这也可以说是属于历史上比较原始的资料。如果说，北伐军在蓄势待发，通过了编组成为八个大军，誓师颁令，各自首途，那时的一股锐不可当蓬勃朝气，加上亲爱精诚、合作无间，联结成的一条甘苦

共尝、祸福同担的精神纽带。我那时才年过30，军旅生涯只培养成自己一种质朴愚直的心态，一切都从光明面去看，对革命事业也无所怀疑，事实亦为自己提供了一部分可喜现象。但自从武昌围城，在功成在望的关键时刻，我师各团都忽然奉调移防，而且把我们摆在本来就不吃紧的点、线上，只有总部的严令下来，情况才得扭转，此次东行援赣，几个战役里我师的各部大约都比较伤亡惨重，特别是三十五团，马革裹尸，黄沙溅血，作为一个军人又何辞于为国捐躯、为革命赴义？然而遇功争先，甚或假人之力、欺世盗名、见利忘义的若干恶劣行为，都使我心底留下深深烙印。我节抄日记的一部分，也许还是属于当日行军作战过程的第一手资料。

60年过去了，现在回溯旧事，依稀历历在目。我不愿对谁褒贬，什么恩怨也已过眼云烟，都成陈迹。不过倘使我在60年前的日记所反映的、革命军人能够公、能够忠，领导层也不苟安、不偏听、不摆架、不谋私，兢兢业业，则国之郅治，民登衽席，于兹久矣。

我，不能不为60年悲哀。

四军回师武汉，人民锡予荣宠

1926年11月17日，奉命由九江循水路乘轮回武汉，19日正午抵达。

我四军此次系奉命在武昌驻防。

自10月21日东征至此未及一月，陈可钰副军长因病不能执行职务，第十师陈铭枢师长亦因事在假，故此援赣战役中第十师的三个团亦统由张发奎师长率领。其实我第四军亦就以这第十师和十三师为基础。

我军回抵武昌驻防以后，武汉各界民众以及党（注：此系指国民党）政机关，咸以我军自出师北伐以来，战取攻克，使吴佩

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望风披靡，帝国主义亦惊心丧胆，第四军之令誉不脛而驰于湘鄂赣三省。而围城之日，攻城司令陈可钰副军长更多次以武昌城内数十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为重，号召城内北军投降；及至最后刘玉春、陈嘉谟战无可战，吴俊卿表示输诚，率领大军进城的亦系陈副军长，他以攻城司令的身份所作关于进城之部署及进城后之一切措施，首先强调并且做到的是秋毫无犯，所以第四军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印象亦最深刻。

重归武昌之日，各方联电致贺及遣使慰劳，巨暮络绎，民众犒军宴会，几无暇日。张师长代表陈副军长除向来电及来人致谢外，并吁请勿再劳民伤财，致令我军受之有愧。

接着，武汉民众又铸了铁盾一个，给我四军宠锡一个“铁军”的称号。

铁盾上有铭文，文曰：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
四军伟绩，威震迩遐，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
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
革命担负，如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
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至于各方面的贺电，我从阵中日记中略择数则如下：

（一）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贺电

汉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全体将士公鉴：自诸君出发，频获捷音，各悉努力杀贼，勇往直前，为各军之冠。回溯醴陵、平江、汀泗、贺胜以至武昌宾阳门、通湘门诸役，战绩尤著，迭奏奇功。援赣之战，诸君南北驰骋，制敌机先，且复爱护人民，遵守军纪，秋毫无犯，有口皆碑。仍希继续奋斗，以竟全功，

务使军阀荡平，国宁有日……

(二) 第五军贺电

汉口张向华师长：迭获捷报，欣悉贵军回师武汉。公以百战之躯，率革命之众，荡平湘鄂，浴血南河，丰功伟绩，永留青史。谨电驰贺。

(三) 海陆军教养院贺电

汉口第四军张师长转全体将士：比闻此次底定长江，贵军作战最力，所至秋毫无犯，尤得民众欢迎，纪律之师，壶浆载道，牺牲奋斗，万古传芬。遥听捷音，欢腾岑表。谨掬至诚，电致革命敬礼。

(四) 第十三师党部电

汉口探交四军张师长转全体革命同志：武汉三镇，久为反动军阀恶势力之中心，今我革命军蒙霜露，沐风雨，冒矢石，忘生死，一鼓而使反侧救平。虽帝国主义在长江之势力，白日所照，亦将随浪涛淘洗向尽。伟绩殊勋，临风顿手。敝师党部同人，誓将一致戮力，巩固后方，庶免诸同志后顾之忧。如有驱策，即便执鞭以从。谨此电贺。

投考军校的回忆

谢冰莹

谢冰莹，原名鸣冈，湖南新化人，著名作家。1948年赴台湾，任师范大学教授。1974年迁居美国旧金山。作者1921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未毕业即弃学从军，于1926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次年参加北伐，写出了成名之作《从军日记》。本文即描述作者1926年投考军校女生队的前后经过。

一个惊人的招生广告

民国15年（1926年）的秋天，一个气候温暖的早晨，我正在想：要不要去看二哥？敲他的竹杠，让我打一次好牙祭。忽然听到工友叫我的名字，我连忙跑出来问：“什么事？”

“电话！电话！快去！快去！”

“冈猛子，赶快来！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真高兴，从电话里传来二哥的声音。

“什么好消息？先告诉我嘛，好二哥。”

“不要啰唆，赶快坐洋车来，我付钱。”

一听说好消息，二哥又答应替我开车钱，太高兴了，真的马上叫了洋车向明德中学跑去。

“你看了今天的《大公报》没有？”一进门，二哥就这样问我。

“车钱，车钱，先给我车钱再说。”我故意逼他，其实我早

已打发车子走了。

二哥递给我《大公报》上的广告一看，原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第六期招收女生启事。

“二哥，我要去当兵！”

“有这勇气吗？”

“有！有！”

“不怕死吗？”

“不怕！不怕！”

口里答应着，眼睛在看广告上的考试科目：英文、国文、数学、三民主义、政治常识、地理、历史……名额两百名。报名资格：高中或大学毕业或肄业学生，具有三民主义民族思想、勇敢、爱国……可惜我没有把当时的报纸留下，记得广告的大意是如此，文字可能有出入。

“我的天，就去报名！”

“不要性急，让我先考考你的思想和常识，这是你在报名的时候，他们就要问的。”

二哥一本正经地说：“你为什么来当兵？”

“第一，为了国家民族，献身国民革命；第二，为了求男女平等……”

“哈哈，你原来是自己打算，还有第三吗？”

“有，有，我不说了。”

正在这时，三哥进门来了。

“今天星期天，我特地早点出门，想邀冈猛子（也不知什么缘故，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位哥哥都叫我猛子，大概因为我的个性强，说话鲁莽的关系）来你这里集合，我请你们去吃早点，打电话说她不在学校，我正在怀疑，这么早，她到哪里去了呢？”

“三哥，我要从军去了。”

我把手里的报纸指给他看广告。

“我也正为这件事而来，冈猛子很容易冲动，凡事不仔细考

虑。你想当兵，父母会答应吗？”

“不答应也要去。”我坚决地说。

“二哥，你和她谈过了吗？”

“谈过了，她去志已决。”

“我反对，冈猛子如果真的去当兵，性情一定会变得很坏，将来不能做贤妻良母。”

“我和你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她假如考取了军校，对她只有好处。她这么爱好文艺，正开始学习写文章投稿，她去从军，一定有不少新鲜的有意义的材料，可以充实她的生活，还可以锻炼她的身体……”

“二哥，你要知道，她学的是师范，明年暑假就要毕业去实习，当小学老师了。你赞成她去当兵，等于毁了她的前途。”

“不，不，我想这大好机会，正是帮助她创造美好前途。她在军队里，一定会搜集不少可歌可泣的材料，对于她将来从事写作，是大有帮助的。”

“我始终反对，如果爸爸和妈妈知道，还了得！”三哥气虎虎地说。

“爸爸不会反对，他曾教我读《木兰辞》，说她代父从军是个孝女，又会打仗。”

因为有了二哥撑腰，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敢和三哥辩论。

“好，我们现在先去吃饭，回头再讨论这个问题。”二哥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准备走。

这天早晨，吃的烧饼油条、油豆腐、粉丝豆浆，是什么味道，我一点感觉不出来。充满在脑中和心里的，只是明天去报名，投考军校的问题。

报 名

真没有想到第二天朝会的时候，校长徐特立先生训话了。他

说：“你们在师范学校读书，不但供给你们有吃有喝，书籍、笔记本，都是公家发的，每年还有两套制服，冬天灰色，夏天白色，每月还有两块钱零用，你们比在家里吃的还好！国家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你们？完全为了要你们毕业之后，终身献给教育，培养幼苗出来！如今你们因为好奇要去当兵，谁来做幼稚生、小学生的老师呢！”

校长在台上训话时，下面有两位同学悄悄地说：又不是全体去从军，有什么关系？难道革命不比教育更重要吗？

“我并不反对你们去投考报名，但是我要警告你们，考不取的，是绝对不准再回学校的。那时候，就得你们自己找出路！”

——当然喽！我几乎要大声说出来。

朝会完了，大家议论纷纷，胆子小的就开始动摇了，我和翔霄姪，还有四位同学，决定第二天去报名。

“考不取，我们去当勤务兵总可以吧！万一不行，我们去投考普通中学。至于钱的问题，到时再说，走一步，算一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要勇敢奋斗才行！”

我好象在讲演似的，她们五个人都不住地点头说：“好，明天我们一块儿去报名。”

真没想到我们六个人都考上了。

然而天下有多少事情不可预料，我考取了军校，正在万分高兴的时候，不料还没有进学校，就被开除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长沙投考的人数，共有3000多人，他们本来规定只录取男生100名，女生20名。后来经全体考生请求增加名额，取了男生200名，女生50名，不料到了武汉要举行复试，淘汰130名。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一致反对，因为我们都是下了最大决心，牺牲家庭，牺牲学业，甚至要牺牲生命，来投考军校的，如今考取了，嫌我们湖南人太多，要想法淘汰，真是岂有此理！革命是全国男女老幼的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于是大家起来反对，立刻推举10个

代表出来，向校方请愿。起初有人提议，男女各半；后来很多人反对，因为男生比女生多好几倍，改为男生8人，女生两人代表。不知什么人提议“铁大姐”（周铁忠）和我两人代表女生，我极力反对，没有人听我的话，全体鼓掌，一致通过。

唉！谁知道恶运来到，10个倒霉鬼去请愿，统统被开除。

这时候，幸亏二哥来武昌接洽政治部工作，我去找他，见面先流泪，他连忙安慰我：

“冈猛子，不要难过，你还有一个机会参加考试的，不过你要改名字，改籍贯去考，这是从北方各省来的一批，他们的程度比南方学生低，因为受军阀的压迫，不敢看三民主义一类的书，你们都看过，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录取。”

“我改个什么名字呢？”

我擦干了眼泪问。

“冰莹，你前次报名是鸣冈，是用的学名，现在用笔名，他不会知道是一个人。”

“籍贯呢？”

“北平。”

“可是我不会说北平话。”

“傻瓜，你不会说你生在湖南吗？”

“呵，不可以，不可以，他们要对相片的。”

“前次你的相片如果是正面，这次用侧面；前次是侧面，这次就用正面，不要穿同样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

没想到这么老实的二哥，会教给他的妹妹说谎。我一面讽刺他，一面暗地里高兴。第二天，我真的去照了一张侧面像，去报了“谢冰莹，北平人，女师大附中肄业。”报名时，要对相片，那个中年人左看右看，他很怀疑，首先问我：

“你该不是冒称北平吧？为什么说的完全是长沙话？”

“我爸爸在长沙做事20多年了，我们兄妹都只会说长沙话，我是在长沙出生的。”

“我好象看见过从长沙来的一个女孩子被开除了，你很象她，是不是你又化名来考？”

“那怎么会？世界上长得相象的人很多。她既然被开除了，还敢化名来考吗？难道她不怕第二次开除！”

我口里虽然这样说着，其实心里早就在发抖了。

好象做梦似的，发榜那天，我从最后一个看起，顺着向前看，还有二三十个名字，我懒得看了，只听得谭浩郁在叫我：

“鸣姊，鸣姊，恭喜你，考了一个状元。第一名！第一名！”

“不要胡说，开什么玩笑嘛！”

我很生气地走开，她把我拖回来看榜。

果然是第一名，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过了半个月，由阅卷的先生们传出来许多笑话：

问：何谓三民主义？

答：农民、工人、商人。

问：何谓施政三时期？

答：春、夏、秋。

问：何谓五胡乱华？

答：酒壶、茶壶、便壶……

还有几个有趣的问答，我记不起来了。

一点感想

前年我回台湾，曾参加军校六期同学的理监事联谊会和聚餐会，谈到女同学的问题，感慨很多。我们当时两百多人，如今已烟消云散，不知还有多少活在人间？最令我们伤心的是：在台湾的黄埔月刊，连“女生队”三个字，也从没有人提及过。半个世纪，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也许百年以后，更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北伐了。

唉！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革命？看样子，我们还要学黎东方先生的方法，来一部：细说民国，细说北伐了。

1981年6月于旧金山潜斋

六十年前的往事——当兵的回忆

最近一年来，我有一件很高兴的事，当作最机密的珍贵资料，藏在我的心里，昨夜又逢失眠，我再三思维、考虑，还是把它写出来的好。

1926年的秋天，我们湖南的女生，有数十人投考军校，有10位女生分配在武昌斗级营一家小小的旅馆里。有一天晚上，大家集中在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我忽然提议：“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十全十美’，这是拿来祝福亲朋的话。今天我们十个有缘，都同住一个旅馆，何不结为十姊妹，以后离开了，不论分散天南地北，永远不要失去联络，经常通信。”

“好极了，我赞成！我赞成！”

矮个子有点胖的黎树蓉首先举手。

“我也赞成！”翔霄、容箴、浩郁都附议。

“好，现在大家都报实际年龄，依长幼有序来排。”我首先提议。

“当然喽，我今年27，我是老大姐。”周铁忠说。于是一个挨一个报出年龄。老大是个共产党员，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和老七早已离开人间；我是老三，从去年开始已经和老四、老五、老六都取得联络，而且常有信件、相片往来。

这是一件值得我特别高兴，值得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我愿再回忆到我是怎样去当兵的。

1986年7月4日早补记

(湖南省冷水江市政协供稿)

我的父亲徐谦

徐 英

作者徐英是国民党元老徐谦的女儿，现居美国。本文从家庭生活的角度记述了徐谦的思想、性格、作风，反映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五卅”惨案、“八·一三”惨案、“九·一八”事变中的活动。

我的家是中国一个旧式家庭，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不过很重道德。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们家最重要的人是我的祖母，父亲处处都尊敬她。

家人对小孩的亲疏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我就听说：“大宝贝，小心肝，中间人，不相干。”我上有大哥，下有弟弟，这个中间“不相干”的人就是我。我生下来是近视眼，没有人注意，老摔跤。摔跤就哭，父亲最不喜欢小孩子哭，一听我哭就打，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是专打人的，非常可怕，也从来没见过他有过笑脸。平日不常见到父亲，我知道他上衙门去了，很少在家中吃饭。不见到他，我可少害怕一点。

小时候，大人都叫我“印官”。我不明白个中来由，问祖母为什么给我起这个怪名字。祖母告诉我：我生下后，父亲点了翰林，做了官，掌了印，所以就替我起了这个名字。

有一天，家人大大小小都穿上了新衣裳。那时我只3岁，也给穿上新衣，跟着家人到什么地方去见什么人。当时只知道人很多，吹吹打打的，很热闹。后来听人说，才知道是入宫给老太后拜寿。凡官到六品，都可以携眷进宫朝拜。

祖母对我说，我父亲本来不只是个六品小官，他本中的是鼎甲第三名探花。主考官文华阁大学士戴鸿慈老师看完所有的卷子后，很欣赏父亲的文章和字体，点了他为探花，还派人来报喜，叫他准备第二天披红戴绿，骑高头大马进宫受封。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谁知第二天早上派人去看榜，却是二甲第八名进士。家人大为奇怪，因为戴老师绝不会误报。过了些时日，戴才偷偷告诉父亲，说西太后在发榜前，打开卷子看，看到第三名徐谦的字太遒劲，想必是个老头子，如何可出个老探花？往下看到第八名的字写得秀丽，就对调了。在那个封建社会里，西太后的话重千钧，谁敢说话！总算祖宗有德，考上了。

“你父六岁时，我们家境不好，我东挪西凑，弄到100两银子，买了一房子土纸，让他天天练字。纸写完了，他才能有这个笔力考中翰林。”这番话是我七八岁时，祖母告诉我的，我一直记在心上。

那时，我家有几位叔叔和堂叔叔，请了位拳师教他们练拳习武，父亲和大伯也学会拳打脚踢。听说父亲赴北京考试，是和大伯骑马北上的。他们白天骑马赶路，晚上轮流喂马睡觉，很是辛苦。

父亲考中翰林前，随我祖母生活在南方，家无收入，父亲在扬州平山堂设馆授徒，得点修金，维持家用。父亲兼好围棋，常和高手对弈，以让二子著称。那时他才19岁，读书下棋两者兼顾，以致体力受不了，病倒了，祖母就不许父亲再下棋。父亲是个极有孝道的人，祖母说的话，没有不听的。父亲4岁丧父，祖母守寡，克勤克俭，带大4个儿女。我父亲有个双胞胎姐姐，从未婚嫁，我父去世后好多年，始在桂林我大哥徐璋家去世。

父亲在京有了官职，遂请祖母来京安居。他在编修馆任职时，我的生母去世，父亲续娶沈氏夫人。沈仪彬是位才女，能书擅画，夫妻俩时时诗词共吟，看上去他们相处得很是快乐。

经常有人来求字，所以父亲常常写大对联，磨墨拉纸全是我的事。那时我只知贪玩，一听父亲叫拉纸，就觉得苦差使临头了。拉纸不许动，笔直站立，一直等父亲写好，纸墨笔砚都收拾完毕，才能走开。现在回想起来不无遗憾，如果当时注意父亲的书法，今天我的文字书法肯定好得多。可是当时只想玩，巴不得快完快走，把那黄金的机会毫不当回事地错过了。他老人家只一心一意在写字，大约也忘记了在旁边拉纸的女儿。如果当时指点指点，我必受益不浅，可是父亲是个心无二用的人。

后来家中有些洋人出入，来得最多的是两位英国人，一位史主教，一位韩大夫。父亲的书架上，也有了不英文书籍。那时不要说洋字，连中国字我也认不了几个。家中有位胡老夫子，教我们几个小孩子读《三字经》。大哥被送到史主教的教会学校读书，祖母说女孩子能识几个字就算了。我跟着和父亲孀生的姑姑住，大哥跟祖母住，继母也生了弟弟，她自己管。

大伯父续娶的杜氏大伯母，是清朝两代中堂的后人，其先人杜文正公、杜文端公受皇室封荫，产业很多，内中有一所大府第，占了西城东太平街半条街。大致分成两座进深很长的院落——东院和西院，当中是一个祠堂院，总起来大约有100多间房子。当时杜家有宫里赏出来的宫女、太监等。改成民国后，这是私产，没有被没收。

大伯一家住西院。东院就请我父亲奉母及所有的叔婢、堂弟家人同住。祠堂院供他们杜氏祖先。这地方很大，花园、院子又多，房间又高，加上没人住，显得格外的清冷和阴森，不由得就生出许多鬼怪狐仙等等荒诞无稽的故事来。我们这些小兄弟小姐妹听了，都惊恐万分。我不敢对父亲说，他那种不可亲近的威严，够我害怕的了，现在又多了一个威胁——高大的房间，当中

吊了一盏昏暗的电灯，各个角落都有可怕的阴影。总之，我10岁前，终日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不久，听说父亲升了官，先是北京地方审判厅丞，后又升任北京高等检察长，并被派出洋，到华盛顿参加世界改良监狱会议。那张朝廷发的护照，是张很长的纸，上面有好些弯弯曲曲的满文。父亲一路上还去了好些国家考察，很是辛苦。一个多月后，他被抬回来了。他的腿麻痹，不能行走。回家后，还休养了很久。韩大夫天天来给他治病。父亲很喜爱京戏，对谭鑫培和刘鸿声尤其钦佩。我常听到他和大伯两人唱戏，唱的最多的是《乌盆计》。大约他有很深的感受，觉得做一个审判官，必须执法严明，不许生出鬼魂来。有时我见他翻来复去看一张纸，直至深夜不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看状纸。

二

随着革命风暴的逼近，父亲的朋友换了一班新人。偶然听到父亲愤懑地说，清皇朝太专横腐败，不顾民生，实在应该打倒。我渐渐长大了，天天在家总会听到些新鲜事，可就是不许问，一问父亲就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不要麻烦大人。”一句话就挡了回去。原来父亲和许多青年革命志士有了来往。大伯和父亲有相同的志趣，和那些人也常常在一起。辛亥革命起了，北京不大平安，大伯和父亲奉祖母及家人在天津租界租了所房子住。不久，清帝退位，民国成立。父亲是最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人，和大伯及一些友人组成国民共进会，倡议共和联邦制。以后，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父亲是位法律专家，遂被任命为司法部次长、代总长，并是清宫财产保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易培基是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们一同去清查清室财产。宫里珠宝琳琅满目，有些人顺手牵羊，装了好些进自己的腰包。父亲在文华阁看到了当年自己的翰林考卷，就顺手带了回家。此卷后

来辗转到了我的手中。

后来，袁世凯野心大膨胀，自己称帝，改年号为“洪宪”。袁要我父亲拥护他，以授他总长为酬劳。父亲痛恨不已，但当面不好发作，婉言说：“我上有高堂老母，请容我回禀老母，待其同意后，再来回复总统。”父亲一到家就怒气冲冲，大骂袁世凯是个无耻小人，向老母说明原委，并告必须马上乘车去上海，如总统府有人来，就说他回家后忽然病倒，由英国韩大夫陪同去上海就医了。

父亲到了上海，苦闷不堪，说：好不容易推翻了清王朝，如今又出了个祸国殃民的袁世凯。有些基督教的朋友劝父亲入基督教，以求精神得到寄托，脱离苦海。父亲说：如果你们有个好上帝，就不该容许袁世凯这种人活在世上，如果袁世凯马上死去，我必入你们的教。还真巧，袁称帝83天就暴病而亡。父亲就这样入了基督教。

后来，黎元洪当了总统，父亲又被任命为司法部次长。那时，张勋要挟解散国会，父亲不赞成又阻止不了，遂去上海以当律师和卖字为生，又办了个法政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先生，就是这个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我和史良先生的年龄差不多，我未去美国读书前，和她多次见面，也谈得来。后来隔绝了来往，直到中美恢复了邦交，才在报端见到史良的名字，可惜没有机会再见面。

辛亥革命后，父亲觉得女孩子也应受良好教育，便把我送进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圣玛利亚读书。我已15岁，进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英文，也有中文课程。我家的家规很严，每个子女每月只给3元月费，平均每日只能用1毛钱。我大哥有祖母这个后台，幼弟有其亲母为后台，只有我这个中间“不相干”的人没有后台。每月干巴巴3元钱，如此过了7年的艰苦生活。我比同班同学大好多，知道用功，每考都是第一，每年跳一级。由于用功过度，我得了两天两夜睡不醒的怪病，全校震惊，通知家里。我

父母把我接回去就医。愈后回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父亲对你真好，一见你就双眼流泪。”我大受感动，原来父亲是爱我的。我对他的恐惧心理消失了，同时，还得到莫大的安慰：世上有人爱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父亲被派到欧洲，参加巴黎和会。这是父亲第二次出国。

1923年，父亲去广州追随孙总理奔走革命，但不知何事与孙先生有了不同看法，遂应岭南大学钟荣光先生之请，去当中文系主任。那时我在学校又生病，就去父亲处养病，也在岭南大学旁听，认识了父亲的得意门生司徒宽。父母都赞成选他为婿。司徒将毕业去美国深造时，奉父母之命，我和司徒订了婚。我也想去美国留学，父亲颇不以为然，说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中国人为何要去那里读基本大学？司徒不同，他已大学毕业，又是华侨，是去深造的。我只好到北京上燕京大学，那是1924年。

这年，父亲在岭南大学的任期已满，孙中山先生要他去北京劝冯玉祥将军参加国民革命。父亲到北京后，发现3元月费对一个大学生不够用。有一天他给了我200元，说：“你把这些钱存入银行，慢慢地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大的一笔“财产”。那时燕京大学一年学费连膳宿在内，只不过72元。我们父女常常见面。我慢慢懂得了革命，父亲也发现这个女儿与他的志趣有很多相近之处，便常常和我谈国家在专制政权下的腐败和民生的痛苦。并教导我为人要读好书，懂大势，做救国救民的事。我一直记着父亲的教导。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震动。北京学生成立了“五卅沪案后援会”，学生四出募捐，救济上海罢工工人，一下子捐得3万元，银元、铜板堆成小山。我是后援会的财务主任，这些堆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的钱，我放心不下，父亲说叫鹿钟麟派兵来警卫。父亲和鹿钟麟是好朋友，挂了电话，来了一排人。我被派去上海放赈，父亲大为赞成。发放后还有点余款。我

们各校代表成立了“五卅青年社”，由该社发起创办一个“五卅学校”，请我父当名誉校长，学校的大匾就是他写的。校舍由我奔走，父亲协助，通过鹿钟麟要到蒙古宣王府的府第。父亲仍每月出版“基督教救国论”的小册子。我记得有本叫《劳资合一论》。有一次，父亲向我借300元，说是印刷费付不出了，他知道我手上管有学生会的很多钱。我说：“爸爸，您不是老教导我为人千万不可擅自动用公款吗？”父亲大笑说：“你真是孺子可教，我是试试你为人的。你居然明大义，敢违抗父命，很有革命精神。你好好读书办事吧！”

第二年，发生了“三·一八”段祺瑞执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大惨案。父亲和李大钊都是“三·一八”运动的领导人。天安门的群众大会，父亲是主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日本炮轰大沽口国民军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强硬驳回八国通牒，号召民众联合一致，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也参加了天安门大会。会后，我们到执政府请愿，遭到段祺瑞卫队的开枪屠杀。我幸免于难，逃回了学校。我对父亲的安危放心不下，挂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大伯接的电话，听到是我的声音，大为惊喜。因为不知是谁先报了信，说看见我倒在地上，通知去收尸。大伯告诉我，父亲因痔疮大流血，被人从天安门抬了回来，没有去请愿，现在还躺在床上未能起床。我放下电话，就去看父亲。那时，父亲是中俄大学校长、中俄庚款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和住宿都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旁的一所房子里。我进去时，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等人都在病榻旁。

段祺瑞为了逃避罪责，嫁祸于人，诬陷父亲和李大钊等人“率领暴徒袭击国务院”，遂下令通缉。不久，父亲便离北京随冯玉祥去莫斯科考察，直到北伐开始后才回到广州，任国民革命政府司法部长。我的大伯也去了广州，当广州市司法厅厅长。父亲每星期有六天在司法部办公，第7天上观音山传道，听众时时有两三千人，“基督教救国论”的小册子也愈出愈多。父亲的文

章传到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耳中，坎特伯雷便请父亲去当主教。父亲以国难当头无法分身，婉言谢绝了。

三

“三·一八”以后，我流亡到美国继续上学，在那里和司徒宽结了婚。1926年底，我回到广州。

1927年1月，国民政府搬武汉，父亲去了汉口。就在这年，大伯全家由港乘船去沪，准备再转车回北京。谁知船一到吴淞口，大伯就被蒋介石的特务抓走。我在港刚刚生下第一个女儿，满月后马上去上海看望大伯。蒋介石大捕异己分子，他将武汉政府全班人马请到南京。别人到南京全招待在军政部，独将父亲“招待”在丁家花园，并派了16人的卫队前来“保护”。父亲实际上是受到暗中监视。

父亲是老于政治风浪的人，知道处境不妙，寻思脱身之计。父亲的老仆刘四，身材和父亲差不多，两人在房间调换衣服穿，以防万一。我大哥那时已娶了一位洋嫂嫂，住在上海。父亲打电报，叫他们速去南京。他们四人日夜在一起。卫队紧紧盯住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出去散步，卫队也跟在后面。有一天，他们四人散步到下关一个英国麦牧师家。麦牧师家的后门临江，他知道父亲的境遇后，派人到江边察看有没有升火待发的轮船，恰巧有条船马上去九江。麦牧师立刻悄悄从后门送父亲四人上了大船。父亲他们先是上行到九江，然后又换船顺流而下到了上海，住进黄浦滩一家外国旅馆，总算逃出了虎口。

这时，大伯也被押到南京。父亲的好友钮永建去见蒋介石，问蒋何故将一个毫无过错的人捕来南京受监狱之苦？蒋问何人，钮说徐巽。蒋故意叫人去查。他得到我父亲已经出走的消息，知道留大伯无用，遂说是“误捕”，将大伯放了。大伯一到上海，大病发作，没几天就去世了。那时，父亲刚到上海，不敢露面奔

丧。他们兄弟最后见了一面，半夜就把大伯发丧了。我们到上海奔丧也已晚了。

以后，父亲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所小洋房隐居。祖母已在前几年去世了。有一天，杜月笙忽然来拜会。父亲与他素无来往，不明何以来访，遂请进相见。杜说，他的弟兄们发现蒋介石派人来上海行刺，他们认为徐先生从未错判一个案子，未误杀过一条人命，是位大好人，不可任人暗杀。他们决意保护，请徐先生不要随意外出。从此，父亲4年自禁家中。

1931年“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父亲开始为抗日救国活动奔走。1933年冬，他参加了李济深先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来因胆结石症发作，到香港治疗。经医生检查，认为要马上动手术，如果开刀割治，还可以活上几年，如果不开刀，只有六个月的寿命。我们开了家庭会议，继母和我们几个子女都不敢断然表态，还是父亲自己作主：“我决定开刀，和你们多过几年，不然的话，半年就和你们永别了。”最好的专家波尔大医生给父亲动的手术，检验内科症状的也是一位名医。手术非常成功，取出了一大块黑褐色的胆石。我们天天去医院看视。医生说父亲是个好病人，一点也不违背医嘱。父亲病情日渐好转，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

有一天我去看他，大吃一惊，他面无血色，精神萎靡，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医生来后，才知道昨晚伤口大流血。医生给输了血，没有发现其他症状，只需安静休养。

那时我的家在广州，丈夫在岭南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卢沟桥事起，日本飞机时时轰炸。一天，有个大炸弹落在岭南大学，全校惊慌，很多人出走香港。我们一家也参加了这个逃亡行列。广州到香港只不过两小时的火车，但那天警报频频，火车走走停停，拖了24小时始到香港。父亲也和其他亲友一样在紧张中等待我们，他虽然动过手术，但一直等到我们到了家才放心休息。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和李济深同机飞南京，共赴国难，

任国防参议会议员。尔后，国家重心迁武汉，国民参政会成立，父亲是参政员。1938年冬，父亲受参议会的委托，到粤桂川视察和协助总动员，因为手术后身体虚弱，兼有脉搏微弱，精力不支，从广州回香港治疗。那时大量难民涌入香港，父亲想办个救济院，收留并教育无家可归的难童，但他手上经济不宽裕。他的二女徐政的丈夫卞凤年在南洋中国银行任职。父亲知道南洋华侨素来爱国并乐善好施，我的继母又是位画家，于是两老预备了许多字画去南洋举办展览会募捐。父亲大事宣传抗日，大受欢迎。华侨们无不慷慨解囊，募捐很成功。回香港后，父亲在九龙新界粉岭租了一所民房，开办难童工艺救济院，请了几位教师，学生半日学文化，半日劳动。产品在市面上销售，以维持经费的不足。收容的难童由开始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父亲看到战事的发展愈来愈不利，对国事忧心忡忡，加上香港的战事已迫在眉睫，谋划如何安置这些难童，日夜操劳过度，遂使心脏病发作，呼吸困难。医生给套上氧气箱，终因心力衰竭，在氧气箱中慢慢地、平平安安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世。这一天是1940年9月26日。

1986年1月12月

于美国檀香山

(北京市政协供稿)

怀念竺可桢校长

马国均

作者马国均1943年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核能部顾问工程师、核电专家。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论语》)



竺可桢

文首引用了颜渊称颂万世师表孔老夫子的几句话。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千古弟子对师长崇敬和向往的心情。谁还见到过比这一段话更庄严、更贴切、更有力量的对师长的颂辞呢？可是，每当我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的时候，心中除了充满着类似的仰慕和崇拜以外，更洋溢着无限亲切感激的恩情。因为竺可桢先生不但是我们的校长，同时，他也是我个人的导师。

导 师

1941年秋天，开课不久，有一天，看见一群同学们齐集何家巷训导处门口，读着一张大布告。我挤进人群看个究竟，布告大意说：“本校历年来，学生进修德业的导师均由校方指定。从本年度开始，导师的选择改由同学们自由投票选择……”云云。一时，福至心灵，我竟投了校长竺可桢先生一票。揭晓以后，才发现选校长做导师的，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事隔40多年，记不清当年我为什么会如此冒昧，静静地回想，却仍依稀记得当时投票结果公布以后，既喜悦又忐忑的心情。

忐忑得最厉害的刹那，是校工通知我去拜会校长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回到训导处，改变我的初衷。

那是一个阴雨的星期天下午，我趑趄地站在他那空荡荡的大办公室门口，不敢惊动他老人家。他终于招手让我进去，在他那大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的名字，叫做马国均？”

“是的。”我答道。

“你家在什么地方？”

“湖南湘潭。”

“你听我的口音，有没有困难？”

“既没！”我咬着洋泾浜上海口音回答着。

“你为什么选我做你的导师呢？”

“我对校长的人格和学问十分崇拜。”我嗫嚅着。

“我希望多晓得一些同学们的意见和想法，希望你将来变成我和同学之间的桥梁。”他顿了一顿，又问，“你是念机械工程的？”

“是的。”我回答。

“你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微积分差一点。你为什么选读机械

系呢？”

乖乖，好仔细的校长，在召见我之前，居然查过我的成绩单了。这一下，我真狼狈，于是硬着头皮，将实况告诉了他。

“我的数学并不坏，上学期大考时，打摆子，缺了微积分期考，后来才补考的。我补考得了91分，但成绩单上只登记60分，我真不该缺考。”我头上热汗直冒。

“哦！”校长似乎察觉了我那尴尬的傻相，他立刻再转话题：“你结婚没有？”

天呀，又一个令人脸红的问题。我额头上的汗珠冒得更多了。我一面拭汗，一面回答。

“没有。”

“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啊，有一个……”我胡说呢，还是说双关语呢？我甚至暗中希望他没有听清我的答案。

“哦！”他不再使我难堪了。

这一次谈话约经半小时光景，其他对话已记不得了。但我清晰地记得握手告辞，他送我出门，说道：

“有事随时来找我，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祺秘书。”

诸葛祺秘书，在遵义上学的校友们谁不记得他，不经过他那一关是不容易见到校长的。他居然告诉我，有事找他不必通过诸葛祺秘书，这真令我感到受宠若惊了。

关 怀

日子久了，我受竺校长的熏陶愈久，对他的敬仰愈深；他对我的认识愈多，对我的关心愈切。四时八节，总邀我去他家，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了解学生们肚子饥饿的可怜，佳节思亲的可怜。吃些什么，我完全记不得了，但他对我的亲切和爱护，使我终身不能忘怀。

和竺校长闲话家常，是最令人感动的回忆。他深知我谈吐木讷，有时索性一直说下去，不期待我的任何回答和解释了。在公共场合里，他给人们的印象是拙于辞令，“这个是这个”，“这个”的闲话，说个不停。但是，当他教诲我时，却是那么近情近理，深入浅出，令人心感，令人敬服！

有一次，他又和我谈到婚姻问题：

“你的女朋友在遵义？”他关切地问我。

“不，在重庆。”我答。

“她也是学生，还是在工作？学的什么？”

“她是中央护士学校的学生。”

“你们怎么认识的？你生病住过医院？”

“不，我们是同乡，而且是邻居，从小就认识。”

“好极了，互相了解家庭背景，十分重要。”

他停了一停，接着又问：“毕业后准备结婚？”

我真害羞了，连忙否认：

“不，我没有这么性急，我们认识还不够深，可能还得等些日子。”我装成十分成熟的样子回答着。

“不，不要拖得太久了。人人都知道早婚有害，但很少人谈过迟婚更加无益。”他兴致似乎很浓，继续地说下去，“无论男女，超过了某一年龄，思想成熟了，个性固定了，往往很难牺牲个人的成见，迁就对方，对家庭的幸福反而有不良的影响。二十四五岁是结婚最合适的年龄，太迟了，反而不好。”

顿时，我竟想入非非，难道这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校长丧偶，续弦才两三年。立刻之间，连忙责备自己不应该胡思乱想。新夫人，我常见面，她是那么温柔敦厚，和蔼可亲，而且生下一位漂亮女儿，刚满周岁，家中洋溢着幸福和欢愉。他的话只不过是對我未来幸福的关怀而已。迄今回想，那亲切的关怀，实已远远地超越了一般师生的情谊了。当时，我心中的感动真是无法形容。

言 志

大家都知道，孔老夫子一时兴致来了，召集几位得意门生，“各言尔志”，学生们发表意见，孔老夫子点头，子路讲得离谱了，还挨了一顿申斥。竺校长当年只有我这么一个半吊子导生，所以也不免想听听我的志向怎样。

“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如果成绩合标准，我想留在学校里当助教。”

“你对教书有兴趣？”

“不，我想继续进修，将来考公费留学。”

“很好，留学学习什么？”

“航空工程，我想，将来救国，万事莫如航空急。”

他老人家低头不语，若有所思。然后轻声地说道：

“你们一代很幸运，对自己的前途知道怎么选择，而且有无限制的不同的选择。”

我愣了一会，不禁反问一句话：

“校长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很幸运？”

我只想到当时抗战的艰苦，肚子时刻在饥饿状态中，连纸笔都买不起，不要说买教科书了。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觉得后悔不应该提出那么幼稚的反问。

他老人家并没有直接答复我的询问，可是，他脸上浮现了笑容，从容地说下去，不停地说，我不敢再插嘴了。

“我是前清末年被选拔去美国留学的。当时仅16岁，剪了辫子，才准上船。到了美国连英语都听不明白，莫说选课了。有一天，学校当局问我想念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沉思了一会，我告诉他，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

“学了一年农科，没有味道，有人告诉我理科比较新颖，还不如改学理科为好。于是我请求转系。学校当局问我想转学什么

系，我又答不上来。愣了许久，我又忘不了中国以农立国那种基本意识，所以，我答道：我想读与农业有关的理科。

“这位先生，一面摇头，一面翻阅一本学校概况，他说，有了，读气象怎样，又是理科，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得相当愉快。接着，他继续说了下去，我静静地听着。

“于是，我终身与气象学结了解之缘，一直到接任本校校长职务为止，没有离开过气象的工作岗位。你看，天下许多事是多么偶然啊！”

“我们那一代人，连立个志愿都不知道如何适合国家的需要。你们一代不但人人都有能力选择志愿，而且机会那么多，这不是幸福是什么呢？”

“抗战已到极度艰苦的阶段了，未来更苦难的日子还很长，但是青年人要有信心，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你选择航空工程，将来报效国家，方向是正确的。”

40年来，我常常回忆这一段“言志”的往事。本来他老人家想听学生言志，终于引起了他说出自己“言志”的故事来。这岂不比再有、公西华侍坐，孔老夫子点头更亲切、更有风度、更有意义吗？

风 范

我对竺可桢校长的景仰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当年，湖南省有一位颇负盛名的地理老师谢国度先生，他在课堂里几乎无日不提到竺可桢先生气象分区的贡献。他对竺先生可谓倾倒万分。但我却从未打听过他与竺可桢先生之间有无师生关系。

我是在宜山考进浙江大学的。当然抱了很大的希望，想一睹心仪已久的竺可桢校长的丰采，没想到那么容易见到他。每天中午，他老人家按时到大茅草棚饭厅里，和全体同学们一同吃那难于下咽的糙米饭，有时吃完午饭还站起来作十几分钟的谈话。可

惜我这湖南小子，听他那绍兴话实在费力，有时连一句都没听懂。

有一天，黄昏时近，发现空地上搭了一个临时讲坛，点亮了几盏大煤气灯。我想，一定有什么热闹可看了。人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陈诚将军要来演讲。那时，正值日军南犯，南宁吃紧，浙大正准备迁往贵州。陈诚是当时战区最高指挥官，加之浙大同学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敌工作。我们幻想大学生毕竟很了不起，与这最高指挥官并肩作战。

陈将军的青田话比竺校长的绍兴话更难懂，我听完讲演，只懂得几句，而且是似乎不太顺耳的话。他说：“抗日是我们军人的责任，建国是你们学生的责任……”言下之意，你们不必参加战地工作似的。我觉得他未免小看了我们大学生，心中有点不是味道。

竺校长致答辞，我听懂了几句令我十分兴奋的话。他说：“不久以前，在庐山国是会议的辰光，陈辞修将军看起来翩翩年少，而今他为国宣劳，头上已增添几丝白发了……”，这本来不过是主人赞美客人的客气话，可是，在我当年幼稚的脑子里，却想象那是英雄式的还击——你小看了我的学生子，我也倚老卖老一番。好过瘾。

回思往事，我当时已经入大学，思想上还那么幼稚，那么荒唐可笑，如同白痴。少年时代的幼稚，当然只是暂时的。可是，从此竺校长的风范，在我心目中却变成永恒的了。

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活，并没有我们今天怀念中那么风平浪静。相反地，经常会风波迭起，动荡不安。在我的记忆中，某次游行便是很突出的例子。

我无意追忆那历史上的小插曲，更无资格作任何历史评价。但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那段动荡期中，竺校长个人给我的风范和启示。

那天早上，我独自坐在何家巷5号教室里，等待第一堂电工原理月考。啃笔记告一段落，发现全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心想走错了教室，继而想几点钟了。穷小子没有手表，索性兜到何家

巷3号去看走廊上的大钟。走入何家巷3号大门口，只见院子里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熙熙攘攘，好象天就要坍塌了下来似的。我看看时钟，望望同学们的面孔，似乎没有同班生，于是又匆匆回教室，等待考试。心想缺考不是味道，补考再好，也只算你60分。

考试终于没有举行，但遵义城里却举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大游行。有人说竺校长坐在黄包车里带队游行，也有人说竺校长是步行，黄包车是空着的。童心未泯，顿时有点后悔，没有去大街上看个究竟。

风平浪静之后，除了民主墙上贴了更多的文章，街头宪兵咯咯的皮鞋声更加响亮一点以外，教学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记不清隔了多久，我又到校长办公室去拜见竺校长。我似乎从来没有见他那么严肃过，显然与最近的风潮有些关联，所以我更不敢说任何话了。

“校园里一切平静了？”他首先打破了沉默。

“月考完了，一切似乎和平日一样。”我答道。

“民主墙上文章很多吗？”

“很多，读不完。”

“署名的多不多？”

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问这句话，所以我反问一句：

“校长的意思是……”

“我认为青年人要练习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才是求是精神。我欢喜写文章署名的同学。希望大家都光明磊落，表示意见，这是发扬求是精神的高度表现。”

我无话可说，校长的表情似乎比刚才更严肃：

“这次游行平安无事，我感到满意。但我一直十分担心，我最大的责任是保障全校师生的安全，而当地的治安机关却有他们自己的责任。怎样调协这不同的责任，我费了很多周章，总算没有出半点乱子。”

校长没有透露半个字关于怎样调协的经过，我更不敢问他半

句。松了一口气，他继续告诉我：

“我刚从重庆回来不久，我去教育部报告这次事件的经过。当局示意我立即引咎辞职，我并未立刻同意。第一，我有责任保障全体师生安全，在没有获得治安机关肯定保障以前，殊难一走了事。第二，我呈报教育部，学生从头到尾都没有违章乱纪，我领队，我负全部责任，希望不要归咎到任何一位同学。如果这两件事获得部里谅解，我一定自动辞职。

“此外，还有一件隐衷在我心里：目前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中，只有我和梅贻琦先生两人还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深知政治上许多事极为复杂。如果我不顾大局，只图意气用事；立即辞职的话，不幸引起其他支节来了，我将何以自处。顾全个人容易，顾全大局维艰。本来这些话不必对你讲，但是，我希望你记住，凡事都得负责到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竺校长那么严肃得令我敬畏。40年后，回想往事，竺校长居然将内心衷曲说给我这小子知道，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孤单啊！回到宿舍，有人问我校长讲些什么，我不曾透露半句，只轻声地说了一声：“我们的校长很伟大！”

慈 爱

一天早上，我夹着笔记本从老邮局宿舍五楼飞奔下来，赶去上第一堂课。天下着雪，弄堂的寒风刺在脸上，犹如刀割。走出巷，忽然听到小孩的哀泣声。猛抬头，瞥见地下蹲着一位五六岁的小女孩，蓬头垢面，圆圆的小脸孔，冻成象剥了壳的皮蛋，已呈紫黑色了，上身披着一件不能再褴褛的大人穿的破衣，下身全部赤露在寒风里抖擞着。我停了脚步，走近小孩，她只是哀号，没有回答我任何询问。管不了上课，我牵着她回到宿舍里，找那管宿舍的老罗。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几张钞票，嘱咐老罗买些吃

的穿的，救下这条小命再说。

下课回来，老罗居然作了妥善安顿。他将钞票和孩子给了巷子里的一位老妇人。老罗引我走入那户人家，室内漆黑，大概没有窗户，地上燃烧些什么，很温暖，却有些臭味。小女孩看见我走了进来，连忙抱着我的双腿：“马先生！”叫个不停。看不清她有没有洗脸，但摸摸她身上穿了一件旧棉袄，小手温温的，也温暖了我的心。那妇人没有亏待这孩子，我十分感激。她告诉我，她也没有饭吃，老罗给她的钱可以过两三天，小棉袄是她家的旧衣，不算钱，不生关系（贵州土话）……

两三天！我盘算着，我自己口袋里一文莫名了，两三天以后又怎么办？我去见校长。校长听完我的叙述后，十分同情。他随手掏出一张名片，一边写，一边告诉我：

“遵义有一个育幼院，负责人是位×女士，我介绍你去见她。我想，她大概会收容这可怜的孩子。”

好不容易见到这位女士。从她家的排场和她一身的穿着来看，不问也知道她不是寻常的百姓。我一面掏出竺校长的名片，一面讲述这小孩子的苦经。她似乎不愿多听，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育幼院是×夫人办的，指定收难童。她又不是难童，我怎么能收容呢？”

“她不是难童，是什么？请问：没爹娘，没饭吃，没衣穿，眼见就要冻死了，还不算难童，那么谁是难童呢？”我沉不住气，嗓门似乎高了一点儿。

“年轻人，我告诉你，难童是指战地收容的孤儿。贵州不算战区，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真是……”

挨了一记闭门羹，只得回头再去找竺校长。听完我的报告，他老人家又掏出一张名片，介绍我去见遵义县长孔福民先生。

这个名字立刻令人发生好感，好一个县太爷名字啊！万民有福，这一下问题可解决了。可怜的孩子，我祝福你。我一面走，一面端详这张名片，一面暗中念念有词。

福民县长没有接见我，派了个秘书和我谈了一会。他说：“如果这种小事都要管，那么县政府不要办公了。”顿时，我真怀疑我走错了衙门，更加怀疑我的耳朵。我咬紧牙关，向他横眉一望，冲出衙门，再去找竺校长。我有信心，他那儿有我追寻未得的温暖和慈爱。

校长再给我一张名片，这是写给当地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高文伯先生的。这一回他写明白了，我是他的导生，请他惠予接见。

高先生接见了我，出乎意外，还称赞我热心公益。但是，他说，他很忙，将这件事交给秘书去办，要我坐着等一等。终于等到秘书出来了，是一位和蔼的老年人。他吩咐我：“明天上午，将难童送到桃溪寺的收容所去，一切都交涉好了。”这老人居然称这可怜的孩子为难童，听了令人舒服。

次日，一个大晴天，仍旧很冷。我缺课领着孩子去桃溪寺，一路上，我问了她许多问题，但似乎答非所问，她连自己姓什么都说不上来。我断定她决非低能，因为她一路上问长问短的，而且问得那么富有情感。走了十几里路，终于到达了桃溪寺，一位胖女士来和我接洽。她面孔看来还慈祥，但讲话却十分坚定。

“马先生，她不是难童，我很抱歉，不能收留她。”

晴天霹雳，令我火气直冒，怎么又不叫做难童了。

“高文伯先生答应了，怎么又变卦了？”我反问。

“我们不归高专管辖，我们直属中央。”她一字一顿，似乎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我心想，吵架不是办法，于是换了一种缓和的口吻：

“我是浙大的学生，我没有能力抚养这孩子，可怜她罢，只给她一碗饭吃，不称她做难童好了。”

“一个孩子一份粮，中央按人口配粮食，哪有多余的，除非呈报重庆批准，我没有办法。”她斩钉截铁地说。

“要我领回去办不到，可怜她吧！”我哀求着。

胖女人也不是有意和我为难。她听了我的哀求，心肠似乎软

了一点，终于回答说：

“你回学校去，将她留在这里，瞧着办好了。”

我的天！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孩子命不该死。她怎么“办”，我大可不必问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约了同房几位同学到桃溪寺去郊游，顺便探望这可怜的孩子。我发现胖女人终于没有收容她，将她转送到附近一户农家做童养媳了。一不做，二不休，问清那农家地址，索性看个究竟。

当我们走近那茅草房的农家，小女孩一蹦一跳，领着一一条大黄狗，远远地直叫：“马先生！马先生！”多亲热啊！农家留我们吃了一顿饭，黄包谷夹白米饭，很香。

直到今天，我每怀念竺校长，便想到那个孩子，那个农家，那一顿香喷喷包谷饭和那条老黄狗。

友 生

我曾梦想当年如果竺可桢先生不曾许身科学，他必定是一位诗人。长期接触，使我领悟到竺校长不但有湛深的诗人修养，而且有着诗人纯洁的情愫。举一个例子：校长给我私人信件都署名“友生竺可桢”五个字。我每见“友生”二字，耳边就仿佛听到诗经中“伐木丁丁，鸟鸣嚶嚶”的韵律，心中就引起诗经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共鸣。他老人家谦谦君子的风度，对弟子都流露出如此纯真的友情，多富诗意。

提到信件，他老人家从不由秘书代笔，皆用毛笔亲自写，字迹娟逸，功力极深，凡保存着他老人家墨宝的校友，当同意我的看法无疑。

最令我毕生难忘的通讯往事，是抗战胜利之初，校长替我介绍工作的经过。日军投降后，学校尚待复原东迁，我先返湖南故乡省亲，然后启程赴上海。启程以前，我上书报导行址，因恐多

扰，故仅请安而已。孰料甫到上海，便收到他老人家来信，备极关怀，并附一函，囑面交他的老朋友陈晤皆先生，托他替我安排一份工作。

胜利初期，上海求职之难，难于上青天。陈先生是当年上海市炙手可热的善后救济总署的负责人。我心想，叨校长鸿福，也许谋得一枝之栖，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南京路上善后救济总署办公大楼，变成了我每天朝圣的宫殿，霞飞路豪华的陈公馆，也经常有我的足迹，奔波了几个月，始终没有获得陈先生的眷顾。我不愿将个人的失望去扰乱校长的安宁，所以一直不敢把在上海的遭遇报告校长。后来机械系教授王宏基先生介绍我去台湾台中飞机制造厂工作，不久家眷也在台中安顿下来了。上海那一场辛酸的恶梦，也尽可能地忘记它算了。

有一天，我收到从上海转过来自杭州寄出的一封信，信是杭州电厂寄来的，信中附来聘书一纸。信上说接受竺校长的特别推荐，所以希望我早日到职云云。此中曲折，使我一时茫然，猜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仔细推敲，我的结论是：陈晤皆先生可能回答了校长关于我求职未果的事，所以他老人家一到杭州，立即将我推荐给杭州电厂。他那亲切眷爱我这不成大器的弟子，真可谓无微不至了。为了感激他老人家那份恩情，此生真不知暗中流过多少眼泪。

最后一次收到校长的信，是我到台中半年以后。无意中看见报上刊出一则小新闻，大意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因公飞抵台北，后天恰值竺先生六十岁寿辰，借此避寿”云云。我立刻写了一封祝寿信，请报馆代转，过了几天便收到竺校长简短的回音，信中有言“国家多难，个人生辰，何足挂齿，盼你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信末署名仍然是“友生竺可桢”那令人亲切的五个字。

此后，师生之间有形的联系便永远终断了。精神上，此生未

曾一日忘怀恩师给我的训海、启示和典范。这份感受将铭刻在心头，直到永远。

故校长竺可桢先生是一代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他老人家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教育上的贡献，道德文章的影响，都不是藐焉小子可述其万一者。本文仅就个人数十年对恩师的感受，作一简略的追忆。“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低徊俯首，心向往之。

(浙江省政协供稿)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

李 侠 文

作者李侠文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新闻社理事会理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抗战前后这段时期，是《大公报》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它在促进全国团结合作、鼓动人心士气，发扬民族精神，支持抗战到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九·一八”以后，日寇野心不戢，谋我更急，华北形势日非，《大公报》未雨绸缪，由津馆开始，预先增辟沪馆。“七·七”事变后，津馆最先不保，随着战局推移，沪馆亦告放弃。其时报馆同人分为两路，一路转往汉口，一路南下香港。汉口馆后来迁入重庆。香港陷敌前，桂馆已成立。迨桂林失守，最后都集中到重庆一馆，毁一馆，设一馆，百折不挠，在日寇的飞机炸弹威胁下，同人流离颠沛，备尝辛险，而弥久弥奋，坚守工作岗位，终于迎来抗战胜利。在此过程中，张季鸾、胡政之两位先生呕出心肝，主持至计，运筹策划，与同人同心协力，甘苦共尝，其贤劳不可湮没，而季鸾先生患有肺病，中道以劳瘁转剧而长逝，未能目睹胜利之到临，尤为可惜。

今年为“七·七”事变50周年，今明两年又分别是季鸾、政之两先生诞生100周年。他们去世距今先后46和37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生前谈及如何写文章、办报纸、做报人的道理，留在我的回忆中，经久不褪。

全国政协编者来信征稿，谨将本人与这两位报界老前辈生前接触所见所闻所感受者，就记忆所及，拉杂写此拙文，以为纪念。

(一)

我和季鸾先生接触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左右。我初进报馆时，他和政之先生还住在香港，后来才携眷赴渝定居，但仍时常来港。外间传他来往渝港之间，每次都“负有任务”，被人问及，他总是说“我们有一家报馆在港，我来港自然有任务了。”

他每到编辑部，坐下来后，一支香烟在手，与大家言笑晏晏，谈论时事，四座风生。那时编辑部人手极精简，每天下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去碰碰头，谈谈当天的新闻，比较各报处理版面内容的异同。我们几个进馆不久的年轻人，因熬夜工作，回去较晚，看完几份报纸已是黄昏时候，季鸾先生常常招呼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报馆在大道中洛兴行，以就近去永吉街陆羽茶室的次数为多。我们在他面前都觉得无拘无束。他喜欢昆曲，偶亦搓搓麻将。我没有机会听他“新声翻法曲”，但曾和他搓过一次麻将。

对于青年同学，季鸾先生总是以鼓励为主，奖掖有加。我写过一篇有关行政效率的社评，那是当时时髦的话题，我没有过什么研究，无非一些书本知识。恰好翌日编辑部同人在资料室开会，他问起这篇社评是谁写的，并当众表示赞许。

他由渝来港时，多半住在如云酒店，每周总有一次由金诚夫先生偕同蒋荫恩、马廷栋和我到他酒店房间喝下午茶，听他讲述国际问题和抗战局势。蒋、马两兄分别是要闻版和国际版的编辑，而我的工作翻译外电，偶尔写写社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编报和撰评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一次他批评英国切断滇缅路，助长日本侵略凶焰。我照他意见写了一篇社评。那时日寇尚未南进，英国不敢开罪日寇，对香港的报纸，都由华民政务司作出版

前检查，凡是“日寇”、“敌军”、“侵略者”的字样都不许用，批评到英国政策更不用说了。港英的检查最缺德的是，在小样上被删掉的地方，不许“开天窗”。因此，我写这篇社评见报时，不但主要论点失了纵，有些段落的文气也不连贯。当天他回编辑部来，默然不提这篇社评。一篇代表报社意见的评论对于一项重要问题表态，如此不清不楚，无怪他不高兴。

他交游遍全国，平日喜欢倾听各方意见。他在港极少举行宴会，但有时邀约一两位朋友吃饭谈天。这些朋友多半有专门知识或事业经验以及对时局有见解的人。他在格兰酒店住过，在那里与客人共饭时，我也曾叨陪末座，听主客交谈，得益不浅。我想这也是他和政之先生培养青年同人的一法。

他对我们说过，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将在全国设四个分馆，作为总编辑，他将于每周把他的见闻和对时局的看法传给四个馆的编辑部，以供参考。他又曾发愿写一本书，叙述其30年的记者生涯。他这两点愿望都不曾实现。

“文如其人”。季鸾先生为文与他为学为人是分不开的。大家都知道，他少年时受学于关中经学家刘古愚。刘氏治《通鉴》、《通考》，又曾刻欧阳修《新五代史》，他得以师承观览，打好了国学的根基，不但以后为文绵密警策，且深受经学家讲究砥节砺行的影响。其后留学日本，赞助辛亥革命，投身报界，关心天下大事，目光四射，识见更广。他的文章取重一时，但为文从不留稿，尝谓“我们写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话虽如此，他写文章的态度是严谨的，执笔前都经过深思熟虑，从不作漫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谈到一些问题，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中间往往有些对仗的警句，使读者琅琅上口。他曾对我们谈社评写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他早期所写《蒋介石的人生观》一

文，指摘蒋身为总司令，在前方军士死亡以万计之际，在后方散发非有美满婚姻，就不能使革命进步的怪论，意旨严正，但行文极喜笑怒骂之能事，大抵一时即兴之作，这种文字风格在他的文章中是绝无仅有的。

他对朋友说过，生平三大得意事，第一件是为孙中山先生草拟就职大元帅的文告。他在上海《中华新报》所写《列宁逝世》一文说，“列宁逝世之报，将永为人类历史上特笔大书之事……历史上所谓大英雄，其事迹往往仅代表一民族或一国家而止，而列宁之理想，则为全人类的，其事业则世界的……就此而言，千古一人而已。”今年台湾方面重印《季鸾文存》，把这篇文章抽掉，不让今天台湾的读者见到，而在60多年前军阀割据时期，他对列宁如此推崇，可见其胆识一斑。

他对国事较具影响力的评论，多半发表于抗战前及其初期，就中以西安事变以及有关晋南事件两篇颇受疵议。他当时受到蒋介石的礼遇，以“国士”相待。国民党中人认为蒋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他的部下，而没有和他平起平坐的诤友，有之，则唯张季鸾一人。他对蒋难免有知己之感，为营救蒋出险，规劝张、杨，言辞激越，但为了一致对外，蒋向张、杨承诺抗战后，中共也曾从中促成蒋的释放。关于晋南事件一文，与他一向持平的态度大异其趣。侧闻他曾说过：“芸生招架不住，只好由我力疾写此文，以资应付。”他受到的压力如何，不得而知，这一篇文章无疑是一大败笔。但全面看待他的言论，可以说瑕不掩瑜。中共对他没有求全责备。他逝世时，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以参政员名义分别由延安、重庆致唁，电文中肯定他“坚持抗战，功在国家”，称许他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正，允为士林所矜式”。

季鸾先生对人一团和气，全无架子，却不是面面俱圆的好好先生，他外圆内方，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处事极有原则。他初以

一记者献身社会，30年后仍以一记者死去，两度入狱，不改故常，不问名利，乐于助人，而国家大事则时刻不曾去怀。于右任先生赠他的诗：“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仇”，是写实的佳句。最难得的是他对人对事的一片真诚。他逝世时，我在桂林版撰《张季鸾先生的精神》一文以志哀思，以两句悼语作结：“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虽然文字幼稚，对季鸾先生认识未能全面，但我至今仍觉得，这是我从他为人、为文中得到的真实印象。他待人以诚，处事以敬。宋儒认为立身行己，应时接物，莫大乎诚敬。刘安世花了7年功夫，才做到“从不妄语人”。我在文中引用刘蕡山一段话：“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之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此一段精神所谓诚也……稍涉名心，便是虚伪，便是不诚，不诚则无一物。”尽管这些理学家唯心的说法，今天看来很迂腐，但说到季鸾先生的言行“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一生不作妄语，不玩弄手段，心口如一，热情感人，相信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有同感。

他逝世前在病榻上还挖空心思，出点子写文章，为抗战加油打气。当时的后方叫人喜见乐闻的事情实在不多，他忽然想到那时正是秋收时候，他就叫同人撰评，说收成好就能足食，足食就能足兵，足食足兵就能持久作战，打败敌人。他的一位老友说：“他人亦爱国，惟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爱国。”

他的《归乡记》写得平实亲切，流露出他的真性情。据说他的乡人有些看了感动到流泪。

他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后，对港馆念念不忘，在渝仍扶病以老兵的笔名为港版写寄通讯。他对报馆同人亲如家人，弥留时遗嘱仍以同人的健康为念。诸如此类的事例甚多，在在表现出他爱国、爱人、爱事业发自真心诚意。

记得香港有些热心报业的青年，办了一家小型通讯社，向

各报发稿，不为人重视，为文自发牢骚，被季鸾先生看到，当即吩咐编辑部同人注意，纵使来稿文字欠佳，不妨加以润饰，设法采用，以免使初入行的青年受挫灰心。

战时重庆有些记者办了一个刊物，向他征稿，他抽空为他们写了一篇《无我与无私》。他认为记者在撰述或记载中要竭力将“我”撇开。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发表主张应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夹杂着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名誉心本来是好事，但容易转到虚荣。以卖名为务，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

他是这样阐述“无私”之义：“报人的职责在谋人类的共同福利，不正常的自私其国家民族，也是罪恶。以中国今天论，我们抗日决非私于中国。假若中国是侵略者，日本是被侵略者，那么，中国报人就应该反战。”他认为“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他在重庆报界庆祝《大公报》获得米苏里奖章大会上致词，除重申《大公报》初复刊时的“四不”约言，并强调报人不但不应求权、求财，并且也不应求名。他在《无我与无私》文中提出对报人的期望：“人们或者问：无我无私，岂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我可以这样答：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二)

我进入《大公报》工作，接触的第一个人是政之先生，以后相处十年，经常见面。他给我的教益特多。1938年秋冬之交，报馆招聘编辑、翻译，有数十人应考，取录三人，我在其内。政之先生约见我，问我过去有无撰文编报经验以及工作志趣等。我念中学时编过学生刊物，念大学时曾向北平《独立评论》和上海一

些刊物投稿。我认为在抗战期间参加新闻工作，也是报国自效之道。他听了我的回答，表示满意，叫我上班。我记得上班的第一个晚上，他站在我的桌子旁边，看着我逐句翻译外电。过了没有多久，又把我找到他在坚道的寓所去，出题目叫我写社评。他知道我到过暹罗（即：泰国），他出的题目就是评论当时一位暹罗侨领遇刺的事件。他说，写社评要开门见山，不可拖泥带水；但没有告诉我评论的内容应着重什么，任我自由发挥。我这篇社评的处女作翌日见了报，没有经过什么删改。

日寇掀起太平洋战争，他到桂林去视察桂馆的筹备情形。行前，他约我到会客室谈话，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两位先生在座。他说将调我到桂版工作，暂时留港改编要闻，仍写社评，我的工作要同徐先生的工作打成一片；并说，编辑部的负责人都是这样经过采访或翻译、编报、撰评等锻炼提升上来的。我入馆时间甚短，由翻译而撰评而当要闻编辑，在以“科班制”严格训练人手的《大公报》，同人认为这是异数。我初入馆时，做着和梁厚甫兄相同的工作，合作编译过一本《世界各国概况》。我们本来就熟识，同在一起做事后，形迹更见接近。几个月后他被《工商日报》聘请去当总编辑。政之先生知道报馆的人事不简单，青年人容易见异思迁，我也可能相继他去。他行前特意谆谆嘱咐，拳拳勸勉一番。

那时报馆作了应变的部署，报址由洛兴行迁往利源东街一家小印刷所的楼上，地方狭小，我的桌子和徐铸成先生的相连，相对而坐。我天天编报，间中写写社评，并为《大公报》写时评，有时也翻译或写些专栏。那时没有公休制度，同人写稿不给稿费，但没有人计较，大家都干得很有劲。我没有编报的经验，事先也没有人指导，我空枪上阵，自行摸索。有一次我把一篇冗长的文告发排，全发长文，大样上出现一片汪洋，幸得徐先生临时

指点，增加一些分题，改动一些栏数，版面才象个样子。政之先生对我可谓“大胆使用”的了。我和他初见面时，他曾问我会不会写文言文，并说，如果不会，恐怕帮不了报纸什么忙。我入馆后，曾试仿《甲寅》杂志式的蹩脚桐城文体写过一篇稿，文字实嫌陈旧，没有被采用，我送了给外间一家新办的杂志刊登。受了政之先生这一问的影响，我写稿常常夹杂着许多文言句子，连新闻标题，也试过用些不大通俗的字句。我想他不过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同人把报纸搞得老气横秋的。

我离港前，与林慧洁结婚，偕同赴桂。政之先生关心我经济上有无困难，问我要不要帮忙。我平生最不愿欠下人情，婚礼从简，所费不多，对于他这一片好意，表示心领。事隔十年，港版复刊，我先由沪来港，内子于几个月后到来，他单独约我俩在中环一家法国餐厅晚饭。他说：“我记得你们新婚的晚上在这家餐厅进餐，被我遇见了，所以我今晚特意请你们到这里来。”

从一些小事情，也可看出他对后进青年如何宽厚和多方诱导。我在渝版开始编报时，有人先在拼版时做了手脚，翌日向他指摘那天的报纸编得不好，他只一笑置之。不是金诚夫先生告诉我，我还不知有此事。我主编渝版时，有一次没有采用“中央社”发的一条新闻稿，事后证明这个报道失实，唯独《大公报》没有刊出，他认为判断准确，十分高兴，曾向陈序经先生谈及，传回来我才知道。有一天我在编辑部用毛笔在土制的稿纸上挥写，他恰好来到，拿起稿子来看，我写一张送一张给他，为了求快，字愈写愈大，一张稿子写不了几十个字。他没有明说战时纸张奇缺，应节约用纸，却笑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加上两句，写的是蝇头小字，相形之下，使我自觉不好意思。

《大公报》被认为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外间有人办报纸、办事业，常会向报馆延揽人手。象其他一些同事一样，我有过多次

可以转换工作环境的机缘，但我终于一直留下来，除了觉得《大公报》是一家为各方所重的大报之外，政之先生的关怀备至，也是一个原因。季鸾、政之两位先生主持报馆，对同人的确有一种凝聚力。在这一家私营报馆里，他们分明是老板，我们是伙计，但他们却使人不觉得有这种关系的存在，总是把报馆看做大家共同的事业。

季鸾先生逝世后，渝桂两馆的人事和职称，有了一些调整。我当时在桂林抱恙，休养多月，我的名义是社评委员，主要工作是写评论，没有编过几天报，在湘桂大撤退前去了重庆。渝馆容纳了各馆涌来的人员，僧多粥少，工作安排大费周章。政之先生初时叫我协同杨历樵先生编译《大公报小丛书》，不久仍然叫我每月编报两周。他说我将来要负责广州版的编辑部，此时不可把编务抛荒。后来我由渝赴沪，是过渡性质，仍是每月一半时间写两篇社评，一半时间编报。

抗战胜利后，先后恢复津、沪两版，大家都归心似箭，不愿在川久留。政之先生要我留下一段时间，碍于他的情面，我答应仅作3个月的勾留，让家眷先行赴沪。

他看见报馆经历了抗战的艰难困苦，现在载誉重返津沪，他的喜悦，可以想见。他对我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他参加了访英代表团，又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出席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他回国后在重庆逗留了一些日子，交际甚忙，经常在季鸾堂内设宴款待到访的军政财经文教各界人士，每次我都做陪客，他让我与各方多所接触。他把我介绍给客人时，还会美言一二。

自季鸾先生逝世，评论工作由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主持，政之先生虽是总主笔，实则不大过问。在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开始，

《大公报》发表的评论，尤其在国共问题上，有些被认为还可以，有些论及东北交通与战事的，证明非常错误。王先生后来作了检讨。李纯青兄在《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也有详细分析，这里不必赘及。在王先生离渝赴沪前，因为纯青兄等已先走了，大约有三几个月我成了他撰评的唯一助手，有时我写的社评比他还多。一般的评论，他只出题目，任自己去拼凑；较为重要的题目，或由他自己来写，或由他把意见说明，我来执笔。前此他曾授意我写过批评国民党劫收失人心，出动特务在沧白堂和较场口大打出手，如《民主的习惯》等文；也曾授意我写过抨击八路军在东北一些行动，如《为交通着急》一文，后者的错误，王先生在检讨中已说得很清楚。他虽承认此文的主意完全是他出的，但我究竟是执笔之人，不能说全无文责，自应感到疚歉。回想当时自己的心态，首先是希望国家在战后早日进行建设，不要再有内战，并没有看到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处心积虑要对付共产党，内战已势不可避免，可谓昧于大势。对于东北的真实情形，我相信连王先生也并不了解，只凭国民党一面之词去评论，自然谬误。在王文彬兄和我留守渝馆时，吴玉章、王维舟两老，曾邀我们两人到他们在两路口的办事处做客。吴老在小客厅接待我们，指着墙上一张东北地图，讲述国民党如何在东北破坏“双十协定”，我对东北的情况，才算知道一些。

战时一直拟议要在广州设馆，不再寄人篱下去恢复港馆。张发奎回广州受降，政之先生在季鸾堂设宴送行，还请了罗卓英、欧阳驹等粤、穗当局，席间仍说到广州版，说我将来会到广州去。后来时局变化，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港馆恢复。那时国民党把全国经济推向崩溃，发行金圆券搜掠金钞，蒋经国在沪成立的所谓“打虎队”扬言取缔投机倒把，起先声势颇为汹汹。报馆将所存金钞全部献出，换回了天天贬值的金圆券。恢复港版，哪里来外汇？

馆内一些老同事心存疑虑，由于政之先生主张坚决，大家才无异议。记得他在沪馆开会讨论筹设港馆时，吴达诠也在座，他没有说上几句话。依照他与张、胡创办报纸的约言，他去做官就不能再过问报馆的事，但他毕竟是创办人之一，恢复港版与否是件大事，自会请他出来表表态了。

港报编辑部虽自始则由我负责，但最早进行筹设时，并没有通知我，总管理处也没有发表我的职务，连王芸生先生和我谈起也觉得奇怪。过了不久，政之先生忽然叫人送来一封信，说“关于兄赴英事，即须着手进行，已托秉乾兄负责介绍，盼与秉乾直接接洽……”原来他打算让我先去英国进修两年才回港工作，已托了萧乾兄代为进行，但我事先全不知情，大抵他知道我有过出国的念头，对此项安排，自必乐从。没想到英国战后财政困难，缩减预算，英国文化机构已送过两次奖学金给《大公报》的人，还要应酬别的新闻单位，因此拖延了一年多，国内解放战争已展开，我也不再去进行此事了。

重开港馆的经费是挪用了政之先生一位旅美经商的好友所赠与报馆购置图书的5万美元。在港再次租用利源东街那家小印刷所的二楼。地方狭小，编经两部同人虽只有30人左右，也容纳不下，有些桌子只好轮流用。那时在港办报，要多拉广告，打开销路，都很不容易。随着由内地涌来香港的人渐多，物价日涨，又闹房荒，安排同人的生活就大伤脑筋。政之先生和我们“同住同食同劳动”，他住在宿舍顶楼一个小房间内，起居饮食都没有人特别照顾，来回报馆与宿舍之间都是坐巴士。有一次在巴士上给我碰见，人多找不到空位，他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在车行中摇晃，悠然自得。

为了出版这张报纸，他埋头苦干，不倦不休。各种条件实在

太差，报纸试版5次都不放心。他每晚都来看试版，关心每一个环节，处处都想从旁帮上一手。出版那天，他等到拂晓开机，看到我们从机房拿上来的第一份报，他兴奋地连声说“恭喜！恭喜！”这份报可以说是他的心血结晶。在他的鼓舞下，同人不怕环境恶劣，不怕工作繁重，把一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办到了。我从这里多少体会到什么叫做“创业艰难”。

他以事忙，久不执笔为文，但仍为港版写了复刊词和另几篇社评。出版两天后，我们劝他在宿舍休息，晚上不必再到报馆来。毕竟上了年纪，不胜繁剧，不久就生病了。他原患血压过高，未曾悉心调理，我找了一位司徒医生给他诊治，发现他患了肝硬化。司徒私下告诉我，他的病难望痊愈。我每天在宿舍到他的房间去探看，他卧在床上和我交谈，仍是谈笑自若，对事业、对自己都充满信心。大家决定请他回去上海医病。我和几位同事送他到机场，看着他乘坐的客机腾空飞去，愈飞愈远，我想到他此次将会一去不返，心里非常难过。于右任先生称美季鸾先生“不自顾其穷，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念念在国家，念念在职务”，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政之先生。

许多老同事认为政之先生为人严肃，同人工作有错误会被他面斥，大家有点怕他，可是在我心目中，他十分和易可亲。特别是港版复刊前后这段日子，他怕我们劳累，叫我们每天下午回宿舍午睡，回去前常和我们几个青年同人去餐室喝茶；大自国事，小至家务，以及生平交游和早年做记者的趣事，无话不谈。他病发前，我曾陪他去逛山顶，两人沿着山上的小径走了一圈，他的步履还算轻健，边行边谈，多半是与办报有关的。他喜欢和青年接近，从他的言谈中，使我觉得他恨不得把平生办报做人的经验一下子全传授了给你似的。他看见青年同事肯努力工作就高兴，听到新事物新知识就津津乐道。青年同人中谁的思想比较进步，

政治倾向如何，他都心里有数。1947年国民党要打击《大公报》，在渝、穗两地无理逮捕了多位记者。经过设法营救才获释放。他为此跑了一趟重庆，并曾致电广东当局说，他本人愿到穗做人质，要求先放人。

政之先生一生保持着淡薄文人的本色，自奉俭朴，不谋荣利，时时向同人提出要“事业前进，个人后退”。他常说，廉洁自持，才能卓尔独立。在桂馆曾召集同人讲话，强调报馆除了搞好版面内容、评论有正确主张之外，必须注重经营。清末民初不少文人办报，有些文章传诵一时，但报纸昙花一现，瞬告关门。沪上有些报纸销路甚好，但言论不被重视。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大公报》正是汲取这些教训，要使报纸经济自给，以保证其独立性，不受外来干涉。做记者尤其要讲操守，过去有些记者受人津贴，又去骂人，被人报复。他叫记者不要打听别人隐私。如果有人把某些秘密告诉你，最好不要听，可以声明不代保密。因为他可以把秘密告诉你，自然也会告诉别人，别人传了出去，你就逃不了责任。要有操守，才能不受威迫利诱。个人如此，报纸亦然。他说过去他办报、办杂志，能顶住一些军阀政客的压力。他说：“尽管他们有权有势，只能煊赫一时，迟早会倒台，我的报纸却是长期存在的，我无求于他们，有时我不买账，他们也无可如何。”在重庆时，我记得他说过在某一场合，国民党一个粮食部长，对于《大公报》刊登有关粮食的消息不满，竟说可以多配给粮食给报馆，希望以后笔下留情。政之先生大为光火，当众把这个家伙面斥一顿。

说到报纸的经营，同行无不佩服政之先生。在抗战前后，各馆在各地预先开设，逐个撤退，战后又一一恢复，人力物力安排调配，头绪纷纭，事至繁重，而他洞烛机先，指挥若定。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他在港馆购下一批白报纸，后来纸价飞涨，而港版能应付裕如。有时让出几卷纸就够支付同人一月的薪水。战时渝馆收入不错，刊登广告要一周前登记。抗战胜利后，有财力恢复津、沪等馆，还分别赠送同人一笔复员费用。只是购买美国印刷机，非用外汇不可，因此申请了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此事成为后来被指接受国民党变相津贴的口实。这部新式卷筒机，是美国战后运来远东的第一部，《大公报》从未启用过，转卖了给广州《南方日报》。解放前各馆有一批同人为避国民党迫害来港，在解放后再由港返回内地。港馆本来就亏本，此时开支大增，全赖经理费彝民先生多方筹措，对付过去，最后凭这部机器来清偿债务，这是政之先生生前所绝对料想不到的。

• • •

政之先生是经营事业的长才，同时也是文章好手。他早岁由日本留学回国，即开始他在传播界的事业，办过杂志、通讯社，并以“冷观”的笔名投稿《民立报》。新记《大公报》创刊时，他与张、吴轮流撰评，后来他这位总经理事务繁多，虽偶亦撰文，而言论的责任主要由总编辑季鸾先生负起。在抗战前及其初期重要的文章皆出季鸾先生之手。所以，他的文名不象季鸾先生那么广泛被人所知。他是第一次大战后到法国采访报道凡尔赛和约签署新闻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一生有为有守，见识广博，洞明世事，积行内满，文辞外发，自能议论周匝，饶有气势。在渝馆有几次他在办公室外碰见我，问我有没有空，叫我随他进去，让我坐下来，他站在旁边口授社评，由我笔录，他念一句，我写一句，中间没有停顿，段落分明，斐然成章，我给加上标点，就送交编辑部发排。他认为做新闻记者要锻炼自己在忙乱嘈吵中也能够集中精神写稿，他自己当然做得到。他一位四川同乡曾赠他一对楹联：“文章自古夸西蜀，事业于今胜北岩。”虽属藻饰之词，但也能道出他的文才和事业抱负。

在大动荡的时局中，他一直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他抱病前曾召集编辑部多位同人在告罗士打酒店茶叙，谈他对港报的期望，分析了当时的大局，指出国民党政权已羸败到无可救药，新的局面必将出现。他谈了两个小时，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国内局势的激变，同人精神苦闷，思想波动而发。他强调国家和事业都有前途，鼓舞大家抖擞精神干下去。

他对国民党政权未见得有什么好感。国民党人背后指摘他在报馆最后退到重庆前，老是“躲开政府”。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尤使他反感。抗战胜利后，新闻限制丝毫没有放宽，反而对《大公报》特别加严，认为《大公报》受人重视，关于国共之间的一些新闻，别家报纸可登，而《大公报》不能登。他曾慨然说：如果我们现在办的是一张新的报纸，也许就不会碰到那么多麻烦了。

他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当国共和谈濒于破裂，蒋介石硬要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他和另几位参政会的老先生相偕去见蒋，希望和谈能有转机，劝蒋展期开会。蒋很厉害，答应把会期展延数天，但有条件，就是开会时他们这些贤达必须参加。他在报馆一次社评会议上神情沮丧地把经过告诉我们，并说为了报馆，他去“跳火坑”，到时他去签个字报到就回来，大家报纸照编，不要受他影响。

我还记得另一次，他由南京回来，说到他这次一到南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派了秘书傅泾波来访，准备了洋房、汽车招待他，并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他谢绝了司徒雷登的接待，自己跑回《大公报》驻宁办事处去睡帆布床。

他是在上海解放前夕逝世的。他曾在病榻上对费彝民先生

说：“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

• • •

世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更不会有毫无缺点的完人。《大公报》迭经世变，张、胡两人肆应其间，诸多局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必有可议之处。如何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正确看待这个事业和这两位报人，将有待于高明之士。有人把过去的报纸和人物，或则说得天花乱坠，或则大张挞伐，我对此实不想妄参末议。本文只想写出这两位老前辈在我个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以我自己为例，追述他们是怎样栽培扶掖后进的。限于水平，宥于情感，所述不周至，见解有偏颇，在所难免。我参加这个报馆的工作行将届满半个世纪，岁月不居，人生易老，自顾碌碌无所见长，于事业鲜有裨补，实有负前辈曩昔的殷殷期望，走笔至此，只有惭恧。

1987年8月于香港

我记忆中的父亲

韩素音

作者是蜚声世界的英籍华裔女作家。她的父亲周映彤是我国颇有建树的铁道工程师。

我的父亲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他从不向子女们讲述自己，我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可他却从不回答。他往往只是带我到北京城各处漫步。到过龙虎寺(指北京隆福寺古董市场)和其他地方，主要是去购买些花木。他最喜欢在住宅花园内栽花植树，这是他平生唯一的爱好。即使是在北京的严冬时节，玻璃窗上冻结了许多冰花，而室内却绿叶葱茏，鲜花朵朵，粉红的康乃馨、紫色的罗兰藤、金钟床花以及红玫瑰……次第开放。

我对孩提时的最生动的记忆，是母亲对父亲生气的情景。因为那时他在铁路上工作却得不到任何工资。那是一个艰难的年代，军阀横行的年代，内战频仍的年代。我妈妈老是大声喊叫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挣点钱？你瞧人家A先生，他做木材、煤炭、粮食生意，有钱得很啦！”父亲从不对嘴，总是转过身去看他的花卉。他也种些番茄和葡萄藤于园中，这样，每逢秋季到来，我们就有番茄和葡萄可吃了。

我的父亲出生于四川一家周姓大族。周家原籍广东梅县，客家人，是几个世纪前迁居四川的。先祖在郫县定居后，以种植烟草在其它农产品为业，有的先辈曾入学黉门为举人或秀才，也有做地方官的。我祖父就曾当过甘肃的地方官，他深通医学，而且是中医师，他行医看病，做了许多好事。父亲和他的兄弟姊妹们

同祖父一样都有献身祖国的精神。我敢说：周家一门全是热爱祖国的。

后来，在50年代，我的叔父周见三的儿辈留学回国，个个都为祖国工作。他们如果留居西方的话，本来都可能成为美国的名教授的。

20世纪早期，四川发生了反帝的保路运动，周氏全家卷入了这一运动之中。这次运动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企图拥有中国的铁路，从而控制中国的内地省份。它发生在孙逸仙博士1911年发动的辛亥武昌起义之前。

我父生于距今100年前的1885年，他是1903年第一批送往欧洲学科学的四川留学生之一。早在本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就知道四川的矿藏丰富，而交通运输尤为迫切需要。因此，他专修采矿和铁路工程，向往着将来回川开发矿产、修筑铁路。

从1903年至1913年，父亲在比利时留学和工作达10年之久，他和母亲就是这时期结婚的。我母亲出身于贵族家庭，外祖父是比利时铁路局的高级官员。自然，这种婚姻是有困难的，因为双方家族都持反对态度；但是他们矢志不移，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结为夫妇。1913年，他们双双回到了中国。虽然当时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动乱之中，而且父亲本来也能够留居比利时的，然而他们却毅然决定一同回国了。

中国从1913年到1928年这些年代里，战乱频仍，军阀专政，相互残杀。仅仅四川一省就有若干小军阀集团，割据一方，动辄兵戎相见。两年过去了，父亲有鉴于此，深知在四川绝无修筑任何铁路的希望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在四川我只能以吃茶打麻将为消遣。”这是他跟我说起过的关于在四川那段时间里少数几件事情之一。这时京汉、陇海两条铁路正由比、法两国投资修筑，父亲于是离开四川，在京汉路局得到了一个职位。

1914至1918年，欧战爆发削弱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控制，因此，中国工程师逐渐代替了比、法工程师们的地位，中国乃得重

新收回管理权。

父亲的所有孩子都是沿京汉铁路各站出世的，如河南信阳、江苏徐州以及石家庄等。母亲共生了八胎，除大哥出生在比利时外，其余尽是“铁路孩子”。其中四个由于缺医护，未能成活。因为父亲是中国人，而外国医生们有时甚至拒绝母亲抱病孩就诊。

父亲不得不和军阀们作斗争，因为他们随时强迫把车辆和车头调去运兵。母亲在这些年代里的遭遇，记忆非常深刻，每每对我们谈到当时的情况，说只有冯玉祥将军对父亲好一些。

20年代初期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被调到京汉铁路局任职（职务不详），经常几个月得不到工资，这时母亲就得写信向外祖父求援。此后数年都是依靠外祖父从比利时寄钱来作生活费用。

叔父周见三到北京来看望我们，同父亲作了长谈，也接济了一些金钱。他要父亲回四川，父亲没有干。

从1928到1949年这些年代里，父亲都是在铁路上工作。30年代初（我记不起是1932或1933年）他和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到天津去了，仍然是在铁路上工作。

1933年我进燕京大学读书，此后我就不常见到他们了。只有一次他们到燕京大学来看过我。以前母亲曾反对过我的所学，可那时她已改变了她的看法。

在那些年代里（到天津以后），父亲的环境好转了，他甚至在北京东皇城根街买下了地皮，修建起两座房屋和两间棚子。这两所房和棚，目前依然存在。他那时把一所房屋租给一位朋友，把两间棚子分别租给一个炭商和一个柴商。这样他就有了一点收入，虽决非富裕，但也就能在天津过点舒适日子了。

1935年，我离开读了两年的燕大，即赴比利时学医去了，因母亲是比国人的关系，我申请得到了助学金。但是由于对日抗战爆发，在1938年我又回国了。当时日军侵占了平津两地，我就到

了四川重庆，而后又到了成都，终于在四川会见了父亲的家族。他们待我很好，使我永生难忘。我从他们那里得知父亲平安无恙。但父亲的信件很少，因为日军占领着天津，从沦陷区寄信到重庆是很困难的。

我在四川住到1942年。其时我丈夫唐宝华被国民党任命为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在那些年里，我同父母分开了，也无法通信，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当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的丈夫决心返回中国。我不能同意他的决定，这是去“打共产党”，这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另一次内战。可是我知道中国人民正狂热地要求革命，我把此意告诉了我丈夫，但他不相信我；因此，我带着女儿留在英国，把我1938年为归国而中断了的医学重新学习起来。

1946年和1947年我终于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但是都简略不详。我妹妹的信中说：父亲的身体不好，她和母亲对此感到忧虑。

1948年，我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我决定去香港。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指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我认为住在香港比较接近中国。我有一个女儿，我得找工作以供她读书，香港的玛丽医院给了我一个工作。于是1949年初，我就去了香港。我给父亲写信，他回信说他的病好些了，并说母亲和妹妹都在四川。但是和往常一样，信虽长总不详谈个人的近况。我只好请假回重庆去会叔父周见三，他曾来信给我说母亲和妹妹在重庆正准备要出国，这使我心中非常不安，岂不是让我父亲一个人单独留在北京么？并且我女儿也有病，是肺病，迟早须动手术。母亲和妹妹都要我帮助她们出国。我到重庆后，才从叔父那里得知父亲拒绝和母亲一同出国。

我还听说，早在1904年，我父亲在比利时当学生的时候，就曾写信回家请求父母不要给妹妹们缠脚，而大姐的脚都已缠就了，因为这封信的关系，其余两个妹妹乃免于缠脚。这件事早在1949年我就知道。1985年这次在成都，我父亲的三妹82岁的周兆

蓉姑母对我又谈到这事。这件事还说明要使父亲谈谈他自己和他
在世一生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困难。

抗战期间父亲曾被日军囚禁一段时间（我相信约两三个月，
但我得知此事也不是由父亲本人却是母亲给我讲的，也许不大可
靠），被禁闭的原因我至今不明白。每当我问起这件事，父亲只
是说：“日本人需要人们全时间为他们服务，从早到晚，从头到
脚，而且总是不信任我们。”

当他被释放时，和其他铁路员工，全被强迫学习日语，我发
现一本被父亲遗忘了的记事本，上面写满了不少与工作有关的日
语技术词汇。

1945年抗战胜利，战事结束后，父亲返回北平，一直到解
放。

1949年全国解放了，这时父亲还在北京，他先后应陈毅元帅
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出山帮忙。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北京附近门头
沟煤矿（和一度为英国所有的开滦煤矿）被水淹没，北京燃料奇
缺，通往矿区铁路急待修复，全国铁路也同样待修。

此后几年中，父亲和其他工程师们，象青年人一样地工作
着，不休息，睡帐篷，自背行李，八方指导修复铁路工程，使煤
矿迅速恢复正常运转。他们这些工程师，尽是六十开外的人，但
是他们个个都热火朝天地在工作。父亲和这些同志们后来才得
知，成渝铁路终于修通了，无一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父亲把这事
写信告诉我。我于1956年回国，他总爱这样说：“我等了一辈子
想修这条铁路，现在此路总算修成功了。”（指成渝路）

从1949年直到他去世的1958年，除1956年我去看他，他同我
到北戴河游玩了四天外，他没有要过一天假，连星期日也不休
息，因为他感到现正是努力建设新中国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不知道
他工作的详细内容，但我知道他至少被评为劳动模范一次，如
果不是两次或三次的话。

我亦曾知道他曾为北京庞大的供水方案工作过，并拟定了许

多计划。

就在那时，父亲认定作为首都北京肯定要发展扩充，水源是亟待解决的大事。他也曾为中国铁路网拟定（起草了）了铁路交通计划。

我于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北京看他的时候，经常有许多朋友来会他。有时在他们作为科学家那样的讨论中，我略为了解到他们讨论而且提出的尽是一些工程设计和规划。

1956年春天我见到他时，除头发略现斑白外，一切如前。他仍然天天上班，即使风沙时节或大雨天气都一样，不管是盛夏或隆冬，他从不乘坐局里派给的车辆，而是赶公共汽车。他总是这样说：“我不愿浪费公家金钱。”与往年一样，他经常步行上班。

父亲烧得一手好菜，我小的时候，他常常在星期天烧四川菜给我们吃，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吃惯四川菜了。他又是诗人（16岁中秀才），我认为，他的孩子们没有像他那样学过中国文学，对他来说是件遗憾的事。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中文的缘故。即使是目前，我每天在睡觉之前，都要学习中文——不是读报纸，便是看小说或者诗词。

父亲对于饮食很有节制，特别是晚餐，他吃得更简单。

1948年，他心脏就有病，这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过度的原故。晚上总是一碗小米饭和汤，中午和早晨，他就爱吃蔬菜和豆腐。他不常吃肉，不饮酒，偶尔喝少许甜酒。

我父亲平生最喜欢朋友，临终之日也是如此，有朋友来就会有说有笑；他从不谈论自己，而是讨论怎样搞好青年一代教育和有关国家的工程设计等问题。好几位来到中国的欧洲人，闻父亲之名，都请求要见他。其中一位是埃德加·佛尔(Edgar Faure)先生，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戴高乐的朋友，也来见过他。我买过一本E·F写的有关中国的书寄给了父亲。

1957年我回来的时候，反右运动展开了，父亲感到焦虑；他曾写过些批评文章，但他向我说：“我所说的是我认为对中国

有益的，假使知识分子害怕官府或那个官员的话，那我国就永远不能进步了。”

从1949年到1964年这些年里，我是当医生的，先在香港后在新加坡。我不能跟父亲在一起久住。我于1957年10月同他分别时向他说：“明年春天将回来看你。”那时看上去他还满好。天啊！哪知我再也见不着他了！1958年3月19日接到电报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立即飞往北京。我本来就打算4月份去的。这时，我在三天之内就急忙赶到了北京。

我也曾听到我父亲临死前的情况，那时各部门均陷在会海之中，而父亲又是这些会中的积极分子。

那一天，3月19日的那一天，北风大作，尘土狂飞，袭击着北京。他仍和往常一样，拒绝乘车。他从办公室回家吃了午饭，就再去本部门的会上发言。他正开始讲话，突然发病，用手扶着头部说：“我……我不舒服。”就昏迷了。他患的是严重脑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随即去世。享年73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

我父亲是个不揽权、不贪财、不倚势凌人的人，只想着“我怎样才能为我的祖国服务得更好”。他切想在全国建成一个雄伟的铁路交通网。今天终于实现了他未完成的夙愿。死而有知，应当含笑九泉吧！

杨夷甫 译
(四川省政协供稿)

英商太古洋行在华南的业务活动 与莫氏家族

莫应淮

英商太古洋行是以航运为轴心的综合性的托拉斯集团。太古洋行186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在香港设立总行,从此成为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事业的重要支柱。作者莫应淮现常住香港。

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 & SWIRE CO. LTD 中译名应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本文按商场习惯称之为太古洋行,下同。)自1867年在华成立以来,迄今已近100年。我们莫氏家族,自我的祖父莫仕扬于1870年出任香港太古洋行远东总行首任买办开始,至本世纪30年代香港太古总行取消买办制度为止,中经我的父亲莫藻泉、胞兄莫干生,三代相继,担任香港太古总行的买办凡60余年。我自己亦先后在香港太古总行担任过副买办和糖业部华经理。直至现在,我的侄孙辈在香港太古洋行服务的仍有多人。五代百年,我们莫氏家族一直在英商太古洋行工作。但由于年代湮远,作者本身在香港太古总行任职时间极短(仅1928至1934年),加之手头无片纸只字可资参考,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我在香港太古总行任职几年时间的所历所闻及得之胞兄口述的,有关1928年以前的太古洋行的情况记述如后,供治史者参考。文

内所述，只限于香港太古总行及广州太古分行的情况。至于太古洋行在华北及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早期虽亦与莫氏家族有若干关系，由于作者毫无所知，只好留待其他人士补充。

太古洋行的组织轮廓

太古洋行是英国本土著名的财阀集团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 (JOHN SWIRE & SONS CO.LTD.) 所属企业之一。该公司设于英国伦敦。根据已公开的材料，其主要股东除史维亚的后代，哲·克·史维亚 (J.K.SWIRE)，阿·西·史维亚 (A.C.SWIRE) 之外，还有哲·史·司柯特 (J.S.SCOTT)，约翰马逊爵士 (SIR JOHN MASSON)，西·西·罗宾特 (C.S.ROBERTS)，姆·喂·芬奈斯 (M.Y.FIENNES) 等。其中后三人均曾出任过上海和香港太古洋行经理，他们是与史维亚家族有深远的渊源的。

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子公司，除太古洋行之外，据我们所知的还有：中国航业公司 (CHINA NAVIGATION CO.LTD.) 俗称黑烟通轮船公司，俗称蓝烟通轮船公司 (BLUEFUMAL LINE)，远洋轮船有限公司 (OCEAN STEAMSLIP CO.LTD.)，中国航运合资公司 (CHINA MUTUAL STEAM NAVIGATION CO.LTD.)。蓝烟通轮船公司是属于英国利物浦的阿尔费荷尔特有限公司 (ALFRED HOLT & CO.LTD.) 所有的。另外，香港太古船坞工程有限公司 (THE TAIKOO DOCKYARD & ENGINEERING CO.OF.H.KLTD.)，香港太古炼糖有限公司，俗称太古糖厂 (THE TAIKOO SUGAR REFINING CO.LTD)，香港永光油漆厂 (THE DURO PAINT MANUFACTURING CO.LTD.)，在上海的永光油漆厂则于解放后顶出去了。香港太贸公司 (SWIRE & MAELAINE LTD.)，远东油公司 (FAR EAST OIL CO.LTD.)，

香港航空公司 (HONG KONG AIRWAYS.LTD), 香港史维亚航空总站 (H.K.AIRTERMINAL SWIRES), 香港航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H. K. AIRCRAFT ENGINEERING CO.LTD.), 澳大利亚冷藏储运专利有限公司 (FRIGMOBILE OF AUSTRALIA PTY LTD.), 史维亚乌尔合资控股有限公司 (SWIRE & YUILL PTY LTD.), 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 (OATHAY PACIFRE AIPWAYS LTD.), 美亚轮船公司 (AMERICAN & ASIAN STEAM NAVIGATION CO.) 以及国泰航空公司 (KOTAI AIRWAYS CO.LTD.)等等(包括这些公司在日本、澳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所设的分支机构)。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些子公司中都占有30%至50%的股份, 甚至有的全部投资都是属它所有。

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在华的业务, 统由太古洋行代理。各公司在华的各个口岸均不设自己的分支机构, 只有在个别地区的某一子公司的业务特别发达、需要单独经营时, 才于当地太古洋行的分支机构外, 另行成立分公司。

约翰史维亚除拥有一批子公司外, 还有英、美和西欧各地取得80间厂商的代理权 (即比怡和洋行也就是渣甸洋行——少代理20家厂商左右, 这是由于太古洋行着重于航运业务, 而怡和洋行则偏重于一般进出口贸易和代理欧美厂商业务的缘故), 并把所有代理的业务都拨给太古洋行统一经营。

由于太古洋行实乃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各个企业在华的总代理, 因此太古洋行在华各地的产业, 其中有许多表面虽由太古洋行经管或购置, 其实则均非太古洋行本身所有, 而是属于上述各个公司的产业。例如, 约值3000万港元的广州白砚壳的太古洋行货仓 (包括码头建筑等设备, 这是解放后按当时的估价, 可能有点偏高, 详见下文), 实际是黑烟通轮船公司的产业; 又如, 上海市的码头和货仓, 有一部分属于黑烟通轮船公司, 在浦东方面的包括浦东的蓝烟通公司大、小码头 (据我所知大码头可同时

泊碇四艘远洋轮)和13艘驳船、几艘拖船及仓库等都属于蓝烟通公司。蓝烟通公司设在上海的码头,仓库业务上虽受上海太古洋行的领导,但帐目上则保持独立,并由蓝烟通公司直接派员管理。香港的蓝烟通公司货仓及黑烟通公司货仓,在我们的家族担任买办时代,虽是由太古洋行的办房派员管理,但物业的所有权亦不属太古洋行。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各个公司的在华业务,虽统以太古洋行名义对外活动,但内部各有独立的帐户。严格地说,本文所指的太古洋行在华南的掠夺,其实是包括了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各公司在华掠夺的一部分。由于不了解其内部帐务的划分情况及为了行文的方便,所以笼统算入太古洋行帐内。

太古洋行虽属约翰史维亚系统内的一个企业,但其真正的创始人却非史维亚家族的祖先,而是英国的一个小商人布脱费德(BUTTERFIELD)。在我国鸦片战争以前,这个小商人就搞了几艘机帆船(有人说即是过去华南常见的“大眼鸡”帆船,究以何说为是?待考)。这些船航行于中英之间,他赚了不少钱,但要扩展业务,尚感财力不足,因之只好投靠史维亚(SWIRE)家族,并且获得其支持,才组成了较具规模的太古洋行。故此太古洋行的英文名是布脱费德史维亚有限公司(BUTTERFIELD & SWIRE CO.LTD.)。史维亚家族既然是英国的大财团,布、史两家合作后,资金虽已雄厚,但原由布氏独立经营的航运事业,便转为史维亚家族所控制。后来,布氏的股份甚至被迫全部退出。现在的太古洋行虽仍保留着布脱费德史维亚有限公司的原招牌,实际上已是由史维亚家族所垄断。

太古洋行在华最先成立的机构——上海太古洋行是在约翰史维亚(JOHN SWIRE)两次到沪视察后才决定成立的。由此可见该行成立时,史维亚已经控制了该企业。我们可说,太古洋行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实乃一部英国财阀史维亚家族对华经济的掠夺史。

太古洋行除香港的远东总行有一笔总资金外,在华南各分支

机构，均无独立的资金。至于香港的太古总行的总资金究有若干？我们莫氏家族虽充任了大半个世纪的买办，仍是毫无所知。但在华南的洋场早已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太古有钱，渣甸有面”，意谓太古洋行的资本雄厚见称，而渣甸洋行则以政治手段灵活取胜。

太古洋行在政治手腕上虽不及渣甸洋行活跃，但在经济掠夺上却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据说，太古洋行的洋经理，连所属各船只上使用的火柴有无浪费，也要亲自过问，由此微末问题，足见其经营作风之苛刻。

香港太古总行机构的组织是相当庞大的。经理之下，设远洋航运、旅客、工务、保险、帐房、办房等业务部门，连黑烟通公司、太古船坞、太古糖厂、永光油漆厂及战后新成立的太贸公司等同系统的各个公司在港的机构，合计雇用的员工，仅华籍人员，即达数千人。在我的祖父、父亲两代担任太古总行买办时期，所有这些机构雇用的华籍人员，绝大部分都由我们办房负责介绍和担保。稍后，太古远东总行才成立了一个华人事务处(DEPARTMENT OF CHINESE AFFAIRS, 简称D.O.C.A.)，负责对上述各机构华籍职工的任用和调派的统筹工作，处长之权相当于第三经理，香港人俗称为“三班”。

创立时期(1867年——1900年)

根据太古洋行内部文献记载，约翰史维亚 (JOHNSWIRE) 自与布特费德 (BUTTERFIELD) 合作组织太古洋行之后，曾先后两次来华考察中国的船业情况。第一次是由其股友威帝朗 (WILLIAM LONG) 陪同，于1860年到达上海的，其后两年，又偕约翰司柯特 (JOHN SCOTT) 再来考察。那时，香港被英国占领已有十多年，英国人对香港的经营已初具规模。英中之间的货运往来日益频繁，航业极为吃香。史维亚了解到这种

情况，遂于1867年来上海设立分行。上海分行（写字楼）是在当年1月中旬成立的，但对外宣布则说是1月1日。这是太古洋行在远东成立的第一个机构。其后，又考虑到对中国贸易，一定要在远东建立一个基地，香港既逐渐变成英国在远东的经济据点，故在1870年，又在香港设立了太古洋行的总行。

上海和香港太古洋行成立初期，主要业务是代理蓝烟通公司的客、货运业务，并经营一些杂货生意。如：从中国运出南北杂货，从英国输入洋货、布匹等。

蓝烟通轮船公司成立于1866年（比太古洋行上海分行早成立1年），初期只经营英国至远东的航运，其航线是从伦敦经非洲、南洋而至中国。关于这个公司的情况我所知不多，只知道这个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发展到拥有自建及租入的各种远洋轮船78艘（绝大部分属自有，租入的只占几艘），战后只剩下41艘，后来虽新建了一些，数量大概仍未恢复战前那样多。这个公司最大的船只约1.1万净吨，但这种万吨级的船只所占比重不大，只有尤里西亚（ULYSSEA）号等两三艘，其余都在5000至7000吨之间。大约5000吨级至7000吨级的船只各占一半左右。这个公司经常来往中国各口岸的船只，通常保持着5艘左右，最少时也有3艘。据一些曾在蓝烟通公司所属机构工作的老职工回忆，在解放前那些时代，曾在中国沿海口岸出现过蓝烟通公司的轮船，能够说得出船名的，计有：来康（LYCAON）、皮拉斯（PELEAS）、纽斯顿（NESTON）、民宁（MENNON）等30艘左右。这些船只从欧洲运来中国的货物，每艘船平均约3000至5000吨左右，其中多为棉织品、机械仪器等。所收运费，凡是中国出口的，都根据中国货水脚出口章程（THE EASTERN FREIGHT CONFERENCE, SHANGHAI）的规定收费的。参加水脚章程协定的，只限于大英公司，蓝烟通公司等几个大轮船公司，一般新开设的小公司都不能参加。至于从欧洲或其他口岸运进中国的货物的运脚，则由发货口岸规定。蓝烟通公

司在中国的业务得到发展后，不仅在上海有自建的码头、仓库，在香港等口岸也有自建的码头、仓库（详见下文）。

关于香港太古总行初成立时代理蓝烟通公司业务的具体情况，现在已无法查考。但据老一辈的职工回忆，香港太古总行成立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它从香港运进广州的货物仍要用“大眼鸡”帆船转驳。因为没有自己的码头，只好把船只泊在广州沙面对面的白鹅潭。

1872年，太古洋行的主脑人物看见中国沿海各口岸之间的货运日益增多，以远洋航运为主要业务的蓝烟通公司的船只，因食水较深，不能在沿海口岸停泊，遂于是年成立了黑烟通轮船公司，在英国建造了一只载重约2、3千吨的轮船，专门行走中国沿海各口岸，以补蓝烟通公司轮船的不足。另外还建造了一些小船，行走中国的内河。当黑烟通公司建造的轮船初次开来中国时，因在英国接不到向中国出口的货载，只好从伦敦运来一批红砖，用以建筑香港渣打道英国海军船坞附近的太古洋行的远东总行大厦。这件事本身，说明草创时期的黑烟通公司，在中国航运事业中，还没有确立其地位。

当时，香港太古总行因要打开业务，急于物色中国人作帮手。曾多方委托在香港的英国商人代它物色买办。我的祖父莫仕扬在英国人侵占香港以前，原在广州经商，与广州十三行的洋商素有业务往还。英国人侵占香港以后，他的英国籍朋友曾力劝他趁香港仍处于开辟时期，到香港去搞些生意，认为必可获得厚利。我的祖父接受了他们的劝告，于1860年由广州到了香港，经营建筑业，并兼营进出口的杂货生意。那时，香港英国政府鼓励商人投资建筑房屋，以每呎一两银的低廉地价，批与申请人建造。我的祖父曾向香港英国当局先后申领了不少地皮，现在香港摆花街那数十幢房屋，及卅间（香港的一条街名，因我的祖父首先在那里兴建了30幢房屋而得名）的楼宇，都是我祖父当时所经营的置业公司投资兴建的。史维亚因我的祖父在香港人面较熟，与洋行

又素有往来，特请香港英国商人中熟识我祖父的人作中介，结识了我的祖父，力邀我的祖父担任香港太古总行的买办。我的祖父因本身在香港有不少生意，一时放不下，但又不想放过和这个英国资本家合作的机会，经过考虑后，决定自己作挂名买办，实际业务则派我家一个帐房先生名吴用伍的去负责。太古洋行方面当时只要我的祖父答应帮忙，便不计较条件；不仅答应由吴用伍去代理买办职务，而且没有向我祖父收取保证金。这是香港太古洋行成立的第一年（1870年）的事情。那时我的父亲莫藻泉才14岁，祖父为了让他熟悉洋行的业务，要他跟吴用伍到太古洋行办房学做生意。我的祖父、父亲和吴用伍都不懂英语，办房和太古洋行的洋人打交道，都要靠“通译”传话。

吴用伍在太古洋行代理了3年，便于1873年去世。我的父亲当时只17岁，还顶替不上。当时香港的建筑行业，因经营的人渐多，利润已很薄，杂货行业也有盈有亏，光景同样不十分好。太古洋行的办房，不仅每笔生意可从太古方面取得5%的佣金，利润本已相当深，加上无论经手什么买卖，都可另向中国商人方面收取回佣，两头都有利，远胜于经营建筑行业和本地杂货生意。因此，我祖父决定放下自己经营的业务，亲自去执行太古洋行的职务，以全付精力为太古洋行服务。

当时太古洋行所经营的进出口业务，无论是输出中国的土特产，或代中国商人从英国订货来中国，都可获得数倍于本钱的利润。而且，他们因为有英国银行支持，出口的货物一经付船，便可从银行取得押汇，用以清结中国商人的货价，实际上用不着拿出多少真本钱来。只要买办能够替他们拉到主顾，他们便获利百倍。我的祖父在香港的商场中素有信誉，自1873年亲自担任买办后，太古洋行的生意便与日俱增。

航运方面，在我的祖父手里亦有所开展。黑烟通轮船公司最初开办时，只有一条船。无论货运客运，统由我们的办房代理，同样由太古洋行给予5%的佣金。办房在接载客、货时，则依照

中国商场习惯，按九八折找佣给顾客。我的祖父与南北行商人本有联系，接载自是较有把握，加上那时在中国沿海各口岸之间行走的船只不多，黑烟通轮船的载位经常供不应求。黑烟通轮船公司因此获利很大。为了扩展业务，它不断以所获利润增建船只。仅在我祖父担任买办职务那7年间，黑烟通轮船公司便增加了两、三只新船，平均每隔一年多至两年左右，他们便赚得一条2、3千吨的新客货轮。

1879年，我的祖父去世，由我的父亲莫藻泉继任买办。这时，太古洋行的局面已经打开，对买办的态度已不象对我的祖父在生时那样客气。我的父亲刚接手，太古洋行便要求他缴交5万元港币作保证金，后来，又陆续增加到15万元。

我的父亲接任买办初期，黑烟通公司继续以平均每三两年增加一艘新船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00年，黑烟通轮船公司已拥有客货轮十多条。为适应船只不断增加的新形势，我父亲遂在太古洋行办房所属华人船务部（那时办房内只分总务及华人船务两部分）之外，另设一间南泰号于香港，专门联络南北行的商人，由我的堂兄仲逵主持。那时，许多中国商人还不惯与洋行打交道，我们以南泰号的名义，用中国商场传统的方式和南北行商人打交道。此外，又派员和各地客栈打好关系，通过客栈介绍搭客，由船上给予回佣。因而，为黑烟通公司拉来了不少新的客运生意。至于货运，则仍由办房内的华人船务部负责，除雇用了一批“行街”，四出接载外，并照顾客商不懂英文，填写载纸困难，特增雇了好些文员，专门代客填写。故货运业务亦有相应的发展。

随着海禁的大开，沿海各地的南北货物交流很活跃。作为华南咽喉的广州，每年均有大宗食糖、柑、橙、沙田柚、甘蔗、香蕉、葵扇、荔枝干、龙眼干等土特产需要经由海运销往华北一带，在广州沙基（现六二三路）一带的三江帮商号，每年又有大批杂粮如芝麻、花生、牛庄绿豆及药材等货物要由华北各口岸运来广州。为便于联络南北客籍，并向华南内地发展太古洋行的业

务，我父亲商得香港太古总行同意，于1881年在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侧兴建并开办了广州太古分行，派我的五叔担任太古广州分行的买办。自开办时起，至1930年止，广州太古分行的买办一直听命于香港太古总行的办房，并由总行买办代缴保证金。

这时，太古洋行已开始注意华南和内河航运。因黑烟通轮船公司的船只不适于在华南内河航行，特新建了一些小船（如专门行走省港线的佛山轮等），专门行走于香港至广州和香港至江门两条航线，企图垄断广州至香港及香港至江门的客货运输业务。

随着华南业务的打开，太古洋行在这十多年间，又陆续在广东的汕头、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建立了分支机构。其后，又以上海为中心，把业务伸展到长江的中、上游，直至四川等地。据我所知，后期经常行走于长江上下游的黑烟通轮船计有黄埔、鄱阳、温州、重庆、武穴、芜湖等12艘，上海和武汉两地，每日上、下水各有一只船行走。

当时，中国各地太古洋行的分支机构的买办中，有不少是由香港总行的办房派去的。例如，1912年，我的父亲曾派我的四叔莫芝轩去担任上海太古分行的买办。芝轩到上海后，深染了洋场的浮夸习气，挥霍很大，使上海分行办房得不偿失，我的父亲只好把他撤回，由上海分行自行觅人继任。又如，1913年，青岛太古分行成立时，又由我们的办房派出我的堂兄莫季樵去充当买办。直到1923年，季樵才被调回香港。

至于黑烟通轮船公司各种船只的船上买办，初期亦全由我们的办房推荐。他们大都是我们的姻戚。——因为担任船上买办风险较大，我们莫氏家族的子侄很少愿意担任。——按照太古洋行的规定，黑烟通轮船的客票、唐餐楼、官舱、大舱等部分，统由船上买办承包，以行走长江流域的船只为例，每艘底数大约是每月500元至1000元左右（不包括货运水脚部分）；西餐楼部分（每船只有10至20个位），则由公司直接售票。另外，船上的旅客伙食亦由买办包办，茶房则由船上买办招人投承，由船上买办收保证

金，船上买办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和职权做私帮生意，不须付载脚，利路很广。故奔走于莫家之门谋船上买办职务的大不乏人。至于我们的办房，在向黑烟通公司推荐船上买办时，除收取其保证金外，还从中收受黑钱。此外，凡担任船上买办的，还要经常向办房内专管货运的华人船务部的主管人员送礼。船上买办委托我们开设的南泰号代售他们承包的官舱、大舱等客票，又须给南泰回佣。办房在这些方面获得的利益亦很大。因此，后来上海太古分行的买办亦向太古总行提出要求，由他们荐用一部分船上买办。太古总行的西人经理为协调两方面的关系，曾作出规定：此后凡有新船下水，应分拨一部分船上买办的名额由上海分行的办房荐用。

南泰号经售太古洋行各条航线的客票，除直接售给南北行的客商外，一般多不直接售给普通旅客，而交由各地的客栈代售。如设在汕头市的南记（南泰的分号），绝大部分客票均交由当地较著名的旅店如宝华兴客栈（专做“猪仔”客，即“契约华工”的生意，是汕头著名的“猪仔馆”）、裕兴祥客栈等代售，一般旅客要乘搭太古洋行的各线轮船，一定要到上述客栈买票，使旅客多负担一层中间剥削。当时，自汕头至新加坡的太古船票，由南记售给各客栈时，每票售价为18元，客栈一转手，即以每票20元的价格售给“水客”或旅客；自汕头至曼谷，南记交给客栈的票价为每张16元，客栈转售出去，亦抬高了价格。遇到船少客多的时候，南记售给客栈的船票，往往炒高至超出原价二至四倍，如遇船多客少，则煞价至只及平常售价的1/3弱（如曼谷船票曾煞低至每票仅售3元），一涨一落，差距大得令人难以想象，南记和各船的船上买办及客栈东家的中间剥削之重，不难推算。是时凡在汕头经营客栈的，都要到当地的交涉署（专管华侨出国事务的机构）领营业牌照，须有两间商号联保，并规定“不准拐带妇儿及贩卖华工出国”，但实际上不少客栈都以经营“猪仔客”的生意为主。南记批发给较著名的客栈的船票，都采取记帐方式，不必以现金交易。客栈则分别在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几个节日陆

续完帐，至春节全部结清。客栈除到船票后，亦转交给经常来往南洋、非洲等地的水客（水客主要业务是代各地华侨携带侨汇回来给国内的侨眷，并负责带引“新客”出国，每年来往于国内及侨居地三数次不等），也是在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令回国时才结帐。太古洋行的客运业务，通过南泰和它的各地分号，和各地的客栈、水客联结起来，因得顺利开展。

太古洋行的航运业务，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开辟，至这个阶段的末期已经扎下了根，因此便先后在香港的石塘咀兴建了黑烟通轮船公司仓库，在九龙邻近火车站的地段，兴建了蓝烟通公司仓库，由我们的办房派出我的堂侄莫如恩担任黑烟通公司的货仓主任，派我的堂兄莫文畅担任蓝烟通公司的货仓买办（文畅死后由我的堂兄莫寿南继任）。

货、客运大量增加以后，太古洋行看到货、客的保险（包括水险、水渍等）业务，是一笔营业额很大、利润很厚的生意，又开办了保险业务，除自行承保一部分外，并代理了英国于仁等十多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保险部成立初期，以承保海洋保险为主。由于太古洋行是以航运业务来带保险业务，航运业务发展得快，故保险业务亦发展的很快（这方面的情况留待谈到下一阶段的业务情况时再详述）。保险方面的营业，初期亦全由办房包接。

这一阶段的中后期，太古洋行的业务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当它的航运业务有了显著的进展、资本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便放弃了前述的进出口杂货生意，将溢利全部用于建造新船和投资于工业。1884年，它首先从溢利中提出港币500万元，投资于当时获利最厚的炼糖工业——在香港鲷鱼涌兴建了太古糖厂（THE T-AIKOO REFINING CO., LTD.）。太古糖厂是以菲律宾及渣华（即印尼）的原糖（赤砂糖）为原料，采用骨炭滤法及硫化法漂白制炼绵糖（白糖）。这个糖厂有两付溶糖设备，每付每日能溶糖100吨，每月可生产精糖12.5万担（司斤）。这个糖厂建立初期，曾一度独占远东精糖的销场。

当时，国内市场只有土制的黄糖销售。在华南地区，只有广东的惠州有少量白糖（系溜糖）出产，但不洁白，且数量微不足道。因此，太古糖厂用渣华原糖制炼的精糖，利润经常达一个开以上。

太古糖厂所生产的白糖分成很多品级，有：粗砂（内分A级粗砂，双A级粗砂等）、幼砂等。比较细粒的称为“车糖”（TK），用布袋包装，分为5磅装、10磅装两种，外国人多用以拌和在红茶或咖啡中饮用。还有一种糖粉，专门供应中国制饼的厂商，用以制作饼皮或作糕点的糖面。这种糖粉未在我国市场出现以前，中国的饼商多采用粗砂糖作原料，制成的饼食，因饼皮容易绽裂，不耐久贮。太古的糖粉销进国内市场以后，饼商用它制作饼食糕点，饼皮不易破裂，一般可贮存半月左右，故在华北一带极受饼商欢迎。生产量最大的一种精糖名软幼砂（其内又分5、6级，最好的称B级，色泽洁白；最低的一级称HX级，色泽较黄），在我国市场销量最大。太古糖厂生产的冰糖，产量虽不很大，但色泽很洁白，远胜于当时国内市场上其他地方出产的冰糖，在华南及西南各省很畅销。云南方面对这种冰糖最为欢迎，甚至在各种筵席上，亦必备一碟太古出产的冰糖宴客。

太古糖厂设立以前，渣华糖在中国市场占了主要地位（除国产黄糖外），太古糖厂设立以后，其产品除供应远东其他地区外，大部销入我国内陆，自华南至华北，均占了市场上的很大份额。以广东为例，那时广东每年约销售食糖（不包括土糖）50万担（司斤）左右，由香港输入的太古糖，约占了30万担以上，基本上控制了广东的食糖市场。在正常市价下，太古糖厂大约在每担糖中可赚到5元的利润（以每担5元的价格买入原糖，以每担10元的价格售出精糖。）此外，制糖过程中所产的副产品桔水，每月达数万担，亦成为香港及广州两地的酒商和酱油商的主要原料来源。在太古糖厂设立以前，他们所需的桔水除取之于本地的糖寮外，主要依靠渣华桔水供应。但渣华的桔水力度较低，不如太

古糖厂的桔水好，故自太古糖厂建立后，上述厂商多转向太古洋行进货，

太古糖厂所获利润之巨，引起了另一英商洋行——渣甸洋行的注意。因为，在太古糖厂开办后不久，渣甸洋行也在香港开办了一间中华炼糖厂（香港及华南人士习惯称之为渣甸糖厂）。这个糖厂除生产砂糖外，有一副制造方糖的机械生产方糖，以与太古洋行角逐中国的市场。但因太古糖占领市场较早，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始终遥遥领先，比渣甸糖的销售量一直保持着超出一倍左右的差距。渣甸糖厂因无法争衡，后来不得不自行收盘，把部分设备顶给太古糖厂（详见下文）。

太古糖厂开办后，食糖生意便成为我们的办房最大宗的业务。我们除可在经手售出的白糖中赚取佣金外，——仅此一项即占办房总收入的6%——并可从事撻扎：市俏则以各种字号名义向太古洋行订购，转手以高价在市场抛出，滞市则单纯赚佣，或囤积居奇。对于桔水，亦以同样的方式经营。为了供应太古糖厂所需要的蒲包，我父亲特别开设了一间昌记蒲包店，直接向蒲包的出产地（广东肇庆）采购草席回来，加工供应，所获利润亦很大。

太古糖厂出产的产品初时还没有适当的商标，和我的父亲商量后，由我的父亲替他们出主意，用一个太极图作唛头（mark），取“源远流长”之意。后来，太古洋行所属各企业经营的商品，便全都采用了这个标记。

我的父亲为了替太古糖推广销路，初期确费了很多精力。现在还能回忆得起的是，当时每逢旧历年（春节），我们的办房必定大量印制月份牌，形状如现在的年画，画面多是美人图那一类东西，并有“富贵寿考”、“国欣家庆”等投合当时一般人心理的字样，广泛分送客户，仅印刷费一项，每年开支便超过1万元（在清末的物价水平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以上。广东回乡（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家，不管与太古洋行有无交

易，家中多挂有太古洋行印制的这种月份牌，而太古糖亦由此更深入人心。至于与我们莫氏家族有往来的亲友，每逢过年，更是纷纷索取。市面上更常常出现炒卖太古洋行印制的这种月份牌的情况，供应最缺时曾抬高到每张索价几毫，这种价格在当时真是高得难以想象。因为太古糖的招牌在市场上很响亮，华南四乡便有不少商人争着做太古糖的各乡代理。对于华南各地，除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由我们的办房直接批发供应外，其余如广东的江门、海口及广西的梧州等有船只直接来往香港的地区，都设有太古糖的代理商号。凡代理太古糖的商号，除可得到九八回佣外，每逢糖价有起跌，我们的办房都必定事先通知，尽量使他们能多赚钱，少亏本，乐于作太古糖的代理。

广东以外，山东帮每年直接向香港购销太古糖亦很大宗。据我个人的记忆，历年运销华北一带的太古糖，亦达数十万担，份额比运销广东的更大。太古糖在华北除直接由各地太古洋行的分支机构推销外，香港总行的办房亦在香港就地出售给从华北各地推购的糖商。

对于广州市场的供应，我们办房除批售给广州的糖商（一般都在太古洋行经营的省港船或停泊在香港的一两个码头的、客商指定船只的船边交货）以外，我父亲还投资在广州开设了一间大昌栈，以大昌栈名义向太古洋行订货，大量囤积太古糖。广州的食糖行市，每年照例必有数次起跌，因为广东的土糖寮，一般都是在农历冬至前十日开榨，次年清明后十日收榨。在这100多天的榨季内，因有大量土糖冲场，糖价例必大跌。每年农历四月至五月间，因当年土糖产量已定，糖制品亦开始行销，糖价便开始回涨，特别是农历六月左右，因饼商开始购进原料准备制造中秋月饼，糖价便上升到最高峰。其次是农历十月至十一月，民间婚嫁最多，糖价亦俏。大昌栈在糖价低跌时囤积，市俏时抛出，往往在一起一跌之间，一瞬之间便可获利数万元。至于正常情况下，每月只能获利三数千元而已。

食糖如囤积日久，很易回潮，即使仅仅是包皮潮湿，在正常市况下，也要削价2%至3%才能脱手。我的父亲为适应贮存食糖的需要，特在广州的琼花直街建造了一间专供贮存食糖的货仓。这种货仓的建筑设备与普通货仓的要求迥异：普通货仓要求通风，贮糖的货仓则要求“密气”（密闭）。广州经营糖业的商人一般都没有这种特备的货仓，货物多贮存在露风的地方，不能久存，囤积居奇自较困难。我们因有特殊的贮糖设备，经常能待至货疏市爽时才放出，获利比一般糖商更厚，售价平均可比其他糖商的存货高5%左右。

桔水的经营方面，除供应港、穗的制酒及制酱油的厂商外，我父亲又在香港开设了一间同利栈，利用职权从太古洋行低价购入桔水，制成酱油及蒸酒外销，获利甚巨。此外，又由办房假借各种商号名义，向太古洋行购入桔水，转手以高价卖出。

广州的桔水商人，自太古糖厂的桔水面市后，都抢着向太古洋行要货。他们用自备的船只，把桔水盛入散舱内，运回广州，批发给制酒及制酱油的厂商。初期，他们曾企图垄断太古桔水的市场，联合起来以不向太古洋行要货作要胁，迫使太古洋行杀价出售给他们。他们知道：太古糖厂每月所出桔水数量很大，如不及时清理，日子一久，便无法处理（因没有贮存的地方），非作为废物倒入海不可。因此，他们以为采取杯葛（boycott意为抵制）手段，必定可以迫使太古洋行让步，这一手对我们的办房来说，比对太古洋行的打击更大。因为桔水也是由办房负责推销的，按照买办合同规定：如果买办不能把产品推销出去，糖厂受到损失，买办必须负赔偿之责。但是，我的父亲的经营手段也很厉害。在广州桔水商实行联合杯葛以后，他立即派人回到广州，在河南的海天四望那个地区，租了一大片地，建造了一个可容纳几十万担桔水的桔水池，准备把太古糖厂所出产的桔水，全部自行承购下来，载运到广州贮存（我们经营的香港同利栈酱油厂，也建了一个可容8000担桔水的小池）。并对广州的桔水商扬言：

不管任何一个字号，如果在一个月內不来交易，便永远和他们断绝交易，另找外人代理，或直接与酒厂交易。桔水商人对我父亲的这一着都感觉无力招架，只好纷纷恢复往来。经过这一场较量以后，太古糖厂的桔水再没有出现过积压现象。桔水商人掀起的这一场斗争，他们本身没有获得丝毫便宜，倒给我的父亲制造了一个大捞一笔的机会。因为桔水商联合杯葛太古洋行的时候，我的父亲即趁势向太古洋行的经理强调桔水积压，非杀价不能出售。得到太古洋行的经理同意降价20%，以后（从每担2元，降至每担1.6元至1.5元左右），他立即全部自行承受下来，在桔水商恢复交易时，才以高价售出。

总之，自太古糖厂投入生产以后，太古洋行固然是开辟了一条对我国人民进行更严重的掠夺的途径，我们莫氏家族，也由是陷入更加仰赖帝国主义以自肥的泥坑。我父亲那一代，除我的伯父云裳因照科举考试，没有进入太古洋行工作以外，其余几房叔父，后来都成了太古洋行各分支机构的买办，姻戚中，因我们莫氏家族的援引，后来成为太古洋行的各种附属机构的买办、职员及船上买办的，为数更不可胜数。故当时外界曾谑称太古洋行为“莫氏家祠”。事实上，我的父亲确有意识地培养了大批子侄为太古洋行服务，除为了照顾长房——我伯父云裳那一房，将办房所属的华人船务处划归我的堂兄莫泳如负责，并将南泰号划归我的堂兄莫仲逸、莫久畅（后来当了我父亲的帮买办）负责外，并极力培养子侄读英文。那时，香港的皇仁书院已开办，不仅我们的家人中有不少进入了皇仁书院读书，即故乡香山（即中山县）县会同村（现划为珠海市）的族中子弟，亦陆续到香港读英文，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凡准备入太古洋行写字楼或办房工作的，照例都先由乡间到香港我们的家内居住，学习英文一段时期以后，才开始工作，真正急于谋生的，亦在进入太古洋行之后，边工作边补习英文。太古洋行的业务扩大一些，莫氏族入进入太古洋行工作的人数又增加一些。及至后来，会同村的族人，凡能

工作的，几乎都抛弃了农业，由我们接引到太古洋行或其他洋人洋所办的企业工作。我们莫氏家族后来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由祖、父辈的完全不懂英语，变为有些子侄竟完全不懂中文，真是莫大的讽刺！

发展和全盛时期(1901年——1941年)

这个世纪初，英国正在极力开发南非洲，需要大量华工；在南洋，特别是印尼一带，各国殖民主义者也需要大量劳动力。香港、汕头等地的洋行，在那段时期都从这些殖民主义者那里，接到大批订单，向中国招收“契约华工”——即华南人民熟悉的“卖猪仔”。太古洋行也参与了这种肮脏活动。这些生意也是通过我们的办房做的。关于太古洋行怎样和各地的“猪仔头”和“猪仔馆”转做“猪仔”进出口居留生意的口内及口外各地的客栈，怎样收买“猪仔”，我的父亲和胞兄都没有向我详细说过具体情况。我只依稀记忆：1905年，曾有一批“契约华工”（约500至600人）被送到南非洲后，因水土不服（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劳动过重，营养不良）大量死亡，剩下的也因脚肿等原因不能劳动，被退了回来。因为太古洋行不发遣散费给他们，他们曾连续几天跑到我们的办房来坐索。我们的办房不但没有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反藉着英国人的势力，召警察把他们强行驱逐出香港。

关于太古洋行的血腥掠夺，我所知的仅有这一点点。因为这是研究本世纪初在华各类洋行的活动不能忽略的问题，所以作为一条线索提供出来。

太古洋行在转入本世纪以后，便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不仅原有的航运、保险、糖业等业务都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并且投资开设了太古船坞这样一个远东有名的重型工业，兴办或吞并了著名的香港国光油漆厂和上海永光油漆厂，取得了

更多欧洲的轮船公司及厂商的代理权。这个阶段太古洋行的业务活动比较繁杂，我所知有限，只能摘要分别略述：

(一) 开办太古船坞

太古洋行的航运业务奠定基础以后船只即不断增加，维修任务因而显得日益繁重。因为这些船只，每年例须入坞检查，不仅维修费用庞大，而且在远东没有能够负担这项业务的厂坞，必须开回英国本土才能修理，对蓝烟通公司等经常来往于英国本土及远东航线的远洋轮船，影响还不十分严重；对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的黑烟通公司及航行于华南等内河的轮船的业务发展影响便很大，加上香港的英国军舰亦有就地解决维修的要求，故太古洋行在香港英政府的鼓励下，于1901年，拨资80万英镑（这是草创时的投资，相当于港币1280万元左右），在香港鲮鱼涌太古糖厂附近，兴建了太古船坞。坞内的设备，不仅能负担维修2、3万吨轮船的任务，而且能建造万吨级的轮船和生产引擎等多种机器。草创时期，坞内所雇用的固定工，经常保持在数百人左右，接到建造或维修大船的任务时，则增加到千人以上。但这仅是就船坞本身几个应设的部分所雇的固定工人而言。至于油漆等许多工种工作则须经常另行雇用大批散工。故太古船坞各种工人总数，往往有5000人以上。所有油漆等非船坞本身常设的工种，都采用包工、包件等办法，判给坞外商人承造。各项工种的判头，都是由办房荐去的。他们在接做这些工种时，都要给办房回佣。据我所知，假如一个工人每天的工资为1元，其中便须抽出1毫5分给予判头，另外给办房五分回佣，余类推。至于船坞本身的固定工人，则全部由办房代雇，其工资亦全部由办房经手发放。不仅办房本身有利可图，连办房内经手发放工资的小职员，也可利用职权进行剥削。太古船坞在坞侧建有数十间房屋，专门租给坞内的固定工人居住，每月由坞方收回一定数量的租金，不属办房经管。我有一个表兄刘秉钧，是办房内专管发放船

坞工人工资的小职员，本身每月的工资不过数十元。他利用职权，在船坞的工人宿舍租了一些地方居住，并在住处开设了一个杂货店，指定工人必须到他的杂货店购买粮食和杂货，办法是发工资前除售，发工资时扣还。他的杂货店出售的货物，价格都比市面高。除此以外，并利用手上的资金在工人中放高利贷。因此，经营工资二、三十年，从上述剥削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资产，竟达十余万港币之巨。办房本身所得，就不难窥见了。

太古船坞的技术水平，在远东方面来说，与日本的造船工业是可互相颉颃的，但工资则较低，故造价远比英国本土为廉。太古船坞建立后，不仅解决了共同系统各轮船公司和香港英国海军的船舰的维修问题，而且包揽了中国——特别是华南各地——不少造船业务。在业务不算繁荣的年代（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太古船坞刚刚复工不久的1947年），太古船坞所承修的船舰每年亦在400艘以上，承建的大、小船只亦不少。黑烟通轮船公司后期新增的船只，几乎全部都是由太古船坞建造的。太古船坞除负担修建本系统各公司及香港英国海军的船舰外，并对外营业。据我所知，当时行走在广东省内河的各种船只，如同安公司的东安、西安等轮，都是向太古船坞订造的。通过太古船坞，太古洋行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华南的内河航业。

因为太古船坞是远东有数的修造船只的企业，故来往于远东及香港的各国船只愈多，太古船坞的业务愈发达。英国原是世界上船只最多的一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船只受损失极大，急待补充和修理。这些任务，有很大一部分要由香港的造船工业来承担。太古船坞建立不久，便接到了大批订单，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太古船坞曾受到很沉重的打击，被迫停工了一段时期，直到罢工结束，才恢复过来。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许多原来在上海等地检修的船只，都要转到香港来检修，故又形成了太古船坞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直延至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时才结束。

太古船坞所需的各种原材料，除钢铁等大宗器材是直接由英国等地购进外，一般零星物资，全由我们的办房就地代为采购。后来，太古船坞设立了自己的仓库(STORE DEPARTMENT)，才改由它自己的仓库采购和保管。

(二) 扩大保险业务

太古洋行的保险业务，是以“水涨船高”的形态随着航运业务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了这一阶段，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来往货物，客商除如前购买水险外，又多增购兵险。太古洋行为适应这种战时情况，又在原有的水险和火险业务之外，增办了兵险业务。

香港原有的中、外保险公司本来很多，大家为了争生意，都在订价和回佣两方面想办法。太古洋行在兜揽顾客方面，亦尽量压低订价，以减轻顾客对保险费的负担。例如，价值一万元的货物，订价时往往只按原价的30%至40%计算收保险费，并在应收保险费内给予若干折优待（即回佣）。这项业务，初期全由办房承包。因此，我们的办房特在香港的三角码头开设了太古燕梳分局，由办房派我的堂兄莫泳如（原华人船务方面的负责人）主持，专门经营保险业务。办房所属航务部门负责接载的人员，亦兼负兜揽保险生意的任务。

在广东省内各地，太古洋行亦积极扩展保险业务。除广州外，佛山、江门两地，亦承保火险。

对于火险业务，无论在香港和广州，太古洋行都采取划区分别经营的办法。香港方面，分为上环、中环、湾仔、九龙几个区，各区所承保的数目都有一个最高的限额，不使业务偏集某一地区，避免某一地区发生严重火灾时赔累过大。保险费分许多级，大致是近马路、易救火、钢筋水泥结构的屋宇收费较低，横街窄巷、距水源较远、砖木结构的屋宇收费较高。除屋宇外，并

可承保家私。

各地所招揽到的保险生意，如已达到太古洋行本身承保的限额，超出部分，由太古洋行统一分配给它所代理的各保险公司承保。根据后期上海太古洋行保险部的统计：太古洋行本身承保的生意，只占营业总额10%至20%，其余80%至90%是转拨给它所代理的各英国保险公司承保的。华南方面，还没有看见过较全面的统计和分析。

太古洋行除以一般的竞争手法拉接保险生意外，对于须经由蓝烟通公司及黑烟通公司运载的货物，更想尽千方百计，务使货主向太古洋行投保。当时太古洋行系统各公司的载位经常供不应求，各地客商因为要依赖“太古船”载运货物，大都只好向太古洋行投保，以免太古洋行借故积压或拒运。有些客商同与太古洋行关系较深，或故意向太古洋行拉交情，往往连他们的陆上产业如：店铺、货仓、住宅等等，也一股脑地向太古洋行投保。故太古洋行的保险业务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为繁荣。

太古洋行因为保险生意好做，自1927年开始，特从香港大学雇用了一些毕业生，给予保险部华经理的空头名义（实际只是接保人员），直接听命于写字楼的外国负责人，插手兜揽保险业务。我的侄儿莫庆，曾担任太古保险部华经理30多年，太古洋行除给予他们若干车马费（个别人由太古洋行给予若干工资）外，只在成交的生意中给予一些佣金，大约占保险费的20%（所收到的保险费，80%缴给太古洋行，20%作个人佣金）。由于太古洋行直接插手保险业务，我们的办房所经营的保险业务便愈来愈少。1930年，我们只好把设在三角码头的太古燕梳分局撤销，把有关水险那一部分业务并入办房所属的华人船务处办理，有关火险部分，则交回太古洋行直接雇用的保险部华经理莫庆、郭佩璋等负责。

(三) 航运业务进一步开展

(甲) 华南的内河航运

太古洋行所经营的内河航运，华南方面主要是省港（广州至香港）及江港（江门至香港）两条航线。

太古洋行对省港线，最初只派一条佛山轮行走。在这条线上行走的中外轮船很多。船只最多的，首推英商经营的省港澳（门）轮船公司，拥有金山、河南、香山三条客货轮，后因河南号超龄，又新造了泰山和龙山两轮（泰山轮后来被调往行走香港、澳门航线）。中国人经营的，有广东、广西、大利、天一等轮。彼此竞争很烈。有一个时期，各公司都纷纷降低客费价格，互相招徕生意排挤对方。从香港至广州票价最低时，降到每客只收二毫，途中还由船上免费供应大包（广东茶楼常见的一种点心，以件头大、价钱廉而受茶客欢迎）。太古洋行为了和这些中、外轮船公司抢生意，更以免费供应搭客的饭菜作号召。但仍感势孤力薄。为达到排挤中国人经营的轮船公司的目的，遂与省港澳轮船公司协议，实行联营，实力因此大增。加以省港澳轮船公司在广州市的粤海关大楼附近有一个自建的码头，处于商业最繁盛的地区之一的西濠口，既便于旅客上落，又便于办理报关等手续，业务上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人经营的广东、广西两轮，都没有码头，只能停泊在白鹅潭河面，大利、天一两轮虽有专用码头，但离海关很远，旅客上落不便，业务上受到很多窒碍。“四山”（即太古洋行的佛山和省港澳轮船公司的金山、龙山、泰山）等船只较大，航速较快（每日下午4时自广州开出，晚上10时即可到达香港，全程只需六个小时），客商运出国或运到中国其他口岸的货物附托它们运到香港后，又可直接交由蓝烟通公司或黑烟通公司的轮船转运，无需另行拨给载位，比交由其他公司的船只载运更为快捷便利，故很多经营南北行或进出口生意的商人，都乐意交由“四山”载运。至于经营淡水鱼（即塘鱼）出口的商人，就更

非依赖太古洋行的船只运载不可。因为太古洋行的船只仓位大，它们置有特备的大木桶，每桶可贮水和载鱼数十担，使鲜鱼在旅途中不致发生大量的死亡。其他公司的船只，便没有这种条件，只好任由太古洋行的船只专利。基于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太古洋行和省港澳轮船公司在省港线上遂处于压倒的优势。

佛山轮的买办，初期是由我的父亲向太古洋行推荐我的姨丈陈景华挂名的。陈景华在清末时期曾在广西任知县，因滥杀了一批归降的土匪，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扣押，买通看守人越狱潜逃到香港，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我父亲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故荐他担任佛山轮的买办。清廷倾覆以前，陈景华因为不能来广州，只好派彭俊生代理他的职务。辛亥革命后，陈景华于1912年出任广州警察厅长。太古洋行通过我家族与陈景华的关系，以承租地名义，强行收买了广州白蜆壳附近的田地，用以建筑黑烟通轮船的码头和货仓（建筑情况见下文）。陈景华为这件事，曾对当地农民施用了不少威迫利诱手段。陈景华被投靠袁世凯的广东督军龙济光杀害后，其家人生活，仍继续由代陈任佛山轮买办的彭俊生按月供应，一直维持了十多年，至彭俊生去世后才停止。

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太古洋行和省港澳轮船公司经营的省港线航运一落千丈，后来只好停航。为了打开僵局，太古洋行的洋人曾鼓励我们办房的华人船务处（名义由我的堂兄莫泳如主持，实际工作由我的姨丈胡禧堂负责）组织了一个益安公司，把省港澳轮船公司拥有的那几只船租过来经营。太古洋行亦把它自己所有的佛山轮交给益安公司经营。但由于省港工人坚持罢工，益安公司亦无法打破僵局，一直拖延到大罢工结束后才能开始营业。泳如和胡禧堂等除经营益安公司外，还自行集资组织了一个同安公司，新造了东安、西安、昇昌、恒昌、播宝、哈德安等几条轮船，加入省港、港澳和新辟的省汉（门）线行走，指定金山、佛山、香山、龙山、东安、西安行走省港线，昇昌、恒昌行

走省澳线，播宝、哈德安行走港澳线。在中国人民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极端尖锐的那一段时期，太古洋行对这几条航线，一直采取了在幕后操纵的方式，通过我们莫氏家族所组织的这两个轮船公司，继续对省、港、澳之间的航运事业进行垄断。太古洋行利用他们的蓝烟通公司和黑烟通公司的轮船，和益安及同安所属的船只互相驳运，以维持它在中国沿海的航运、远洋航运与华南内河航运的连锁关系，不致因华南人民的反帝高潮而遭受沉重打击。

益安公司和同安公司为了应付广东省的政局，特派我的侄儿莫庆为这两个公司所属10条船只的“出宦”（专门和官府联络的交涉员），长驻广州，应付广东的官员和海员工会。

益安公司经营到1930年，因省港澳轮船公司和太古洋行把它们所有的“四山”收回各自直接经营而结束，同安公司则始终作为太古洋行的外围企业，继续支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停止。

江门是广东著名的侨乡五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赤溪——的门户，每年都有大量华侨和侨眷经由江门来往于香港、广州等地，香港至江门航线客、货运极为繁盛。早在1890年，太古洋行已派出两只浅水轮船行走江、港航线。这两只都是铁壳船，航速很快，而且不象省港线那样有许多劲敌。太古洋行要垄断这条航线，本来比对省港线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但因这两条轮船的职工——特别是外籍船员——对旅客态度极端傲慢，颐指气使，诸多留难，引起五邑一带的华侨，尤其是来往于外洋及五邑之间的水客极大不满。他们遂自行集资，组织了一个四邑轮船公司，建造了顺利、德利等木壳船（后来又增造了一只安利铁壳船），行走江门、香港之间，与太古洋行的连滩等两轮船对抗。他们以侨资创办的航业公司作号召，把绝大部分来往于江、港的旅客——特别是归侨和侨眷——都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太古洋行虽多方设法挽回颓势，但由于五邑的华侨及侨眷团结力很强，太古洋行经过几年的较量以后，终于无法支持，不得不于

1907年退出了这条航线。四邑轮船公司凭借五邑华侨、侨眷和广大同胞的支持，战胜了在船只设备及资金两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的、横行在中国海洋和内河的太古洋行，在中国的航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四邑轮船公司在打退了太古洋行以后，独占了江、港航线。因此，在1915年，又增建了一只大利铁壳船，加入江、港线行走。但因这只新造的铁壳船航速太大，航程所经各乡堤围受到很大冲击，被沿线各地农民反对，后来只好改走省港航线。

（乙）沿海航线

太古洋行经营的中国沿海航运，在这一阶段，已逐步达到它的顶点。

在前一阶段，来往于我国沿海各口岸的黑烟通轮船公司的轮船，因为船只仍不是很多，班期还不能准确固定，广州和香港，都只能在接到船只到达日期的电报以后，才开始接载。转入本世纪以后，因为船只已比较充裕，来往于我国沿海各口岸的船只，都能按着准确的班期到达和开出。以广州、香港为例，大约每隔三天或四天，便有一水船来往于各个不同口岸。

因为船只增多，华南方面在1905年开始，增辟了广州至海口航线，由香港办房派我们的本家莫鹤鸣到海口设立代理处。直至1908年，因太古洋行广州分行买办蔡功谱（是我的姨丈，于1903年我的五叔襄甫去世后接任广州分行买办。）被调回香港总行当帮买办，才把莫鹤鸣调回广州当太古洋行广州分行的买办。

其后，太古洋行又进一步把广州至海口的航线伸展到北海、海防。北海、海防航线初开辟时，因业务还没有打开，太古洋行为了树立信用，有一班船，虽然仅仅接载得几箱白银，其他任何货物都没有，亦准时不误地把空船开出。由此，遂以船期准确获得当地客商的信任，业务逐步打开。后来北海、海口等地，每班船经常都能接载到5、6百吨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烟通公司的船只有一部分被英国政

府征用，太古洋行在各线的船只虽然减少了一些，但载脚在战争期间却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太古洋行在航运业务中获利仍很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给黑烟通公司补偿了一笔巨款，黑烟通公司借此新建了一批船只，不仅在我国沿海的航运获得进一步开展，而且把业务更加深入地伸展到长江流域的中、上游，后期，并购置了数十只驳船，直入洞庭湖和鄱阳湖，上水装汽油、火油，下水装桐油。在长江流域，太古洋行的业务同样执航运界的牛耳。招商局因航线不定，渣甸洋行因班期不准，都无法与太古洋行争雄。至于从香港至我国沿海各口岸的黑烟通船只，班期比前更密，一般已由本世纪初的每隔3、4天一班缩短为两天一班。

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黑烟通公司的船只已发展到90多艘，但始终没有达到百艘大关，因为当时中国沿海时常发生海事，黑烟通轮船屡遭损失。我们办房中有一部分迷信观念较浓厚的人有一种论调，认为黑烟通公司的船只不能超过100艘，每逢发展到接近100艘时，必定要发生海洋事故。我对这种论调虽不相信，印象却很深，从而对黑烟通轮船的极限数字印象也较深。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航业》所载各种统计中，有：黑烟通轮船公司共有船只74艘，共16.4万净吨，其中载重1000吨以上者约40余艘，其资本总值9000万元，每年盈余在2000万元以上……这些数字虽然可供参考，但不一定准确。该书所开列的珠江航线各轮船公司，及它们所拥有的船只中，有：英商港澳轮船公司共有船只二艘，益安公司有船只一艘，均与事实不符，益安公司在1930年已结束，该书在1933年出版时仍将其列入，同安公司拥有船只六艘，在珠江航线是一个较具规模的公司，该书却没有列入，等等，都可比对出该书的统计是值得考虑的。我在我们的家族中，不是直接经办太古洋行航运业务的人，对黑烟通轮船公司的船只数量、资产总值及盈利实况等，无法提供准确的材料，只能提出上述意见和事实，供研究太古洋行历史的同志参考。

30年代以后，从青岛、上海、北海（包括海口、海防）等口

岸，每天都有定期班船到达香港和广州。定期班轮以外，还有一些由各地商人整船包租的黑烟通船，来往于广州、香港和华北各口岸之间，太古洋行职工称之为“野鸡船”。每年秋、冬华北的杂粮（包括牛庄绿豆、芝麻、花生等）收成季节，广州沙基（现在的六二三路）一带的三江帮，即经常向太古洋行租赁“野鸡船”从青岛、上海等地载运杂粮南下；南北行的商人，亦时常租赁“野鸡船”从华北运药材来广州。广州黑烟通公司的白蜆壳仓兴建以前，无论定期班轮或非定期班轮，到达广州后都一律停泊在白鹅潭河面，用驳船转载客、货上落；白蜆壳仓建成以后，定期班轮均停泊在白蜆壳仓的码头，“野鸡船”仍旧泊在白鹅潭。根据广州白蜆壳仓的老职工回忆，抗日战争以前，黑烟通公司轮船中，经常来往于广州至天津、青岛、上海、北海等线的有35艘左右，吨位一般在2500至3000吨之间，其班期如下表。

船 线	到达广州班期	船 名
青 岛	星期四 星期天	多是S字母排头的船只，如，苏州、绥阳、新疆、山东、四川等
海 口 (包括北海、海防)	星期三	K字头船只，广东、广西、嘉庆、安庆等（安庆仅偶或来一次，平常很少到广州。）
上 海	星期二 (两星期一班)	太原、济南等
天 津	星期五 (三星期一班)	莞州、惠州等（以云南方面的客帮为多）
“野鸡船”	一般都在星期一、 星期五到达广州	云南、南安、南昌、镇江、浙江等
不定期班	不定期	一般都是R字头船，如，南昌等

1927年以前，从香港开入广州（上述各线船只均须经香港）的船只，随时均可自由进出。1927年5月以后，广州成立了海港检

疫所，自香港来的船只，因须经检疫后才能入口，而负责检疫的医生（当时的检疫所医生名钟子晋、黄开荣）按规定每晨8时才开始办公，从香港来的黑烟通船，只好适应检疫医生的工作时间，半夜左右从香港开出，以期能在上午到达白鹅潭，当天下午3、4时卸完货，随即载货开走，绝少在广州停留超过两天的。

黑烟通轮船载运的货物，从广州运往华东、华北各口岸的，以葵扇、柑、橙、沙田柚、甘蔗、香蕉、荔枝干、龙眼干等土特产为多，大约从广州开出的船，都载有200至300吨葵扇、1000箱荔枝干左右。此外，则以北运的食糖为最大宗，每年均有数十万担。开往海口、北海、海防的船只，以载运杂货如纱绸、布匹、瓷器等为主。

至于从广州出口运往欧洲的货物，如：竹仔、蛋黄、陶瓷等，则多由省港船（佛山、金山、龙山等轮）载运到香港，转交蓝烟通公司的船只运去欧洲，绝少由黑烟通公司的轮船转取。

从广州运往华北、华东的货物，即以生果，尤其是香蕉、甘蔗等为大宗。这些货物又很易变质，变干，不耐久存。黑烟通轮船比任何其他公司的船只都多，而且班期准而密，故华南的航运业务，几乎被太古洋行所垄断。太古洋行与渣甸洋行对载脚虽有协定，彼此均须按统一的标准收费。但渣甸洋行为与太古洋行竞争，却在统一规定的载脚项下暗中给顾客以回佣，大约每百元载脚退给顾客暗佣3元。尽管如此，渣甸洋行仍无法弥缝本身船只少、班期不及黑烟通轮船准（黑烟通船无货仍如期开，渣甸洋行的船则常常延期候货）等缺陷，始终无法在华南与太古洋行争衡。尤其是对香蕉、甘蔗等项货物，渣甸洋行所能接载的绝少。

太古洋行在我国沿海及内河的航运业务，在这一阶段所以能够获得长足发展，除了上述它本身特具的优越条件以外，我国各地在本世纪以来不断发生的内战及反侵略战争，也给太古洋行造成了不少客观条件。例如：1931年，当我国人民掀起反日高潮，日本人在我国沿海经营的航运事业受到普遍抵制的时候，太古洋行

因此就少了一个劲敌。加上这年我们国内又发生了战争，火车不通，沿海和内河许多客、货运都要依靠英商轮船来解决，给太古洋行提供了一个乘机掠夺的机会。又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官僚资本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已不能行走，日商轮船亦受到很大限制，而各地逃难的人却随战事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各个口岸待运的行李、货物都堆积如山，唯黑烟通公司的船只，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仍能挂着英国旗，来往中、日两方的辖区。太古洋行的航运业务，因而达到它的历史的顶点。

随着华南沿海航运的空前活跃，太古洋行在广州的仓库业务亦繁荣起来。

黑烟通轮船公司在广州白蜆壳建筑的货仓（俗称广州太古仓），共有仓房十幢，每幢包括两个仓库，共20个仓库。其中有一幢是专供贮藏棉花用的，用屋铁搭成，与其他库房隔离（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幢仓房被日本飞机炸毁，故战后实存的仓库，连棉花仓在内，仅18个）。这20个仓库的容积，每个大约可贮花生5万至6万包（每包180磅，即每吨10包）。仓库以外，还有3个码头，其中有两个是小码头，每个只能泊一条黑烟通船，另一个是大码头，可同时泊两条船。故白蜆壳货仓的几个码头，可以在同一时间，让四条船起卸货物。在20年代的广州，可算是比较完善的仓库和码头建筑了。

白蜆壳货仓除仓库主任（最初是由三江帮商人郑德生担任，后由我的本家莫庆堦，和我们的姻戚唐绍雄先后继任。唐最后升任了广州太古分行的买办）外，有水手、打磨工、打字员及管仓（每幢货仓各设1人，专管出入货物的帐目）、看仓头、看仓（负责打扫仓库及缝补麻包等工作）、理货（派筹）及固定搬运工人等共200多人。他们都是固定的工资的，但待遇菲薄，除由太古洋行供膳食外，月薪最高不超过30元，最低的只有五至六元。除华籍职工外，另由太古洋行广州分行派去一个外籍码头监督（WHARF SUPERINTENDENT），作为全仓的最高领导

人。这个码头监督的主要工作，只是指挥船只泊岸、验报货物损耗等，每日工作极清闲，照例是早上9时才来货仓，到处逛逛，便回去吃午饭，以后，便一直睡到下午4时才起床。但这个码头监督每月的工资，却高达港币400元，比华籍职工超出十多倍至数十倍。

仓库所雇的固定搬运工人，只负责搬运货物出仓交给前来提货的顾客。至于轮船上的起卸工作，则临时雇用散工负担。按照所装卸的货物的吨数计价。在我的侄婿卓惠愚任广州太古分行买办时（30年代中后期），这些散工统由卓惠愚判给把头卢胜包办。卢原是香港太古洋行所属各货仓的把头，兼广州黑烟通公司货仓的判头（抗日战争以后，改由广州太古分行买办唐绍雄和卢胜、卢辉廷等共同承包）。

广州黑烟通公司货仓的业务，自建成以后，即异常繁盛。1925年省港大罢工之前，因为太古洋行的航运业务不断发展，货仓职工连假期都要日夜加班。那时，太古洋行对夜晚加班是不增发工资的，只是工作到夜晚9时以后，才供应一顿夜餐。

广州黑烟通公司货仓每年收入的仓租，据从货仓主任提升起来的、太古洋行广州分行最末一任买办唐绍雄对职工透露，远在1928—1930年之间，即达十多廿万元之巨。进入30年代以后，太古洋行在我国沿海的航运业务已达到空前的繁盛，广州黑烟通公司货仓的仓租收入，自然是远远超过20年代。广州黑烟通公司货仓的业务是受太古洋行广州分行买办管理的，零星货物的仓租，统由货仓收集上缴，三江帮商人寄存的粮、油等大宗货物，则直接由办房收租。每当我国各地发生战事，太古洋行航运业务激增，黑烟通公司的船只的仓位供不应求时，太古洋行必定乘机增加仓租。

（丙）远洋航线。

这个阶段，太古洋行同系统各轮船公司的远洋航线，已遍达全球。主要航线有：

远东、中南亚航线——由黑烟通轮船公司经营，均有船只30艘，一般吨位约在3000至8000吨左右。但达到8000吨的船只不多，只有太原、长沙等四条，专走澳洲、东南亚、香港等地。

美洲航线——由美亚轮船公司经营，有船20艘左右，与蓝烟通公司的船只相同。

欧洲航线——由蓝烟通公司经营，有船30艘左右，一艘在8000至1.8万吨左右。

(四) 开办香港国光油漆厂和上海永光油漆厂

太古船坞开办以后，无论在维修或建造船只方面，都需要大量油漆。加上在我国市场，油漆的销途日广。因此，在30年代，香港太古洋行和上海太古洋行，便分别在港、沪两地开办和接办了国光油漆厂和永光油漆厂。除供应太古船坞的需要外，并通过太古洋行在我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大量推销。

上海永光油漆厂开设以后，因要与当地原有的名牌货永固油漆竞争市场，曾采取赊销办法，广为推销。客户可以在月头取货，至月尾才结账。太古洋行的资金雄厚，且在我国各地均遍设分支机构，永光漆厂的产品，可通过各地分支机构分头推销。永固漆厂资金少，无力在各地多设推销机构。竞争的结果，永固油漆在我国各地的市场上处于劣势。

(五) 太古糖厂获得了暴利

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太古糖厂出产的软细砂等，虽然独占了远东的市场，但仍未能进入欧洲。欧洲市场所销售的，仍以当地用萝卜为原料制成的白糖为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农业受到很大的摧残，以萝卜为原料制造的白糖大幅度减产，不得不向远东地区大量扯销。尤其是战后的1919年，欧洲各国都放松了食糖的管制，食糖需要量大增。远东食糖价格受到刺激，不断上升。1917至1919年间，食

糖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太古糖厂出产的砂糖，原来每担的价格不过八元至十元左右。受到欧洲市场扯销的刺激后，在这两年间，一度高至每担索价80元。

我的父亲在1917年8月已去世，由先兄莫干生继任了香港太古总行的买办。干生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以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太古糖的买卖上。在他接任买办后头两年（1917至1919年），手上经常扎有太古糖十万八万包（100司斤装），在不断吃进和抛出之间，攫得了巨额暴利。据估计，他在这两三年，由于经营太古糖这一项生意，便赚得港币500至600万元。太古糖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两年，总共获得了多少利润，就无法估计了。

20年代以后，日本凭借侵占台湾所掠得的糖业资源，发展了它的制糖工业。日本各糖厂出产的软幼砂开始进入远东市场，与太古糖争雄。原来互相激烈竞争着的两个英商糖厂——太古糖厂和渣甸糖厂，这时便联合起来，与日本糖商对抗。太古糖的产量因此稍有降低，但在市场上仍能保持着较大份额。渣甸糖厂则在撑持上已颇感吃力。

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太古糖厂和渣甸糖厂都被迫停工。渣甸糖厂并由此收盘，把制造方糖的机器出顶给太古糖厂。因此，太古糖厂在大罢工结束之后，增出了在远东颇负盛名的太古方糖。

大罢工期间，太古洋行及同系统的各企业的工人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罢工行列（在华北的黑烟通船除外），但文职人员却未闻有人参加。太古洋行对参加罢工的工人都以辞退作威胁，并由香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及至全港参加罢工的人数愈来愈多，香港英国政府却又采取制止出境的措施。局面比较紧张时，一部分有产阶级相率出走澳门。我有一个侄儿亦由澳门打电报到香港，要他的家人迁过去。香港英国当局在大罢工期间，曾指派了九个人，专门负责检查来往电报，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侄儿的电报被香港英国政府获悉后，认为是拆他的台，极为不满，特把我的大哥莫干生

召去质问。事后，我们家族为表示对香港英当局竭诚效力和决不出走，首先在坚道地区发起成立自卫团，由我担任团长，干生和我都亲自出来巡更。

1928年，太古糖厂复工时，太古洋行为了把糖厂罢工时所受损失转嫁给买办，以1920年至1925年间，办房代太古洋行购入的蒲包，价格高于市价，使太古洋行遭受了80万元损失为理由，要求干生给予赔偿。（事情的起因是干生在1919年在食糖生意上赚了大钱后，曾以港币100多万元，在靠近山顶的干诺道购地10万多平方呎，建筑了一座英国皇宫式的住宅。当这座当时香港最豪华的住宅落成时，曾邀请太古洋行经理布朗前往参观。引起了布朗怀疑，派出人员查核干生的帐目。）

干生在经手代太古洋行采购蒲包中赚了钱，当然是事实。太古洋行在事隔多年，才以这样的方式，倒过头来要求赔偿，也不近常情。我刚刚在这一年进香港太古洋行任帮买办。事情发生后，即检出干生与太古洋行签订的买办合同查阅，才发觉合同中有这样一项规定：“买办必须为公司（指太古洋行）忠诚服务，如买办因失察、过失或欺骗而致公司遭受损失，必须负责赔偿……”（这是我现在记忆得起的原文大意）根据这项合约，太古洋行的一切损失，几乎无不可以“失察”、“过失”或“欺骗”作借口，转嫁给买办负担。在这件事发生以前，太古洋行曾向办房提出过两次无理的赔偿要求：一是1927年，有一次办房派员携款乘太古洋行自置的小火轮往太古船坞清发工资，中途被盗贼抢劫，太古洋行即以买办事前“失察”，未预先配备武力护航，要求买办负责全部赔偿；又一次，洋行的一个外籍职员失掉一双皮鞋，亦以买办对华籍职工平时督察不严为词，责成买办赔偿。

根据这项合约，我们对太古洋行提出的因采购蒲包价格过高造成的损失，自然无法争辩。经过反复磋商，卒于1929年，由干生补偿港币25万元作了。

干生经此打击后，对太古洋行的买办业务已感心灰意冷。尔

后，太古洋行又对办房的业务范围大加压缩。原来办房对太古洋行的买卖几乎是巨细无遗，无所不包的，经过调整后，办房的业务只剩下海洋保险（见上文）、糖业、黑烟通公司的货仓业务、代管太古船坞等华籍职工工资等几项。至于一向由办房管理的蓝烟通公司货仓，则由太古洋行收回，另聘香港华商总会会长黄广田作买办；华人船务处亦由我们的办房分出去，改由我的姨丈作买办；一向附属于太古洋行香港总行办房的广州分行的买办，亦不再隶属我们，由我的侄婿卓惠愚当买办，自付保证金，独立经营。

另一方面，干生的买办保证金，自接手时起便一再追加。我父亲去世时，本已增加到港币15万元；干生继任不过几年，又一再增加到50万元；调整业务范围后，仍保留20万元金额（胡禧堂和卓惠愚的保证金由他们自负）。太古洋行虽仍按月给办房3000元津贴费，但买办经手买卖的佣金，早已降到2%（我们祖、父辈原订是5%），后来又借口太古洋行的营业额庞大，佣金应再相应降低，骤减为2.5%。

即以仍保留在办房业务范围内的糖业生意而论，业务亦大为缩小。过去，太古糖销经华北各地，除各地太古洋行分支机构就地推销者外，香港太古总行办房亦可销出。1930年以后，太古洋行的华北各地分行，认为我们在香港直接卖糖给华北的批发商，影响各地分行在当地放盘，要求香港总行不要让办房在香港卖给华北来的批发商。香港太古总行为照顾华北各分行买办们的利益，要干生的办房自1930年下半年起，停止直接向华北运销，并不再放盘给华北来的糖商。干生办房所经营的太古糖销区，因此只剩下广东、广西两省，生意锐减。

干生感觉形势剧变，再干下去前景也不会好，遂于1931年向太古洋行辞职。这时，太古洋行自觉在华业务已有雄厚基础，能自行处理与华人的业务往来，无需再假手买办，对干生的辞职亦乐于接受。并从此时起，取消了香港总行的买办制度。对于生办

房的人员，太古洋行认为需用的，则留下来作行员或雇员，（太古洋行的职员分为行员与雇员两种，行员可调充各地分行的经理或副经理，多由外籍人员充任；华籍人员只有个别人能被聘为行员，一般只能作雇员。）他们认为不需要的，则予以遣散。

至于我自己，自1928年进入太古洋行去帮买办时起，即负责推销太古糖。太古糖厂因为刚复工，并增加了方糖这个新产品，生意急待推开。我为了打开销路，不辞跋涉，走遍西江、四邑（即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海口等地。这时日本出产的细砂糖已经成为太古糖的劲敌。为了打败日本的竞争，我作出了如下的设计：保证代理商有一定的利润，鼓励他们放手订货。办法是：把太古糖批发给代理商时，规定每担价格比市价低五毫，并要求他们预订3个月以后的期货，如果届时食糖跌价，又保证他们在下一次订货时，照更低的盘码计价，保证他们不仅可弥补损失，拉扯计数还可有盈余。因此，各地商人都乐于做太古糖的代理商，销售额很快便恢复到太古糖厂停工以前的水平。我自己亦趁机向太古洋行多报估出数目，在太古洋行的优待价中赚回一笔。我们采取的这一着，使日本糖受到很大打击。他们的总代理也采取了同样措施来拉主顾，和我们竞争。经过调查后，我知道日本糖商在华南的总代理是我们的亲家郑道亨。郑是日本华侨，又曾当过天祥洋行及荷兰银行的买办。我一面设法探清他每次从日本运糖来香港的船期，在他的货物将要到达时，通知太古洋行突然杀价大量抛出太古糖，使各地向郑订货的商人都受到损失，从而使新到的日本糖滞销；一面派人劝告郑不要再经营这种业务，否则必定亏本。郑初时不加理会，继续进货。他是代日本厂商包销的，所有由货价低跌造成的损失，都要由他自己全部负担。经过几次较量以后，他经不起亏损，便不敢再干。

我在推销太古糖方面既显示了成绩，因此，在干生辞去买办职务的时候，太古洋行仍挽留我担任糖业部的华经理，每月给我250元津贴，另在销货额中给我2.5%的佣金。我考虑到当时无论

在经手推销太古糖或承销桔水方面都颇有利可图，亦乐于接受。

尽管如此，太古洋行的外国人对我们这些华籍职员仍是不信任的。有一次，我因需要对太古糖的生产情况获得进一步的了解，曾要求到太古糖厂去观光。太古糖厂对生产技术一向是采取保密态度的。据我所知，当我国资本家马玉山、劳敬修、虞洽卿、杜月笙等，于1921年在上海集资兴办我国第一个民办新型炼糖厂——中华国民炼糖公司时，虽然聘请了太古糖厂的工程师 Risker担任顾问，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仍不能解决。该厂糖业机械工程师曹铭先（原交通大学教授），拟到太古糖厂参观而不可得，只好通过太古糖厂的职员陈倡图，乔装顶替扫地工人，才获得机会，潜入太古糖厂的精炼车间和办公室，进行过为期两天的观察。因此，太古洋行的副经理对我所提出的要求，初时虽然满口答应，并且约定了时间陪我前去，可是到时却突然通知我：太古糖厂的总管认为制糖技术是一种秘窍，不应让外人观看；我是负责推销的人，只能参观糖仓对产品的贮存和保管情况。结果，我亦只能看了一下太古糖厂的货仓，在厂房四周浏览一遭而已。经过这一件事以后，我深觉为外国人服务，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他们信任，时刻盼望自己的国家能把制糖工业发展起来。

1931年，广东省举办国货展览会。我以香港糖商总会会长的名义，与香港一些商人组织了一个观光团，回到广州参观，由我担任观光团的团长，香港糖商总会副会长庄成宗和大新公司经理蔡昌担任副团长。统治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特派出广州市长刘纪文招待我们。在观光团离开广州的前夕，陈济棠邀请我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并召集广东省政府的各厅长一起参加座谈，征求我们对于“建设”广东的意见。我在座谈会上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之一，是利用广东丰富的糖业资源，兴办制糖工业。并表示：广东当局如果成立制糖公司，我们愿意纠集港商和华侨回来投资。当时，陈济棠正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表示同意由我们去进行。我回到香港后，立即和庄成宗、郭春秧等几个同行商量集资

的办法。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出现，影响所及，连香港青山水泥厂的股票亦由每股十多元跌至二、三元。太古糖厂的业务虽仍可勉力支持，但不少糖商因汇水变化太大，相继破产倒闭。参加商量的一些同行对回广东投资经营糖厂，兴趣虽大，但担心与国内军阀打交道风险大。我则认为拟议中的制糖公司，得到广东的军人支持和参加投资，如果有问题，他们将首先受到损失，可以不必顾虑。经过研究后，香港的糖业同行终于同意我的意见，并决定每人科港币100元，委托我先行到广东各地了解糖业资源情况。我遂于1932年，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和海南岛等甘蔗生产较多的地区视察。由香港到达广州时，陈济棠手下最热衷于这筹办糖厂的军界人士，如：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公安局长何莘等，曾在广州东山军方人士经常聚集的俱乐部退思园，设宴招待我，和我交换意见。我动身前往雷州半岛时，陈济棠曾亲笔写信交我带给当地驻军的政治部主任陈章甫，嘱协助我工作。后来因为陈章甫离开驻地，由驻军参谋长黄涛负责招待，何莘亦写信嘱他所举荐的徐闻县长曹某帮助。我视察完毕回到广州时，和香翰屏、何莘等具体商定，由我负责在港商和华侨中集股，他们负责在军界中集股。我通过庄成宗的关系，知道菲律宾有一批旧糖厂设备待沽，每套约需港币百多万元。因此，我们决定在徐闻先试办一个日榨量为500吨的小糖厂，预计共需集资港币300万元，以200万元向菲律宾购买当地糖厂出顶的旧制糖机械，以100万元作流动资金。香翰屏特指定第二军军垦部门的农业顾问、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农业局局长冯锐和我联系。

关于筹办糖厂事宜，原应由广东省建设厅掌管。当时的省府主席兼建设厅长林云陔，因我只找军方人士商量，没有和他联系，据说心里很不痛快。冯锐是省府所属的人员，是我在岭南学堂（即美国教会所办的岭南大学的前身）的同学，亦想把筹办制糖工业的事权揽夺在手，遂利用军、政两方的矛盾，在外面放出空气，并在陈济棠和林云陔面前进言，说我的后台是太古洋行，

英国又一向是制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让我来经营广东的制糖工业，难免被英国资本控制，主张由政府收回自办。后来，他又和美国制糖机械垄断集团之一的檀香山铁工厂取得联系，在檀香山铁工厂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在广东兴办五座大糖厂的计划（这个计划据说也是由檀香山铁工厂代拟的）。据知道内幕的人士了解，美国人支持冯锐，目的在推销积存在菲律宾的大宗剩余残旧制糖设备和长期向广东推销剩余食糖（冯锐原定的计划，是把准备兴建的五座糖厂全部交由檀香山铁工厂承包的，后来由于捷商圻柯达厂《SKODAT》加入竞争，檀香山铁工厂未能达到一口吞下的目的）。陈济棠会意把这件事交给冯锐主持。但又因对我们许诺在前，不好改口，于是假手当时国民党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订出一个条例，规定民营糖厂的资金不得超过50万元。这个数目，其实连购置机器都不够，我们筹办的制糖公司，遂不能不胎死腹中。

冯锐把在广东开办糖厂的实权攫到手后，又顾虑将来制出来成品自己无力打开销路，故又建议：由我纠合糖商承销广东当局决定兴建的市头、新造、惠阳、东莞、顺德五大糖厂将来生产的白糖，按照承销额给我一定佣金。我的目的只在牟利，对是否由我来办糖厂，本来是无可无不可。双方经过协商后决定：由我邀集几个同行，以蔗糖营运商名义，缴纳保证金40万元，保证每年代销白糖60万担，广东当局则答应给我们9%的佣金。当时，广东当局对兴建糖厂正苦无款，我向冯锐建议：用我们所缴的保证金，先付一部分定款给承建糖厂的外商，一边施工，一边从国外运糖进口销售，待糖厂竣工时，经营进口食糖所获利润，即足够结清外国公司的机械设备帐目和施工、安装的工款。后来，陈济棠果然在五大糖厂建成前，大量从香港购运食糖进口，到广州后改换商标，宣称是他们自办的糖厂的产品，向市面推销，被华南人民讥为“无烟糖”。他们为了逃避国民党中央的食糖进口税，猎取更大利润，所有进口食糖均由海维、海周两只军舰运载，实

行武装走私。陈济棠进口的食糖来源有二：软细砂是通过我向太古洋行购买的；粗砂则直接向渣华（印尼）的糖业公司采购。至于向市面推销，则由我们几个蔗糖营运商承包。我无论在为太古洋行推销太古糖（计共卖给陈济棠软细砂糖数十万担）方面；和为陈济棠推销“无烟糖”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利益。

关于蔗糖营运商的名额，我原计划只由我自己、庄成宗及广州的糖业公会理事长袁丽泉等五人承包，后来因为冯锐方面伸手要分肥，便将名额增加为10个，我和庄成宗、袁丽泉等各占两个名额。我们原计划把包销的白糖批发给各地区的糖商分销，佣金的分配是我们占6%，分销的糖商占3%。当时广州的食糖生意已做得很烂，糖商们售出一担糖，往往只赚到一个糖包，所值不过两毛。如果替我们分销，以每担白糖市价为18元计，每担即可获得五毫多的佣金。但广州的糖商不满足于这种分配办法，群起反对。我即向袁丽泉说：“如果广州的糖商坚决反对，我们就索性把它包到底，直接向市面推销，把9%的佣金赚足。”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别在广州市各个区自行开设了十间商号，门沽广州市应包销的份额。至广东各县，则仍按分销商占3%佣金的办法，分配给由各地驻军支持的商人代销。在营运商应占的佣金份额（即6%）项下，我们每年便可获得60万元以上的利润；我个人所得，每月计达1万多元。至于在广州市直接门沽部分所得的利润，还未包括在内。

在蔗糖营运商的业务展开以后，我在广州琼花直街的沙基酒店设立了一个办公处，专门处理全省食糖的包销及广州市的分销店号的业务。并且留下两部小轿车在广州，任由我们要应酬的官场朋友随意使用。我自己亦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兼顾太古洋行及广东方面的业务。除了包销白糖以外，我还向冯锐建议，把全省的土糖也统购起来，由我们统一收购和推销，企图把整个广东的食糖销售市场都垄断起来。这件事曾一度获得广东当局的同意，我们已派出了几条船到雷州半岛一带，准备把当地的

土糖都统购起来。我原意以为上头有陈济棠支持，这一计划必能实现。没有料到，各乡的土糖寮，大都是当地有势力的豪绅、土霸开办的。他们都和地方驻军有密切联系，受到地方驻军的支持和包庇。我们这一措施出来后，立即受到各地驻军反对，无法实行。其后，我又转而向陈济棠从渣华运来的粗砂糖方面打主意。当时，细砂糖每担价格比粗砂糖高3至4元（即细砂糖每担售21元至22元），我曾向冯锐建议，把粗砂糖加工，用石磨或机器磨细，加入4%的“硝镪”（即稀盐酸），制成软细砂出售，不但每担价格可提高3至4元，而且因为加入“硝镪”，秤头也可增加4%左右。冯锐支持了我的意见。我们按这个办法，每月碾制出“软细砂”2000至3000担，在市场上推销。我在碾制过程中，把所加入砂糖中的“硝镪”比重，暗中又提高了3%，即总共加入稀盐酸7%以上，因此，在制出的“软细砂”中，我个人便能在秤头上获得更多的利润。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软细砂”，从外表看来与太古糖厂的产品毫无差别，但因为所含的水份超出了工艺规程所允许的程度（精制的细砂糖每担只能加入稀盐酸3%），贮存几个月后便会潮结成块状，零售商如果不能及时销出，便将受到损失。

广东当局在五大糖厂建成前，除武装私运食糖进口外，并向渣华的桔水公司购运桔水进口图利。这些业务，都是以建设厅所属的广东省营产物管理处名义出面办理，而由冯锐经手的。当时产物管理处的处长由建设厅的主任秘书陈元瑛担任。在与渣华商人签订合同时，原应用陈元瑛名义签字。冯锐为了攫取外商的回佣，只在中文本上签了陈元瑛的名字，在英文本上却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后来被我知道了，冯锐恐被上头发觉，向我征求弥缝的办法，并在他所经手的桔水中，拨出1万多担给我经营。我和冯锐的关系，真是既互相利用，又勾心斗角，目的只有一个，双方都想垄断整个广东的糖业市场。

这段期间，虽然国内外的食糖市况不很好，但太古洋行仍利

用我国复杂的政治情况和法令变更等机会，赚了不少钱。除前述利用陈济棠武装走私的机会，向广东推销了大宗太古糖外，1932年春，又利用我国提前公布进口食糖增税（由原来每担2元多增加至5元6毫）的机会，于公布后执行前这段期间，一面将仓存的白糖数十万担，先期抢运到广州，一面加紧生产，继续抢运。等到增税后糖价提高，才在市面推出，从走漏我国税收中赚了不少钱。我自己也利用这个机会，把个人所掌握的太古糖，用黑烟通轮船运了4万多担来广州。其后因广州销路较窄，一时不易脱手，又在广州改装转运上海（广州市场所销的白糖是100斤装，上海则惯销200斤装）销售。仅在逃避国家税收方面，我就攫得了10多万元的暴利。

这里要顺带提到的是，当我把运到上海的太古糖完全推出，从上海动身回广州的时候，便接到胡禧堂在香港太古洋行华人船务处买办室被他的外甥枪杀的消息。香港太古洋行自他去世后，又把华人船务处的买办制取消，改为华经理制，由我的侄儿莫庆镛充任。至此，香港太古洋行所属各部门的买办制，便完全被华经理制所代替。

太古洋行对我在广东方面的活动，初期并没有提出意见。至1934年底，广东的各大糖厂将陆续动工的时候，太古洋行的经理即劝告我不要参与广东方面的糖业活动。他认为：陈济棠在搞“无烟糖”这段期间，暂时虽要向太古洋行买一些糖；糖厂建成，有了出产以后，即不需要光顾太古洋行。并表示：如果我愿意站在太古洋行这一边，太古洋行愿聘我为行员，每月给我600元工资，佣金仍照旧计发，并预许将来还可派我往国内各地分行担任副经理或经理。要求我立即作出抉择。我因为在广东的糖业活动所得到利益，远比在太古洋行所得的优厚，对国内的军阀又存有幻想，认为在广东方面的业务前景较宽广；加上对太古洋行歧视华人的态度深觉憎恨，遂拒绝了太古洋行经理的要求，在1935年离开了太古洋行。我辞职以后，太古洋行另聘我的襟弟黄卓庵

(香港大学毕业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太古洋行所属的太贸公司经理，详见下文)，继任糖业部华经理。

广东省营产物经理处蔗糖营运商的业务，自1934年6月正式开展以后，初期还算得手。我离开太古洋行回到广州时，原以为从此可以专心致力这种业务，前途大有可为。不料陈济棠手下的军人看到营运商的利润优厚，纷纷伸手，要求把他们驻区的食糖包销业务划归他们经营。因此，一年期满以后，陈济棠便决定自1935年6月起，把全省统一包销改为划区包销。我自己包销的地区，被压缩到只剩下五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赤溪)、两阳(阳春、阳江)几个县。但各地军人仍不满意。至第三年(即1936年6月起至1937年6月止)，我的承销范围又再度被压缩，变成广州市内几个承销商之一，只包销广州市内的一部分地区。而且还是由陈济棠手下的空军大队长丁纪徐出面向陈元瑛交涉，以丁的名义承出来交我经营的。为此，我每月须分出1000元利润给丁纪徐。

陈济棠垮台以后，孙科的侄儿孙满回到广州，原想借孙科的关系，活动产物经理处长的职务。孙满那时手头不很宽裕，由我招待他住在琼花直街沙基酒店我所设的食糖营运商办事处内，我的小汽车也任由他使用，准备在他当了产物经理处长后，重展我的业务。后来，产物经理处长被建设厅长刘维炽的亲信陈均朴攫取过去，孙满只活动得一个广东省饮料厂长。我这个冷灶又没有烧亮。陈均朴当了产物经理处长后，对我放出空气：要我拿出黑钱来活动，才准继续在广州市内承销食糖。我对这种业务早已感觉不值得留恋，便不再承销。

1935年以后，市桥、新造、惠阳、东莞、顺德五大糖厂已先后建成，揭阳糖厂接着又投入生产。它们都生产机制白糖，因无须缴纳进口税，成本较太古糖为低。它们的产品除在本地推销外，并运销华北各省。国内各地市场，只有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才向香港太古糖厂扯销。否则都以销售国产糖为主。太古

糖因此受到很沉重的打击。加上日本糖在远东地区大量倾销，太古糖的销路便日益狭窄。

太古洋行的全盛时代，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香港，太古洋行被日本人接管时为止。

在结束对这个阶段的叙述以前，还必须提到一个问题：在太古洋行进入全盛阶段的同时，四大家族在我国的统治已逐步形成。太古洋行为了求得在我国的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于1937年间，一度拉宋子文的亲信、香港广东银行（宋子文是主要的股东）副经理区伟国（上海先施公司股东区彬的儿子）到香港太古洋行远东总行担任副经理，企图通过区伟国来拉拢宋子文。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宋子文已无力照顾香港方面的问题，太古洋行才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1941年以后)

1941年12月以后，太古洋行停止营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太古洋行才复业。

当社会秩序非完全恢复、香港尚处于军政府管理下的时期，因太古糖厂尚未复工，港英当局只好由渣华（印尼）运糖来供应市面。这些渣华糖运到香港后，由太古洋行负责配售，太古洋行则交由糖业部华经理黄卓庵主持。

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太古洋行的英籍人员全被押在集中营。黄卓庵在这几年，不断送食物进集中营给太古洋行的经理美臣（masson）等，故在太古洋行复业后，很受到美臣的信任。

黄卓庵拿到这些渣华糖后，转发给和他有关系的数十家代理商号，与这些代理商共同分利。在战后两三年之间，便积资100多万元。

香港的商业恢复以后，太古洋行投资经营了一个太贸公司，专门经营布匹、棉纱、儿童玩具等进出口生意，黄卓庵又被调升

太古公司的经理。黄已于广州解放前去世，据其家人向香港自报，遗产已达数百万港币之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的航空事业有很大发展，太古洋行为适应这种形势，投资组织了国泰航空公司，并代理其他多家航空公司的业务。航空线遍布我国内地各大城市和世界上许多重要都市。

太古洋行所经营的海运业务恢复得比较早。战争刚结束的1945年即有船只行走。由于黑烟通轮船公司等船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部分被日本人破坏，另一部分被英国政府征用，船只大为减少。加上我国在战后已收回内河航行权，太古洋行在我国的内河航运业务已大为缩小。华南方面，只有省、港航线仍派有佛山和武穴两轮行走。前者排水量为1600吨，后者有1800吨。班期为三天一水。客货多时，两轮同开；营业淡则只有佛山轮行走。乘搭这条船来往于省港两地的旅客中，以走私为业的水客占了相当比重。广州佛山轮码头主任孙广林等有关职工及这两条船的船员，不少亦从事走私活动。据当时在广州太古洋行分行工作的职工称，由于太古洋行所属船只职工的走私活动经常被海关查出，广州太古分行与我国海关交涉的信件，几乎无月无之。广州解放前，孙广林还自行搞了一只华贵轮，加入省港线行走，与太古洋行的船只竞争。

太古洋行和渣甸洋行战后在我国沿海的航运业务，都以载运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为主，尤以太古洋行所占份额为多。载运这些物资经常来往广州的黑烟通船只，有四川、湖南、湖北、新疆等轮。这些外资公司的船只，因为只有在载运属于我国政府的救济物资时才能进入广州内河。因此，在当救济物资逐渐减少时，太古洋行便私下将在香港接载客商货物，搭配在载有少量救济物资的船只中，仍以载运救济物资为幌子，来往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私运货物入广州。船抵黄埔时，先将货物卸下交驳船载入太古仓（即广州白蜆壳黑烟通轮船公司货仓）。善后救济总署方

面，初期是向太古洋行承租整条船载运救济物资的，后来，它的内部工作人员，亦串同太古洋行舞弊，暗中搭载私人货物。

远洋航运方面，除仍由黑烟通公司、美亚公司、蓝烟通公司继续经营南洋——中南亚、美洲及欧洲三条航线外，太古洋行并代理了十多家欧、美轮船公司的业务，航线遍布全球。

太古船坞战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至1948年，才开始恢复建造大船的业务。在此以前，只能进行修船、舰，建造小轮等工程。由于战争期间损失较大，船坞的股份在战后已公开在市面交易以吸收外界的资金。股票底额原为每股十先令，但最近一两年，成交时已抬高到每股50至52先令。

太古洋行广州的分行，因行址于战后在国民党放火焚烧沙面时被毁，直至1947年才复业。1947年以前，广州太古分行的业务，全部交由“的臣”洋行(DICEAN)代理。

广州各国洋行在抗日战争以后，业务一般已下降到不及战前的1/4。有些甚至没有复业。太古洋行广州分行复业后，业务亦极稀少，进出口货物又不多，重要交易都集中在香港总行解决，广州分行实际只以处理省港船(佛山轮)的业务为主。

白蜆壳的黑烟通公司货仓，抗战胜利初期，全部租给善后救济总署贮存物资。救济总署结束后，改为海员的出口仓，由粤海关派专人驻仓验货放行。业务亦很冷落。

广州解放以后，太古洋行广州分行的业务已基本停顿。唯黑烟通公司的货仓，在解放初期，曾先后租给我国的企业机构作仓库，每月仍可获得租金9000多元(折合人民币计算)。当时，太古洋行留在广州的职工(都是华籍职工)不过数十人，每月仓租收入，除发放职工工资外，仍有盈余。因此，太古洋行的主事人初时仍拟暂维残局，以待“时机”。后因所属设备全部由我国政府征用，太古洋行广州分行才被迫结束。

1956年，香港太古洋行远东总行感觉它在远东的作为已不大，因将香港总行的行址，以800万元的代价，卖给澳门富商傅

老榕，本身所属各机构，则迁往于仁行（香港一座大厦的名称）办公，和它的全盛时代相较，已是日薄崦嵫之景了。

莫氏家族的变化

100年来，太古洋行从代理蓝烟通公司航运业务开始，凭着它的血腥的掠夺手段，到现在，已发展成为国际上有名的航业垄断集团。虽然它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但它仍然拥有一支数目庞大的船队、颇具规模的造船工业和为造船工业服务的油漆工业。并以航业为轴心，组织了自己的贸易机构、保险业务系统，把触角伸展到炼糖工业和航空事业，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托拉斯组织，成为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殖民事业的重要支柱。太古洋行在近100年内，究竟在我国掠走了多少利润，至今仍令人感觉庞大得难作出确实的统计。

我们莫氏家族在太古洋行近百年对华的疯狂的掠夺中，一直是它的驯服的工具。并且在太古洋行的华南系统内，形成了一个以莫氏家族为中心的买办集团。除了我们自己一门三代，先后共有十多人担任了太古洋行各种机构的买办外，由于我们的援引，还有不少亲戚、朋友当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买办。他们遍布在华南各个地区、各种船只，同样成为太古洋行对我国进行残酷掠夺的工具。至于因我们的介绍，到太古洋行各个单位工作的族人，百年来累计已达千人以上。影响所及，目前仍留在老家的族人，便少到不及总人口的1/4。

在这100年里，我们这个买办集团从太古洋行的馀沥中，吸吮了不少人民的血。除了我的祖父、父亲两代因年代湮远，无法了解他们当时所积累的资财的确实数字以外，单就我哥哥莫干生接任香港太古总行买办以后算起，这数十年间，积资逾港币100万元以上的就有好些人。其中：

莫干生

约1000万元

莫如恩	600万元
胡禧堂	400万元
.....

(莫如恩、胡禧堂的资产，都是在他们去世后，其家人在向香港英政府缴纳遗产税时自报的数字，莫干生的资产数目是根据我自己的了解粗略估计的，可以肯定是偏低的。)

至于我自己，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积累，但在我这一生中，花掉的钱亦以百万计。从剥削得来的钱，根据莫氏家族几代的情况来看，总是挥霍掉的占十之八九，能够积聚起来的不及十之二、三。莫如恩、胡禧堂的遗产，其实远远不等于他们生前在买办任内的实际收入。

长期依赖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个买办家族的后代中造成两种可悲的畸形状态。一是，彻头彻尾的奴化，离开了对国外资本的依附便无法生活。自从我的祖父投靠了太古洋行后，到我的父亲那一代，已经是兄、弟、叔、侄，一门四口(我的父亲藻泉、四叔芝轩、五叔襄甫、堂兄季樵)，都成了太古洋行的买办。至我的哥哥干生和我这一代，兄弟、子侄、姻戚中，在太古洋行当买办、帮买办、华经理及高级职员更难历举。干生离开太古洋行以后，虽大部分子侄已陆续改业，分别当了医生、工程师及自行经商等，但仍旧是为外国资本服务，大部分仍感觉离开了帝国主义的势力便无法维生，真是令人焦虑和痛心。其次是，深染了纨绔劣习，寄生、堕落。干生的长子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大少爷”原是留学英国回来的，在家庭内是长子嫡孙，从祖父和父亲手里先后分得数十万元资产，却因为沉缅于鸦片，不事生产，不久便把全部资产花光。干生虽极力维持，亦无法满足他的欲望，只好把心一横，任他沦落。结果，这个“大少爷”竟堕落至沿街向亲友索款，死在香港的一个“烟格”(鸦片烟馆)内，身上只有几毛钱。干生为了维持莫氏家族颜面，只好花上几千块钱为他举行“风光大丧”。我们还有一个侄儿，原在香港太古洋行

的办房内负责华人船务方面的业务，并兼任了一个船务公司的经理。因为炒股票失败，沉溺于赌博，又亏空了数十万元，卒在上海流浪而死；临终恐贻羞莫氏家族，频嘱家人不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本身的姓名，改以他的母亲的姓氏为姓。

我因为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于1952年被港英当局逮解出境，举家回到广州。在党的教育下，获得了改造，有了出路；我的儿女，在党的抚育下，亦陆续成长，在国内当了医生、教师、文工团员等等。还有一子一女，年前分别到了英德的华侨农场和惠州的财贸农场务农或支援农业，成为我们莫氏家族百年五代中的第一批青年农民。对我们这个庞大的买办家族来说，他们的道路，才是真正的出路。

1965年稿

(广东政协供稿)

旅美杂忆

谢英明

先父侨居美国有年，笔者亦于1913年赴美留学，居留美国达13年，对早年旅美华侨生活颇多感受，现忆述如次。

早年的旅美华侨

根据一些老华侨的回忆，以及有关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初，去美华侨逐渐增多。那是和美西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有关。从那时候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口岸三藩市(San Francisco)逐步扩展、繁荣。去美华侨称三藩市为“旧金山”大埠或简称大埠。

三藩市是我国侨民自上海或香港到达美国的第一个大站。那时候，紧靠三藩市的屋仑(Oakland)等市镇人口逐渐增多。华侨到达三藩市后，大都即转去各处金矿做工。不久，北太平洋铁路——由三藩市到美东芝加哥(Chicago)和南太平洋铁路——由三藩市到南美的新墨西哥(New Mexico)相继兴建。以后，在加省又发现并开采铜矿，当时美国急需劳力支援，因此去美华侨急剧增加。据美国有关移民史记载，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华侨进入三藩市并转去矿区和筑路劳工在15万人以上。

当时去美华侨，多半是广东四邑籍属，尤以台山和开平人居多。其间，大多是因亲属串连而去的。早期赴美的也有香山(中山县)、东莞和南(海)、番(禺)、顺(德)各县的人，但为数不

多。

19世纪80年代，美国移民局同意太平洋铁道行车公司派人来华招聘劳工赴美。当时，行车公司派出谢维绍（包工头）到香港、澳门公开招聘华工。谢维绍是我的开平同乡，潭溪人。他曾经回乡，并在四邑各地活动。据同乡的老华侨谈：谢维绍对乡人鼓吹去美当劳工，大有发财机会，美国行车公司每月发给工资20多元（具体数字已记不很清），一月收入，比在国内一年劳动所得还多；可以免费乘船并免费食饭过美国，将来不愿干，也可免费乘船回国等等。先后经谢维绍招去的华工估计当在2000人以上。先父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招去美国的。

当时，乘船人多，医药缺乏，晕船者极为痛苦，患病者不及治疗而死于途中的就连旧金山的影子也望不到了。坐船常发生意外事故。据先父谈：有一次轮船还在途中，就缺乏燃料，只得把船上木器以及旅客所有可作燃料的行李全部投入炉内焚烧，才把船勉强驶到旧金山。

筑路华工，待遇菲薄。在酷暑气候下，每日劳动至少14个小时，加之供水不足（当时铁路在沙漠地带的一段缺乏水源，须从百里外运水供应），中暑而病死的在那30年（1851至1880年）中至少有一万人左右。行车公司对华工死了就算，谈不上福利抚恤。记得谢维绍年老回到开平，许多长久没有得到去美亲人音讯的家属纷向谢追问，他不敢吐露真情，任由乡人咒骂。

当年去美侨胞，不是去建筑铁路的，就是去矿区充采掘工和其他杂工；初期在三藩市定居而经商的，为数不多。侨胞到了矿区，很能吃苦耐劳，但是吃不惯西餐，故常请三藩市唐人埠饭店代办食物，日子久了，唐人埠饭店就分支到矿区去。当时金矿区采金的西人常常把穿脏了的衣服扔掉，后来他们看到办伙食的华侨有些闲暇，便请华侨代洗衣服。华人的洗衣业就由此萌芽起来。开始有一些侨胞到矿区去专业洗衣，从而洗衣业就由一个矿区到一个矿区地延伸发展，跟着在铁道两旁也办了起来。

去美华侨日众，约在100年前，三藩市唐人街已经逐渐形成。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华侨便逐步向美东的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及华盛顿等地转移。到1880年前后，横贯美国的北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先后筑成，美国西部开发已具相当规模，美国便由限制华侨入口而发展到排华运动，于是在美的侨胞也就更多地从西部移向东部。不久，美国政府颁发条例，规定只准“官、商、教（包括教员及牧师在内）、游览、读书”五类华人入口；规定非美国籍人口一律不得在美国购置地产，不得在美国工厂企业从事体力劳动等等，采取了各种手段排斥华侨。

守护神岛（Angel Island）是歧视华侨第一关。此岛位于三藩市海湾内，和三藩市隔海相望，两地轮船来往还不需一个小时。它是一个很小的岛屿，大概是在20世纪初被美国移民局辟为“羁留地”的。我在1913年到达美国，未准在三藩市径直登岸，遂被转船送到守护神岛，羁留了约一个月才被送到三藩市的。当时，据说这个岛已经被使用10年了。岛上建有码头一座，还有几幢楼房。这是移民局专为羁留从远东各国去美的侨民使用的。

原来上世纪60年代美西淘金热潮掀起以后，自远东去美的除我国侨民以外，还有菲律宾、日本、朝鲜等国的侨民。我国去的华工绝大多数勤劳刻苦，又不计较工资待遇，因之华工队伍在美国各个劳动部门逐渐扩大。这一来，不免引起美国种族主义者的嫉妒。等到美西逐步开发，美国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时，美国政府便由利用华工，转为限制和排斥华工，于是明文宣布华工不能在美参加产业性劳动。曾经为美国在荒漠的原野上披荆斩棘，为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流汗流血，为开发西部付出巨大代价的华工，卒之竟被认为损害美国利益的打击对象。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的本质。

美国政府为执行排华政策，把住限制入境这一关口。最初，移民局在三藩市靠近远东轮船停泊的码头附近划出特定地区，建造简陋木屋，把初次进入美境的华侨一律羁留在木屋内，要经过

审问、调查、对证后才发许可入境证。所谓审问、调查和对证的程序异常复杂。除有官员身份的人之外，其他申请入境的华人，都得回答各式各样必要的和不必要的问题，甚至包括带侮辱性的问题。要求入境者，必须在留美居民中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入境者有关系的一方也得回答同样的问题，一有差错，对证不上，那就不许入境，被遣回去。羁留区周围拦以铁丝网，但靠近行人道。因此移民局的通译就利用这种条件大发其财。申请入境华侨需通知居美的亲友，他们准备贿金交给通译，让他们把移民局审问的问题，先行告知，准备回答；或者让亲友事前故意在羁留区附近散步，大声谈话，预示被羁留的亲朋得知移民局将要提问的内容。这些通译要的黑钱数目，是按入境者的身份和有关方面的经济条件而定的。

使用黑钱入境的人并非全是商、教、游、读之类人员。有些人入了境，便设法去工厂、企业做工。后来，日子久了，被羁留的人多起来了，木屋容纳不下，同时，为预防被羁留者的逃跑，移民局便把羁留地从三藩市区内迁到守护神岛。好一个“守护神”！那只是美国种族主义者的一块遮羞牌。

此后，凡是轮船将要抵达三藩市的时候，移民局就要对旅客进行“甄别”。凡属第一次申请入境的中国人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等，一律被送到守护神岛。华侨被关进一幢二层的水泥建筑楼房，简直象一座监牢。行李堆在一个仓库里，不能随身携带。规定每日中午一个小时，取行李用物。被羁留者也只能在此时到楼外场地活动。1913年，我和两个赴美留学生被送入那座楼房。我们先住在一个大房间，房内摆设30张双层床，当时同房的只有20多人。隔几天，当局认为我们的情况比较单纯，说是大房子嘈杂，让我们三个人搬到另一个小房间。

我们自广东去美国，本来事先就已向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办过手续，并经过详细调查，都持有一定的证明文件的。我自己还取得去美读书的许可证，按理，我们入境，只应经过复查就行。可

是，我们在守护神岛被羁留半月有余。其他凭居住美国的商仔纸（父子关系证明）或已入美国籍的华侨子女证明入口，移民局则要盘问多次。盘问范围由祖父、祖母、父母、叔伯、婶姆、姨舅、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的名字和年龄、职业以及各人家庭状况等等，还有居住在哪个村，村里有多少屋，家是在村头还是在村尾，屋子有多大，多高，有几间房子，和谁同住，甚至屋子里有什么摆设，有没有挂镜，四邻是哪家，村头有些什么树都要问，而且过一段时间反复再问一次。象那样琐屑离奇的问题，明明是故意刁难。如果入境者答对了，而第一证人和第二证人的回答稍有出入，便说是身份可疑，如果不用足钱，就要被遣回原地。

这种所谓“调查”、“对证”，无疑是玩弄花招，有利于移民局官员和通译的敲诈勒索，实际是限制华侨入境的一种手段。它可以无限期地进行，有的被羁留七、八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我在美国时，听说因讯问、对证而引起麻烦的极多。记得有这么一件比较突出的事：

三藩市水果商谢汝澜（开平人，和作者同乡）回国带妻子来美居住。事前，谢汝澜已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办过手续，取得同意。到了三藩市，谢汝澜以旧客身份，准予径直上岸。但谢妻是初入美境，就要到守护神岛听候讯问，经过审查，认为口供相符，当局已宣布放行。但哪知等到谢汝澜去接他的妻子时，移民局官员追问谢家里有没有挂钟？谢汝澜随便说：“家里没有挂钟。”这样一来，移民局认为谢汝澜和谢妻的对答不一致，谢妻身份可疑，便不许谢妻入境。谢的父亲在三藩市经商，只好马上去找三藩市华商总会，请求出面作证。华商总会只得依例用20间商店担保，要求准许谢妻入境。铺保规定，住满三年，谢妻身份“确证”无误，才能撤回铺保。

移民局对入境华侨刁难的事谈不胜谈，但对日本人和菲律宾人则放宽得多。他们如果是第一次去美的，同样被送到守护神岛

羁留，但盘问是比较简单的。除个别情况外，一般羁留三几天便放行了。

既是美国多方限制华侨入境，必然就引起我国侨民相应的反抗。但是由于清政府直至蒋介石腐败政权，从来没有采取过有效的保护侨民利益的措施。华侨就只好自己行动起来，想出一些对付的办法。既规定官、商、教、游、读的侨胞可以入境居住，当然这些侨民的直系亲属也就可援引移民法律随去美国。于是，华侨回国（从前是规定不超过两年，后改限一年）再返去的时候，差不多都向美国移民局申报回国时生了男孩一个或两个以备将来援例去美。我认识的许多侨胞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有些是已入美籍的，他们申报在中国出生的子女在未满21岁时可以随时去美，这些子女在年满21岁后可以在美国工厂企业做工；另一些始终保留华籍的（差不多都是商人），他们申报的子女可以去美帮理商务，但不得在工厂企业做工。这些侨胞申报出生的子女，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报的。虚报者须得美国移民局发给的美籍公民后裔证书（在华侨中间习惯称作出世仔纸）或华裔子女证书（习称商仔纸），便多按价转让他人。一般说，出世仔纸比商仔纸转让价高出一倍。以20世纪20年代来说，转让出世仔纸，索价3000美元。买得出世仔纸或商仔纸去美的，还是要遭到诸多留难的。正如前面提到，移民局的话离奇古怪，不近情理，答话不免出差错。于是，许多入美华人被逼得使用黑钱买通移民局官员和通译。我在三藩市居留几年，目击移民局的通译生活阔绰，自是有因的。

直接使用黑钱，有时也有不便。因此，适应这种情况，在三藩市产生了以包人入境的特种“营业”。干这种营业的是在偏僻街巷开设半掩门商店，借以和外界联系。同时，也便于和移民局的官员勾结，以贱价收买商仔纸，高价包人入口。我就曾经和干这行的一个姓司徒的人打过交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同村兄弟谢美钊要接他的次子去美，要我代为物色包商，我辗转探询找到

司徒。他索价3000元，并要预收一半，约定待人入境后再收另一半。我问他：“要是人入不来，预交款怎样处理？”他说可以退回。但相熟的人都说那些江湖客不可靠，我把实情转告了谢美钊。

美国政府排华，史书记载和报刊评述已经不少。现将本人耳闻目见的事实，分述如下：

据老辈华侨谈，他们初到三藩市时，一踏上码头，就遭到美国流氓朝他们身上掷臭蛋、烂果、烂菜、马粪等污物。这些流氓以此取乐，无人管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直至民国初年，这种现象并未中断。当时，华人男的头上还是拖着长辫，女的多是小脚，他们一在街上露面，大批无赖之徒就跟在后面胡闹，说什么“中国人是天生低劣、愚昧、无能”。另外，一些美国种族主义者上唐人街的关帝庙（三藩市唐人街和纽约市唐人街都有关帝庙）故意拍摄那种焚香跪拜的华侨的照片，或以大幅漫画故意丑化华人，加重美国排华的气氛。

当时，华侨的处境得不到祖国政府的支持，大家都很激愤。因此，每当一个地方华侨反击美国流氓得胜，消息便会不胫而走。如保地磨（Baltimore）市有个美国流氓在唐人埠出入必经之路，看到华侨经过，他就伸出脚去，绊人倒地，然后鼓掌，以引起行人哄笑取乐。对此事，美国警察一直不管。当时，有个开平人谭某，少年时曾学得一身好武艺，存心要惩戒他们一顿。一天，谭故意走向流氓面前，当流氓把脚伸出时，他便随着跪下，作扑倒状，就这样把那个流氓的腿跪断了。事过10年，华侨谈起此事还是津津乐道。

芝加哥奥丽中餐馆是华侨开设的。美国流氓往往三五成群，约到那里吃餐，吃罢就走，侍者要他们结账，他们伸出拳头晃一晃，随手把台凳推翻，把碗碟打烂。餐馆向警察局告状无人理会。有刘四伯其人，顺德籍，曾在家乡学过拳术，颇有一手。他与奥丽馆主有交情，闻知此事，便特意到餐馆佯做杂工。当时他

已年逾半百，脚又正好受伤，状甚龙钟。一次，那班流氓来了，他便上前招呼。流氓吃罢，转身就向楼梯走去。刘四伯一个箭步拦住他们，并说一定结清账款才能离开。那个为首的身材高大的流氓伸手就向刘四伯脸上刮去。刘向下一蹲，避开来手，右脚向他一扫，扑通一声，那家伙滚到楼梯下面去了。第二个流氓接着以双峰贯耳之势，直向刘四伯头上扑去。刘再蹲下横扫一脚，这个流氓正好压到第一个流氓的身上。余下见势不妙，只好乖乖结清饭账，并按价赔偿损失。因为几个青年围打一个老头子，在众目睽睽下自知理屈。这是1922年我目击的事。

美国种族主义者还挑拨华侨与当地黑人之间的关系，从中捣鬼。在三藩市、芝加哥和纽约等地，不少黑人喜欢到中国餐馆吃“杂碎”。美国种族主义者就散播凡是“黑鬼”所到之处，白人就绝对不能去。一些华侨资本家为了要做白人的生意，也只好谢绝黑人光顾了。如此一来，就不免引起华侨与黑人之间的不睦。

还有，美国政府无理禁运华侨运输物资。例如，1913年三藩市唐人埠一商人从香港购运一批咸蛋去美。货到三藩市，美有关部门硬说是变了味的坏蛋，不卫生，缺乏营养，不准入口。商人报请华商总会，力争要求化验。后经美国家化验部门证实咸蛋养分并无消失，合乎卫生标准，才准进口，但拖延时日，货主已经受到莫大的损失。又如，1915年左右，我同族兄弟谢丙戎是三藩市茂隆生果店股东，他回国返美，运了一批沙田柚到三藩市。检验当局竟说沙田柚含有远东微菌，禁止入口，这是故意刁难。华商总会派人去海关质问究竟微菌在哪里？美国官员说果皮外有菌，必须剥皮才准入口。明摆着，剥了皮的沙田柚难以储藏，只好贬价卖出。

三藩市唐人街

在美国，凡有华侨聚居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唐人街。三藩市

的唐人街设立得最早，据说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

100多年前，我国侨胞就开始大量进入三藩市。因为绝大多数侨胞是去开采金矿和建筑铁路的，所以，在三藩市定居的不多，停留的时间也有限。但后来，华人去美日多，为适应他们的生活需要，一些商业和服务行业便应运而生，逐渐有较多的华侨在三藩市停留下来。在面临三藩市海湾边后面的山麓地区，华侨开始建造或租住简陋的木屋。在美西各地，早期大都是建造木屋，因为木材方便，造价低廉。在19世纪60年代，华侨定居在三藩市的数以千计，加上过路的，不下万人。华侨家乡观念很重，异地相逢，倍感亲切，很自然的大家聚首一处。年长日久，在一片原野荒地上，出现了座座房舍，一条狭窄、弯曲的道路形成了。这就是最早的唐人街。

初时唐人街开设简陋的饭店最多，后来餐馆、中药店、杂货店相继出现。这些商店适应侨胞的日常需要，因而发展很快。

后来，由于美国排华，华侨被迫由三藩市逐渐向美东、美南各地迁移。留在三藩市的华侨除经营商业外，便大多转为经营洗衣和饮食业。由于洗衣店和餐馆的营业要靠近繁盛市区，不能集中在唐人街，于是大多数店铺特别是大餐馆便分设在市区各地，洗衣铺则多半设于横街小巷内。

1905年，三藩市发生大火，唐人街全被焚毁。灾后，华侨仍在原山麓地区重建房舍。新建的唐人埠街道宽阔，颇具规模。南北向的大街有阔至40公尺的，东西向的也有10至20公尺宽。街道共有四、五十条，南北向的相当长，直而平坦。其中，大马路（旧名都板路 Dupont Avenue）北起西人聚居区，向南伸展，和市场中心大道（Market Street）相连。在这条大马路上，有华侨开设的饭店、杂货店、唐餐馆、古玩店、丝绸店、瓷器店、藤器店、竹器店、被服店、金饰店、书籍文具店、水果店、药材店、五金店、旅馆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商店形成了唐人埠的中心市场。在大马路下侧，把一块荒地改成广场（亦称花园）。上

侧隔邻的斯托顿街 (Stockton Street) 商业比较平淡，但新建的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设在那里，形成唐人埠的中心。当时埠内建筑差不多全是把原来木屋建成三层的砖木结构楼房。这个新建的唐人埠，市容整齐，建筑美观，和纽约的唐人街道路狭窄、建筑低矮，对比悬殊。

早期华侨除了个别南海县人是由香港绸缎丝发庄派到三藩市开设分号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在国内无法谋生才冒险去美寻找出路的。三藩市三和粥店以及好些烧腊店是利用美国人不爱吃的猪肝、猪肚、猪脚等猪杂，以贱价从屠宰场买回来，制成美味可口的及第粥及烧猪肝、卤猪肚、猪脚等食品出售，市利三倍。三和粥店几十年的营业始终不衰，获利不少。东昌伙食店和广合腐乳店的经营尤其出色。东昌号是广东台山余某所开，其中股东之一原是三埠的著名烧腊家，善于烤猪，制品皮酥肉嫩，饶有风味。每日烧猪四、五只，仍供不应求。广合腐乳店是开平县赤坎谢某（和香斋腐乳店股东的子侄）和李圣厚等集资开设的。初时，规模极小，由于制品味道鲜美可口，携带便利，人多夸之，销路日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藩市以外的华人伙食店都成为它的推销联号，到后来广合腐乳店发展成为一间大商号了。李圣厚抗战前回到江门，在江门新鹤路旁建有一座名为“厚庐”的颇为讲究的楼房，在开平还购有产业。可见广合腐乳店也是发了大财的。此外，三藩市唐人埠的生果业几乎全为谢姓华侨所垄断。最初是开平谢某在唐人埠开设了第一家生果店。开始资本有限，后来，逐渐扩大经营，凡谢姓亲族去美国的多在那里学习经营，经过一段时间则各人独自开业。到第一次欧战结束时，唐人埠的整个生果行业都已操在谢姓手中。

据我所知邻近各小埠的华侨事业，都是由唐人埠发展出去的。由于侨胞都是热爱祖国，乡情深厚，他们在每日下午收工后或在假日，大多要回到唐人埠来，共叙乡情，互通家乡讯息。通常，每到下午4时以后，唐人埠便有一番热闹景象。

1913年，我到三藩市时，侨胞都已完全剪掉辫子。华侨上层人物和留学生都穿西装，不再着长衫了。一般老华侨则都穿西装裤，唐装对襟上衣。美国法律规定不准穿内衣裤见客和在屋外行走。男的唐装裤说是内裤（女装例外），要是穿上街，就是触犯警律，要罚款。赤脚上街或只穿鞋不穿袜也要被认为失礼。华侨大多数不愿带那条“吊颈带”（领带），穿西装上衣远不如穿唐装来得更便利。于是来了个半中半西，上身唐装下西裤，脚蹬一双菊花头的中式布鞋或西式皮鞋。

早年华工备受艰苦，节衣缩食积点钱寄回家乡。侨汇在初期，大多数是通过外国银行办理的。那时候，侨胞能说英语的不多。由于语言不通，常感不便。到了清末，广东银行在唐人埠克利街（Clay Street）创办。有了由侨资创办的金融机构出现之后，大部分侨汇转由它经办，华侨各业急需的周转资金也可向它借贷。三藩市附近有个华侨罐头厂，就是因为得到广东银行的支援而发展的。据说，该厂是当时华侨在美的最大企业。它拥有全套新式设备，雇佣中西男女工人数百人。当地（加里福尼亚州）盛产水果，该厂大量收购大桃、樱桃、苹果一类果品及豌豆、篱笋等蔬菜，制成各种鲜味可口的罐头，推销各地。

唐人埠的文化教育，先由中华会馆设立中华学校承担，地址就在会馆的二楼和三楼。此校经过大火之后仍继续开办。这是一间夜校，华侨子弟多来这里学习中文，白天则在美国学校学英语。学校教师原来都是由六大会馆卸了任的先生充当，他们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因此教的都是旧的一套，学生也就很少。1914年，学校董事会目睹这种情况，不宜继续下去，在中华会馆举行会议时，要求整顿，另选由受过学校教育的华侨接任教员。于是，中华会馆董事会聘任台山人黄肇祥为首任校长兼教员，还聘陈景山（中山人）和我为教员。初时学校只分两班，后来学生增加，改开三班。1916年又再增开一班，学生增至百余人。之后，黄子聪、李新、梅某等也到校任教。

三藩市唐人埠有三家中文报纸，1920年又增加一家。原来那三家一是保皇党人办的《世界日报》，一是同盟会人办的《少年中国晨报》，另一家是基督教人士办的《中西日报》。后来新办那家报的名称已忘，这是由同源会（土生华侨团体）主办的。《中西日报》由台山人任于衍作经理。《少年中国晨报》先后由黄魂苏、张蕙蘊（台山人）、刘芦隐（江西人）和黄子聪（台山人）等担任主笔，由原籍台山的土生华裔李是男任执行编辑。《世界日报》主笔梁朝杰，台山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在国内读书以聪颖出名，十几岁时就曾中了举人。

三家报纸的编排格式基本一样。三报各有背景，立论不同。《中西日报》立论平平，没有什么特色，它的读者以基督教人士为主要对象。凡和教会有关的华商总是在此刊登广告。因此，它的订户比较稳定，收入也比其它两家报馆充裕。《世界日报》自然是贩卖保皇的货色，市场越来越窄。我在三藩市几年，和我来往的华商都不爱看它。该报创办比较早，和一些老华商保持了一定关系，所以，还有其销路。《少年中国晨报》当时锋芒毕露，政治态度比较鲜明，是宣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世界日报》在附和，《少年中国晨报》反对。曾经有过一个多月，两报每日各刊社论互相批驳。最后，这场论战因《世界日报》不再答辩，就此收场了。

三家报纸的编辑水平在当时来说都是不高的。它们刊出的新闻内容大致雷同。各报的所谓“本报专电”，常常也都是一个货色。“祖国新闻”都摘自祖国寄去的报纸。“本埠新闻”、“美国新闻”和“世界新闻”，则从三藩市英文报纸转载来的。因此，各报编辑动笔少，剪贴多。当时美报是在日间编排印刷，而侨报则在晚间赶编赶印。因此翌早，美报与侨报可与读者同时见面。所以，各报登载的消息大同小异，其中以社会新闻居多，关于祖国消息的报道较少。但吸引侨胞注意的还是“祖国新闻”。各报总将此类消息冠以“本报专电”字样，它是由各报在祖国的特约

通讯员拍发的。这类电讯以《少年中国晨报》为多，也较及时。因此这家报纸的销量最大，发售到芝加哥、纽约各地。

这中间有段插曲。上面说到只有《少年中国晨报》刊载国内消息较多，易于吸引读者。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发现《少年中国晨报》刊出的新闻，在《中西日报》也有同样的或类似的“本报专电”。经过查察，原来《少年中国晨报》收到此项电讯之后，又将原电转发纽约及古巴各地与其有联系的侨报采用，就在转发过程中，《少年中国晨报》的传达被《中西日报》收买，把电讯抄去，再送电报局拍发。此事暴露之后，《少年中国晨报》执行编辑李是男，有一天故意把捏造的“专电”交传达送电报局拍发，事先他已电告有关单位不要采用。第二天，果然在《中西日报》刊出那条假新闻。李是男看后，告《少年中国晨报》同事，引起哄然大笑，算是揭露了《中西日报》的一宗劣迹。

还有，在三藩市和附近各埠的侨胞中有些人爱聚赌。但说到“赌”字，这和美国警察局有关。因为抓赌是他们，纵赌和包赌也是他们，利用赌博挑拨华侨殴斗，也还是他们。赌场通常设在楼上，楼下是经营商业的，如果赌场设在楼下，那么，赌场的前部还是经营正当商业。这些情况，美国警察局是一清二楚的。但赌风为什么还是那么炽盛？据一位老华侨说：有一年，华商总会的某通译和三藩市市长熟悉，赌场主托他向市长打通关系。于是那个通译去见市长，见面时给市长衣袋插上两支“雪茄”烟，市长不加拒绝，便是取得默许。于是赌场顿时大增，市利百倍。后来那个译员说出来，原来“雪茄”里面全是支票和美钞。据说市长是不亲自接“雪茄”的，他要让别人把它插到衣袋上，意思是说，没有亲手接钱，不算受贿。当然，下面的警察局官员、警察等无不援例行事，要的是钱。华侨捞偏门的有个别人发家了。当时号称“赌王”的台山人陈百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继承他的叔父在屋仑的经营，而成了巨富，1946年他以70万美元的高价把广州爱群大厦买了下来。可见他的富豪。

芝加哥唐人街

芝加哥，位于密西干湖（Michigan Lake）边，是美国北太平洋铁路的终点。早年华侨到达这里，即在湖边附近聚居。该城的唐人街，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稍后于三藩市唐人街而建立的。后来芝加哥繁荣起来，这个湖边地区发展成为城市的商业中心。由于这个地区低洼，所以，它就取名为下城（Down Town）。

芝加哥的市区后来扩展得很大，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下城正好处在商业中心地带。为适应城市交通需要，除在地面行车，还使用空中巨型电车（当地人叫作天面车），贯通市区南北，空中电车又刚好环绕下城来来去去。下城附近一带陆续建起高楼大厦，出现了庞大的商业网。这时，下城唐人街和新建立的商业区不免相形见绌。因为唐人街的建筑几乎全是两、三层的又旧又小的楼房。唐人街的生意不大。租金较低。美国资产阶级认为如果让华侨继续租用旧房，就不能获得高额租金；即使拆掉旧房，改建高楼，但由于华侨经营小本的伙食店较多，也难于负担重租。于是，一方面由美国政府动员：“要规划建设芝加哥啦！”“要整饰市容啦！”另一方面，美国地产业主团用迫迁手段，在下城南边不远的一大片烂地，衔接22街的地方，建起十几幢三层砖楼，衔接22街的旧屋。然后由炒业公司（地产公司之类）出面吸引华侨商会、团体到那里察看，商定由炒业公司用产业经纪的办法把全座楼房或分层批租或卖给华侨（已入美籍的华侨才能购买产业）。华侨在美国政府及业主团的压力下，大多数不得不表示同意迁离繁华热闹的下城，但也有四、五家坚持不愿迁出。最后，除了那几家外，下城唐人埠华侨全部迁到22街。从此，在芝加哥有两个唐人埠，新埠便是22街，下城旧埠虽然还保留名称，但已没有多少华侨，实际上已不象个唐人埠了。那是本世纪初年

的事。华侨先辈一提起“迫迁”事件，都很愤慨。因为芝加哥的发展和北太平洋铁路通车有很大关系，而修通北太平洋铁路，华侨的贡献却是永远抹煞不了的；即芝加哥市区的繁荣，华侨也出过不少力量。

1919年，我到芝加哥时，新唐人埠有华侨商号三、四十家，其中，以饭店包括面厂和芽菜店占多数。饭店是专门供应市内的“杂碎”馆和洗衣店的需要的。

说到“杂碎”馆，这倒有一段轶闻。据说，晚清，李鸿章出使美国，用中国菜招待美国高级官员，美味可口。有些官员便问那叫什么菜？怎么做法？当时，李鸿章随员擅英语者极少，只答说那是中国人常吃的“杂碎”。过后，美国人辗转传闻，说中国菜好吃，他们到华侨开设的餐馆就要“杂碎”。从此，在英文辞典上就出现“杂碎”的译音“Chop suei”，那是“用原汁煮的肉类和瓜菜”的意思。原来美国人做菜，先把瓜菜用水煮熟，把汁倒掉，再加些奶油拌和，而肉类另行烹制。侨胞做菜，是把肉类、瓜菜和水一起烹煮，比西餐别具风味。

那时候，有位叫曾阿巨的华侨，到美国后，在中国酒楼做厨工。他看到美国人喜欢吃中国菜，便在芝加哥集资开设第一家杂碎馆——琼彩楼杂碎馆，兼做唐餐和西餐。他做的杂碎是用肉类加配荤菜、洋葱、云耳、香芹、竹笋、芽菜等做成。那些西人顾客看到云耳是黑的，样子也不太好看，他们每吃杂碎，总把云耳拨在一边不吃。曾阿巨善于观察顾客心理，便把西人不习惯吃的配菜如云耳之类除去，专用绿豆芽、马蹄（荸荠）、洋葱、香芹、竹笋、荤菜等炒肉类。炒猪肉的就叫“猪杂碎”，炒牛肉的就叫“牛杂碎”，还有鸡、鸭杂碎，但无羊、鱼肉杂碎。琼彩楼的名誉逐渐传开来，曾阿巨被当地称作“杂碎王”了。之后，杂碎馆在芝加哥相继兴起。这些杂碎馆开始都是叫什么“楼”，如琼彩楼、乐宴楼、孔雀楼、金鸡楼等；后来，就开设的则叫什么“园”，如广东茶园、椰园、大观园等；再后，新开的又叫什么“村”。

如潮景村、威尔逊村等。这些杂碎馆大的所占铺面多至十余间，馆内陈设大方雅致，还附设有舞厅，配有乐队，可见气派之大。那些附有舞厅的馆子，每逢周末，拥挤不堪，其中西人占绝大多数，都是慕名而去吃杂碎的。我曾听一个美国母亲对她的孩子说：“想周末尝杂碎、炒面（炒面也是华侨餐馆享有盛名的），就得乖乖的不闹事。”我在杂碎馆做工的时候，每逢假期及周末，常常是应接不暇的。

芝加哥杂碎馆的繁荣又促使华侨机器洗衣业的发展。谭赞在芝加哥开办广东面厂，给各酒楼和杂碎馆供应面条。他看到那些馆子每日都要换洗台布，数量很多，在1925年前后，他又和人合资在22街后街开设机器洗衣店。用机器洗衣，简便、快捷，早上收货，晚上交货，周转快，获利多。其它洗衣店也相继发展。这样，华侨把西人机器洗衣店抢去的生意又夺回来了。

前面所说的杂碎馆是指芝加哥市区内的。在唐人埠，还有一家杂碎馆和一家中国式酒楼，专供侨胞饮茶用饭的。那里有精美的广东点心，如虾饺、叉烧包、腊肠卷、蛋挞之类，还有价廉物美的卤珍肝、卤猪肚、卤猪脚等，全是道地中国菜。一些西人也常来光顾，营业不亚于市内的杂碎馆。

在唐人埠，谢圣洋开设致和堂药材店致富的事，算是在侨胞中传闻最广的事了。谢圣洋，开平人，初到美国时，在三藩市集兰堂药材店做伙伕。当芝加哥唐人埠被迫迁到22街时，谢圣洋也到芝加哥来，在22街开设了致和堂（当时全店只有他一个人）。此项生意，需资不多，因为可向集兰堂赊账进货，俟货出手，再行结账。那时，输美的中药材大都作为“干菜”进口。因为美国征收中药入口税比较重，干菜作为食物，入口税轻。唯谢圣洋的致和堂例外，他每次进货，都径直申报药材，照纳关税。当时华侨都说，谢圣洋未免太愚直了。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部分轮船被用作运兵，运货的船只少了，货载量受到限制。美国政府便限令不是急需的东西暂停装运，干菜类自然列在禁运之内。这样

一来，过去报办“干菜”而没有领到中药进口执照的中药店便断了中药货源。而致和堂一直申报中药进口，药材是急需品可以运来。结果，致和堂包办了中药运销任务，顿时成了在美国的中药总批发店。这时候，谢圣泮的兄弟到店帮助，并另雇佣了一个职工，营业迅速发展，美国各大中城市的中药店都转向致和堂进货。同时，他们在禁令颁布前启运的药材进口时也不得不转手给致和堂了。许多中药是用酒配制的。美国禁运酒，美国海关就常常借口刁难华商。一次，纽约某侨商办去一批普济水，美国海关说那是酒制品，不准入口。怎么办？那侨商了解致和堂是正式向美国税关挂号做药材生意的，只好将药削价给他，由致和堂照纳药税把货运回。又一次，三藩市集兰堂药店办到一批永利威的五加皮酒，向海关照报药酒，但海关认为集兰堂向来是只办干菜入口，不准起运。集兰堂又只得将货让给致和堂。谢圣泮遂把那批酒运回芝加哥，转手之间把五加皮酒作为药酒出售，获利数倍。

芝加哥唐人埠也没有中华公所和华商总会，但唐人埠的文化教育事业比三藩市、纽约等埠落后。1926年我离美回国时，那里连一家中文学校都没有。一家中文日报也刚出刊不久，销量不多。报纸内容和三藩市的《少年中国晨报》差不多。

关于华侨社团

华侨社团是随着华人到美日多，侨办事业逐渐发展，为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对抗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歧视、排挤、欺凌和蛮横的剥夺而成立的。1855年，美国法院宣称“华人没有权利控告白人”。这是美国对我华人的最大侮辱，但当时我国政府腐败无能，华侨没有依靠。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侨胞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社团。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等四邑去美的人多，侨团最初就是四邑人组织起来的。宁阳会馆和冈州会馆，创立最早，气势最大。宁阳会馆是台山人建立的。但是，台山姓余

的却不许参加这个会馆。冈州会馆并非新会人所有，在这个会馆里，开平人较多，就中四邑姓关和姓黄的影响较大。由此可见，会馆筹建初期，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当时台山人占旅美华侨的半数或者过半数，其中，又以余姓的人势力大，因而与其他各姓发生利益冲突，于是其余台山各姓联合起来组成宁阳会馆，不许余姓的参加。余姓也不甘示弱，纠合其他非台山的各姓人士组成合和会馆，开平姓谢的就是参加这个会馆的。后来，又有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三县人士组织）、肇庆会馆和人和会馆跟着组成，共有六家。那是1860年前后的事。

到1862年，华侨鉴于各立会馆，只能维护各自的利益，且彼此之间各存门户之见，易为外人利用制造纠纷，而且华侨遇有和美国政府或社团打交道的事，就要有一个统一的代表出面，于是，六家会馆决定共同组成中华会馆（设在三藩市唐人埠内的斯托顿街），由六家会馆的理事兼充中华会馆理事，凡须共商问题，则由各家会馆的理事轮流负责召集。当时华侨把会馆译作“Company”。因此，中华会馆的英文名称就译成“Six Companies”了。

中华会馆建立，即聘请全权法律顾问和译员。中华会馆的经费由各家会馆摊派，同时规定：凡属工、商、教（书）的华侨回国，须交纳一定的出境费给所属的会馆，但视具体情况而定，老弱贫病者免交。中华会馆维护华侨应有利益，资助贫苦侨胞回国等等，起了积极作用。

三藩市唐人埠的华商总会也相继建立。该会的会员开始只限于唐人埠的华侨商号和华商。在三藩市及芝加哥等埠，还有以姓氏的联合组织出现。这种姓氏组织有别于会馆。其组织有叫什么“公所”或什么“堂”的。如刘、关、张、赵四姓的“龙岗公所”，雷、方、邝三姓的“溯源公所”；谈、谭、许、谢（四姓都从“言”字偏旁）四姓的“昭伦堂”等。在这些姓氏组织里，青年人还成立什么“会”、“堂”的，他们有些动不动就讲武

力。所以，那些“会”、“堂”曾被称作是“散仔会”。如谈、谭、许、谢四姓的“联义会”；陈、胡、袁三姓的“笃亲堂”等。为了区别于“散仔会”，人们把最先成立的姓氏组织称为“父老会”。在一般情况下，姓氏组织成员与成员之间遇有纠纷，不能解决，即把问题提到公所来，要求父老帮助。父老们随即召开一个简单的谈话会，研究分析问题性质。然后正式开会，纠纷双方将有关情节及理由阐明后，与会父老各就问题的性质提出处理意见，最后，依据多数父老的意见，进行解决。但有时候一方恃强不理，“父老会”劝告无效，紧接着就开“散仔会”，采取压服办法。前面提到谢圣洋办致和堂，因财产问题申报“昭伦堂”请求帮助解决，不果。后由联义会会友出面，声称要用武力对付被告的一方，才把纠纷初步解决了。那次纠纷是这样产生的：谢圣洋有养子谢维立随在芝加哥生活。谢圣洋因经营药材发了大财；他不懂英文，故每次存款总是叫谢维立送去银行的。岂料谢维立存心不轨，在银行开的户口不用他养父的名字，而用他自己的名字。后来，谢圣洋钱赚多了，又要开设一间百货公司，他要谢维立去向芝加哥市政府注册，谢维立又借机用“维立公司”名义立了案。这种情况谢维立从未向他养父透露过（此人后来回到开平买地造起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立园”，园内设有亭台楼阁，极尽豪华）。只因谢圣洋有次要他去银行提款备用，他竟公然说钱是他的。谢圣洋这才省觉，原来所有存款都给他的养子用谢维立的名字侵吞了。偌大一笔家财就这样让养子刮走，谢圣洋当然心有不甘，但如果按照美国法律向法院起诉，他是不会取胜的，因为银行只认开户人的签字。谢圣洋只好要求“昭伦堂”为他评断。“昭伦堂”当然了解谢圣洋发迹经过，要谢维立最低限度把他侵吞的财产半数交回他的养父，但谢维立断然拒绝此议。“昭伦堂”联义会会友便斥谢维立存心不轨，要他立即执行“昭伦堂”决定，不让他再有争辩。谢维立在压力之下，只得接受处理。可见“散仔会”对排难解纷，有时候是很能起作用的。

上述华侨姓氏组织之外，还有一种社团，既非依据籍属或姓氏，也非根据职业范围而组成的，这类社团记得有“致公堂”、“秉公堂”、“安良堂”、“瑞胜堂”、“萃英堂”、“协胜堂”、“金兰公所”等共十二、三个。这些社团俗称“堂号”。有些老华侨把它们叫做“斧头仔堂”。原来这些堂号组织之初，是以侠义互济为宗旨的。堂友为维护本堂利益不受外界侵犯。初期都是使用斧头仔（刀刃锋利的短柄小斧）为武器，“斧头仔堂”之名，由此而来。这类堂号规定，凡志愿服从本堂章则，担任应尽义务，经过介绍人审查，即可入会。

在美西矿区，华侨大多数加入致公堂。该堂源出祖国的“三点会”，到美后改名致公堂，堂友遍布美西及美西南矿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潜力。随后，华侨转向美中、美东等地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东部及中东部一带，安良堂崛起。其后，协胜堂的势力也逐渐向东发展。

这些堂会，经常发生堂斗”其中大多因赌博而引起的。各堂都有个总堂，如“协胜总堂”设立在三藩市，“安良总堂”则在纽约。如总堂决定堂斗了，那么堂斗就不限于一地，凡设有堂号的地方都展开了相互仇杀。据说，某堂号决定向对方下手了，便拿出布袋一个，内装饼干二磅，美钞200元和左轮手枪一支连枪弹一盒，征求谁愿执行任务。谁报了名，谁就把布袋收下。要是执行人不幸身死，那就由堂号负责料理后事。有人曾约略估计，到1926年止，因堂号之间相互械斗而致死的侨胞最少在300名以上，伤者过千，损失财物更是无法估计。据一些老华侨谈起过去堂斗发生时，双方堂号头目及当地富商即向警局申请派警保护，堂斗中伤毙人命，请由美国律师包案。这一来，警局和律师，对堂斗都感兴趣，因为他们既可乘机捞一把，又可给美国政府作为污蔑“华人野蛮、好斗，连警察也无法制止”的根据。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堂斗不但不进行阻止，反而派警察保护堂号，无异保护堂斗。这种堂斗有时延续一、二年之久。1925年，我曾亲自经

历过一回。虽然我没有被卷进堂斗的漩涡，但已受到堂斗的影响。堂斗进行时并不明显，只是到处风声鹤唳。我本来有事要过别埠去，也怕被误会遭到危险，而久留芝加哥。直至第二年堂斗平息，我才回到祖国来。

留美学生种种

1913年，我径自向广东省教育司申请去美留学。经过测验，审查合格后，我奉准到省外交司领取去美护照，然后，再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申请加盖印章。我见到美国领事时，他首先问我：“谁负担你的留学费用的？”我答：“父亲。”他再问：“你家里有多少产业？每年有多少入息？”我答：“我父亲由南美回来，有很多钱。”美领事要我通知我父亲第二天去。我父亲在乡间，一时不能赶到，他就要我找铺保。象我这样不凭借任何关系自费去美留学的不多。其它自费去美留学的有美国在华的教会学校毕业的、在中国大学毕业的、华商的子女、外国牧师带去的中国孩子、中国教会人士带去的子女等等，还有，按美国政府规定，在美国三藩市六大会馆的先生（理事）可带两个人去美国留学。1916年，美国某教会学校派人到广州招生，当时报考并被录取的有几十人，他们在广州补习了几个月英文，然后才去。那算是自费去美国留学的人数最多的一次。

按照当时民国政府规定，自费留学在美大学读满一年而家境确属贫苦的，可以申请官费。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读了一年，大学的化工系副主任主动帮我申请官费。当时（1917年）广东省政府同时批准连我在内转为官费留学生的共10人。我有个堂兄弟当时在广东省教育厅工作，他去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了。但是，过了好久，在美的官费留学生监督严思鹓还没有拨款给我。后来，我看到《少年中国晨报》登载有关官费留学生的名单，10人中我是居首的，其他几个有后台的，如曾任广东省省长李耀汉的儿子

都已享用了官费，独我收不到钱。我便向严思醮交涉，去了几封信，他回信总说广东没有钱寄去，不能贷款发给。最后，我在信里严词向他质问：为什么有钱寄给和你有关系的一些人，而不寄给我呢？我表示要登报揭露此事。严思醮无法应付，在1919年寄了450元给我，仅合我每年应得的“官费”的半数。再一年，也就是我毕业后转做研究生的那年，严思醮又拨给我300元。

原来，按规定只有大学生才可以申请官费的，但是有后台的，念中学的也同样可以享受官费。大官的儿子享受官费，可以不受规定限制，这在旧社会是不足为奇的。

加里福尼亚大学在三藩市附近的一个小埠柏克利（Berkeley），从那里去三藩市，步行需35分钟。市内人口10万左右。大学里中国学生共100多人，其中官费的占多数。但广东学生大多数是自费的。广东自费生比官费生要多得多，其中，绝大部分是侨商的子弟。

凡有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都有中国学生会的组织。1916年加里福尼亚大学学生会会长是陈端，江苏人，是前清状元张謇的亲戚。学生会规定每年选举一次。我因为晚上要去中华学校教书，所以，很少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不少自费生也和我一样，一面读书，一面做工，没有时间参加学生会活动。但记得1915年广东遭到特大水灾，三藩市华侨踊跃捐献救灾，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也响应，广东同学大都参加此举，四出募捐，颇有成绩。1916年前后，中国学生会发起募捐买楼作为中国学生会馆。当时，在三藩市和附近各埠的华侨中间，全是讲广东话，特别是四邑土话，外省学生语言不通。所以，所有募捐工作全由广东籍学生负责。款额很快就筹足了。学生会请三藩市华商总会出面在柏克利购置和管理产业，从此，中国留学生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特别是外省留学生到了三藩市，也有个落脚点了。当时广东学生因乡亲关系容易找到住宿处所。他们也有住在学生会馆的，但会馆地方不大，人多了就住不下，广东学生就常常把自己住的房子让出

来，让外省学生住宿。原来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住在柏克利市的教堂里。那里有纲纪慎教堂和美以美教堂。教堂楼上隔出一个一个小房间出租。我到美国，就是住在纲纪慎教堂。那儿租金不贵，每星期一元。不管是信教或不信教的，星期天都得同去楼下的礼拜堂守礼拜。我住在教堂两年多，但我不信教。后来，教堂牧师要我的同乡劝我受浸洗礼。我就把西班牙利用传教士侵入加利福尼亚的历史给我的同乡说了，表明了我不愿入教的态度。同乡将此转告牧师，牧师即着令我迁出教堂。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极深，使我了解到美国教会的虚伪性。

自费留学生一般家境不都是很富裕的，所以，大多数半工半读，甚至有的自费生还要汇钱赡养家庭。官费生每年可领到900元是足够维持读书生活的，但亦有少数在暑假期间去工厂做工，有的是为了获得实践经验，也有的则为了搞点收入，接济家人。

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做工情况，有经常性和临时性两种。临时性的是指假期或周末去工作。从工作类别来说，有做家庭工、清洁工、教员、招待员、农场临工、经纪等等。做家庭工的，一清早给雇主烧好早餐，收拾房子，然后自己吃了，匆忙地带上自己的午餐上学。下课后5时左右，又到雇主家里做晚餐，打扫屋子，或洗衣烫衣。忙完这些以后再回到自己的宿舍温习功课。在柏克利的留学生很多是做家庭工的，在美东，则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工作每月所得是10元到30元不等。教书则分四种：在教会礼堂教英文的，私家教授中文的，在中华学校教学的，还有在大学里教同班同学的。这种教同班同学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如原籍台山在美出生的韩亨利，和我同住一间房子，他精于数学，在读大学第二年时，一个教授授课进度很快，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得上。同班同学就分别请他课后补课，韩亨利替同学补课每小时收费两元。还有帮教授改卷的，在教授上实验课时，在旁边管理试验设备的，管理实验室并代替教授指导学生实验的。这是研究生或高年班学生干的。报酬标准按各人的学历来区分。凡已毕业继续留

校深造的，每小时报酬是7角半，仍在读的则每小时5角。清洁工月得30元左右。在美西，中国留学生常有在暑期内（百天左右）去农场帮助收播或搞其它农务的，报酬不定。留学生到餐馆去做工，在美西的很少，在美东的却最多。一般星期六学校休息，学生放下书籍，就到餐馆去，或在餐馆厨房里帮工，或在餐馆作招待员。周末两天，餐馆顾客特别拥挤，故需加聘临工。临工每天工资仅1元，但小账多，周末往往可得10余元，在平常的日子里没有那么多。以我自己为例，一个暑假可以收入250元左右。当然，这是以芝加哥餐馆的情况而言。这样合算起来，在餐馆做工，每年可得八、九百元，所得比其它工种多，足够个人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了。在工厂做临工，每小时工资最少是3角半，一天最低工资是2元8角，技术高一些或劳动效率较高的，每天收入多至9元6角。做经纪的只赚佣金，留学生中干此行的为数最少。还有，最特别的也是极个别的是专替学校球队踢球的。恩平人岑启举是加里福尼亚大学足球队的优秀前锋，打算转学到美东去。恰好密西干大学足球队正要物色优秀选手，该校学生小团体便把岑启举邀去，条件是：岑启举转学到密西干大学要参加学校足球队，由学生小团体按月给他100元，作为岑启举替大学学生俱乐部管理电灯开关工作的报酬，其实，此项工作，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而已。

中国自费留学生多半是这样半工半读，非常勤奋。与美国学生比较，平均计算，我们的成绩要超过他们。清光绪年间在美留学的容揆读书成绩就颇著声誉。他是清政府第二次官费留美学生五人中之一。他因剪去辫子，触犯清廷刑律，不敢回国。我在芝加哥乐宴楼杂碎馆做工时，他也在那家杂碎馆里作带台（外人称作Head waiter，即高级招待员之意），因此算是和我共过事。他记忆力特强，聪慧过人，成绩出众。在校读书时，有个美国参议院议员的儿子和容揆同学，既慕容之仪表，又羡慕之才华，两人结婚了。更因容揆和外国妇女通婚，触犯了清廷大典，故毕业后没有

回国。后经中国驻美公使的推荐，充任公使馆的参赞。由于容揆才华横溢，工作卓有成效，他的名字便在美国人中间传开了。又广东人李耀邦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留校作讲师，因教学成绩卓著，随又升充教授。同校美籍教授认为李耀邦升级过快，诽议群起。但在事实面前，校长不能不力排众议维护他。韩亨利的高级微积分数学的造诣更是美国学生无一可与比拟。他毕业后，在美国海军任电气专家多年，亦多功绩。过去反动政府盲目媚美、恐美，没有合理使用留学生，造成人材的浪费和外流，实在令人痛惜之至！

（广东省政协供稿）

我随尚和玉先生学戏

郑 星 垣

郑星垣先生是尚和玉先生嫡传弟子，艺名“荣阳少主”。是我国著名票友，现居住在香港。

京剧武生艺术，俞（菊笙）、黄（月山）之后，一般崇尚杨（小楼）、尚（和玉）两派。我很荣幸，曾在尚和玉先生门下学艺。先师把着手教我，我待先师如生父。记得近五十年前，我离开北京前一日，我向先师告别，他老人家对我说：“老四（我排行第四），我可什么也没留下，全教给你啦，今日大概是咱师徒最后一面了吧？”先师悲怆之情，令我难忘。五十年来，这句话常常响起在我的耳边。我怀念先师，我感谢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及刘曾复教授，他们要我写一点纪念尚和玉先生的资料，使我有一个报效先师的机会。我要声明一点的，我在这儿说先师尚和玉先生的艺术高超，并不是意味着其他流派的艺术不好，其他流派的表演艺术都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特点，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因为我是尚和玉先生的弟子，我写本文的目的着重在于介绍先师尚和玉先生的表演艺术，供京剧演员、京剧爱好者研究参考。

拜 师

尚先生出身贫寒，一生俭朴，虽然他已目成一派的宗师，可是他待人热情，对艺术要求精益求精。他没有什么嗜好，如果说要有一点嗜好的话，那就是饭前喝一点白酒，平时抽点关东烟。他衣着朴素，冬天嘛，穿棉衣棉袄，还有件老羊皮的皮袄。夏天也是一身布衣。他平时起得很早，起来就练功，练完功吃点东西，有时就遛遛弯儿，找朋友聊天。上午是他为学生教戏的时候，有时下午也教戏。

“受一个总头吧”

我在拜尚和玉先生为师的时候，已经学了一两年武生戏，也演出过。我是经过齐如山先生介绍，才拜尚和玉先生为师的。不过齐先生告诉我：尚先生只是原则上答应，他要看我演出之后再作决定。这使我很觉得为难，因为我学的戏差不多都是杨小楼先生的路子，尚先生看了会说你既然学杨，那你就拜杨吧！所以我赶紧在两个礼拜之内，请骆连翔先生教我学了一出《金钱豹》，演给他看，尚先生这才答应收我在门下。举行拜师仪式是在当年香厂路的新丰楼，应邀出席观礼的有很多老先生和老前辈，如萧长华先生、程继先先生、郝寿臣先生、尚小云先生、金少山先生、时慧宝先生，还有本门的师兄弟，我个人在京剧界的老朋友。按照老规矩，拜完了祖师爷，向尚师叩完头之后，我还要向叔叔大爷叩头。可那天人太多了，我有点发怵。我对齐先生说：“这么多人，这头非叩晕了不可，你无论如何得帮我想想办法。”齐先生笑了，对我说：“这个看着办吧！”等我行完礼后，齐先生很巧妙地对大家说：“时间也不早了，叔叔大爷们想也饿了，这么办吧！全都请上，受一个总头吧！”

这样就免去了我叩很多头，算是把我救了。

第一课

拜师之后，我抱着很大希望到先生家去学戏。可是先师对我说：“你走个云手，拉个山膀，我看看。”我当着先生的面，走了两三个小时，回家后又练了三四个小时，如是者九天。先师才开始授我《芦花荡》，并声言每天必须拉十次云手和山膀。当时我心中确实感到不快，我六岁半登台演花脸，八岁开始练武生基本功，练了两年，云手岂能不会？不过老师既然这样吩咐了，我就照办。这样过了两年，先生对程四叔（继先）说我的云手练到家了，难以寻出超过我的。先师没有当面夸我，最多说我“还行”，后来程四叔告诉了我。我每天还是练三小时云手，前后总共练了六年多。我体会到只有在最小的地方打好基础，这样才能练好武功。学戏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最忌讳的是没学走先学跑。云手是每一个演员都会的，它简单而又容易，但往往也是更难的。云手要真正学到家，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其他如练某一样兵器，枪或刀，或大刀，或锤，每一样都要练很久，一丝不苟，才能掌握它。我虽然不是专业演员，是个票友，可我受的训练跟科班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一样挨打。先师常说：“要是大少爷，不愿挨打，就别学。”我练功之苦，甚于科班。13岁起，为了习惯穿厚底靴，我回家就把便鞋脱掉换穿厚底靴，做作业、家务操作，我都穿着厚底靴，直至上床才脱下，每天要穿六小时的厚底靴，一直穿到17岁。一双靴子只穿四五个月就穿坏了，再换新的，连靴店的人都觉得奇怪，一般演员练功靴可用两三年，我只用四五个月，因为我是把它当作便鞋穿的。后来我每天早晨到戏院台上练功，先陪同练单刀与枪，继之扎靠练大刀、大枪、把子，之后再练整出戏。如《铁笼山》我练了近三年，每晨练一遍，从头演到底。先师曾打趣跟我说：“老四，你《铁笼山》比我演出多得多啦，你一练就是三年，一年三百六十次，三年连续上演一千多次，比我演得还多，你的才能有多大呀！”言毕哈哈大笑。先师的音容笑貌，一想起来，犹在眼前，但

先师西归已经30多年了，悲哉！

在台上学

刚才说到跟随先师学艺，从云手、山膀学起，再学短打、箭衣、靠背，一直到学整出戏，循序渐进。学会了戏能够演出了，演出之前天天练，演完了还要再练。演出时先由配角演起，然后一步步往上升，由三流角色演到二流角色，一直到先师满意了，认为可由我主演了，才让我主演。并不因为我是票友，学会了一出戏，就可以随便演出，不管演出效果如何。这种先演配角后演主角的方法就是为了使自已主演该戏时对主配角的关系了如指掌。这样做事半功倍，对演员主演一戏有很大帮助。这是老先生们教学的一种方法。我演出的时候，先师总来看，看完后总到后台来，告诉我什么地方还待改善，什么地方还得再练，同时告诉我学无止境，学到老，练到老。他本身就是这样做的。他已经成为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可是他每天练功，每天练几场戏，几十年不断，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演戏的时候，我也常到后台在旁边看，受益匪浅。有很多自己演出时没有意会到的问题都能意会到。举个很小的例子，演员扎靠站着的时候，一般总是两手叉着腰。我总觉得我用两手叉着腰在台上站着的时候不如先师站着好看。我就向先师请教：你这样站着，这么好看，什么道理呢？原来先师站着的时候不是两手叉着腰，而是两手在靠里轻轻地托着肚子。很多人忽略这点小技巧。其实叉着腰站在那儿跟两手轻轻地端着肚子站在那儿的确不一样，后者好看得多。这种体会只有在台上看才能学得到。

尚先生谈戏

刚才谈到我学戏也挨打，可是先师对我还是有点偏爱，练完功后赶上下午总要留我在家吃饭。饭很简单，有时吃烙饼，有时

吃面条，他喝一点酒。这时，他常常跟我说一点老前辈演戏的情况、老前辈的专长，还有他本人演戏的体会。虽然是闲聊，可对我这后辈学生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不要描红模子

先师在教戏时常常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也有各自的缺点。演戏要尽量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比如说身材高的人要亮低相，身材矮小的人要亮高相。为什么呢？因为他身材高大，再亮高相，就有点过了。相反，身材矮小的人亮低相，就显得没有了。所以每一个演员要注意自己的身材和体型。我身材远矮于先师，先师教我亮相时就让我亮高相，可以显得威武些。我们学某一个老师，就要学他的长处，不能象描红模子似的去描。往往演员有这毛病，学，就死学，描红模子。但是杨小楼先生、尚和玉先生都是宗俞（菊笙）的，就是因为加进去了自己的特点，所以变化成为新的流派。梅兰芳先生也是拜陈德霖老夫子为师，可是梅先生发挥了自己的长处，所以成为梅派的创始人。余叔岩先生宗谭，可是余叔岩先生也加进去自己的长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老生里的余派。假如前面说的几位前辈在那里描红模子，那末到今天，就没有杨派，也没有尚派，也没有梅派，也没有余派。我现在这样说，并不是说学老师可以随意改动老师所教的，问题是要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先师常说“你学我，死学、学到死，你不如我。可是，你学我，加入了你自己的长处，你就可能青出于蓝，你比我好。”这个话对我说过无数次。后来我发觉这些话全是真理。

演员要做到控制台上的气氛，把握观众的情绪

演员要演好一出戏，不容易，唱念做打，四功都好，当然是难。可是更难的是一个演员怎样做到控制台上的气氛，把握观众

的情绪，使观众也投入到戏里来，这是相当难的。要做到使观众投入到戏里来，演员就要掌握剧中人的情况、背景、时间、地点和环境，演起来才能传神，从而使观众和演员成为一体。我们常说的扮谁象谁。比如说岳飞，谁都没有见过岳飞，怎能知道你演出来的就是岳飞呢！这就要靠你平时的修养，演岳飞，你就要多看一些关于岳飞的书籍，熟悉岳飞的故事，使你扮演的岳飞尽量符合岳飞的形象。往往有的演员演岳飞也好，演高宠也好，甚至勾脸演姜维或金钱豹也好，观众一看，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一上台，观众就说你来了，而不是说岳飞来了，高宠来了。这样，演员做不到控制台上的气氛，把握观众的情绪，台下就松散得很，观众说话的也有，吃东西、嗑瓜子的也有，这种演出是失败的。演员要做到控制台上的气氛，把握观众的情绪，虽然难，但要做一个好演员，这一点却是必须要做到的。

技术与艺术是不同的

尚先生常对我说，演戏要讲究美。每一个行当，生、旦、净、丑，都有他本行当应有的美。这个美，并不是说扮相的美，而是说身上动作美。生，老生、武生、小生，都有他本行当身上动作应有的美；旦，青衣、花旦、武旦，也都有他本行当身上动作应有的美；甚至于丑，也有他本行当身上动作应有的美；净也是一样。不能理解成为美一定是青衣、花旦才有美。每一个行当都应该有他艺术上的美。因为京剧是综合各方面艺术形成的一门艺术，所以美感是不少的。艺术与技术是不同的。艺术之中有技术。文的方面，如嗓子运用得好，唱得好，就是艺术。武的，武打是技术，但它经过多少演员琢磨、加工、不断改进，就有了舞台艺术的美。原样搬到舞台上不一定美。艺术和技术的分野就在这里。练技术只要刻苦耐劳，有几年，甚至十年八年，总能有成，可是要达到艺术之美，就大不一样了。艺无止境。有些老前辈，演一辈子的戏，但就是偏重技术，缺点艺术。这当然与许多

因素有关。可是既然身为演员，就要不断探索研究怎样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当一个全才的演员。

演自己对路子的戏

京戏的动作，虽然有些地方大同小异，可是每一出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演员表演它时不能裹乱着演，每出戏都应保留它的特点，不能胡乱往上加东西。因此，很多名演员形成了他自己风格的戏。比如杨小楼先生有适合他自己路子的戏，其他人演的好戏，他不演。还有一位老前辈马德成先生也是这样。他只演对自己合适的戏，不演别人的戏。这样各人都有自己对路子的戏，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流派。这里忌讳的是你演《战马超》，我也演《战马超》，全是《战马超》，或者是你演《挑滑车》，我也演《挑滑车》，全是《挑滑车》。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各流派都能演《挑滑车》这出戏，但每一流派的演法是不同的。先师还有一出《窃兵符》，四本，演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只有先师会这出戏。至于《铁笼山》一戏，先师演时很少在前边加戏。杨小楼先生演《铁笼山》时，前面贴《九战中原》，有司马带令、姜维探营等内容。老戏每个流派都演，但有区别，各有特长，互不拆台。这种戏德是值得我们后辈效法的。

尚先生的几出戏

《铁笼山》

《铁笼山》是先师成名杰作之一。先师演《铁笼山》有他自己的特色。

首先在服装方面，“起霸观星”一场，一般人演时不戴“慈姑叶”，先师演时戴“慈姑叶”。虽然是个小区别，可是演起来吃功。因为姜维戴“千斤”，四个坎背旗飘着，所以戴“慈姑叶”表演时难度大一些。

其次在动作方面，一般人演到“打八件”一场，都是七星刀上膀子，然后一磕，交给女兵。而先师演起来，只用一锣。刀（就是七星刀）、鞭、“钓鱼儿”、走甩发，这几个动作在一锣里完全走完，难度比较大一点。“起霸”最后一指“踩泥儿”的时候，一般人表演一指“踩泥儿”，飞脚，“踩泥儿”；先师却多了个翻身，再来个三百六十度飞脚，“踩泥儿”，亮住。再有，最后一场马趟子，在将要下场的时候，一般人表演是跨腿、踢腿、飞脚、“踩泥儿”。先师表演时跨腿、踢腿、飞脚、鬃子落地、挂“踹鸭儿”，然后“踩泥儿”。在一个“四击头”里（只有四下锣）走那么多动作，脚下还穿着厚底靴，这是比较吃力的。还可以说一点的是，“八件”那场有踢刀。这踢刀跟武旦的表演不一样，踢刀往左边去，这刀转着走。《铁笼山》里还有两腿干拔。第一腿是在“起霸观星”回头望月之后，斜踹一个小垫步，然后干拔一腿踢到太阳穴那么高。还有一腿是在末一场马趟子，临下场时拔一腿，也是踢到太阳穴。这种表演一般武生戏里很少见到。

再有，《铁笼山》一剧还应恰如其分地表演出姜维的性格。头一场，“起霸观星”，姜维带着45万铁甲兄弟，头一仗就把司马师围困在铁笼涧，他踌躇满志。但姜维又是个儒将，他受过诸葛亮的传授，熟悉天文地理，所以“起霸观星”的时候，看出满天杀气，觉得虽已初步获胜，但仍然面临一场硬仗，心情有些沉重，又觉得仍有取胜的把握。“起霸观星”时，姜维应该表现出这种心情。后来司马师请来了西羌老大王迷当帮忙。迷当原来和姜维站在一边，现在反目，变成敌人，站在司马师一边。这时姜维要表现出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他和司马师力战，最后那场马趟子，表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纵马跳过铁笼涧。45万铁甲兵溃不成军。马岱劝姜维回去，姜维觉得无路可走，也只有回去。这时姜维急得吐了血。演员在台上虽然只有一点动作表示，但是要演得悲愤不已。这也是把握观众情绪的一种方法。演

员要想法演得入扣，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要是演得不入扣，观众不知道演员在台上的动作意味着什么。所以演员要掌握有关剧中人的境遇、心情，才能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真的剧中人。

《挑滑车》

《挑滑车》是先师的拿手好戏之一。先师演的《挑滑车》有他特殊的地方。在最后一场挑车的时候，打腿大翻身是六个，不是三个，三个正，三个反，然后下岔。下岔也与其他流派不一样，不是三个岔都一个式样的一个腿在前面岔着，而是左右岔，左右左，然后跪倒。先师演到挑车扔马鞭子的时候，不管他演多少次，马鞭子落地总是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现在演《挑滑车》的演到扔马鞭子的时候总是往后台扔，先师那点功夫已经没人继承了。常有人（主要是老观众）问我：“你学过《挑滑车》没有？你扔马鞭子时是不是每次都扔在那儿？”当然我没法跟老师比，但先师总告诉我应该往那儿扔，我扔的时候，大致马鞭子落地的方向、地点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我见过有的演员演到《挑滑车》里挑车的时候加上“倒扎虎”的动作。当年很多老先生，尤其是先师是没有这个动作的。因为高宠挑滑车时人困马乏，不是人仰马倒，所以不适合用这个动作。当年的老先生老前辈每一位基本功都非常好，不是不能走“倒扎虎”，而是考虑到不应该用这个动作。演员要为艺术演戏，不是只为了取悦观众，随便往戏里加东西。

先师的《挑滑车》与其他演员演的《挑滑车》最大的不同地方是“起霸”。一般人的“起霸”，到拉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八大呛”，然后“四击头”，踢腿亮相。先师的“起霸”没有“八大呛”，拉回来，“答”就跨腿，“台”已经出腿。这样的演法不一般。还有，每次亮住，锤锣落地的时候，先师总是带挂龙，同时是一起落在底锤上，而不是站稳了脚，用身子着地。我觉得这是先师与其他演员演出不一样的地方。

《挑滑车》里，先师演到大枪下场，背花、上膀子以后，使腿底下过，在腿上有“串腕儿”，然后左手接“串腕儿”。很多人演到这儿时都是上膀子就交枪就亮相，唯独先师上膀子，腿底下过大枪，然后“串腕儿”。这是他与别人表演不同的地方。

道白方面，先师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当年先师对我说金兀术不能称“孤”。为什么呢？因为金兀术一上台已经说了“奉了狼主之命”或者“奉了老王之命，统领人马，夺取宋室天下。”老王既然在，他只是大金邦四太子，不能称“孤”。过去念：“依孤相劝，不若归顺孤家。”这不符合当时兀术的身份，先生主张改。虽然兀术不是先师演的角色，但是他改成“依咱相劝，不若归顺金邦”。这样念白，符合兀术四太子的身份。这种小地方的更动，使剧情符合每个人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从前老先生说，戏要粗枝大叶地演固然可以，细致地演也可以，其中就有这么一点点的分野。有些人说，好角同普通角，所差本来不多，他们的舞台动作都经过基本训练，也可以说差不多。但就在这些普通地方，好角同普通角就显出了不同，这个不同就说明了是粗枝大叶地演戏呢还是细致地演戏呢？其中很主要的一点是演员演戏要切合剧中人的身份，注意研究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剧情。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再举高宠为例。“闹帐”一场，演员要把高宠王爷身份、自傲的态度深刻地表演出来：没受到调遣，心怀不满，想辞官不干。碰见金兀术的时候，一枪把金兀术的耳环子扎下来，套在大枪上；又要表现出你金兀术也不过如此，一副藐视兀术的样子。到了“挑车”时候，要表现出人困马乏，可还是雄心万丈，最后终于战死沙场。这样才符合高宠这员勇将的身份。

《艳阳楼》

《艳阳楼》也是先师一出成名的戏。在这出戏里，其他演员

表演时戴扎巾，穿箭衣，穿靴子。先师表演时也是穿箭衣，但外边却穿开氅。为什么穿开氅呢？因为高登是高俅的儿子，高俅是当时的太尉，是世袭公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高势大，所以穿开氅，衬托出有威风。演到高登和花逢春等开打一场，一般流派演高登都是扎套子、戴小袖，可是先师尚和玉先生不扎套子，不戴小袖。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高登已经酒醉，半夜，花逢春、呼延豹、秦仁等到他家去救许佩珠时，他从睡梦中惊醒，和花逢春等打起来，所以来不及戴小袖、结套子。动作方面，第一场的马趟子动作比较多，有三腿，然后踢“朝天蹬”。还有，五个转身，一般人演时是三个转身。这出戏第一场的动作就比较多，以后每一场都加多，到戏演完的时候就很吃力了。同时一般人表演时不大用髯口上膀子的动作，先师是用髯口上膀子的动作的。还有使用扇子的问题，《艳阳楼》中的高登一上场就拿扇子。这扇子不是拿在手里扇风或插在靴子里做样子，它是有很多戏可以做的。扇子举得高或低，左或右，甚至到上马的时候怎样举，扇子的颤动要跟锣鼓相配合，这里是有很多戏可以做的。再有“扎”，当年先师的扎是很厚很长的，同时戴着“慈姑叶”，旁边还有朵花。扎扔上去，转空掉下来正在膀子上，挂在膀背上。这些虽然是小地方，练起来是很吃力的。《艳阳楼》中开打的时候跟别的戏不同的地方是“串腕儿”多。普通串法是伸平了串，先师“串腕儿”时手背向上伸，伸到什么地方呢？在脑袋向上在那儿转。同是“串腕儿”，可是功就不一样。先师演《艳阳楼》演到抢许佩珠时，用飞脚上马的动作。这是很对的。贾斯文见着高登，高登问贾斯文：“可有美貌的女子？”贾斯文说：“多着呐！”高登接着说：“带马！带马！”用的是飞脚上马的动作。因为高登是酒色之徒，他一听说有漂亮的女人，连上马都顾不得了，窜了上去。这样表演也贴题。

高登这个角色要表演出他仗势欺人的恶霸本色。第一场高登一出场，演员就要表演出他那种有权有势，不可一世的姿态。在

抢许佩珠的时候，一个老苍头，一个老旦上去拦阻。在高登眼里这些人只是小蚂蚁一样，根本不放在他眼里。抢走了许佩珠以后，碰见了花逢春、呼延豹、秦仁，他们打抱不平，要来搭救许佩珠。高登又觉得自己有权有势，抢个把妇女，算得了什么？他本人也会武艺，不把这几个人放在心上。这样表演，才能体现出高登穷凶极恶的恶霸本质。先师在教我们演这出戏时，就告诉我们思想上应该有这种感觉，才能演好这个角色。

《长坂坡》

先师演《长坂坡》里赵云，有特点，就是有些场合不威武，这是有道理的。赵云是员名将，本来应该很威武的，可是他面对着主公刘备、两位主母，不能“威武”。尤其是见甘夫人一场，为糜夫人“掩井”一场，他不能抬头，不能用两眼直盯盯地盯住主母。先师是这样演，杨小楼先生也是这样演的。有的演员认为这样演没有戏，赵云很威武，应该注视着主母。先师和杨小楼先生却认为不能这样演。因为当年的臣下对主公和主母礼节很严，不能瞪着眼看个不休。不用说在汉朝是这样，就是在现在，下级这样对领导也不合适。这样的分析应该说是合理的。再说“掩井”一场，很多人演“抓帔”的动作。糜夫人要跳井，赵云过去抓，没抓着，把帔抓下来了。本来，这样演是可以的。但是在汉朝，还是那句话，臣下对主母，男对女，男女授受不亲，看见她要跳井，只能干着急，他不敢抓。所以先师演《长坂坡》时没有“抓帔”。他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再有，念白方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其他演员演到“得剑”时，都念“青虹剑”，先师念“青罡剑”。“得剑”以后，下场时有个扔“钓鱼儿”的动作，左手持枪，右手拿剑，从左膀子底下过。先扔“钓鱼儿”，然后转身，正好转过来，剑掉下来，接住，“蹉泥儿”，由小边下。一般演员演时不扔这个“钓鱼儿”，但先师是这样演的。

《四平山》

《四平山》也是先师一出成名的戏。这里李元霸使双锤。一般演员演到李元霸下场时是右手抡“钓鱼儿”，左手拿锤接住。这个锤“钓鱼儿”下来顶在另一锤上，顶很长时间，然后再颠回来。先师教我时是右手拿锤，左手抡“钓鱼儿”，锤下来时用左手顶住，然后右手锤跟着扔两个“撇挑”，左手的锤再倒向右手，转身儿，左手接锤，把右手的锤夹在膀子底下。这个表演法，好象他人没有。锤是一头沉的，扔“钓鱼儿”很容易，扔“撇挑”呢？就得有点分寸了。一锤扔两个“撇挑”，更不容易。

先师演李元霸演出那种第一条好汉、不可一世的心情。他是李渊的儿子，初生之犊不怕虎，目中无人。儿出李元霸的戏中，《金殿比武》和宇文成都比武，根本不把宇文成都放在眼里。《四平山》战裴元庆，起初也看不起裴元庆，后来打了裴元庆三锤，发现裴元庆有本事，才产生了爱将的心理。到了《惜惺惺》时，遇见阿麻怪兽，也是一员勇将，李元霸非常喜欢他，所以戏的名字就叫《惜惺惺》。先师演李元霸时，突出地演出了他的性格。扮谁象谁，使观众喜欢看。

其 他

这里我再说一下先师尚和玉先生演戏的几个动作。首先说“蹯鸭儿”。“蹯鸭儿”分“平蹯”与“斜蹯”。有的人表演是站稳以后，把脚抬起来，身子往后仰。先师说“鸭儿”就是脚，“蹯”就是把脚蹯出去，不能演成把脚抬起来，身子往后一仰。先师演“蹯鸭儿”时是云手转身，“起范儿”，“蹯泥儿”，蹯是一个劲儿，脚蹯出去，身子躺平了，四肢同时搭到地，这是“平蹯”。“斜蹯”也是云手转身，“起范儿”，“蹯泥儿”斜蹯，也是一个劲儿，这比站稳了蹯出去难度更要高，因为“蹯泥儿”有的时候已经站不稳了，再要“蹯鸭儿”蹯稳了，演员必须有很扎实

的基本功，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再说岔。武生演员都有岔。摔岔，一般都是摔直岔。桌岔，下桌子，也是直岔。直岔就是一个腿向前，一条腿向后，前面那条腿向着观众，后面那条腿向着后幕。摔岔之中，横岔比直岔难得多，就是两条腿分到左右，并不是前后。桌岔由桌子下地时用横岔，也就更难。先师演到劈岔时都是不含糊的。

再说大翻身。武行又叫“狗撒尿”，多数人演都是走正的。老先生们知道京剧所有的动作都是有正必有反。这个大翻身也是走完了正的应该走反的。比如说“望门”这个动作，没有望一边儿的，望完这边必望那边，望完大边必望小边。先师在教戏时都向我们交待了这些。

以上所说就是我对先师尚和玉先生的点滴回忆。我学得不好，不能全部继承先师的精湛艺术。所述只能供京剧界同行以及京剧爱好者参考。再重申一点，因为我学的是尚派武生艺术，所说当然是介绍尚派表演艺术。各种流派都有不同的表演程式，各有自己的优点，都应发扬光大，以丰富发展我国的京剧艺术。

叶祖孚、孟菁苇整理
(北京市政协供稿)

荷里活寻梦录

——银坛生涯漫忆

关文清



关文清

作者关文清，广东人，著名导演，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岁就读于美国，未几，即往好莱坞（文中译为“荷里活”）学习电影。历尽艰辛，孜孜以求，终于学成。1920年归国，为中国的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先生耆年忆旧，在香港撰成《中国银坛外史》，这里节选的是其中《荷里活寻梦录》的主要章节。

内容是他当年在美国学习电影艺术的曲折经历。字里行间流露着他那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和艰苦励翼的雄心大志。

往荷里活^①去

我在美国学电影的动机，第一是因为我的哥哥于1914年在三

^① 通译“好莱坞”。本文译名多为早期译音，一般不再做注释。

藩市逝世，使我无法继续求学，而我又愿做厨工或洗衣工（那时在美国谋生的中国人多数是做这两种行业的），终身难得超脱，因而决心要学一门技艺以便回祖国后，大者可为国家振兴工业，小者也可以谋取一己的生活。那时电影是新兴的事业，具有潜移默化的艺术功能，用来教育民众是最好的工具。第二是因受到玛利璧福的演技所吸引。我看了她主演的《金履缘》后，对她的成就非常羡慕。她原是纽约一间话剧院Belasso Theater的童星，那时她只十五六岁，饰仙杜里娜(Cinderella)这个角色。这个故事是写一个爵绅丧妻后遗下一个孤女，他续娶了一个寡妇。这寡妇带了两个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来，鸠居鹊巢，对仙杜里娜备极虐待。当爵绅外出的时候，就迫仙杜里娜替她的两个女儿擦鞋洗衫和做家里一切工作，进餐时要仙杜里娜旁立侍候，等到她们饱食之后，才给一点儿残羹冷饭，让她在厨房独自进食。晚上睡在一间布满蜘蛛网的草房角落，与老鼠、蟑螂为伴。

我当时看到这里便不禁泪下，因为我感到我的环境同她一样凄凉和困苦。那时我是半工读的，在一两人家里当打杂。早晨6时便起床洒扫和为主人准备早餐，8时侍候老板夫妇和他们的子女们受用，等到他们全家吃罢，我才收拾残羹回厨房自用，等到洗好了碗碟才得上学。到下午放学回来就要准备晚餐，一直做到对上11时始得上床休息。星期六要洗全家大小的衣服，星期日到全屋大扫除和熨衣服。在这种处境下而看到这样的剧情，怎不叫我洒下同情的热泪呢！从此我变成一个玛利璧福的忠实影迷。她的情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深处，凡是她主演的片子，我都要看两三次，甚至梦中也时常见到她。有一晚梦见我和她身穿古罗马戎装在皇宫里参加舞会。跳完一次舞便携手步出露台。天上月明星稀，台外园林静寂。她解下腰边宝剑赠我，我接过手正要低首吻她的手时忽而音乐大作，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原来已是清晨6时，闹钟在催我起床。我按止了闹钟，闭目回味梦境，她那瓜子型的脸孔，卷筒型的金发，动人的剪水双瞳，甜蜜的梨

窝，实在太可爱了。我不但是个影迷，简直已成了个情痴，（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十分愧对，但在人们青年的时候，哪个能免于“钟情”呢？）我决心找机会见她一面，我要和她在一起工作。她无意中鼓舞了我参加电影工作，决定了我的前进的路向。

到了学期结束，我向老板辞了工作，拿着最后一个月的薪金15元买了一张12元的二等车票，袋中只剩下3元，便大胆地向荷里活进发，寻求我梦想已久的新生活。

到了罗省（Los Angeles）以后，先觅一间下等旅馆住下。这间旅馆是日本人开的，房租每月由2角5到1元，住客多数是黄种人和黑种人。因为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是歧视的，中上级酒店多不肯接待，且收费奇昂，不是有色人种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有色人种多数是做卑贱的工作：黑人倒垃圾、修路、开矿和扫街；日人种瓜菜、料理花园、捕鱼和当家庭侍仆，中国人则开餐馆、洗衣馆、卖瓜菜和当家庭厨役。每月最高薪水不超过200元。上层的职业绝少雇用有色人种的。

“到纽约去找经理吧！”

荷里活离罗省约5英里，有电车可通，车费2角。在未到罗省前，我已从电影杂志上抄下各制片厂的地址，从中选择较近的，就在荷里活道（Hollywood Boulevard）和日落道（Sunset Boulevard）交叉处下车。这里有一片厂（Vitagraph Studio）。这厂在一块空地上（原来是麦田）搭了几间小木屋作办事处和化妆室。离这里不远又修了一条象乡下市镇的街路，两边以木板架设的商店，都是有前无后的，看来简陋极了。他们正在这条街上拍戏。因是露天，又没有围墙拦阻，我便有机会第一次看到拍戏……

我看了许久，才到办事处找经理，岂料办事处阒无一人，正

想转身走出，忽有一青年跑进来淘气地问我：“噢，你要找谁？”
“要找经理。”我说。“到纽约去找吧。”“请问你们这里请人做工吗？”我客气地问。“噢！我们不需要厨子，也不用洗衣的。”说罢，高傲地走了进去。他分明见我是个中国人，只配做煮饭和洗衣的工作，我受了他这样的鄙视，实在心有不甘，但不甘又有什么办法呢？惟有忍气吞声地离开那个片场。

这是我进入社会谋事第一次碰上的钉子。被人藐视，一时很觉心灰意冷，但在我打算步行到荷里活道乘车去的路上，心里想：原来电影圈的人，是这样鄙视东亚人的。照那个青年的外形看来，绝不象个高级职员，料他只不过是个杂役罢了，因为所有高级职员都在外面拍片，而经理又去了纽约，“塘中无鱼虾作主”，他乘机作威作福罢了。我不能被一个没有见识的人，三言两语的冲撞就把自己所立下的志愿打消。我要鼓起勇气，继续奋斗下去！电影是艺术，而真正的艺术界是不会鄙视我的。

选角办事处

怀着这个念头，我决定往别家片场碰碰运气。从这里乘电车往别家片场，最近的也有两英里多。我初到此地，未能辨别街道的方向，在电车站便请问一位在那里候车的年约30余岁的肥胖的妇人，往拉斯基片场(Lasky Studio)乘哪一号车合适。她说她也是往该片场的，可跟她一起去。我见她的态度很和善，心里十分诧异，因为刚才受那个恶少年欺侮过，和这里的白种人打交道，已存了多少戒心，现在却得到这个女人善意的答话，不禁又使我恢复了信心！认为白人当中也有尊重亚洲人的。在车上，她问我是否往该片场拍戏。我告诉她：我初到此地，要投身电影界。她问我有没有照片。我答没有。她说如果要想当演员，一定要先向各片场登记，填写姓名、年龄、履历、地址和缴交照片一张或数张，有各款化装照片的更好。我说想求一份长工，什么工

作都好，以便学习。她说所有片场职工，都是技术人员，若是初学，很难获选。听了这番话，我的勇气又消失大半了。原因是我既没有照片，也没有钱去映，且是初学，这样看来我的计划不是要落空了吗？

到了拉斯基片场，只见很多男女站在门外，同行的妇人叫我跟她入内，直到一间用木板隔成的办事处，门上标着“选角办事处”（Casting Office）的牌子。坐在办公桌旁的男子，和肥婆亲热地打招呼，说正想派人找她。“威廉德美”的片子今天需要她演出，叫她赶快化装。那肥婆喜形于色，并匆忙地介绍我和那男子认识，便往化装室去了。原来这男子是选角负责人（Casting Director），所有临时演员和特约演员，都是由他选用的。我对他说明来意，他便叫他的助手帮我填写登记表，可是我没有照片。他嘱我改天交来，并说等有适合我演的角色时，便通知我。

那个选角先生随即带了助手，拿着一张名单到门外去，向着站在门外的男女逐个注视一番，便指出当选者。他的助手跟着每人发一张凭证，并把那些人的姓名登记在名单上。原来这是在选明天所需的“临记”，这里每天都有许多男女来候工的，因为这种工作不十分劳苦，也不需要经验。如果被选上，每天可得三元，并有一份午餐，包括三文治两件、西饼两件、牛奶一支、生果一枚。如果做到有些经验，一旦被导演赏识，便可一跃而成为特约演员，每天就可以赚到由10元至50元不等。那个肥婆就是特约演员，因她肥胖且外貌很甜，故此做了不久，便逐渐走红了。

早期的美国电影事业

我是在1915年由三藩市到荷里活的。那时的电影业正在萌芽阶段，一般投机商人，已在各地设厂，有如雨后春笋。但资本较雄厚的公司，大部分设在美东各大城市，如纽约和芝加哥等地，在荷里活设厂只是较小型的。因为纽约是美国的经济中心，所有

的大工厂都想在其邻近谋发展；其次，美国的文化和技术人材，也是集中在纽约，电影所需用的人材，如编剧、导演、布景、摄影和演员在那里征聘，也比较容易。不过美东一带的天气，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而且人烟稠密，拍摄外景困难特多，故各公司所拍的影片，多注重内景。那时还没有水银灯，摄影仍靠日光，阴雨和早晚都不能开拍，工作时间很短，所用演员多由舞台的话剧或游艺班聘来的二三流人物，而有名气的舞台明星，多数不肯降格就聘。那时的电影还是杂牌娱乐品，未登艺术的“大雅之堂”，摄制工作又受天气限制，制片时间被拖长，成本也随之而加重起来。这就使美东电影业的发展有所限制。

至于荷里活，那时只是罗省郊外的一小镇，荷里活道（Hollywood Boulevard）只有三数十间小商店，环近都是柠檬园、橙园和荒地。各制片厂就在这些果园和菜地上用松板围了三数万尺地，建筑一个百余尺阔一尺高的木台，没有上盖。用铁线串着一排排的白洋布来遮蔽日光，这些布排是活动的，随着摄制的需要而拉开或扯拢，正如没有电灯照明时的照相馆一样，需用侧光时则利用白布在布景外借阳光反射进去，需用较强的阳光或月光从窗口或门口射入时，则用大照身镜反射。

所制的影片多数是一本至三本，情节很简单，一般没有剧本，只由导演写了本事和一份分场表，便可开拍。所用演员都是新手，薪酬甚微薄，故事的取材也很狭窄，不外西部片和胡闹的滑稽片。因为荷里活的天气好，一年四季不冷不热，天气晴朗的时间多，下雨的时间少，没有烟霞阴雾的影响，而且附近百里内有高山、有森林、有沙漠、有河流、有海洋、有农庄，是拍摄外景最理想的地方。如西部片描写欧洲殖民到美洲后的斗争过程，这类影片可以完全不用布景，演员在农庄及山林间互相追逐，便可以拍成。只要摄制的画面清楚，打斗紧张，便算得上一部好片了。

至于胡闹的滑稽片也很少用布景，在公园或街巷中，便可以

拍出许多引人发笑的镜头。

那时电影院还很少，即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亦不过三两间而已。一场戏约在一个钟头左右就可演完，其中主要片约三本，辅片两本（普通是一本谐片，一本西部片或风景片）合共五本。票价是首轮院2至4角，二轮院由5仙至2角。放映时间约由正午12时起至晚上11时止的连环场，观众可以随时买票入座，离场迟早，悉听尊便。此种连环场制度，美国至今仍因循如故。

寄食“唐人街”

连日往各片场探问工作，花去车费不少，因各片场散布各处，彼此相距甚远，步行费时误事，至此，我袋里只剩下1元4角，若再乘车，明天的膳宿便成问题了。以经过的情形看来，电影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得到的，目前要立刻解决的，便是栖身之所。

在乘车回旅店的时候，我想起了唐人街来，为什么不到唐人街去，看看有没有亲人在那里呢？在外埠同姓兄弟不管认识与否，见面总是亲切的，兄弟间互相帮助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我问车上的售票员往唐人街该在哪里下车。经他指点后我便下车向唐人街走去。

罗省的唐人街约有六七十间铺户，除了四间餐馆是做西人生意之外，其余的便是药材、粮食和杂货商店，都是做中国人生意的，其中有一些铺户不是靠做店面买卖来维持的，铺面上只摆些杂物，内进则设有睡床数张供客留宿之用。如有兄弟失业，便招待在这里食宿，收费低廉；如果没有现钱，可以挂账，待找到工作然后清还。每间商店都可向政府注册，填报十个八个股东，将来该股东回中国时可以向移民局领取“回头纸”（即回美护照）。因此象这一类姓氏团体的组织在海外实有莫大的互助作用。

我到了唐人街，便找寻关姓的铺户，得一老侨胞带我到一间名叫“广聚隆”的杂货店去，和掌柜的互通姓名，才知道他是我邻村的人，我说出父亲姓名，他也认识。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

我告诉他是从大埠来这里寻找工作的。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说住在旅店，他说住在旅店是不经济的，不如搬来这里住，一来可以节省些钱，二来可以和在这里出入的兄弟多见面，以便托人介绍工作。我虽然不很愿意，但在一贫如洗的时候，不得不“士急马行田”了。我谢了他的盛情，次日就搬到“广聚隆”来。

不过吃住问题虽然暂时获得解决，但袋里只剩数角，怎能够往各片场活动呢？不但没有钱照相，甚至连来往的车费也成问题，难道我学电影的志愿就此幻灭，而到头来还是象其他的侨胞一样当厨工或洗衣的工作吗？但当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寐的时候，想起了我国“世上无难事，人心自不坚”的格言，我的意志又坚强起来了。目前的困难，只是欠缺生活费，不如暂时找份其他工作，做一两个月，积蓄一百数十元，足以维持三几个月的生活费后再往各片场碰机会。主意既定，内心的忧虑顿觉一扫而空，于朦胧中睡着了。

次日，买了一张西报，注意招聘广告，但所有要招聘的必须要具有专门技术。我没有专门技术，无法报聘，只好往各荐人馆填写求工作志愿书，并留下住址，各馆主都说待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再行通知。这样一连等了几几天，消息仍是杳然。我心里十分惶急。一天，有一个兄弟，名叫“头厨耀”的，到“广聚隆”来，对掌柜说，他接了一份大酒店的厨房包工，要请一个二手厨工和一个洗盘碗的来配合。二手厨工月薪100元，洗盘碗的月薪60元。那掌柜就介绍我去洗盘碗，另介绍一个兄弟去做二手厨工。那酒店在距罗省约50英里的蒙罗山上。这蒙罗山是罗省附近最高的山，山顶常年积雪，夏天有许多人到那里去避暑，冬天也有许多游客到那里赏雪。酒店建在距离山顶不远的斜坡上，有缆车可达。

在大酒店切马铃薯

由火车站到蒙罗山脚，还有8里路程，须乘马车才能抵达。从

山脚转乘缆车上山时已近薄暮，但见乌云蔽天，远处雪峰擎天，若隐若现。车行甚慢，一路上松林石壁，瀑布流泉，车行越高，温度越降，及至半山，已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忽而一阵狂风过处，窗外白雪纷飞，天山一色，此情此景，宛如韩愈被贬潮阳，路过蓝关时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景况。由罗省起程时，天气甚暖，故我们身上只穿秋绒衣服，所有寒衣都收藏在行李箱内，而行李还留在山脚缆车站内，待尾车才能运到。这时我们已冻至如置身雪窖中，全身颤抖，牙齿轧轧响个不停，及到达酒店门前，两足已僵硬不听使唤，拚命用手按摩了许久，始能勉强下车，这已是入夜9时了。管家妇带我们到工人住所，环炉取暖，并有侍女送食物来。饭后始恢复元气。

“头厨耀”问管家妇近日酒店生意可好。管家告诉他，过去两月生意很淡，但现在已接近旺月，而且已经下雪，预料由明天起，当有许多游客前来赏雪，生意当趋兴旺。原来那时南加省的白种居民多是从东方迁来的，因为这里天气好，地皮便宜，故很多东部富户迁来落籍。由于他们的故乡大多数一到9月便下雪，而圣诞节更是下雪的时节，他们南迁后久不见雪景，未免有故乡的怀念，所谓新居虽好，旧地难忘，故每闻蒙罗山下雪，便挈妇将雏来此重温冬季的风光。由此可见，人人对于故乡都有莫名其妙的眷恋之感的。

是晚在睡觉前，管家领我们到厨房和货仓指点一切，然后“头厨耀”又向我和二手吩咐各人应做的工作。头厨负责订出每日菜色，分配肉类和制面包饼食；二手掌理炉头，所有煮炒焗煎，都是归他操作；我除洗盘碗外须洗涤蔬菜，和刨马铃薯。我的工作时间最长，每天早上5时起床，即往厨房生煤炉火，把隔夜切好的马铃薯片或条，用猪油炸熟。二手在6时起床，那时炉灶已够旺热，他把面包和饼食焗好。7时头厨到场，同时餐厅开始营业，顾客陆续到来。早餐时间是由7时至10时，午餐时间由12时至3时，晚餐时间由6时至9时。头厨10时便可放工。二手则

在11时休息。而我在洗完盘碗以后还要洗涤瓜菜，切马铃薯和洋葱头等，每到深夜12时始克上床就寝。在切洋葱头的时候，往往被葱头的辛辣气液射入眼鼻，弄得涕泗交流，着实难顶，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苦差；况兼我在南方长大，不习惯这么寒冷的气候，加以睡眠不足，做了10余天便染了头痛症。但责任所在，不能不勉强支撑着，捱满一个月，就辞掉工作回到罗省来。

结识一个画家

回到罗省，算还了“广聚隆”的食宿旧账，剩下40余元，映了一打照片，便再往各片场找寻电影工作。那时荷里活已有小片场10多间，但散布各处，往来费时，而环球公司竟设在西南郊外，来回车费要花一元。各片场多是给一张志愿书，填写姓名、年龄、履历、特长、地址等，贴上照片，便算了事。我在片场查问玛利璧福所在，结果我想见她一面的迷梦，再次幻灭。原来玛利璧福是在纽约工作的，从来没有到过荷里活。后来荷里活的出品，证明价廉物美，美东的制片公司纷纷西迁，原有在美东的片场才逐渐淘汰。那时玛利已是影坛中最红的女星，有“世界情人”的美誉，因业务关系，迁到荷里活来，但说也奇怪，我为她而来谋求电影工作，但始终没有机缘见过她一面，咫尺天涯，难道“造化”正在左右其间吗？

我到过各片场填了志愿书后，满以为不久便有工作，岂料一连候了十多天，有如石沉大海全无消息。一天，带着几分闷气，在唐人街上散步，见一西人青年，坐在街边绘画，我走近一看，他使用“半咸淡”的四邑话跟我打招呼：“朋友，你好！”当时我十分诧异。一个西人会讲我们的四邑话！莫不是他曾到过我们的家乡吗？我于是想了解他的来历。“好，你绘的真好呀！”我礼貌地回答他，顺手送他一顶高帽。但除了第一个“好”字他明白外，其余的似乎完全不懂。他继而用英语向我解释，他并不会

讲中国话，不过昨日他在这里绘画，向一个唐人学了这么一句话。今日便用来向我试试，看学到的口音正确不正确罢了。我问他是不是想学讲中国话。他说是的，因为他要研究中国的美术，来补充西洋画的不足，将来有机会打算到中国去学习，因此现在想先学中国话。那时我正以为结识一些西人朋友，或许有利于我找寻电影工作，这样我便向他提议，我愿当他的义务教师。他立即堆下满脸笑容，就邀我到他的画室倾谈。

他的画室是在一间古老大厦内，离唐人街不过两条短巷。这座大厦是七八十年前的建筑物，占了半条壁架街（Baker Block）的长度。而这间大厦则和这条街同名，大厦地下是吕宋人和日本人开设的小型铺户，二楼和三楼每层有十多个房间。有些甚宽大，且有冲凉房和厕所。据说这原来是一间颇有名气的大酒店，许多欧美名人曾在这里住过。百年前的罗省，不过是一个小埠，这间大厦就是商业繁盛区的中心，后来由于市区逐渐南移，时至今日，这个区域已形冷落了。这是因为房租便宜，所以一般未成名的美术家、文学家、剧艺家和音乐家都迁来这里住。三楼有一所美术学院，油画、水彩画、炭笔画、钢笔画都分科授徒，分日夜两班，每班有男女学生十余名，上课时多采用裸体女模特儿，有时也用男的。模特儿的酬金是每小时1元，而学费则每生每月20元。我的新朋友就是该院学生之一。他的画室是在学院楼上的阁楼，因为这大厦是欧洲贵族式建筑物，顶楼有三个高阁分布在南北两隅，另一阁在正门顶上，天台的中央。他的画室是在北隅，从美术学院侧有梯直上。这个阁房约有10尺丁方，三面有窗，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彩色大“加官图”，周围贴着炭笔和钢笔画，地上空无一物，连一张椅子也没有。他自我介绍叫考活韦勒（Howard Willard），我也把我的姓名和学电影的志愿告诉他。



考活韦勃为青年时代的关文清所画的素描

据说他是个贫苦学生，日间在一间百货公司革履部当售货员。每月薪金50元，晚上在美术学院上课，不用学费，因他替学院扫地。他专习钢笔画，对中国墨笔画甚感兴趣，故想学些中国话作为将来研究中国美术的门径。我告诉他，中国有许多种方言，标准的是北京话，而我能讲的只是四邑话，恐怕不是他的理想教师。他说没有钱请国语教师，而且这里也没有这样的人材，如果我肯教他，四邑话也好。

他问我住在哪里，我依实告诉他住在兄弟开的杂货店里。他问我想不想来这里和他同住。我想，住在“广聚隆”接触到的人物与我的志向是不相合的，这里是艺术界聚集的地方，如果将来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作为进身电影界的引线是理想不过的。因而我问他房租要多少，他说不收房租，有暇教他说唐话作交换便行。原来房租每月不过10元，水电费包括在内，多一个人住，没有任何不便。但我见不到床铺，问他如何睡觉，他就随手拉开一扇小门，原来这是收藏衣物用的小房，里面贮满衣被和一张卷起的床毡。他说夜间拿出来铺在地板上，就是一张很舒服的大睡床了。我立即和他握手，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即日把行李由“广聚隆”搬来，从此展开了我生活的新页。

迁入了艺术之家

在我初迁入肇架大厦的时候，二楼只有一间产业经纪的办事

处和一间救世军教会租来贮藏救济衣物的大房间。三楼因为有美术学院，物以类聚，一般“未来”艺术家，都在这里居住，1号房是一个法国少妇租来学古典歌曲用的，整天可以听到她弹着钢琴伴着她的尖锐歌声。她的艺名叫做卡拉希莲 (Clara Hele-ne)，她有个“卸任”丈夫，每月供给她赡养费100元，以那时的生活程度来说，除了衣食住行和学费外，是应该有余钱储蓄的。但储蓄不是她的志愿，更宁愿把余下来的钱，来津贴情郎，令她的情郎也可以安心于研究美术。她的情郎名叫夏罗 (Harald) 已经算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油画家了。他租了卡拉的邻房做画室，日常除了花些时间和卡拉谈情外，就是研究用油彩来描绘女人的曲线美。

住5号房的是一个德国青年，名叫史宾卡 (Sprunk) 和一个爱尔兰人名叫史密夫 (Smith) 的。后者在一家晚报当修改照片的工作，而史宾卡则在一间图画仪器店当卖手，他们都是夜班的美术学生。6号房的住客名叫卜利达 (Bert Eollioit)，是个美国父亲、日本母亲的混血儿，他的水彩画已绘得相当好，但生性散漫，非有特别感触，是不轻易执笔的。在生活中他追求的是醇酒和美人，和他最友好的是9号房那个红人画家，名叫独狼 (Lone Wolf)。独狼已有相当名气，被美国美术界认为是绘马专家。本来美国的红人很少到外界谋求生活的，美政府早已把他们集中在大山里的保留地中，由政府供给粮食，任由他们过着原始生活。但这个“独狼”从小由一个传教女士抚养，后被送入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再送到纽约考大学，依他养母的意愿，是想他学神道，以便毕业后由教会派他回保留地把耶稣的道理去感化他的族人。但独狼不喜欢严肃的神道，而喜欢浪漫的美术。他在纽约一间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多年，回到他的家乡，绘了马匹的油画多幅，携去纽约参加展览会。结果，一举成名。有一家杂志以2000元的代价买了他一幅马做画面，而且有个白种女子爱上了他。不久，他们就结了婚。他的成功，大概因他小时在保留地日夕与马匹相处，对于马的生活神态，深印脑海，因而绘来便有独

到的风格，而且他是个红人，物以稀为贵，他的作品也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他携妻子西来度蜜月，在荷里活租了一所高级住宅，因喜欢南加省的阳光和风景，故在这里住下，他虽然受过白人的教育多年，但红族的天真粗野性格，仍遗留在他的血液里。他有爽直不羁的性格，有纵情豪饮的嗜好，对于“高等”社会的拘谨生活则格格不入。为着逃避现实，他来璧架大厦租了这间9号房做画室，有时工作兴起，一连多日不回家去，他的太太就得前来这里照料他了。

还有两个住在中央阁楼的少女：一个是黑发的“指甲女郎”，她是在一间理发所替人修剪指甲的，一个是黄金发的“片场女郎”（Studio Girl），她和我一样，着了电影迷，从别省来荷里活，希冀实现她的明星梦的。她的姿色虽不算艳丽，但也算是可人儿，而她的身材也符合选美的标准。她已当过许多影片的“临记”，现已升上“特约”的地位了。这两位女郎，也不是美国人，黑发的是西班牙人，金发的是瑞士人。这里的人种可算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有色或混血人喜欢住在这里呢？大概因为在这里居住或社交，比较随便，保证没有人因不同种族而受到歧视，生活上有名士派（Bohemian）的作风，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我迁入璧架大厦那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正是这里最热闹的。到美术学院来的学生特别多，因为有许多学生平时各忙各的，只在周末来上两天课，加上各画室都有客人到访，晚上必有“派对”。是晚7时，考活君往学院上课，他带我介绍给院长认识。一进门，便见一个少女一丝不挂地站在一个1尺高的木台上，动也不动。面前有20多名男女一面注视她，一面用炭笔或铅笔往纸上画，我当时十分尴尬，垂头不敢仰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裸体女人，我的面部顿时热气腾腾，不知应如何才好。考活君带我至院长处，他是个50岁左右的人，头发已经斑白，一副古老眼镜，唇上留着一副八字胡子，穿着一件白色外套，我觉得他更象一个医生而不是个美术教授。考活君介绍我是个中国留学生，同

时也是他的中国语教师。院长听罢，对我特别客气，招呼我坐。但我想，我不是这里的学生，如果坐在这里看模特儿，人家岂不疑我是个“醉翁之意”吗？按照中国的礼教而论，这是“非礼也！”我因而急中生智，托词有要事待办，改日再访，就溜回阁楼去。

待考活君下课回来，我问他那院长的履历。他说，院长虽然不是名画家，可是他相识满天下，许多已成名的画家是他的同学或朋友，甚至有的是他的学生，也有些在电影厂当布景主任的。今天我和他结识是很有用的。我细味考活君这番话，觉得他有些趋炎附势，不象一个真正艺术家的风度。有一次，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参加欢迎一个名作家的宴会，我不肯去，说出不愿意去趋炎附势。考活君听了，忽然大笑起来，说我是个傻瓜，他说：“你想学电影，是向那些有财有势的制片家求取工作，还是向街边的乞儿求取工作呢？”他郑重地问我。“当然求制片家啊！”我不加思索地答。“那么，照你的见解，岂不是趋炎附势么？”我给他问得没有话可说。“老实说”，他继续发表他的理论：“象我们没有地位的人，若不是靠去交际，多识几个有地位的人来提拔，怎能有机会成名呢？”我想他的话确是事实。理想和现实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呀！终于我和他一起去参加那个欢迎会。

“将进酒，杯莫停”

星期天晚上，这里例行有“名士派”的晚会(Bohemian Party)不是这间画室做东道就是那间；开会不用多费金钱，只要买儿加仑意大利红酒(Dago Red)便妥。这种红酒很便宜，每加仑不过一块儿毛。大厦里的住客是当然的成员，此外，还有各人的同道朋友，也可任意邀来参加，不用请帖，多多欢迎。是晚，在5号房开会，由史宾卡和史密夫作主。考活君在下课后才去。因这会是9点起至半夜一两点的，我因初到，相识人少，



关文清在壁架大厦最后的一次晚会上（抱月琴者为关文清）怕有尴尬场面，故称疲倦，推辞不去；但考活君去了不久，史密夫君便亲到我处敦促说有许多人想和我结识，而且有个诗人来朗诵他的得意诗篇。盛情难却，我无奈只好穿了衣服跟他去。5号房是三楼中最大的一间，内有一厅一房一浴室。我进去的时候，已有20多名男女坐在厅中了。史密夫递给我一杯红酒，然后叫考活君介绍我和众人认识。接着史宾卡君便宣布诗人开始朗诵，他接着燃起两枝蜡烛置在暖炉的云石板上并加些木柴到火光熊熊的壁炉里去。史密夫拿着一大罇红酒给各人添了满杯，然后把电灯灭了，这时只有微弱烛光照在诗人的稿纸上。壁炉发出的闪烁不定的光线照着宛似比翼鸳鸯的男女们身上，全室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神秘感。诗人朗诵约有半个钟头始完。我看见有些人瞌着眼，一动也不动，不知是不是闷极睡去，抑或领略诗情深处。这位诗人诵的诗，好与不好，我估计，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有能力批评。不过朗诵到最后，诗人的声音逐渐低微终于沉寂下去时，人人不约而同地睁开眼睛拚命鼓掌一轮，使那位诗人，大有飘飘欲仙的样子。跟着诗人对众人说，他曾读过中国《唐诗三百首》的英文译

本，对李白的作品甚为敬仰，请我朗诵一首给他们听，这个提议，显然是要表示他的博学，就连中国的唐诗也读过。我想，这是对外宣扬我国文化的好机会。我虽然不是一个朗诵专家，可是，幼时读过几年旧学，对四书五经，古文唐诗，被老师强迫念到滚瓜烂熟，而今朗诵起来，谅不至太过生疏，而那时我已饮了半杯红酒，已有些醉意，羞怯之心，早被酒精冲散。故只说了两句谦虚话，就把李白那首《将进酒》的大意，略加叙述，便大胆地用四邑读音朗诵出来。诵时顺着语气节拍，学八股先生那样摇头摆脑一大阵，诵完各人热烈地鼓掌。诗人高兴地说，听了这首诗的音律节拍，他可以想象到李白如何风流潇洒了。接着，希莲女士要求我再诵一首，众人鼓掌敦请，那时我更加胆壮了起来，便不再说什么客套话，就朗诵了一首《长相思》。诵完在掌声中我和考活君兴辞而出，同时住在中央阁楼的两位女郎也跟着走出。到门外考活君介绍我和两位女郎认识。金发的名璧姬，黑发的名玛李。璧姬说，她明早9点要到拉市基片场拍戏，故此要早睡。考活君告诉她，我是从三藩市来的，要参加电影工作，请她代为介绍。她想了一想，就提议我明早跟她一起去。她说明天是拍礼拜堂景，用百多名临时演员，或者可能被选，我立刻答应她，并多谢她的关照。

初做“临记”

次晨，我随璧姬到拉市基片场，因为璧姬是个当红的特约演员，随她入闸并没有人拦阻。她带我到主任办事处。主任见璧姬即递给她一张工作证，并着她先往服装部领取服装，然后化装。璧姬接了工作证便介绍我和主任相识，“关先生是个中国留学生”，她说。言时露出一种娇媚的笑容：“他从远东来，特别要研究电影拍制法，你能给他当一份临时演员，令他有个机会去研究吗？”主任不待思索，冷静地回答：“对不起，今日需要的临时



关文清与璧姬

姬微笑地答，“我希望能多加一个。基督信徒中也有中国人嘛！”她带着俏皮神气催促他。佐治略事思索答：“或者也可以。”他迟疑地说，“我们既然有多名黑人教徒，也应该有一两名东方人，相信老板不会反对的。”接着，璧姬向他道谢，并对我说：“化了装到片场见！”便匆匆地向化装室走去了。佐治向选演员主任取了当天的演员名单，加上了我的名字，带我到服装部领了一件大襟唐装衫，然后叫我到男化装室去。原来那人是施素德美的助手，是个副导演。

男化装室是一间30余尺的长形木屋，中间摆着一张20余尺的木台，阔约5尺，中间摆着两行镜子，两边置有长木凳，演员杂乱地坐在凳上对着镜子涂脂抹粉。看到这些堂堂大汉，竟然统统都学女人装扮，我觉得十分有趣。但是详细看下去，他们不只在涂脂抹粉，有些更在把些假须粘在面上和嘴上，有些拿着一枝铅笔在面上乱画，有些把白灰水擦在发上，原来他们要扮成年老一

演员，已经额满，迟些时日我留意录用吧！”我听了很觉失望，璧姬也有些不自在起来，我正要辞出，突然有个30多岁的青年人匆匆入内，一见璧姬便说：“璧姬，你来了，正好，快去化装，拍你的镜头啦！”“好，半点钟后就来。”璧姬答，见我在侧，问：“喂！佐治，你能多录用一个演员吗？我有个中国朋友……”说时指着我，佐治一眼盯着我，旋问：“噢！他要当演员？”“是。”璧

点，有些扮成乞儿模样。那日拍的场面，是一幢救世军礼拜堂布景，所有临时演员都是扮成到教堂听讲道的模样，或是来求援助的人。因为美国救世军教会，专向下层社会传道和做救世工作，所以到教堂聚集的不是贫苦大众就是无业游民。这班临时演员必须这样打扮。当演员的，个个懂得普通化装术，化装主任只是管理化装室和特别化装，如盲眼、烂鼻和缺口等。我因为初入行，未学过化装，坐在那里看着各自施展“绝技”，自己则不知道从何着手，心里正在叫苦。副导演佐治一俟来到眼前，他向大家宣布：10分钟内要到2号场1号布景前集合。我尴尬地向佐治说明我不知道如何化装。他愕然瞟我一眼，然后对化装室管理员说：

“他是中国人，要比别人黑一点，但不要黑到似非洲人一样，你替他化吧！”那管理员把眉一皱，似有难色：“只有10分钟，做不来！”他断然地拒绝。佐治略事思索说：“你先把雪花膏润他的面皮，不用涂脂，差利替你扑上些粉吧，快点！老板是不等候任何人的！”他吩咐完便匆匆出门去了。我依照他的吩咐，不用5分钟，便化完了装，换了衣服，跟着大伙儿一齐向第二号场走去。原来那时的胶片（film）发明不久，未臻理想，片中的微粒，只有黑白，没有中间色素，如不化装，拍出来的画面，便白的白到发光，黑的黝黑如墨，因而所有上镜人物，一律要化装，同时，白色的道具如看护衣、衬衫、被单、台布等等也都要染上微红或淡黄色。

这是大导演施素德美（Gicel de Mille）自编自导的五幕巨片，那时的影片，多是一幕（One Zeel）或两幕，五幕已算巨制了。女主角是由纽约百老汇聘来的著名话剧明星宏尼活（Fannie Ward），男主角也是个话剧演员，他在这部片饰演一个情场失意的浪子，因失了爱人，心灰意冷，终于不务正业，终日酗酒寻事。女主角是个救世军传教士。一天，见他醉倒街上，警察正拟以阻街罪名捕他入狱时，她大发慈悲，上前代为讲情，并带他回教堂供以食宿，待他酒醒，然后向他讲道，劝他痛改前非，重作新人。浪子受

女的美貌和真诚所感动，逐渐爱上了她，由此立志改造自己，严行戒酒，并加入教会，跟她一齐做传道工作。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碰上了施素德美

当我们走出到第二号影场的时候，摄影师已在场指挥着杂工们把吊在布景顶端的白布，某幅拉前，某幅扯后，这是默片时代的配光法。副导演佐治把我们分配坐位。不久，施素德美也到场，手携着一块尺余长方板，板上有个铁夹夹着个剧本。他是个肥壮而略矮的人，额头饱满，虽是30左右，但已略露光头，身穿一件黄布恤衫，没有外衣，也没结领带，马裤长靴，看来宛似一个军官模样。施素德美一屁股坐在摆在摄影机侧一张帆布椅上，张目四顾，时佐治已侍立在侧候命。德美吩咐他有些家私道具要变换位置，某些演员先在场，某些后到。佐治奉命，即指挥杂工搬动家私和道具，并吩咐各演员如何做。那时璧姬也已到场。她到德美面前，恭谨地向他请安，并问他应如何表演。德美把她饰演剧中人的个性和身份，在那场戏所应有的态度和动作等详细地告诉她。那时摄影师已把全景配光工作做妥，问德美要先拍哪一道镜头。德美说先拍全景远景，并吩咐佐治往化妆室催促男女主角到场。摄影师叫他的助手把影机安置在指定的位置，然后请德美检视，德美到影机后从镜头里瞄去，认为构图不错，便把那场戏的动作和主角的位置告诉摄影师，以便配特别焦距的光。不久，男女主角赶到，德美把那场戏的过程、情感和效果对他们说了便即试演。这些镜头是宣道会的开始，有四名乐员坐在琴台侧奏乐，璧姬坐在琴台弹风琴，前来听道的人和教友们有些已坐下，有些从外鱼贯而入。女主角和另一男牧师在招呼教友入座，男主角在这镜头还未出场。试了一次，便顺利拍了这个镜头。我扮成个教友，早已入座，故不用任何表情，因而能注意到导演工作的过程。当德美叫出“卡马拉”（Camera）的时候，摄影师便把影

机右侧的铁把手转动。各演员依照导演所吩咐去表演。及德美叫一声“咳”(Cut)摄影师霎时停手,演员们也停止表演,等候导演的下一道命令。下一镜头,是由琴台向门口拍去,男主角由隔壁宿舍出来,正欲离开,为女主角所见,留他坐下听讲道。大家一直工作到正午12点,忽然钟声大鸣,德美便下令停工午膳。他和男女主角离场去了。佐治则叫杂工把预备好的餐点分派,每人一包,内有三文治四件,西饼一件,另牛奶一小瓶,各人就坐在场中吃,璧姬也是一样。那天由9时至12时,大约拍了10多个镜头,有两段不够理想,“N.G.”(No Good),重拍了两次。一个是男主角行入教堂时,有个饰教友的临时演员,在主角的前面走过,摄影师说他遮住男主角的表情,故要重拍,另一段是德美认为女主角的愕然表情,有点过火,故也必要再拍一次。在拍片的当儿,有个女场记坐在导演身旁,把镜头号数和表演情形逐一加以记录,这是预备给剪接软片时参考用的。午后1点钟声复鸣,所有工作人员依时进场开工,直至下午5时才结束。这一天大约拍了二十五六个镜头,有些镜头超过半小时的时间去预备和试演,尤其是男女主角的近镜(特写),用大照身镜从景外有阳光处,反射强光进来,配来配去,花掉了许多时间。导演为了培养演员的情感,特命乐师在旁以小提琴伴奏着配合剧情的音乐,故拍特写镜头就特别慢了。这些是我亲眼看见施素德美导演的手法。至于他的理论,我曾在一本杂志中读到他对记者发表过的一篇谈话,他说:“我以为一个导演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明瞭全部剧本的中心思想,剧中人的个性,把握住故事由始至终的发展过程至于高潮;其次是选用演员,务须切合个性,对他或她能否真正担任这个角色,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各有所长,有些长于演悲剧,有些长于演谐剧,有些长于调情,有些偏于豪爽,若能选到适合剧中人性格的演员,则事半功倍。至于如何使演员演出剧中应有的表情,导演只须把每一镜头的特点,剧中人的心情,要达到的要求,向演员交代清楚便足,断不宜呆板教他或她

怎样去做，因为每个演员有他们自己的表演能力，若导演一定要他们学他那样表演，结果将会弄巧反拙的，即使学到十足，那出现的只是导演的个性，而不是剧中人的个性。其余如每场戏的特点、气氛及镜头的运用，也应时常留意以期达到理想为止。

电影学院的生活

自从这次当过一天临时演员之后，片场内的组织和制片的程序已略知一二，但对于摄影机的构造和摄影的技术，菲林的冲印和剪接，仍无法了解个中秘奥，若要学成后回国制片，非全部工作过程和技术都能掌握不可。我当时便很想找份片场的工作，但无针不能引线。要学任何部门专技，要得到那部门技师收为学徒，才能入片场工作。那时的大学又未有电影艺术一科，戏剧不过是文学系之一部分选修课程，要学电影专业，简直没有可能。一日，忽见报纸上有广告一则：“明星电影学院招生”另有小标题是：“做明星的捷径”，“学电影的正途”。我看了这段广告，十分高兴，立即拿着报纸，乘车朝该学院进发。

明星电影学院是在罗省的郊外，设在一所大木屋内，四周用白灰水刷过，屋檐高悬着一块大招牌。院内陈设简单，靠墙置一张长台和木凳，中间摆着数行木椅，近门口处用木板隔了一间小房当教务处，墙上挂有许多明星的相片。我到时已有许多青年男女，在那里或坐或立，聚精会神地在看章程。我取了一张，便回壁架大厦。把章程一看，始知该学院只是一家演员训练所，章程中并没有标明科目，只是空泛地说：会给进校学习的人获得电影普通知识，同时在毕业后可以介绍他们进入片场工作。学费每月30元。我觉得当演员只任由导演依照剧本来指挥，没有创作的机会去发挥本人的思想和能力，所以我决意选择导演兼编剧的工作，来做我的终身职业。这所学院是不合所求的，但当还没有比较理想的可供选择时，也乐于报名参加，以求多得些经验。

第一日上课，讲的是化装理论，没有教科书，教授口述，学生笔记。第二天讲戏剧理论。第三天讲表演技术。以后便实习化装和表演。学生中都是20岁左右青年男女，上课时有讲有笑，倒是十分轻松，不若别种学院上课时那么严肃拘谨。

在那学院学了两个多月，院长宣布实习上镜，要学生每名缴实习费20元，作为买菲林和租赁服装之需。因剧情是取材于圣经，描写耶稣在山上讲道，所以所有演员要穿阿拉伯装。8时在学院齐集，化装和准备一切，9时出发，到荷里活一个小山上展开工作。院长当导演，另一教授当摄影师，先拍男女教徒们，联群结队上山的远镜，每一个镜头要排练一两次。拍了几个镜头，已是中午12点。那时正是6月天气，荷里活的阳光特别强烈，演员因一忽儿上山一忽儿下山，来回奔跑多次，人人已汗流满面，湿透衣衫，化装品多是蜡质，被阳光晒溶，化油流下。学生们对化装虽曾学过，但只是一知半解，还没有现场经验，用巾揩揩抹抹，便个个变成“花脸猫”似的！化了装最忌揉擦，有汗用软纸印吸，然后补粉，使蜡结实才行。过去满以为拍片工作是轻松的，现在才深深理解“艺术须从血汗中磨练出来！”这时人人已是精疲力尽，幸而院长及时宣布休息午膳。学生们便如初释囚犯，争相奔往树荫躺下，虽有三文治和汽水，已懒于急往领取了。下午拍耶稣讲道，院长由扩声筒指挥各生分立山背，饰耶稣的则立在山顶，高举两手面孔朝天，作祈祷状。院长着摄影师从山麓朝上拍。拍完了这一全景镜头，多数学生工作便算完毕，乐得大家坐到树荫下“指点江山”讨论方才所拍镜头。有些头皮厚不怕日晒的就跟院长上山顶去，看拍耶稣近镜。这次排演，不过让学生们有一次实习的机会罢了，草草拍了三数镜头，便告了事。至于影机内有无菲林，学生们不得而知，因事后并没有影片给我们看。

“助导、演员和厨子！”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对于拍片的过程，已略知梗概，但我的经济又发生了困难，没办法继续支持下去。这时适有一影片公司在报纸刊广告招请职员和演员，我立即按址前往求职。

这家公司是设在一小型片场内，而这片场是业主租给小型公司拍片，按日计租的。当下门房带我到写字间来，那里正端坐一对中年男女，男的伏在办公桌上书写，女的在旁边打字，看模样，男的是经理，女的是书记。当我行近桌前，那男子举头一望，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告诉他来意，同时指着报纸上的广告给他看。他略作思量，便问我有没有经验。我把曾在施素德美导演的片中上过镜，和在电影学院学习的经过告诉他。他又问我识不识做膳食，我听了有些不自在起来，以为他存心菲薄，因那时美国人多数鄙视有色人种，以为中国人只配做厨房和洗衣工作。但这个人的英语带有欧洲口音，料是和我一样，到美国不久，说话时脸色十分和善，不象存有藐视的表情。内心经过分析后，我便心平气和地对他说道：“我现在来求电影工作，不是要当厨子。”他笑道：

“我不是要你当厨子，只要你有厨房的常识，便够了。”我告诉他：“我曾在大酒店厨房当过洗碗碟工作一个月。”“好极，好极！”他轻松地说，“请坐！”他指着旁边的椅子说：“我和你详细谈谈。”说罢，把桌上已熄的烟斗再燃着，吸了两口，安闲地把烟由嘴中一圈一圈地向前上方慢慢地喷出去，然后对我说：“我坦白告诉你，我们这里并不是大公司，事实，连公司都未组成，不过我有个朋友，他要我拍一部片子，捧他当主角，他愿拿5000元出来作资本。但这个数目，在预算上只够买菲林、冲印费和摄制时的一些杂用罢了。为了玉成其事，惟有用劳资合作的办法。如果你不怕吃苦，我欢迎你加入。”我想，我目前并不急于挣钱，只求能解决生活，又有电影工作可学，便算理想了。“只要是电影工作，无论

怎样辛苦，我都不怕！”“我要你当三个职。”他说，“助导，演员和厨子！”说完微笑地再吸一口烟。我略加考虑，坦白地对他说：“我没有做过导演，演员只当过Extra（临记），至于厨房工作，只晓削马铃薯和切洋葱头，也学过煎热饼。”“够了！”他说：“助导不是导演，只拿了剧本跟着我，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于演员方面，有个墨西哥浪人的角色，拟给你当，你化了装，可能似个混血的墨西哥人。但我当然要先试试你表情，能否担任，方给你当。至于厨子一事，因为这片是在荒山上拍外景，那里没有酒店，连住家也没有，我们要在那里住两个星期，要带足粮食去。所谓粮食当然不是蛋糕和肉扒，只是罐头牛肉和猪肉，豆和马铃薯。你既然识得煎热饼，可以多带些面粉和糖去。这两个星期，我们只求有物充饥，有气力去工作，便算了事。这些工作，我相信你是可能做得到的。至于酬劳方面，我们可以把红利给你十分之一，但如果拍成的电影卖不出，就算大家行了歹运，白做一场罢了。”我听了他这篇坦白的谈话，不觉兴奋起来，不再思索，即答应加入。他连声称好，然后吩咐在旁打字的那女子起一草约，并介绍她和我相识。原来那女子就是他的太太，他们都是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发生以前，他们夫妻曾领导过一个小型话剧团，在欧洲各大城市巡回演出，那时他们生活相当好。大战爆发后，不久战火燃遍全欧，所有欧洲的艺术人才，除被征入伍外，其余多逃往美国避难。他们夫妻就是艺术难民之一。由1915至1917的两年间，美国的电影工业，突飞猛进，投资拍片的人，比“寻金热”更加踊跃，其中也有不少象这家小公司一样，采取“劳资合作”方式，有些则用“兄弟班”办法。大笑匠神经六（Harold Loyd）就是用“兄弟班”办法起家。当然也有些公司，拍了一部片，卖不出去，便告垮台的；也有不少公司拍了一半，因资本不继，而宣告夭折的。我和经理签了约。摄影师来到，经理介绍我们相识，并要他给我“试镜”。我闻要“试镜”，心里便自着急。我虽然在学院学过

各种表情和动作，但他们现在所要试的未知哪几种，万一做不出来，怎样下得台呢？我诚惶诚恐地随着他们来到影棚。摄影师往黑房托了一个扁方式木箱出来，按上一个三脚架，那就是摄影机了。他们叫我立在离影机约5尺处，那经理当临时导演，吩咐我：先侧面向镜头，然后慢慢转正面向镜头，作大怒状，然后又作狂笑，然后又……至此，摄影师忽插嘴：“对不起，”他说，“机内只余20多尺片！”导演听了，即笑笑对他说：“啊！好吧，我们就试到这里罢！”原来那时的片盒，只有100尺至400尺，他们买了100尺菲林回来，日前替男女主角“试镜”，已用了70多尺，故此摄影师在旁提醒导演，以免误事。当下导演吩咐预备，我立在指定位置，摄影师立在机后，手持着机旁的把柄，导演一声“卡马拉！”摄影师把把柄转动，我依照导演的吩咐依样作各种表情，但我在作大怒状未完，摄影师已放下“把柄”，耸耸肩膀说：“完了！”原来片已用完。导演无可奈何地说，“够了！”旋对我说：“你做得好！我的剧本今晚便写完。由明天起，我们在此排演，你明天下午两点来吧，五天后我们便到山上开拍了。”从此我便正式加入电影圈，去学习那时存有神秘感的工作。

《毒侦探》下落不明

圣点马士离荷里活约50英里，早晨5时我们从罗省搭长途电车，8时到达圣点马士。这是一个乡下小镇，位于一座大山的谷口。全埠只有店铺十余家，专靠邻近农场的工人，和周末登山的客人光顾的。我们抵步后租了5匹骡子，把带来的行李、粮食、影机和菲林等分装在5匹骡子背上，在一家餐室用过早点，然后整队上山。我们一共7个人，连所雇骡夫兼向导合共8人，由骡夫拉着一头骡子带路，导演拖一头跟着，摄影师和他的助手和我，每人拖一头，男主角在后，照料女主角和导演太太。由谷口

沿着溪边一条羊肠小径进发。这条小径是唯一通上山顶的路，长达20几英里，一路转弯抹角，上上落落，颇觉吃力，好在靠近谷口五六英里那一段路旁，有些大树，鸟音啁啾，泉流石上，游目骋怀，倒是有些快意。但过了这一段，迎面峭壁耸立，不能直通，转过小径出现另一个山冈。冈上不独无大树，而且有的山头寸草不生。时正中午，烈日当空，好似置身焗炉中，有时要攀上高岩，然后翻落，人行已是不易，何况还要拖着一头生性懒散的骡子。此时已是气喘呼呼，汗流浹背了。这里崎岖的情形，正如唐诗所描写的：“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啊！这个“不毛”的山冈，大约有七八英里路远。我们行至下午5点，才走到那条溪水的上游。靠近溪边，有几棵大树，我们人人已疲乏不堪，加上又饥又渴，一到溪边再顾不了许多，便停下来饮水，食点饼干充饥。那女主角和导演太太撒起娇来，声言不愿再行了！但那骡夫警告她们说，这里是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入夜便出来寻腥果腹，我们要趁着天还光亮，赶到目的地，才不致为毒蛇猛兽所噬。她们听了，几乎怕得要哭出来。后经男主角和导演落力劝慰，她们才勉强站起再行。由那里到目的地，不过3英里左右的路程，但山上日落较早，而且因体乏步缓，到目的地时太阳已没到地平线下去了。

我们扎营的地方在高山上一片盆地，周围数百亩，相当平坦，但满地都是石卵，泥地绝少。由这里到最高峰，还有五六英里，峰上终年有雪覆盖着。溪涧里的水，就是溶雪流下的。溪边岸上，有许多大树。近处有间没有人住的小木屋，约10尺见方，内空无一物。门口在木楣上刻有字句：“欢迎游客借住”。据说，数年前有个作家要写一部以山区为背景的小说，为了体验生活，特来这里建造这间木屋，住了多月，到那部小说脱稿，才回到荷里活去。我们就是以这木屋做大本营的。女主角和导演太太住在内面，男的就在门口搭帆布帐住。所有行李、伙食和摄影器材，都放在木屋内。这里夜间寒冷，虽有毛毯，也要在帐外周围

堆起枯枝杂柴生火取暖，同时也可藉此防御猛兽的袭击。经过一日跋涉，人人都已疲劳不堪，每人只吃面包，到溪边喝几口雪水，倒下头便睡。

次晨，早餐后导演和摄影师到各处观察附近景物，我和摄影助手同行，男女主角和导演太太留在营中整理服装和道具。这剧本是配合山区风景而写的，译名叫《蠢侦探》（The Foolish Detective），剧本是描写一个蠢侦探（男主角饰）被派往山上追缉一个墨西哥浪人，因那浪人曾在圣点马士犯下偷窃罪。同时，联邦酒税局也派了一个女侦探（女主角饰）上山侦查私酒，为便于旅行和展开工作，女侦探佯扮男装。另一个中年人，妻子死了，无以为生，携了16岁的女儿，往山上专酿私酒，由女儿携出墟市发售。两个侦探和两个犯人，在山上引起误会，互相追逐。墨西哥浪人，身手矫捷，爬山攀树如飞，弄得蠢侦探扑朔迷离，啼笑皆非，不但不能把他捉到，反而被他缚住，幸为女警探（女主角）所见，利用“美人计”，戏弄浪人，诱他饮酒，到他酩酊倒地，乃从容把蠢侦探解缚，将绳索转缚浪人。后来女侦探来到女家，疑她父亲是蒸私酒犯人，正欲拿之归案，女忽和蠢侦探一起进来，当下大家说明来历，女坦白地向两侦探告以家庭苦况，因不得已蒸私酒为生，赢得两侦探的同情。女侦探答允不予逮捕，劝她父女同他们一齐回城市去，共谋生活。最后镜头映出他们父女和侦探押着墨西哥浪人下山，至此全片结束。这剧本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以当时的电影艺术水平来衡量，这片的导演手法，也可算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这位导演原是舞台的演员和话剧导演，对于戏剧，确有相当修养和经验，对于美术，也有一定的知识，在拍摄时所采的背景和构图都相当美丽，镜头角度，也很精彩；另一方面这是他初次编导，对于特技的摄法，还欠到家，好在摄影师相当合作，对每一个镜头，都提供意见，而导演也虚心接受。例如追捕浪人，他提议：浪人跑上山岩镜头，用“慢摇法”（Slow Crank），使看到浪人跑步如飞；又如一跃而跳上

10尺高的树枝，则用“倒摇法”（Back Ward Crank），因由地下跳上10余尺难，但由10余尺高跳下地则易。用“倒摇法”，则浪人可以由上跳下，将来在银幕上映出，便恍如由下跳上了。原来镜头的作用，摄影和放映恰巧相反，摄影师摇得慢，放映时演员的动作则见快，摄影时摇得快，放映出来的动作则反慢。又如跳下，“顺摇”则动作如常，“倒摇”则放映出来的动作，便如由下跳上了。我的工作虽然很艰苦，但学得许多摄制电影的知识和技术，内心窃慰。以导演和摄影的技巧而论，这部片本来可算成功的，但可惜男女主角都没有演戏的经验，对剧中人的性格也体会得不够。拍摄时每个镜头都重复多次，仍不能达到要求；重新拍过，又犯上“N.G.”。所谓“N.G.”，就是英文的“*No Good*”，导演们用这两字母来代表“不好”，一来不用多说；二来免使演员听了，而产生不自在的心理。我们在山上工作了10天，还有些镜头尚未全部拍完，但所带来的生片，已经用尽。带来的粮食，也已吃完。骡夫依约由圣点马士带了3匹骡子来接我们。来时因粮食笨重，5匹骡子仍感负荷过重，且上山与下山吃力得多，故需行一整天，方能到达；但回时只需大半天，下午4时便回到圣点马士了。回荷里活后，次日往近郊小山上补拍仍缺的镜头，一连拍了两天，便算完成，最后在片场拍字幕。默片的字幕比声片多，一部3000尺的影片，最少约有400尺是字幕。编写默片剧本，主要以表情动作和景物来描绘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高明的。但有时故事的来龙去脉，仍需依靠字幕加以解释，方能使观众全部接受。电影是以画面动作来说明剧意为主，无论默片或声片，写的剧本总以少对白为佳。拍完字幕，我的工作便告结束，冲印和剪接由摄影师和导演负责。因那时未有分门别类的专人负责，所以小公司的职员，多数一身兼数职。我虽不用负责冲印和剪接，但为了要明瞭制片全部的过程起见，我要求准我到黑房帮助工作。那摄影师是意大利人，童年随父母移民到美，有爽直的性格，对于冲印剪接技术，我有不明处，请教他时，他必

详为解释，我从中得益不少。这部片一共拍了5000多尺菲林，但废片很多，剪辑后只得回半数，加上500尺字幕，勉强凑成3本，在片场试映过一次，看后我很觉失望，因男女主角表情生硬，恐难得片商垂顾。后来导演和男主角携拷贝往纽约发行，叫我们迟些时到片场听取消息。我跑了几趟，片场老板都说“没有消息”。不久那片场又被地主收回，从此便失了联络。这极可能因片在纽约卖不出去，导演和男主角转营别业去了。

不当演员，聊当作家

这次我参加了拍片工作20多天，得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可是因没有薪酬，结束后生活又成问题了。重回壁架大厦时，同房的考活君已在一家最大的百货公司谋到一份卖货员的工作，月薪150元，从此无须再为美术学院扫地来偿还学费。他把扫地这缺介绍给我做，每月工资20元，足以维持两餐。这样，我工作余暇就到各片场求职。在志愿书上，我填要当导演或摄影助手，不求当演员了。因为那时影片的故事，多数是描写白种人的事情，很少涉及有色人种，间或有些剧情涉及唐人街，必是描写华侨自相残杀的“堂斗”，或描写唐人街的鸦片烟窟，引诱白人女子吸毒等辱华片。饰这种片的演员，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当的，而是多由日本人或菲律宾人扮演，主要的角色，则用白人。这种辱华片，应该由我国驻美领事向美政府提出抗议，禁止放映才对。但那时我国的外交官员，多数是怕“鬼子”的黄脸洋奴，谁敢挺身向外人说句硬话？华侨们有心无力，惟有消极抵制的一法。

我候了三个多月，每个星期，都往各片场走一趟，询问有无工作。得到的都是“没有”两字的回复。我又托璧姬，请她到片场拍戏时代问一声。据她说，导演和摄影师的助手，都由他们自己选用，公司无权干涉。他们多是师傅带学徒，都属长期性，除非那助手已提升为正导演或摄影师，否则不离开师傅云云。照这

样看来，欲在片场求得一职，“难于上青天”了！当我正在为着职业问题而苦恼的时候，楼下8号房的麦基罗君，携了一本相册给我看，那相册贴着百多幅4寸大的照片，全部都是中国风景和名胜。我问他从哪里得来，他说，数年前随他的姑母往中国游历时拍的。我灵机一触，想起罗省《时报》，每逢星期日必刊一栏《星期特辑》和附一张粉纸印的世界名胜和名人图片，很受读者的欢迎。因而我便向麦君提议，把那些照片携往卖给《时报》，我可以负责写注解，说明每一幅照片的历史背景。麦君听到我的提议，也兴奋地说：“是了！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是美国人，若然由我拿去，编辑未必见我；你是中国人，由你拿去，说是你由中国带来的，编辑定必另眼相看。如若成功，所获酬金，两份平分好了。”我听他这一篇议论，觉得有道理，便答应照办。便先选出10余幅比较著名的，如万里长城、天坛、明孝陵等拿往相馆放大，然后租了一部打字机，由我口述，麦君打字，把每幅照片的历史背景，简单地给以扼要的说明，打成的字条，贴在照片后面，然后由我拿往《时报》，求见编辑。我到传达处时说明了来意，那人便打电话去编辑室报告。在那10余分钟“恭候”的时间里，我简直坐立不安。等到传达员说：“上三楼，星期编辑室。”我才松了一口气，但仍疑虑未释。说也奇怪，所干的事情，既非犯法，为什么我的心情，那样紧张？大约因为初次出来谋事，有如青年人将当人父，呆候着妻子临盆时的心情一样，有点神秘的喜惧感；其次，可能是初次往见一个大作家，下意识在作怪吧！在升降机由地下升上三楼的刹那间，脑际忽然闪出老子一句话：“见怪不怪，失其为怪”。如果我能使我的心理，“见大不大，失其为大”，就不致于缩手缩脚了。我经这一心理分析，当步入编辑室时，心情已转趋平静了。编辑室分内外，编辑在内室工作，书记在室外打字。编辑名夏利卡（Harry Carr），身材硕大，态度和蔼，看来50左右。他在《时报》除编星期特刊外，每日还为《枪兵》（The Lancer）专栏写稿，很受读者欢迎。他

和我握过手后问：“有何见教？”我把来意说了一遍，便交照片给他。他约略一看，便放下，对我说：“我给你一个主题，回去把你在中国童年的生活写出来，在这些照片中选出一两幅来做插图吧。”“我未曾学过写小说或自传，恐怕写不出来。”我坦白地对他说。“没有问题，我不是要你写咬文嚼字的文章。”他用鼓励的口吻说，“只是用平常的文字，来写平常的事情，照你平常对人讲话那样写好了。”我听了他这一段话，不禁兴奋起来，但又带上几分喜惧心情：喜者，有了这新的谋生途径；惧者，惧自己学识浅陋，写出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难免贻笑大方。但想别人既然有信心，我难道没有自信和自尊心吗？别人既然肯给机会，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机会，写些有活力、有人情味的东西出来，让美国人民增加对我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是多有意义啊！

“谢谢你的指教！”我起立着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尝试。”

“好，你拿这些照片回去，写好了文稿后连同那些照片送回来，待我选择好了。”说罢，继续处理他桌上的文稿。

在回寓的路上我想着：很奇怪，这家罗省《时报》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喉舌，为什么用一个头脑如此清醒如夏利卡这样的人来当编辑呢？他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偏见，也没有高傲的架子，我曾在他的《枪兵》栏读过他评论欧洲战事（后来发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1916年，美国还未参战，他说：“这场战争，将来会把欧洲的豪门和贵族埋葬掉！”这是多么具有远见的评断啊！

用平常的文字，写平常的事情

晚上，麦君放工回寓，我把往见夏利卡的经过告诉他，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冲动地说：“关，你成为一个作家了！”我说：“不要太张扬，现在一个字仍未写出来，如果太早给人家知道，将来写出的东西万一不受欢迎，那时岂不丢尽脸了吗！”“不！”他肯定地说，“不会失败，如果夏利卡对你有这样信心，他怎甘让

你失败？”当晚，他不由分说，在他的房间，招集同楼的艺术
家，开一个“红酒会”，把夏利卡要我替《时报》写文章的事情
告诉大家。在座的不约而同地对我恭维一番，当场我听了觉得全
身热烘烘，很不自在。这或许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性格上的差异
点吧！

是夜，不能入睡，在床上闭目凝思，考虑这自传怎样开始，
怎样结束，终于决定由7岁入校读书时写起，至14岁离开家乡、往
美国时止。回忆那童年8年间的生活，当时的一景一物，恍如跑马灯
般的幻影重现脑际，一直到晨鸡鸣晓，才于朦胧间睡去。下午醒
来，便开始写作，那时我不懂打字，用笔写下，到晚间麦君放工
回来，请他用打字机打过，这样一连5天，大约有5000字左右。
麦君提议，先送这12页给夏利卡，看他有什么意见，然后再写下
去，我依议怀着稿件往见夏利卡。他当场翻开检视，头几页只是
略行浏览，我心里很疑虑，满以为所写的东西不合所求，因而他
不肯多花时间去详细阅读，不料阅至第四、五页时，他忽地伸直
腰肢，聚神地细读起来，慢到几乎逐个字在注视着，看完这两
页，我见到他眼镜后的双瞳，泪水沾润着。我知道他已感动了。
稿件看完，“很好！”他说：“还有几张？”我告诉他，这是上
集，还有中下集。他吩咐我续写，并说在两个星期后便可刊出
这一集。我兴奋万分，觉得这种遭遇，真是意外，我梦寐也未曾
做过，我真的能写出文章刊出卖钱吗？以前，我在璧架大厦，曾
听过有些准作家们说，“作文容易卖文难”。他们有些写作了多
年，写了许多小说和其他各种文章，寄往各杂志出版社或印务局
求售，都领略过“壁回”的味道的，但我在无意中被当作“作
家”捧出来。我从此有了一条新的谋生之路！但这却颇使璧架大
厦里那班“长毛”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既羡慕又莫名其所以了！

我这样埋首写了两个星期，便把“童年自传”全部脱稿，大
约15000字，因夏利卡教我：“用平常的文字，来写平常的事情，”
故此没有“咬文嚼字”的阻挠，也没有“矫揉造作”的麻烦，照

实写来，一气呵成。由此，我觉悟到写作的秘诀，切勿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写怡情或论说的文章，更不要企图卖钱；如要卖钱，就要写“应时”的文章，例如逢中秋节，就写一篇《火箭探月》或《明皇游月殿》一类的文章，寄往任何报馆。包管编辑先生赶快刊出，以应时节。夏利卡叫我写自传，也是“趋时”，因为那时欧战正酣，欧洲事情，除与战事有关素材外，没有其他可写。故此编辑们要向亚洲来寻求有新鲜的有启发性的题材来。而亚洲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它有5000多年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古老大国，正经过辛亥革命，新成立了个共和政府，对于政治大事，报纸上虽有简单的报道。但对于人民生活，风俗礼教等情况，却未见其详。那时美国人对于中国，犹如今日我们对月球一样莫测高深。因而当我拿着中国的风景照片给夏利卡看时，他就灵机一动，要我写“自传”，他并不是究揭我的生活底细，因我不是“名人”，而意在通过我在中国的童年生活，让他的读者从中得到一些新鲜的、过去中国人的生活实况吧。果然，不出他所料的，上集刊出后，报馆和我接到许多读者函件，有些要我解答问题，有些要求报馆刊登这类作品，说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太贫乏了，要求编辑们，多搜罗些有关中国的实况的文章。夏利卡把那些读者的来信给我看。勉我继续写作。接着，我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中国诗词的优点》论文，都先后刊在《星期杂志》上。

大导演葛莱夫的作风

一日，夏利卡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叫我立即往访葛莱夫（D. W. Griffith）。我到达“日落路”的葛莱夫片场时，传达处已预知我的到来，径带我进入内室。那是一个大厅，地上满铺地毯，中间摆一大长台，两旁陈列多张靠椅。夏利卡和一班人正在环坐讨论剧务。夏利卡见到我，起立迎接，并介绍座中各人和我

认识。第一个坐在长台尽处，就是红极一时的名导演葛莱夫。他



荷里活早期著名导演葛莱夫

身材瘦削而高大，两目炯炯有光，坐在他左旁的是丽莲吉舒 (Lilian Gish)，和她的姊姊——多斯吉舒 (Dorothy Gish)，她们都是葛莱夫的长期演员，葛莱夫要捧她们姊妹成明星，过去她们都寂寂无闻，到她们主演了《赖婚》(Way Down East)后，丽莲霎时发红起来了。坐在她身旁的是男主角利查巴马士 (Richard Barthelmess)，他也是葛莱夫在捧上去的男演员。

别导演和夏利卡则坐在葛莱夫的右边。原来夏利卡除当“时报编辑”外，还当葛莱夫的剧本和宣传顾问。那会的剧务会议，是讨论《残花泪》(Broken Blossom)的摄制问题。这个故事是由原名《唐人街的珍娜》(Ginna of China Town)的短篇小说改编，是英国短篇小说家汤玛斯柏克(Thomas Burke)所著的《蓝屋夜谈》小说集中之一。这个故事的版权，无疑是夏利卡提议买的，因为这故事的男主角，是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剧中有许多事情和人物，涉及中国的风俗和礼教，故夏利卡提议聘我为该片的技术顾问(Technical Advisor)。故事叙述一个15岁的白种孤女，她的生父多年前死去，她母亲带着她改嫁一个拳师。那拳师生性凶狠，醉酒时一不如意，便把珍娜打骂。不久，她的母亲死了，剩下珍娜零丁孤苦，常被养父打得满身鞭痕。他们住在伦敦唐人街左边的贫民区，隔邻住着一个中国青年留学生。他眼见珍娜时常受养父虐待，心殊不忍，触起怜香惜玉

之心。日久，由怜生爱，但隔于不同种族，始终不敢和她接近，惟有暗中痴恋。一夜，他从外归，见珍娜坐在梯口饮泣，问起情由，才知道她又被养父鞭打。在街灯的闪烁下，见她的手脚，鞭痕斑斑，他即往药材铺买了一瓶跌打丸，然后扶珍娜到二楼寓所，把跌打丸化开，替她擦伤，并买些面包生果给她吃，之后叫她回家。但见珍娜摇头垂泪，说养父已关了门，不让进去，要求容她在门前冷巷歇宿。青年不忍迫她离去，让她睡在己床，他则卧在地板上。珍娜苦海余生，未曾尝过家庭温暖，今得青年同情，予以救援，始觉人生有点生趣。这样住了多天，终被其养父查出，被拉回家，鞭至晕厥，然后把她锁进厕所，不给饮食，生病也不予理会。青年放学回家，不见珍娜，知是被她养父拉走，心殊痛苦，但隔于身份，爱莫能助。有时在女门外徘徊，闻女呻吟，心如刀割。不久，珍娜受不了折磨，终于香消玉殒，一命呜呼了。青年怀恨在心，立志为女报仇。一夕，拳师饮醉回家，在床上被毒蛇咬死。次日，青年携着鲜花一束，到珍娜坟前，在恍惚中他似乎看见珍娜的阴魂向他微笑。这故事很简单，并没有离奇曲折的探制，若是一般制片家，一定不敢拍为电影。但葛莱夫是导演文艺悲剧圣手，他的才华和手法，已在《民族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天下心》(Hearts of the world)和《人生大事》(The greatest thing in life)等片中，表露无遗了。以上几部片是以战争为背景，场面伟大，故事充满人情味，故深受观众的普遍欢迎。但如剧情简单，没有大场面如《残花泪》，是葛莱夫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一部纯粹文艺悲剧，和后来的《赖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剧务会议时，他对工作人员们说：“我要把这故事拍成一部富有诗情画意，而且充满‘人情味’的影片。”讨论中国青年的造型时，副导演拿出一幅钢笔画给我看，纸上画着一个中国男子，穿了一件长衫，脚踏布鞋，头戴瓜皮小帽，背后垂着一条辫子。我看了对葛莱夫说：“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人已没留辫子了。”葛莱夫尚未

发言，副导演插口说：“这是我们戏剧对中国人的传统造型，若没有辫子，观众便认不出那角色是中国人了。”葛莱夫在深思，仍不发言。“请问这部片是要用虚构事实来欺骗观众，还是要用正确形象来启发观众？”我大胆地提出质问。葛莱夫仍然缄默着，全场一时鸦雀无声，人人陷入沉思之中。葛莱夫忽问夏利卡：“夏利卡，你有什么意见？”夏利卡“唔”了一声，取出手帕，除下眼镜，边抹边说：“我以为《残花泪》是文艺悲剧，除娱乐性外应有正确意识来启发观众知识，而且你在影业界是领导人物，断不能盲目附和。”葛莱夫听了，立即说：“对，我们要忠实。”他问我能否在这部片中充当他的技术顾问。我一口应承下来，这是我两年来千辛万苦到荷里活寻工的工作，而今忽然撞上身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怎可失之交臂？现在，我有机会跟一位名导演学习了！他吩咐副导演，关于中国部分的布景、服装和道具等，全部让我过目，如有不合，要我指出改正。夏利卡并提议，由我介绍几本中国文学的英文译本，给利查巴马士参考，因为他饰演中国青年，应对中国人的生活、思想等有较多的体会。葛莱夫当然赞同这一做法。这时，我忽记起孟子句：“有诸内，必形于外，无其实，而有其功者，辄未尝睹之也。”可知演员必须明了剧中人的心境和思想，方能表达所饰演角色的真情与性格。

会议后，副导演带我到厂长办公室，签一份3个月的合约，薪酬每周200元，名衔是技术顾问，并给我一张排场表，列明每场戏出场的演员、布景、服装和道具，叫我往唐人街商店和埠中的古董铺物色，有则租用，无则交厂家制造。我向他取剧本，厂长说：“老板拍片是不用剧本的。”我以为他在藉词推托，防我泄漏剧情秘密。但后来临场拍片时，他们的确没有剧本。关于这事，久已传遍荷里活，人人都知道的，无疑地葛莱夫是个天才创作家，在电影艺术上，有许多技术是他独创的。例如用镜头串插，来缩短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用冷热场交织来刺激观众的情感；镜

头前用薄黑纱遮掩使画面的光线变为柔和，用反射法来加强气氛等等……都是他的杰作。在他的《民族的诞生》一片公映后，遂使文化界对电影刮目相看，认为电影确有艺术的感染价值。电影之得成为综合艺术，葛莱夫的功劳确实不少。他之所以不用剧本，而能拍成一部成功的影片，不是靠其“天才”，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丰富的戏剧和电影编导经验，在那未办电影以前，初是舞台的话剧导演，继由最初的电影萌芽阶段直到成熟阶段，他都从事这种工作，所以他对戏剧的结构和镜头的运用等有关拍片的技术，都能驾轻就熟，应付裕如。只要有了一个题材，便可加以描绘而拍成一部理想的片子来。有些导演也曾效法炮制，不用剧本拍片，结果，不是临场弄得手足无措，就是拍的镜头，有些难以衔接上去。拍成的片子，当然失败多于成功。在默片时代，荷里活两个最权威的导演，一个是施素德美，一个是葛莱夫，他们都是肯付出大资本，用大场面来拍制巨片的创作者。但他们的手法，互异其趣。施素德美视电影为工业，注重组织和计划，一部片在未开拍前，剧本先由作家编妥，经过多人反复讨论，修改到认为满意，才交给各有关部门去进行筹备工作，待筹备妥当，然后开拍。葛莱夫则视电影为艺术，他只需一个好主题，造了一份分场表，给各部门去筹备，便可以开拍。临场随编随导，镜头随时增删，有时触动了灵感，一段无关重要的戏，可以拍成最精彩的一幕。这两种手法，各有短长，但自从声片发明以后，摄制工作，复杂化起来，没有完整的剧本，是无从开拍的。目前一般大导演的手法，都以剧本为根据，对于镜头的运用，又未必悉数依照剧本所写。他们有加减变动的自由，可说是冶施素德美和葛莱夫两家的特点于一炉。以后学而论，宜学施素德美，不宜学葛莱夫。

在电影史上，葛莱夫可算是个成功的名导演，但在美国社会，电影是艺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影是商品。以商业的眼光看来，葛莱夫还是失败了。他虽然拍了许多部挣到钱的片子，但后来因一部巨片失败，便宣告破产。华尔街的大亨们，不再信

任他，要东山再起，已没有能力，终于在穷途潦倒中溘然长逝。一代艺人，竟悒悒而终，艺术亡于钞票，真令人气短，也令人惋惜。照某作家的批评，说葛莱夫的失败完全在于他自恃“天才”，所谓“聪明多被聪明误”，因为他自恃才高一等，养成一种任性和散漫的作风，思想往往脱离时代，卒与群众脱节。他最后拍的巨片《Intolerance》（不相容），用四个时代的故事，交织编成一部剧本，共20大本，因为是默片，放映时间，需四个半钟头以上，每日只映两场，票价比普通片高了一倍。一般观众不是时间不许可，便是经济不许可。而那片的剧旨，也超过观众的欣赏水平，一般文化程度较差的观众，看了有莫名其妙之感。他企图通过影片的剧情说明，人类的战争多数是由于宗教思想偏狭，不能容忍别的宗教所引起。故事上自古巴比伦强盛时代开始，因宗教问题而引起战争；第二阶段是罗马兴盛年代，不容耶稣教，把耶稣钉死十字架上；第三阶段是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之争引起大流血；第四阶段是现代，纽约的基督教会因推行道德运动，教徒到贫民区去检查，侵犯到劳苦大众的私生活，引起一场大官司。这无疑是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他要藉这部影片来劝导世人：若要消灭战争，强者要有容人之量。

“容忍”本来是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学者用“容忍”来教人和平共处。但每一学说若操之不当便产生流弊。“容忍”的弊处，是趋于消极，如“百忍成金”，“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和“百忍堂中有太和”等等。这些教条，都是由“容忍”观念衍生出来的，结果导致近世东方民族对侵略者的“容忍”，受人侵袭而不知抵抗，受人奴役而不知耻。而西方列强，则争相向东方侵略，展开争夺殖民地的野蛮战争，正所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葛莱夫认为，如果能够把东西文化冶为一炉，孕育出东西共同的新文化，那时人类或能达致和平共存的幸福领域了。葛莱夫这种想法未必很对，因为在历史上，单单由于宗教的偏狭性而发动战争是没有的，但藉着宗教的

偏狭性而发动战争却多着。强者兼并了弱者而更强，火并了强者而遂霸，要强者对强者，强者对弱者“容忍”，那也不是过往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事。但葛莱夫毕竟有此理想。他因为有这种理想，故所摄制的影片，每部都循着这条路线推进。可惜葛莱夫这个“理想”依然不为人们所接受，由营业的失败，引致艺术生命的毁灭，这是商品社会对艺术家“理想”的“报答”。

黄柳霜与黄宗霑

葛莱夫的《残花泪》完成后，拉市基公司（就是派拉蒙的前身）也跟着拍一部以中国旧家庭为背景的《冷面城》，聘我为翻译兼助导。男主角是由日本人早川氏（Sessue Haya-Kawa）饰中国青年。在默片时代，早川氏在荷里活是个相当红的明星，他曾拍了许多片，到有声电影而世，因言语关系，早川氏退居副角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在多部战事片中当过副角，其中最卖座。



关文清（右）与黄柳霜（中）

的《桂河桥》片中的日本宪兵司令，就是他饰的。这部《冷面城》的情节，是描述一个中国旧式家庭，用了很多中国人当演员，后来驰誉欧美舞台和影坛的黄柳霜，就是在这部片中初露头角的。柳霜那时不过16岁，还在念书，日间在公立学校学英文，晚间到唐人街的中华学校补习中文。她和她的姊姊柳英早就醉心电影的。她们一有机会，便到片场做临记或当特约。她们姊妹在这部片里是当婢女角色的。她们对我，一见如故，柳英说：“我们完全知道你的底细了！”我听了愣了一下，“我们以前并不相识，你怎能知道我的情形呢？”我反问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柳霜天真地在旁插嘴，“你写给《时报、星期杂志》的文章，岂不是最好的供状吗？每篇家姐都读过呀！”说罢，向着她的姊姊噙着嘴微笑，柳英瞅她一眼，然后对我说：“柳霜最喜欢挖苦人家呀！”“噢！是吗？”我故意作惊奇状，“以后我要小心说话啦！”“那又不必，她不敢这样大胆！”说罢，又瞅柳霜一眼。“是呀，”柳霜急插嘴，“我岂敢挖苦关先生，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吗？”我听了她说出“班门弄斧”的成语来，内心着实惊奇，一个在外国长大的孩子，竟能应用中国成语来。“你在哪里学得这句成语？”我问她，“噢！上星期中华学校的先生对我们解释过这句话的用意，我记着，现在有机会我就拿来试用一下，请问我用得对不对？”“对极了！”我说，“你确是个聪明的孩子，听过一次便晓得运用，你将来无论做什么事，准会成功！”

“关先生不要太过奖她，”柳英急插口，“不过，她的记忆力确是比我强，例如读你的《童年回忆录》，她看了一次，便可以讲出全部内容来；我看了两次，仍有些未能记住。”我问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读我的作品。她说：“对祖国的情形，我自小就喜欢听人家讲的，尤其是关于我们的祖家四邑的一切，更感兴趣。”她们姊妹常怀着一种想法，一旦环境许可，一定回祖国旅游。这就可以看出柳霜姊妹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纯洁愿望。

海外的华侨，无论在哪一国，都是热爱祖国的，他们都受过

外人不同程度的欺侮和歧视，因而特别渴望祖国富强，这样下一代就用不着离乡背井飘洋谋生，而已在海外的也不再受外人鄙视。有些在海外出生的如黄柳霜姊妹，就是具有这种强烈愿望者之一。种族歧视到处皆然，利用到你就容你居留，在无可利用你时便找个借口下逐客令了。即使不被驱逐，也如美国之对待黑人一般炮制，予以种族歧视，使你在生活上，有如奴隶一般。许多华侨脑海深处，都存有“落叶归根”的念头，只要环境许可，生活有保障，人人都愿归国，没有人愿意埋骨他乡的。

黄柳霜的父亲，原籍广东台山，幼时家贫，迫得往美谋生。先在同乡的洗衣馆工作，数年后有点积蓄，便自行开铺。在罗省拂加路街租了一块荒地，建了一间木屋，前面用作熨衣工场，后面当住家，屋后用木板围了一块空地，用作洗衣和晒衣场。她的母亲据说是清朝时代某外交官的婢女，这位官员卸任回国后把她嫁给柳霜的父亲。收回一笔大聘礼。柳英有六个兄妹，三男三女，柳英居长，柳霜次之。柳霜自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宠爱。自从这次我们相识后，她曾请我到她们家里食饭多次，每次都向我问长问短，要我教她中国音乐和朗诵唐诗。我问她要学这些做什么。她说，如有宴会，可以用来参加节目，因为西人的风尚，宴会时必请艺术界来宾表演节目助兴。西乐如小提琴和钢琴既难学，又不见得稀奇，如能玩件中国乐器，或朗诵一首唐诗，即不算到家，也因物稀为贵，必使他们觉得耳目一新。我听了她说出这篇道理，暗自佩服她见解的独到处。不久，我便买一把月琴送给她，教她弹两支简单的《仙花调》，和《卖杂货》小曲等，并教她两首比较浅白的七绝唐诗。后来我在香港看她主演的《上海快车》，片中她居然用四邑话朗诵了那首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她弹着月琴来拍和。在中国人听来，可能有点平淡，但外国人听了，倒觉得有如置身在中国一样的新鲜。由此，可看出柳霜的活动能力和智慧来。

一个明星成功以后，便名利兼收，令人羡慕不已，但一般观

众，只看到演员表面上的得志，却看不到演员内心的苦恼。一个成名的明星，尤其是女明星，最痛苦的是失却了自由。她的一举一动，时常被人们注视着，记者和影迷们会到处给她麻烦。有些地方她欢喜去的也不好去；有些场合不愿参加的也得去参加。

在许多荷里活的名片里头，可以看到 James Wong Nowe 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中文就是黄宗霑，在荷里活的片场里，人人叫他做占美 (Jimmy)。他是全世界所公认的第一流摄影师。他长于配光和构图。荷里活有许多明星，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明星，和制片家签订合同时，多数提出要由占美摄影。因为他精于配光和运用镜头，构图也恰到好处，如拍恐怖片，他能使画面充满恐怖气氛。他生于美国奥利根省的砵崙埠，父亲原籍台山。在中学毕业后便独自离家，往荷里活谋求电影工作。拉市基片场有个摄影师也是砵埠人，他们幼时已相识，宗霑得他介绍，入该片场当“托机员”，周薪15元。做了多年，升为摄影助手，又多年，始升为摄影师。以一个有色人种，而能登上第一流摄影师的地位，数十年如一日，倘无优异技术，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安能达致？今已届70高龄，而仍红极一时，实在难得。

“声声归去莫多留！”

美国是一个种族庞杂的国家，故在南北战争以后，林肯宣布解放黑奴，在“匹兹堡” (Pittsburgh) 阵亡将士纪念碑揭幕时，他致辞说：“所有人类生来是平等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并经国会通过，明文载在宪法上。但“山高皇帝远”，美国的白种人，自视为优秀民族，对有色人种歧视已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何况美国的制度，是联省自治的，有许多事情，中央政府的法律是贯彻不到省级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多数省区不许白人与有色人种结婚和不准有色人种入美籍的。社会上的高等职业多是白种人充当，有色者只限于做下

层工作。所以东方的留学生，大学毕业后，便要回国，很少留在美国就业的。电影本来是高尚自由职业，艺术界的思想是比较开明，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我在荷里活结识的白人朋友，多数对我有如兄弟般看待。自从罗省《时报周刊》发表了我的《我在中国的童年》和《中国诗词的优点》以后，大导演葛莱夫聘我当《残花泪》影片的技术顾问，我的经济也较裕如，在纸醉金迷的影城，大有“乐不思蜀”了！

我严重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我是黄种人，思想可以改变，但肤色不可能改变。欧洲人到了美国五六年，入了美籍，永远就成为美国人；有色人种即使入了美籍或在那里出世的，也难抹掉脸上挂着的“有色牌照”。我就是忘却这一点而受过两次侮辱。

一次，我和一班朋友往南方旅行，分乘两辆汽车，我和一友先到，提着行李往拟定的酒店投宿。酒店的经理说，所有客房已全部客满。迫得我折回停车处候另一车到来，再往别处投宿。但后到的朋友，不相信这间酒店真的没有空房，他独自往酒店问个究竟。那经理向他解释说：“房是有的，不过刚才你的朋友带着一个唐人，因而拒绝他。因为我们酒店规定不招待有色人种的。”我的朋友责备他一场，但也无可奈何。迫得一起另找一间次等的专招待有色人种的旅馆。这次我尝到歧视的味儿，连累到我的白人朋友也受到委屈，使他们的“高兴假期”变为“扫兴假期”，我着实难以自处。从此，我内心无形中产生了一种疑问。我想：“若长此下去，我将来岂不是变成一个抬不起头来的奴才，或者是成了只崇洋的走狗。”于是我决意要转换环境。但一时仍未得个善策。怎知不久又再受一次更加严重的侮辱。事缘荷里活有间驰誉欧美的舞蹈学校，这是舞蹈家露芙圣丁士开设的。这间学校在每年举行毕业礼时，必有毕业生们自行创作的舞蹈节目表演来娱乐嘉宾。事前他们寄了两张观礼券来给我，我就约了一位白人女友依时前往。我们搭电车到近那学校处下车。那时天色已

晚，忽地由一条黑暗的横街闪出一名警察，截着问我们去哪里。女友答是往舞蹈学校。他问怎么同个Chinaman(辱华人的名词)去。女友答是她母亲的主意。于是那名恶警用凶狠的眼光注视我们有顷，然后用命令式的语气对女友说：“你不应该跟他去！”我的女友受不了这一意外打击，突然大哭起来，声声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答应送她回家，但她拒绝我送。时适有电车到站，她遂狂奔上车，我立在黑暗的街中，望着电车风驰而去。那时我心如刀割，又羞又恼，觉得这个世界将临末日似的，我呆然站在那黑暗街道上怅望……很久，很久，才振作一下精神乘车回住所去。

那晚，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一夜不能入寐，忆起由故乡来美至今，一霎眼间已过10年。这10年中，甜酸苦辣的人生滋味都已尝遍。过去的事情，一幕幕一串串有如电影，在脑际重现。最后，忽记起在香港补习英文，预备来美时，一班同学，用《卖杂货》的调子，谱了一支歌，歌词是：“飘洋过海赴美洲，到处学问求，愈学愈多益，到处学问求呀，呀！”这支歌重重复复在我脑里唱着，提醒我来美国的目的，是求学。我学的是电影，现在对这一行业，虽不能说已经有高深的造诣，但对于影业的组织和摄制技术，可说已勉能掌握，即使多留下几年，在饱受歧视的环境下，也难得到深造的可能，何不就此回国，寻求出路，如能集合资本，未始不能拍制一些影片出来，何必长留此地？正是：“十年一觉西洋梦，侮辱临头忆故乡。”想到这里，不觉诗意特浓，兴奋地跳下床来，信手写了一首七律来表达我回国的坚决信念：

“他乡恋栈有何求，歧路亡羊事可忧，首倚西窗寻旧梦，心怀故国感新秋，浮云自古纵无定，苦海而今浪不休，杜宇啼残花滴泪，声声归去莫多留！”这一决定，终于把我送回祖国的土地上来，从此，我的生活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重游荷里活

我在1920年回国，至1926年再度往美。这回是三藩市一位富商埃式答威（Isac Upham）来游历，把我国的名胜古迹和大城市与农村生活，拍了万多尺菲林。当他到广州市摄取风景时，先到荔枝湾钻石片场访我，要我提供好的摄影目标。我尽地主之谊，带他往黄花岗、观音山、六榕寺、岭南大学等地摄取，工作进行了多天才告完成。晚间他请我到大新酒店他的住处吃饭。问我有无有关日间所摄各个镜头的历史背景，并告诉我对该片的发行意见。他在北京已聘了一位8尺5高的长人刘玉清，计划将来该片公演时，用长人在戏院门前派传单，以吸引观众。我觉得他这宣传手法有些辱华，立心要打破他的主意。于是我对他说：“你既然认为这个长人有吸引观众的能力，何不派他在戏院内，让观众要买票入院后，才能看到他呢？这样更有双重娱乐的作用，岂不是更妙？”但他说，这个长人很蠢，不识英语，更不晓演戏，用他在院内做什么工作？我提议编一简单的独幕剧，不用他说话，只让他摆个样子和动作就成。他问我能否担任编一个这样的剧本。我一口答应可以，他遂提出聘成往美，负责编导独幕剧，兼该片的技术顾问。我说要向公司洽商后，方能决定。钻石影片公司是梁少波和他的弟弟梁历维组织的，第一部片《爱河潮》是梁少波本人编导的，他的弟弟当主角，我只负责训练演员和化妆的工作。那时第一部片拍完，第二部又未有定期开拍，我趁此向公司辞职。他们也不留难。

次日，我到酒店回复答威先生，他立即和我订了1年的合约，每月薪酬美金1000元，由到美国起计。他说先往香港拍多少镜头，然后回国。关于我往美的手续，委托上海一家美国洋行办理的。一个月后，我便往上海会同长人刘玉清和他的护理人兼传译，一起乘林肯邮船往美。到美后，住在三藩市的华人青年会，

该会所备有数十间客房，有讲台，可用来排戏，有体育室，有阅报室，位于华埠边沿，闹中取静，实是青年人的理想寓所。

我把在船上所写的《太子求剑》独幕剧本事，交给答威先生审阅，他表同意，便即开始编写，约期一个月完成。他也把拟定的字幕给我校对，看有没有错误，因该等字幕是插在每一地方风景或古迹画面前，有如地理和历史课本，须要简明正确。我看后略加修改，他便携往荷里活摄制和监督剪接，因那时三藩市没有片场和黑房的设备。

三个星期后，老板已由荷里活带第一个拷贝回来。那时我也已编完《太子求剑》。老板看过认为满意，遂进行征求男女主角，这是一件不易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演员不独要有演戏的经验，还要会讲流利的英语。那时的年青华侨，多数是独身汉，很少有眷属的，而土生青年能操流利英语的，简直凤毛麟角。我在华埠的中文报刊征求演员广告，刊了一个星期仍没有人来应征。后得青年会干事介绍一个姓谢的，他是谢纪元牧师的儿子，已在中学毕业，初转入美术学校。他的太太也已高中毕业，他们在高中时已参加过英语话剧的演出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便请这位干事立即带我去访问这个青年画家。见面攀谈片刻，便断定这对夫妇是最合理想的人选，他们既有演剧的兴趣，自然乐意答应我的征求。我带他们往见老板，见面之下，答威先生也认为合适。当下双方谈妥条件，签了草约，并将剧本交他们带回去，先把台词读熟，五天后就开始排演。

《太子求剑》是两场的戏，第一场是御花园，第二场是武当山头。布景是半抽象式，因为照西洋的立体布景法，则嫌太过笨重，过埠不便，成本也重；若用中国的古老式，又恐西人看得莫名其妙，为了顾及各方面的问题，故采用这个折衷办法。

剧情是：为着解除番邦的迫婚威胁，一对情侣在御花园幽会，共商应付大计。他们听说武当山上有个剑仙，有把宝剑，得者可以天下无敌，于是他们决意前往，向仙人求借宝剑。他们经

过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仙境。只见金山雪拥，雾霭迷濛。峰上立着一个红面巨人，手持宝剑，光芒四射。太子跪向巨人禀告来意，不料话未说完，霎时雷鸣电闪，巨人挥剑欲斩。原来太子求剑的理由，是为着私情，故触动天怒；后由公主以为国为民的理由去求，巨人居然交出宝剑。剧旨是“欲求胜利，必须公而忘私”。这一剧本，在今日看来，存有导人迷信和封建意识，但在那个时代和当时的环境，我想不出有比较好的题材来，而且我国的文学传统，在表现技巧上面不妨借助神圣来加以渲染。

排演了两个星期，各人演技已告纯熟，布景也经造妥，映期与院方也已订妥。那里的“首都戏院”和繁盛的商业区只一街之隔。十多年前，该院是第一流歌剧和话剧的场地。而今受了电影的影响，纽约的“流动班”（Road Show）歌剧或话剧少来了。我们和该院订了7天期，如生意好，可以继续演下去，如未有别班租约当可办到。首演那晚，答咸先生请了很多三藩市的名流来捧场。他们夫妇当晚穿了晚礼服，立在门前招待。有些客人也穿礼服前来，看来很隆重似的。这是广告公司为宣传而运用的一种手法，因该片属于教育片一类，与一般故事影片有所不同，故宣传也用特殊方式。答咸要我把英文片名《Pieces of China》译为中文，在华埠的中文报刊登广告，我意译为《中国人之中国》，以迎合华侨的爱国心理。

在三藩市上映，每晚演一场，日戏只星期三和星期六各演一场的。头两晚观众还算踊跃，各西报刊出剧评多数赞许。第三晚观众已略减少，其余四晚一路下降，故不得不结束。收入总数大概可抵宣传，和一些演出费用。停演后，答咸往纽约，向美东各院接洽，次日，派一经理带领我们往罗省来。

那时的罗省市内的人口约50余万，而荷里活已羽翼长成，电影院林立，人口也不过10万，这是由于纽约的大亨们见到电影业本少利多，纷纷投资，扩大组织，在各大城市建筑新院，或收购旧的杂耍院、歌剧院和话剧院，改为电影院。四大公司如环球

(Universal), 霍士 (Fox), 拉市基 (Lasky), 已改为派拉蒙, 歌云 (Goldwin), 美初 (Metro) 和梅也 (Mayer), 三公司联合, 成为美高梅 (M—G—M)。他们资本雄厚, 除扩大生产外, 并组织全国性的发行网和院线, 从此独立制片厂家有片也无院上映, 唯有投入他们的旗下, 否则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那时有几个红星, 差利·卓别灵、菲宾、玛利璧福和大导演葛莱夫, 认为自己的出品, 交给大公司发行, 被剥削过甚, 因而联合组织一代理发行公司, 名曰“联美” (United Artist)。这些人都是红极一时的明星, 华尔街的大亨们也乐于支持, 贷款给他们组织院线和代理影片。荷里活的影业, 遂成为五大公司的天下。

我们在罗省演出的地方是大会堂 (Auditorium) 地处繁盛之区, 对面就是“普胜”公园。这间大会堂不是公立的, 而是一间民营的大戏院。所有到此演出的各国古典歌剧 (Operas), 芭蕾舞 (Ballet) 和巨型的“交响乐”, 都是在该会堂演出, 梅兰芳往美表演时, 也是由该会堂的主人主办的。我们定期上演五天, 第一晚, 黄宗霑和黄柳霜也来捧场。那时黄宗霑在派拉蒙片场已升为正摄影师, 黄柳霜在菲宾氏的《月宫宝盒》当过配角以后, 名气更大了。她在美国出世, 未曾回过祖国, 今有祖国的游历片, 当然以先睹为快。散场后, 柳霜请我们到夜总会小食。她说将来有机会, 必定回祖国一游。后来, 她成了名, 在太平洋战事未爆发前, 携弟妹和姐姐柳英来港, 在跑马地住了几个月。黄宗霑也一度来港, 我们香港的电影界曾在香港大酒店举办盛宴欢迎。他买了《骆驼祥子》的版权, 原拟往北京摄取实景, 不料那时华北一带已十分紧张, 中日战事一触即发, 故未果行, 而该计划也因战事影响而流产。

我们在大会堂演出五天, 生意平平, 没有多大收获。下一目的地是离罗省百余里的山哥哥 (San Diego)。这埠是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海军港, 居民约有二三十万。我们在那里演了三天, 生

意也不理想。原定下一步就赴纽约，怎料这时接到答威来电着回罗省，候他回来再定行止。

回罗省酒店住下，终日无所事事，乃往访旧友，踏进壁架大厦，怎知已楼空人杳景物全非了。据说，该处一带铺户，都须拆卸，连唐人街也不能免。政府将收回该地，建筑一座新式的巨型车站。往日住在那里一班准艺术家们，都早已远走高飞，考活君去了纽约，麦基罗君已被上海中美书局聘去当经理。无聊中打电话给黄柳霜，她适在家，叫我即往一叙，有事奉商。原来，她正和美高梅公司签了一部片约，而该片的背景是在北京，她问我愿不愿当该片的技术顾问，她可以向导演介绍。该导演和制片人曾看过我们的影片。我把和远东电影公司有一年合约的事告诉她，要候老板从纽约回来，才能决定。但照柳霜的看法，老板一定不能在美东找到戏院合作，因游历片缺少娱乐的气味，难以吸引大量观众。纽约那班文艺界，个个都是讲钱的，若和他们论艺术，他们会问你“艺术”几个钱一斤了。我是万二分同意她的见解，因美国的娱乐事业，尤其是荷里活的电影业，大部分操纵在犹太人的手里，他们只知怎样去赚钱，如无把握赚钱，单谈意义若何若何，他们是绝无兴致的。她留我在家吃饭。席间问我有关影业在中国的状况。

过了一个星期老板由纽约回来，果不出柳霜所料，他在纽约租不到戏院，已把该片的版权卖给一家公司，当教育片发行了。老板问我们愿不愿取消合约，如果同意就回国，他可以发给半年的薪酬和一张二等船票。长人的监护人李某，因在上海有个未婚妻，屡次来信催他回国结婚，他第一个接纳老板的条件，谢某夫妇有家庭在三藩市，也想要完成学业，就点首赞同。我既然有柳霜愿意介绍工作，也同意取消合约，留美再求发展。唯独长人刘玉清不愿意，说要合约期满，才要回国，但老板胸有成竹，也不勉强，老板便和一影片公司斟妥，借长人拍《泰山》片集，定期10天，每天薪酬200元，饰非洲的野人王。拍完该片，老板又把

所余的半年合约，让给一马戏班，要长人饰奇形怪状的人物来展览。就是这样，老板不须多大损失，便把远东影片公司结束。

千面人主演《吴先生》

几天后，黄柳霜带我到美高梅片场去。柳霜早已和导演谈妥，到片场，即由制片人带引我到制片部签约，然后同往编剧部领取剧本，跟着往服装部，道具家私部和布景部走了一周。制片人介绍我认识各部主任，说我是“吴先生”片的技术顾问，如有不明白的问题，可和我研究解决。他说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做筹备工作，叫我回去，用一个星期时间读读剧本加以详细的研究，然后把各场所需用的服装、家私和道具详细列出交他。

这部片的剧本是由一本流行小说改编的，故事是由《西厢记》脱胎的，不过人物有点更改；女主角的母亲改为父亲，男主角的张生改为英国公使馆的青年职员。时间由古代改为民初。剧本改编的重点，在父亲和女主角的近身侍婢两角色，由千面怪人郎呈尼（Lon Chaney），饰父亲，因郎呈尼主演了《驼侠钟声》以后，红极一时，有极强的卖座力。柳霜饰侍婢，份量也十分重，这角类似粤剧中的《红娘》。男女主角的戏比较轻。男主角是英国来的话剧演员饰的，女主角是由身材矮细，但胸脯甚大的法国人饰的。我曾对导演提起中国古代美女，很少大胸脯的，即有天然大乳，也用“扞胸”法扎至平坦方认为美观。导演却说：

“我拍的电影是给现代的西方人看，不是给古代的中国人看，若女主角没有‘性感’，有谁喜欢看她的戏？”由该导演这一言论，我们不难想到，那时的荷里活导演，挑选女演员的主要条件，第一是“性感”（Sex appeal），女主角富有性感，便有把握赚钱，这种观念，简直是毒害人类思想的疫苗。今日世界的色情泛滥，荷里活的导演先生们实难逃脱“始作俑者”的责任啊！

我用三天的时间，把剧本读了两遍，然后用打字机，把各场

所需用的家私、道具和服装造了清单，以后四天才召开剧务会议。在这期间，我往各图书馆，找阅有关的中国书籍或图片来参考，但那时罗省和荷里活图书馆的藏书多属欧美的，关于远东各国的资料，十分贫乏。找了两天，找不到一点合用的资料。于是，我把余下的两天时间，到市里的古董商店查询，果然发现有许多古董可以租来作道具用，不过服装多数不是舞台的绣花衫便是清朝时代的袍裙，没甚可采用的。

制片人依期召集剧务会议。我带了造成的清单和一部清内府藏书的《燕寝怡情》前往。这部书是我第一次回国时到南京游览，在夫子庙邻近一间书店，用五元大洋买的，内有工笔画二十余幅，是用宣纸石印的，听说是八国联军入京时，洋兵由清内府偷出来的。我对该画非常爱惜，常带在身边。在我到片场的会议室时，人们都已准时到齐，有正副导演，各部门的主任，这是西方人的好习惯，不论大小约会，必定依时，且全没有架子气味。反视过去旧中国的达官贵人，大明星，或名流之辈，多数不依约会时间到场，能不惭愧？当下制片人问各人对筹备工作的意见。导演首先提议：“关先生是中国人，而且是本片的顾问，是否先请关先生发表意见？”我把准备工作的经过，当众报告，并把清单交给制片人。他略检阅，便把服装清单交服装主任，道具家私清单交给道具主任。跟着，布景主任问我有没有中国贵族住宅的图片，我就把《燕寝怡情》画册给他看，他看后点头微笑，对导演说：“这正是我们所需求的啊！”导演把书接过凝神细看，叹道：“很有价值！”

服装主任是个四十余岁的妇人，她满披着金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脂粉味扑鼻而来。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人。她看了我列出的服装清单说：“照这清单看来，除主角的服装要特别度身剪裁外，还要做十多套华贵的男女衣服，我们所有现成的都是适合穷苦人家穿着的。”制片人要她和我研究，立刻开始裁制。跟着道具主任说，部内所存的家私道具，很少合用的，看

来要往三藩市物色，因罗省唐人街的商店，货物是有限的。导演要我负责搜罗，无论租借或购买，或自行制造，总之要在一个星期内备齐，随即宣布散会。一场会议不需半小时便告完毕。对此，我不能不暗自钦佩领导人办事的能力，干净利落，全无拖泥带水来耗费时间。

出了会议室，布景主任拉我到咖啡室闲聊。他问我关于中国豪华住宅的布置，问我愿不愿意把《燕寝怡情》画册让给他，他愿出300美元的代价。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为了用作布景参考，我借给他摄下照片。

我拿了家私道具清单往日前询问过的古董店，问他们能否供应这些家私杂物。那老板是中山县人，他们兄弟各开一间，哥哥的在唐人街，弟弟的在西人区，两间的货物可以互相调配，因而他们能够供应一大部分，其中仍缺的，也可去函三藩市他们的联号，办了付来。我同他们商妥用租借方式，由他们包办一切。所有筹备工作，不满一个月，都告完成，影片依时开拍。

这时水银灯被广泛采用，美高梅片场已建了四座大棚，不论日夜阴雨，都可摄制。《吴先生》的摄制工作，只花了两个半月便已完成。我的合约也告期满，便往三藩市候船回国。

与美国移民局斗法

1932年，联华影业有限公司因鉴于侨胞离开祖国日久，极需经常输往祖国影片，让他们多看看祖国的风貌，所谓“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昔”，从而维系他们的爱国观念。也可替国片开辟一个新市场。就派我带《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和其他影片数部到美国放映。

我是搭“豪华”轮的游客位。那时的邮船，客位分三等，头等叫大台，二等叫（Tourist Class）“游客位”，三等叫“大舱”。头等在船面，二等在中间层，三等在船底。大台客多数是

白人，多数专讲“架子”，朝早、中午、晚间，穿不同的服装，有些甚至在晚餐穿礼服。我们中国人除官员为国家的“体面”，要搭头等外，多数不喜大台面搭比较中庸的“游客位”。华侨多数喜欢搭“大舱”，因不但经济，且都是有色人种，彼此不拘礼节，或阅览或拍照、或玩“麻雀”，有说有笑，各适其适，容易消磨旅途时间。

“游客位”每房两人，分上下床，和我同房的也是广东人，名李继渊，是国民党派往秘鲁当党书记兼侨报编辑的，现往三藩市，候轮再转南美。这是他初次出洋，不能讲流利英语，但学识相当渊博。

船到三藩市，于午后两点靠岸。我们收拾好行李，带了旅行证件，上客厅候移民局官员来检查护照。他们三点才到，展开审查工作。国民党三藩市党部派了一位姓黄的职员，来迎接李继渊，领事馆派了李副领事来接我。那时的外交部长是联华公司的董事，他早已去函各埠领事馆，把我此行的任务交代过，并囑他们尽力协助。因而我满以为很快就可上岸。怎知候至时近五点，所有的搭客都已离船，只剩下我们两人。李领事向移民官员查问，他们答称，我们须往移民扣留所住一晚，明天方能办我们的手续。李领事提出，由我领事馆担保上岸，明天再到移民局补办手续。但那官员答，那是他们的法例，所有移民案件，如当天不能办妥，就要往扣留所过夜。李领事交涉无效，问我们如何打算。当时我怒气冲天，拿了护照，上前向他们质问，我说：“我是游客，为什么我们领事馆担保，也不准上岸？”一局员瞪我一眼，然后冷笑着说：“你们领事馆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私运毒品的机构罢了！”我听到这话，不禁又羞又愤，久久不能平息下去。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确曾有人利用外交特权，给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号”载了一皮箱鸦片交给三藩市领事馆，怎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查获，轰传开来，全美国报纸以头条新闻报道其事，这确是一件玷辱国体的大事！但今天那局员仍引用往事来抹煞我们的合理要求，想藉此堵住我们的口舌。怎知我也不示

弱，便冷笑地对他们说：“这是你们情报局的杰作，你们不只揭发这件事，也还揭穿你们国会议员卖私酒（那时美国是禁酒的）；还揭发你们一位总统暴死在情妇的闺房里呀！”他们听了我的反击，愕然地面面相觑。停了一会，其中一局员强扮着笑脸说：“哈哈！我认为各国都有丑闻呀，我们走吧！”说罢便一哄扭动屁股上船去了。

李领事见他们走了，对我说：“你驳得好，我立刻回去，商量对付办法。”

李领事和黄干事去后，我们返回房间。李继渊问我去不去扣留所。我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去！那里是东方人的地狱！入了去，便肉在砧板，要受那班牛头马面的局员折磨。”他问我怎样折磨法，我便把我第一次来美时的遭遇告诉他：当我第一次来美时是由一位美国女教授带来的。民国初年，她到香港招考一百名学生来美读书，第一期75名，我是第一期来的。我们的船到三藩市泊岸后，就成批被赶往“仙人岛”，那就是远东移民的扣留所呀。那地方离三藩市约有15海里，乘电船要一个把钟头，那扣留所是一座大木屋，建在荒岛上，周围用铁刺网围绕着。我们一到，便由医生检验眼、肺和勾虫。这些手续本来在香港未落船前，经由美国领事馆指定的医生检验过了。到美后依样再来一次，这不过存意留难远东移民罢了。其中最可怕的是验勾虫。他们要你喝一大杯泻盐水，喝后每人给一只只有号数的铁盆，分十人一组，被关进一间空房去挤大便。有些人不惯集体大便，出尽气力也没有粪出，就由医生动手用仪器插入肛门来钩取。那些有粪的盆，便由一个叫做“洗屎鬼”的西人捧去，给医生检验。医生有没有检验那只有天晓得！当时有两兄弟，哥哥没有粪出，他深怕医生以仪器插入肛门，从弟弟盆里取了些粪放入自己盆内。不料，次日医生宣布，哥哥有勾虫病，要留医，弟弟正常可上岸。又我有个亲戚，他暗中给“洗屎鬼”5美金（那时美国还用金币），第三日便算医好了勾虫，安然上岸了。我那时没钱供奉“洗屎鬼”，故被

扣了十天，方能上岸。有些同学比我更糟糕。另有些华侨子弟凭“出世纸”或“商业”证件来美，都被扣留在那里，不只要检验身体，还要问口供。问话时如审判犯人一样。由全家人的出生日期以至姊姊何时出嫁，母亲缠脚或天足，都要问个到底。有些口供用十张纸仍答不完。如果说错了一句，便被判为“假纸”配返“唐山”。有些父兄在美，不服判决，请律师和移民局打官司。有些案件由三藩市打至美京最高法院，拖延数月。有些甚至拖延数年，被关在扣留所的子弟，有的生病致死，有些无以自解，竟往厕所用裤带上吊。你如到那里去，第一件看到的是木板墙上写了许多类似“叹五更”、“愿命”、“问天”、“骂神”、“哭灵”或“绝命书”等词句，这就是我当年所见的情形。

李继渊听了我的叙述，忙惊问：“然则我们应怎么对付啊？”我坚决地对他说：“‘弱国无外交’，我们领事馆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不能示弱，我们要本着孙总理的‘大无畏’精神，对他们永不屈服。你是借路，我是游客，我们没有犯罪，如果他们不准我们上岸，我们就住在船上，搭原船回国。”李继渊听罢似乎面有难色，正欲发言，忽有人拍门，是船上的侍应生带着一个移民局职员来，要我们去“仙人岛”。我对那局员说：“不去！”便把门关上。很久没有声音，谅已走开。半小时后，又有人敲门，及开视，原来侍应生捧两份晚餐来。这是因搭客都已上岸，餐厅不开，故特送来让我们在房里吃的。这位侍应生也是广东人，是香港海员工会派来船上工作的。是晚，我们在原房草草又度过不愉快的一宵。次晨10时，我们仍未起床，侍应生前来催醒，说李领事和移民局长在客厅等我们去商谈。我们听说李领事同来，洗漱后立刻前去。李领事介绍局长和我们认识后说：“钟士局长今晨到领事馆，说‘昨日是误会，很抱歉，故特来向两位解释，这由于公务太多，一日办不完，所以两位的事，留待今天办理。’现在局长来陪两位往移民局，循例一行，即可上岸。”我问李领事能否同去，他说可以。但我们未进早餐，局长

要侍应生供应餐点。餐后四人一齐乘移民局的电船往“仙人岛”。到时，医生照例翻起我们的眼皮一望，便算了事。并没有验肺和勾虫等捞什子。局员略看护照，盖印签字，手续便完。局长对我们说：“现在已将12点，各位在这里午膳，然后一齐回三藩市吧。”说罢，局长便带我们到花园散步，边行边对我们说：“有人说我们这里是移民的监狱，你们看监狱有这样美丽的景致吗？”说时指着两旁盛开的花木和近处的网球场。我望望隔山的斜坡上，满布铁刺网的大木屋，依然如故。李继渊和李领事从未到过，当然不知个中情形，但我在那里住过十天，正是终生刻骨铭心！不过局长既然前倨后恭，我也不好当面戳穿他们的肮脏黑幕。时近中午，局长和医生陪我们用了一顿丰富的午膳。席间局长对李领事说：“日本侵略上海，真是无理！”李领事略事思索，说：“他们野心很大。”然后指我说：“关先生是联华影片公司的导演，他带了一部日本侵略上海的纪录片来，如果局长高兴的话，公映时我就通知你。”局长表示很欢喜看，他并问我：“你是导演，在哪里学的？”我答：“在荷里活。”他显得有点惊奇问：“噢！原来你以前来过？”“这是第三次了。”我答。“你说得一口流利英语，是在荷里活念的吧？”“不，我未到荷里活前，是在卜地利念书的。”他高兴地问：“加省大学呀！”我点头。“我们是先后同学啊！”言下甚形亲密。午膳后，局长便开电船送我们到三藩市。一幕精彩斗法节目至此结束。从这次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定下做人的准则是：第一，要有自尊的心理。第二，要有坚强的意志。第三，要有奋斗的精神。并要记住：“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这两句格言。